

目 次

1931年重版序	肖伯納	1
1920年版緒論	塞德尼·韦白	15
1908年版序言	肖伯納	34
1889年初版序言		48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	肖伯納	51
-----------------	-----	----

地租：土地的开垦和人口——地方富戶的經濟起源——地租和能力租金——租佃权——無产者的出現。

价值：交換的結構——价格和效用——供給的效果——無所偏愛法則——总效用和最后效用——价值和生产成本的關係。

工資：無产者——劳力的出售——生存工資——資本主义——富人的增加和財富的减少——交換价值和社会效用的分离。

結論：历史和理論的显著矛盾——社会主义——悲觀和私有财产——社会改善論在經濟方面的健全性。

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	韦白	81
-----------------	----	----

民主主义理想的發展：英国社会主义的先驅——烏托邦主义者——进化观之提出——民主主义的教訓。

旧的社会組織的解体：中世紀主义的衰落——工業革命——法国革命——民主主义的發展。

無政府状态时期：个人主义——哲学的急进主义与自由放

任——功利主义者的分析。

理智与道德方面的反叛及其政治后果：詩人，共产主义者，
哲学家，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和革命者——国家活动范围
的扩大——現存的国家登記、国家檢察和国家对劳工的
直接加以組織——急进主义的綱領。

新的社会組織：进化和社会有机体——自由和平等——健
全的社会。

社会主义的工業基础……………威廉·克拉凱 120

个人生产之被代替——农村手工業——机械的發明——
工厂制度。

大工業的成长：兰开夏的擴張——白种奴隶——国家的
干涉。

世界性商業的發展：自由貿易的胜利——对新市場的爭奪
——世界的运输队。

經理和資本家的分化：合作和股份公司的兴起——“联合
壟断組織”与“托辣斯”——資本共产主义的专橫。

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塞德尼·奧利維尔 164

道德的进化：共同的目的——自由的条件——个人与种族
——社会意識的成长——習俗和法律。

财产和道德：各种财产形式在道德观念上的反应——阶级
道德——自由条件之被否定——社会解体。

社会的复兴：各种基本条件的順序——恤貧律的观念——
各种派生的条件——道德和理智——学校的观念。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組織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产……………格拉罕·瓦拉斯 193

有形的財富：消費性的資本——生产性的資本。

債務和勞務：延期的和預期的消費——利息。

观念上的財富：版权和专利权——教育。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業……………安妮·貝桑特 216

对劳工的組織：农村的——城市的——国际的。

产品的分配：个人——市政当局——国家。

社会保障：对劳动的鼓励——关于發揮创造性的規定——
对特长的奖励。

第三部分 向社会民主主义过渡

向社会民主主义过渡……………肖伯納 241

从中世紀主义到資本主义：旧制度——商人冒險家，海盜，
販賣奴隶者，資本家——新制度的成长破坏了旧制度
——混乱状态。

从無政府状态到国家干涉：政治經濟学——黑格尔的完美
国家观——社会主义及其各种实际困难——突变之不切
实际——民主主义是官僚主义的解毒剂——国家干涉。

从国家干涉到国家組織：艰苦的日子——革命的社会主义
之复活——完成民主主义的其余步驟——社会主义的机
构——社会压力——城市租金——新稅——国家对劳工
加以組織是一种必不可少的补充办法——失业者——关
于賠償方面的困难之解决方法——市区社会主义發展的
經濟反应——放弃以暴力实现社会主义并不是不光荣的。

社会主义的远景……………赫伯特·布朗德 274

英国各政党的状况：發展的路綫——在思想和工業方面的
發展速度与在政治方面的發展速度相比較——所謂的輝
格党的消失。

政治的社会化：政治上的近視——假社会主义——各种混
淆視听的建議——渗透到自由党里去的梦想——梦想的
幻灭——新的开始。

当前的任务：政党分裂的真正界綫——希望与恐惧——工
人的團結。

1931年重版序

肖伯納

这一部論丛显然是不会絕灭的。当它十分出乎意外地达到二十周岁的那年，我这一个最初的編者，还得要給它写上一篇新的序言。过了十年之后，仍然不断地有人需要它，因而塞德尼·韦白（現在的巴斯菲尔德勋爵）又不能不为它的三十周年紀念写了一篇序言。我們以为，这样做一定会万事大吉了；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因为它的四十周年已經到来而且过去了；而我呢，相当詫异地發現我还活着，并且受托来为它写出我的第三篇序言。

我不願故意說本書的这种长寿是一桩值得庆祝的事。这本論丛中所包含着的每一种事物，到現在是應該成为每一个公民的普通教育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我国的普通教育現在是落后了几个世紀；好几代的英国人仍然把許多不殫遺力諄諄教誨于人的观念灌輸給我們。这些观念，一半是屬於漢藍泰吉尼特 (Plantagenets) ① 宮庭，一半是屬於安妮女王 ② 治下的咖啡館的。这一大堆陈旧的东西，就好像西苏菲斯 (Sisyphus) ③ 的石头那样地滾了回来，阻碍了發展思想和消除愚昧的每一种企圖。我們这些曾經作过这种企

① 漢藍泰吉尼特是英国从 1154—1399 年的一个王朝名。

② 安妮女王是十八世紀时的英国女王。——譯者

③ 西苏菲斯相傳是希腊古时国王，因生时作惡多端，死后入地獄，被罰推石上山，但推上又滾下，永远如此。——譯者

圖和把我們這一代的許多知識分子在經濟社會學方面提高到現代水平的費邊論叢作者，現在正面臨着安妮女王和亨利六世仍然在位的一代新人，和我們自己超越地發展了的那種社會主義思潮的階段，而仍然遠遠地處在我們這一代最年青的人們的前面，因此不僅只我們的這本論叢，甚至於比它早十年出版的亨利·喬治所著的“進步與貧困”一書，現在仍然不斷地在銷售。

可是，在我們的政治環境方面，目前却有着一種令人驚異的進步的氣氛。當我寫這篇序言的時候，一個費邊社會主義者正擔任着英國的首相。兩個費邊論叢的作者也在上議院里，他們當中的一個是內閣部長，另一個是前任的內閣部長。國會里充滿了費邊社員以及認為費邊社還不夠極端的一些社會主義社團的成員。費邊主義現在常常被人說成是一種過時的經濟學方面的自負夸耀，對於這種自負的夸耀，一些溺愛它的人們緊緊地抱着不放而以為他們仍舊是年輕的先驅者呢！許多社會主義的內閣、社會主義的總統、社會主義的獨裁者們，現在正在整個歐洲把過去一些帝國的殘余收集起來。在歐洲具有穩定政府的最大一個國家，現在乃是一個共產主義的國家，在這個國家里，那些具有安妮女王——漢藍泰吉尼特式頭腦的人，覺得比耶穌會會員（Jesuits）在伊麗薩白女王統治下的英國更難生活^①。甚至在亨利六世所辦的學校仍舊占着上風的英國諸島，每年對資本家的收入加以沒收的數目已經高達這種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而且經常還借助遺產稅以同樣的規模來攫取他們的資本，并把所沒收的大部分不僅以實物的形式而且也以現金的形式立即在無產階級當中重新加以分配，這已被認為是一種理所當然的事了。

^① 耶穌會是西班牙人 Loyola 在 1533 年所創辦的，屬天主教，伊麗薩白女王信奉新教，反對天主教。故云。——譯者

我們在民主主义方面前进的气派，也是同样引人注目的。当第一本費边論丛出版的时候，欧洲大陆只有两个共和国（假若把小小的聖馬力諾共和国 The Republic of San Marino 算上的話一共是三个），但却有四个帝国和十一个王国。今天，那四个帝国已經消失而为共和国所代替了。包括冰島和阿尔巴尼亚在內，現在欧洲还剩下十二个君主国，共和国的数目一共有十六个；而在人口方面則以十一比四超过了君主国。三万万以上的人民已由君主制过渡到共和制。君权神授（Divine right）說永远不会再被人們提起了，而人民的主权，無論是靠成年人的选举或靠在新宪法中明确宣布，都到处得到了人們的公認。至少，在書面上，民主主义占了上風并且引导着人类在前进。

假若所有这些变革都算是正在發展中的社会主义的一部分，那么，这会是一桩值得庆幸的事。但是，这是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并且是在牺牲資本主义的情况下来使社会主义得到好处的一种企圖；同时这也是一种真正符合这个口号的政策，那就是：“一个賊偷了你的东西，你可以从他那里偷回来”。这样一种政策包含着更多的破产的危險而不是太平盛世的諾言。例如現在，当組織文化的工作已經超过了私人冒險家的能力范围和他們个人利益的时候，过分緊張的第一个征象，就是伴随着商業的复兴和合并而来的一种反常的失業人口的增加，以及这些失業人口要求政府的救助。全体失業者会竭力要求私人企業去滿足社会的需要，而这种社会需要的滿足，却愈来愈超过了私人企業所能滿足的可能性。当失業者的数目达到几百万人的时候，（在相当一个程度內，他們当中包括着曾經在一个史無前例的令人恐怖的战斗中学会了賤視人命的复員軍人）他們实际上就变成了一支依靠国家养活的大軍。

在过去人类文化历史上已發生过的这种窘境当中，資本主义

总是企圖用金錢遣散它所不能雇用而又不敢再讓他們去挨餓的那些人。失業于是变成一种公認的無产階級的生活方式。当我写这篇序言的时候，还存在着从来没有工作过的正在少壮时期的青年，以及从来没有看見过他們的父母們工作过的兒童。假若两三个失業者住在同一間屋子里，他們可以用威胁資本主义直到它同意与他們分享社会脏物的办法，依靠“領取失業津貼”来过一种按照他們自己的标准說来是一种相当舒服的生活。假若这两三个人的联合变为两三百甚至是两三千人的联合，正如当失業津貼制度得到了永恒的称誉，他們会这样做的时候一样，那么，失業者居住的那些徒有虛表的宿舍，就会使通过劳动介紹所仍能找到工作的人們的那些朴实的住宅为之逊色。在季节性行業中工作的人們，現在是依靠他們过去在旺季所提供的失業津貼来維持他們淡季的生活。这样的一种情况，显然就是在重演古代羅馬無产階級的“食物与游艺”的把戏。这种类似的情况会立即变得更为明确，因为我們的警察曾經鼓励电影院在星期天照常开演，以減少街上的行人和維持秩序，从而由国家給予补助的电影院就很可能成立起来，作为防止失業者騷动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办法是必然会像羅馬帝国那样地归于破产的。

我們並沒有充分認識到，而且在这本論叢中也並沒有說明，資本主义制度会像社会主义一样，完全是烏托邦式的、假設的、并且是由聰明的唯心主义的作者們用各种論文的方式写在紙上的一种制度。这种制度的精心結構的理論就是关于如何使我們广大的人口得到养活，以回答他們每天所不可少的第一句“請賜給我們今天的面包”的祈禱語，从而使这个重大問題得到解决的办法，就在于使生产資料成为私有財產，执行在这种条件下一切自願訂立的契約，維持公民和公民之間的和睦，和把此外的一切問題听憑个人利

益的法則去处理。有人認為，这个办法既可以保證每一个工人得到足够維持生存的工資，又可以对富有的有閑階級提供掌握文化的手段，并使他們称心滿意地有足够的金錢去从事儲蓄和投資，而不致产生个人的窘困。

这一理論，在生产和貿易方面是非常有效的。它使我們建立了工厂制度，設置了动力机械以及交通運輸工具，这些工具曾經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即使是像鋼鐵一般堅強的威灵吞公爵 (Duke of Wellington) ① 也会变得像凱撒 (Julius Caesar) ② 那样地茫然不知所措。这个理論曾經产生了一些金融集团，它們能够輕而易举地把安妮女王統治下的英国买了下来，就如像安妮女王能够买下一个船塢一样。恰如各种教会和各种教义以往的情形那样，这个理論以它不断相繼完成的种种奇迹使我們惊喜，使我們满怀希望并且成为輕信的人物。不过这个理論所完成的奇迹是比較实际的，任何一个乡村里的人，只要他买得起一架收音机，或把几个便士投入公用電話的錢孔里去，就能够演出这种奇迹。这个理論曾經使得私人的收入有可能增加到某种程度，在这种程度上，就是帝王們現在也会被認為是相对貧穷的人了。

很不幸地，这些在生产与金融方面的空前的成就，却伴随着分配方面的失敗。由于这种分配的極不公平并且对于社会具有危害性，因此不能再讓它繼續下去是毫無疑問的。人們正在世界各处竭尽一切的嘗試，企圖以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稅收政策、国家对工資的管理以及工厂条例等等，在資本主义制度的範圍內来挽救或至少減輕这种失敗。但是在資本主义範圍內，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稅

① 威灵吞公爵是战胜拿破侖的英国名将。——譯者

② 凱撒是紀元前一世紀的羅馬皇帝。——譯者

收政策，意味着对懶惰者給以津貼，而不意味着对从事生产性工作的人們給以工資，而且把工資和工厂加以管理，对于失業者是没有什么裨益的。

必須記住：分配不仅是指对物質产品的分配，而且也指对工作“閑暇”的分配。假若現代的生产方法使得一个单独看管机器的人，在一天之內比在十八世紀同一行業中的一个沒有机器的工人在一年之內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那么，在“閑暇”这一方面便算是一种利益，而这种利益是通过把工作時間减少百分之三十或約莫百分之三十来实现的。假若这种以及所有同性質的在閑暇方面的利益是平均分配的，其結果必然是工作時間的不断减少以及个人自由時間的不断增加。但是除此而外，也还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有可能使工人們的工作時間与以前一样地长，或者更长一些，并且使有閑暇而富足的人数或奢侈程度增加，或使二者都有所增加。这正就是資本主义制度目前的做法，甚至可以說是它力圖要这样去做的办法。在資本主义制度的現阶段，当它在有閑富人之外又加上了一个失業大軍，因而愈更造成浪費的时候，社会財富分配的改革已經变成对人类文化生死相关的問題了。

直到目前为止，除了把資本主义社会轉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而外，还没有其他的补救办法能够經得起考驗。为了鼓吹这一轉变并揭示出这种轉变的各种政治含义而成立起来的費边社，現在还是像过去那样地为人們所需要。

参考一下本書早期的几篇序言（这些序言無論如何不應該被讀者們忽略过去），就可以回忆起这样一桩事来：那就是在早期和它敌对的各种社会主义者的团体中，費边社的一个显著的目标就是它的坚定不移的立宪主义的主張。当那时的最偉大的社会主义者、詩人和技师威廉·莫理士告訴工人們說，除了革命之外他們沒

有别的希望的时候，我們就說过，假若那种說法是真的，那么，他們就是毫無希望的；并且我們鼓吹他們要通过国会、市政当局和选举权来拯救自己。我們虽然沒有完全說服莫理士，但我們却使他相信事情可能按照我們所指出的道路那样地發展。在今天看来，莫理士似乎不是像在八十年代那样地錯誤了。一个欧洲的大变乱（它是这样一个非凡的和血淋淋的殘忍的行为，以致一切历史上有任何記載的革命与它比較起来，都是微不足道的）^①，在四年之內，就把整个世界改变得比費边社根据宪法在四百年內似乎可能做到的还要多。給予立宪主义决定性打击的乃是对爱尔兰問題所采取的那种武力解决的事件。三十年的立宪运动和国会工作，自从自治法案（Home Rule Act）通过以后便宣告終結。这个法案被它的反对者們所否認，他們把自己武装起来去抵制这个法案，并且由于在爱尔兰服役的几个陆军军官發动叛变的威胁而得到支持。首相向反叛者保証，他們将不致受到压制，并且当局将默許他們运入軍火，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采取的同样行动却受到英国军队的攻击。最后，自治法案被中止了，而爱尔兰問題則是用一場野蛮的燒杀来加以解决。在这次斗争中，爱尔兰军队由于受到一般人民的拥护，打败了英国的駐防军队，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英国或者給爱尔兰以自治，或者卷入一場再征服的血战，而后者無論在英国或美国都是不会得到輿論的支持的。这个非常轟动一时的引人注目的教訓，由于出自这次战争的高度显示，說明了英国政府当着有刺刀逼近喉头的时候（在这次战争里是德国刺刀，但英国的刺刀也同样有效的）能够以急轉直下的神速和令人最滿意的成就，完成作为国家組織應該建立的一切功勛，这些功勛，在英国政府被費边主义者們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譯者

最尖銳的爭論和国内社会主义者們的选票压力之下，曾經宣布过是不可能的和烏托邦式的。这个教訓，大大地削弱了立宪主义者的地位，加强了各个政党和各个国家中的武装恐怖主义者的地位。

除此而外，还有俄国的 1917 年的革命。繼这一革命之后的建立自由主义的国会制度的尝试，几乎立即宣告破产并且一扫而空，而代之以一种采取行动的人們的無情的专政，这些人也是馬克思主义者，他們的反对者很快就使这些馬克思主义者們确信：建設社会主义，不能依靠討論和选举来实现，只能依靠那些积极热爱社会主义的人們，并且把那些积极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們杀掉才能实现。他們实际上就是照着这种办法去做的，并且以極大的精力把它完成了。他們非但沒有失掉群众的同情，反而發現全国人民以極大的热情来欢迎这种領導，以致最初在軍事方面显然处于絕望的劣勢地位的、好像是偶然以几支手槍武装起来的一群暴民的布尔什維克，面对着大部分依靠英国金錢而充分武装起来的紀律严明的軍隊，竟成功地組成了一支紅軍，由于它完全扭轉了局勢并将反动的白軍在不可挽回的挫敗的情況下逐出戰場，因而使一桩不可能的事情得以实现。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靠着他自己的信念，以为由于各种耽延、阻碍、逃避問題的行为而丧失耐性、并且看出了那無止境地采取懶惰态度的国会因而变成伪善的那些人民，他們所需要的，不是自由（他大胆地把自由称之为腐烂着的尸体），而是刻苦的工作、严格的訓練以及絕對而迅速的国家行动。簡言之，他認為人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他把立宪主义抛在一边，立即成为一个公認的和不可抗拒的独裁者。类似的武装政变也相繼發生于西班牙、南斯拉夫、波兰和匈牙利。所有这些政变証明：在反对君主专制中成长起来的旧式的自由主义的国会制度，在維護群众自由的

掩飾之下，已經把那種使國家事務陷于癱瘓的藝術培養到了完善的境地，它不但公開受到輕視，並且可以被取消或廢除而找不到任何有力的支持者。三億多人從君主制到共和制的這樣一個轉變，其結局是在經過了一個短期的“邊做邊改”（Trial and Error）的試驗以後，把大約兩億六千萬人從立憲主義的國家統治之下轉移到獨裁者的專制統治之下。當時沒有人需要這種專制，但是另外的辦法却是行不通的。

但是獨裁政治，如像宣布戒嚴令一樣，乃是一種緊急的措施；因而遭到人們認為戒嚴令根本不是法律的正確的反對。當一個國家的事務陷于絕望的混亂狀態之中的時候，當這個國家的人民已經在騷亂之中受到許多痛苦，以致樂意無論在怎樣專橫的情況之下接受管束和訓練的時候，某些有雄心的人物便會抓住這個國家的要害把它奪取過來並且迫使它建立秩序。努力從事國政往往使得獨裁者精疲力竭；甚至於在實際情況並不如此的時候，他也会感到他不能像一個小部落的酋長那樣地事必躬親。那就是說，他感到必須要有一個憲法。這也許是一個選舉制的憲法，或者是一個有若干獨裁者代表全國各地的獨裁制憲法，但是這個憲法是不可缺少的；因為個人專斷的現代政府在實際上是不可能的。除此之外，這個憲法必須是一個積極的而不是一個消極的憲法。那就是說，它的目標必須是幫助政府有效而迅速地把各種事務控制起來甚至承擔起來，而不是像我們當前英國的憲法那樣，對於政府越出警務、國防和外交範圍以外的一切努力，都要加以阻礙、削弱和打擊。

這裡所談的這種情況，正是一塊礁石，威脅着老年的費邊主義者們的立憲主義。他們已經活到看見了他們的政治計劃超出自己的一切合理希望而成功地實現了。他們所力爭的、可以參加國會

的工党已經形成，而且曾經兩度執政。下議院執政黨的重要議席也被社會主義者所佔據。然而，就社會主義的情況而論，這種議席就由保守黨的銀行家和貴族來佔據也未始不可。因為，工業還未曾實行國有化，而且失業者又被那種具有災害性的古羅馬式的津貼制所收買。此外，政黨制度（在這種制度下“反對黨的任務就是進行反對”）仍舊在有力地發生阻礙作用，以致無人反對的、可以在半小時內加以處理的提案，被當作是真正值得爭論的措施而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去處理。根本的變革是不可能的。僅只是那些為了防止國家機器受到阻礙或停頓下來所必不可少的修理措施，才純然由於環境的強迫被提了出來，並且得以通過。工黨政府，也正如其他的政府一樣，在失望和倒退中帶着它們不曾實現的黃金時代的諾言而壽終正寢了；革命的左派和法西斯右派每天都證據分明地看到了國會的行動在國內毫無作用而國外的硬干則見效神速。

情況既然是這樣的十分危險，費邊社發現自己面臨着一種在本論叢中所未曾預料到的任務。它必須籌劃新的政府機構，這種機構不是如像我們現有的機構那樣，被設計出來用來阻礙政府的行動和中立皇家的特權，而是被設計出來把我們這個國家的主權加以組織並使它發生效力，從而限制私人財閥利益所攫取的特權。在沒有完成這一任務以前，所有循着立憲的道路來達到社會主義的說法都是一些空談。今天，這種立憲的道路是完全不能達到上述目的的，是行不通的。當人們走上這條道路的時候，他們只有訴諸革命或者採用獨裁政治。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那個陳旧的工黨競選計劃，現在雖然已經實現，但它只是把我們引入了絕路，因而必須代之以一個復興英國社會的新計劃，這個新計劃同時還可以作為復興一切現代社會的典型計劃。韋白夫婦在1920年出版了他們題名為“大英社會

主义共和国宪法”(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的那部書来帮助解决这个問題;不幸的是,他們提得太早了(这是对远見的懲罰);因为随着战后(指第一次大战以后——譯者)假繁荣而来的巨大的工業危机,直到該書出版一年以后才發生;而且在整整十年以后,商業界和政治界才开始明白,除了一般性的商業复苏会紧随着短暫的蕭条而来之外,其他任何情况都会更为恶化。而且,在1920年,除了俄国以外,独裁政治还没有出現。而俄国的独裁政治在英国并未引起重視,因为英国的政府和报纸瘋狂地坚持把俄国革命——这个革命尽管带有一切被拖延太久的革命所具有的偶然恐怖,然而它仍是一桩最慈善的事情——当作仅仅是一种民族罪恶的爆發,不久就会像法国革命那样地被鎮压下去的。关于法国革命我們也犯了同样愚蠢的錯誤,当时人們对于独裁制的憂慮也并不是因为我們曾經在滑鉄卢戰場上布防过而引起的。在任何方面,韦白的建議并没有在輿論上产生令人注目的印象。这种危急的情况是没有被人們体会到的。国会里的工党領袖,虽然他們的立法計劃遭到失敗,受到了对实际問題沒有耐心的妇女們的怨言所煩扰,而且普通議員們(特別是那些做过市議員而在从事公务方面受过訓練的人們)又不断地反对把他們純粹当做应声虫而浪費他們的時間;可是这些工党領袖們仍然沒有時間来做立宪的工作。最后,費边社受到韦白夫人的催促,在1930年把它过去在金斯威大厅(Kingsway Hall)每年所举行的一系列公开演講講稿中的一部講稿,用来講述立宪問題。而韦白夫人自己所写的文章則作为1932年的“改革法案”由費边社出版。除此之外,曾有人提議出版第二部費边論丛来討論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宪法机构。

对于这个版本的讀者們,我必須提供有关本書一些必要的修

正的詳細說明和解釋。有两个主要的特点可以在这里概略地指出。第一,政党制度必須要無情地予以廢除。这个奸狡的、使国会無能为力的設計,人們是了解不多的。对于大多数人民,甚至对于大多数職業政治家來說,政党制度这几个字不过意味着不可避免地把一个代議团体划分为保守的一边和进步的一边,彼此为了領導国家事务而互相竞争。由于这种趋势是人性發展的结果,而且由于我們有一种迷信,認為人性無法改变(尽管可变性被認為是人性的一個品質),以致廢除政党制度的建議,通常被当作是用来消灭政党的烏托邦式的尝试而不加审查地被抛弃了。因此必須要解釋一下:在十七世紀末叶,威廉三世为了获得国会支持他对路易十四作战而不得不加强的政党制度,虽然曾被安妮女王努力廢弃,最后终于在十八世紀作为我国的議會政府的正常的立宪方法而确立起来。政党制度不过意味着仅只从一个在下議院中掌握着多数票的党派中来挑选政府成員的一种实施。因而就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推論,認為下議院对政府任何措施所投的反对票,就使得政府必須辞职,然后用普选的方法来“取决于全国”。

这种制度的后果就是:被政府提到下議院来的任何措施,从来不是根据它們的优点加以表决,而純粹是根据政府是否留任,以及下議院的全体議員是否一定要花費金錢和不怕麻煩地被投入一个决定他們当选与否的普选中去加以表决。具有政治独立性的議員們,按照他們的信念、知識或兴趣所作的那种無党派的选举(这种选举方式,曾經使得威廉三世無法預見下一届的下議院是否会为了他在欧洲大陆上的作战給予支持)被取消了,因为只有带着党派标帜、立誓不分青紅皂白地为他們的党派投票的候选人們,才有很大的当选机会。經驗很快就証明了安妮女王直率的常識所預見的事情。說明了政党制度正如它最初企圖加强国王的权力一样,加强

了首相和他的內閣的权力（虽然其代价是限制国王挑选能干的官員因而损坏了政府的素質）；把他們的支持者降低到歌劇合唱者的地位；使历届政府成为朋党式（factions）的和不均衡的机构。

这种政党制度从来没有被引用到市政府中去。在市政府里，市行政机关或市議會是被选出来在一定时期內負責，在这一时期內，不得再进行选举。市政事务不是由单独一个政党内所提出的唯一的“內閣”来管理，而是由一系列由各党派所組成的委员会来管理，每一个委员会处理它自己特殊部門的公务。独立工作的这些委员会把它們自己的各种措施提交市議員大会。市議員們可以十分自由地进行投票，因为除了那措施本身而外，并不涉及其他事件。摒弃这个措施既不牵涉到使政府改組，也不牵涉到要举行普选。阻碍或者“为反对而反对”（这种反对，意味着一种絕对的缺乏批判的非誠意的反对，因而破坏了国会里进行反对的整个价值）就不会發生，保守的和进步的气質之間的冲突会成为是自然的和誠实的。它并不像在下議院里那样，保守党人不得不反复地投票反对他們所贊成的措施，而进步党人則不得不反复地投票贊成他們自己相信是錯誤的变革。这样，实际所产生的結果是：市政府無需过多地在市議厅开会便完成了它們的工作，而下議院則整天甚至有时整夜地开会却不能及时地完成任務，而且会發覺它的过劳的部长們对于他們名义上負有責任的各部失却控制，并且往往对各部所做的工作也很不了解。一个有效的政府，实际上却成了与政党制度脫节的官僚政治或长期的文官制度。

因此，在一切行政机关之內廢除政党制度和恢复較老的市政制度便成为必要的了。

第二个必需的主要变革就是我們的統治者之間适当的劳动分工和职能的專門化。目前，被几十个部长助理所协助由大約二十

凡人所組成的內閣(有人埋怨說人數太多了)是被期望着來应付一大堆從最廣泛和最重要的國際政治、金融和憲法立法直到最不重要的農場和工廠的細節工作。所謂的“職權下放”(devolution)、或是把範圍較小的工作轉交給城市的或郊區的地方當局的辦法，是由于我們對古老的地方界限的保留而遭到了挫敗，而這種界限老早就由于農村發展為城市，以及若干城市聯合成為巨大的城市區域的情況而消滅了。再加上汽車運輸、航空運輸、電話、電報等國內交通的發展，使得二十年前所提出的“分區”的建議都成為可笑的謬論。現在不是一個區域性的議會的問題，而是一個使英格蘭和蘇格蘭各有“內政”權力的中央議會的問題。

對於費邊社的最終目的來說，這些憲法上的變革僅僅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這就是為什麼它們沒有被包括在這本書里而要作為一個新的而且比較短暫的費邊論叢的題目的原因。這一本較老的論叢的讀者們目前必須滿足於這樣的一個暗示，那就是：社會主義之海不能夠被裝在只能夠容納一品脫的十九世紀的國會里。而且企圖堅持這樣做，其結果不可避免的會形成（如像歐洲大陸大多數人民的結局所示）個人專政，這種專政雖然挽救了目前的情況，但也像那些被人民擁為領袖或趕出政府的人們一樣，並不是永生的。假若人類文化要被保存下來的話，那麼，這種專政必然要繼之以有效的現代憲法和政府，這種政府乃是真正能夠進行管理的政府，而不是像我們現在的政府所做的那樣，毫無辦法地去從非官方的、不負責任的、而且實際上是私人工業家和金融家的秘密獨裁政治那里去接受命令。

1920 年版緒論

塞德尼·韦白

剛好三十年前所印行过的这些論文，現在仍为人们需要。尽管自那时以来曾将它们譯成各种文字的廉价版本出售过，尽管可以买得到以更丰富的知識和經驗煞費苦心写成的社会主义著作，但是这些論文在 1889 年的出版，对于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是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現在，只要它們还能找得到买主，不讓它們絕版似乎是有好处的。

那时我們还年輕——我是作为七个作者中最年輕的一个来發言的——而且，我以为，我們确实像青年人那样热情地富于自信心。那时我們所参加的費边社^①已有六年的历史；但它仍旧既沒有一个办公室也沒有一个領取工資的秘書，而且除了担任新聞工作者及职位很低的公務員的少数社員們从他們微薄的工資中捐出来的一点錢而外，它是沒有任何其他收入的。我們在掙得每天的面包以后，便把所有的空余時間都用于讀書和交談——我們研究各种事物：从政府的報告書到艺术，从历史和政治到小說与詩歌；而且不断地在我們当中以及在任何願意听我們談話的人們中間進行。

^① 一本完整的“費边社史”(History of Fabian Society)是由担任該社書記十七五年的愛德華·庇斯(Edward R. Pease)所著，出版于1915年。此書以及以後各頁所提及的所有書籍，假若尚未絕版的話，可向費边書店購到，地址：倫敦，彼得街，脫特赫爾街25号(25 Tothill Street, Westminster, London)。

討論和演講。這一套特別的演講只是若干套我們自不量力的演講當中的一套；但是，無論是由于我們的謙虛，由于我們的貧窮，或者是由于當時出版家缺乏一定的事業心或缺乏見識，因而這是唯一得到出版機會的一套講稿。我們在教的同时也學了一些東西，而且在那些年代當中，由于我們過分經常地忙於事務，以致不能有很多時間去修飾原稿。在本書出版之後，幾乎我們之中的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稿子的幼稚而感到不安，都想把它重新寫過。雖然書已經出版了，可是自那時以來一直未經修訂過。現在，除了更正了被排字工人所誤排而又漏過了原編輯者謹慎校對的兩個錯誤而外，本書現在又原封不動地再一次出版。

回想本書是在沒有任何出版家的幫助之下而出版也許是有趣的。最初的一版，我們自己決定了書的大小、字體的樣式并和承印者立了訂單。承蒙瓦爾特·克拉尼為我們設計了一個引人注目的封面，美·摩里斯女士為我們設計了一個漂亮的背面，我們把這二者都交給裝訂者去處理，并與印刷者和裝訂者一道，小心地從合作社中挑選了幾家按工會標準支付工資而且具有聲譽的印刷所來承印。我們發出了預約通知單；在接到訂單時，“名義秘書”就親自在自己家里與“志願助理秘書”一道把書包扎好并郵寄給訂購者。使我們吃驚的是第一版立刻就銷售一空，從而為費邊社掙了一小筆利潤，并且七個作者正式把版權轉讓給費邊社。第二次印刷本也很快地就賣完了，於是這部書就交給一家出版公司去繼續印行廉價的重印本。本書在美國曾被重印過好幾次，而且被譯成了很多種歐洲文字出版。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可以說，七個作者都曾經寫了無數沒有付印的稿子。其中兩位可以聲稱他們的大部分“著作”，是被埋葬在那些維持大英帝國生存的發霉的議事錄和草案的公事檔案之

中，在這方面只要回憶一下查理·蘭姆^①就夠了。所有七個作者都在新聞事業中工作過，其中有兩人當過教授。這七人中有兩人是在正常的壽限以前就死了，其餘五人都曾經在不同時期中積極地從事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公共行政工作，他們從教區公民會(Vestry)直到殖民部門都服務過。雖然他們從事於這些副業，可是英國博物館圖書目錄中卻透露了：除了無數的小刊物之外，這七個人還寫了一百多本書。再說一句，費邊社與一般少年人的結社不同，它從來就沒有解散過。已去世的兩個社員，臨死時仍舊是社員；另外的五個人，有三個經常留在社內；第四個人離開了幾年之後又重新加入了社；第五個雖不是社員，卻與社一直保持着精神上的親近和密切的同情。這七個人之中，有的曾走遍了天涯海角，或者暫時是被其他興趣或任務所吸引。但是，在整整三十年內，七人之中經常有三、四人住在倫敦，而其餘的幾個人則定期地由地理方面的或其他各方面的游歷中回來，在知識的推敲和政治工作上都親密地結合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思想，討論彼此的發現或發明，時常修改彼此的著作，並且經常在建議及計劃方面實行合作。

對於死去的社員們也應該提上几句追念的話。威廉·克拉凱(William Clarke, 1852—1901年)從來沒有時間去寫一部“政治學”之類的書，但是他的學識與經驗，尤其是他那善于觀察世界上正在發生着的重要和主要事情的能力，是完全能勝任去寫作這樣一部書的。他是一個頭腦特別清楚和知識異常豐富的政治評論家。他的論文在美國比在英國更受到重視。但是不順的境遇從來沒有給他一個更重要的或更永久的工作機會。^②現在可以看出——在關於往後資本家利益的集中的途徑方面——由於他具有深刻的觀察

^① 查理·蘭姆(Charles Lamb, 1775—1834年)，英國散文家，生平困苦，其著作大部分是在辦公時間內偷空寫成的。——譯者

力和非凡的知識，因而對本書的貢獻是令人難忘地具有預言性的。

赫伯特·布朗德 (Hubert Bland, 1856—1914 年) 在新聞事業上所花的精力，要是處在另外一個環境之下，就會使他成為一個能干和有成就的編輯。很多年來，通過向銷路很廣的報刊的專欄投稿，他已經成為千百萬人民所信任的和富於啓發性的政治和社會導師。^③

現在再回到本書上來——順便提一下，這本書出版的時候，在以英國的思想和經驗來解釋現代社會主義運動方面，可以說是陷於孤立的^④——至少使本書作者之一最感到興趣的，是按照三十年來的經驗以及三十年政治學的發展，去標明在哪些地方我們錯

② 參閱巴羅士 (Herbert Burrows) 和霍布森 (J. A. Hobson) 所編的“威廉·克拉凱文集” (William Clarke, a Collection of his Writings), 附有傳略, 1908年出版; 以及克拉凱寫有緒論的“馬志尼論叢” (Essays of Mazzini), 1887年出版; 克拉凱寫有緒論的“從溫涅斯到馬考萊的政治演講集” (Political Orations from Wentworth to Macaulay), 1889年出版; 克拉凱所編的“瓦爾特·惠特曼傳” (Walt Whitman), 1892年出版。克拉凱曾在1895年編輯出版為時短暫的“進步評論” (Progressive Review)。

③ 西雪爾·查士特登 (Cecil Chesterton) 編過一本赫伯特·布朗德所寫的文集, 1914年出版。布朗德本人所寫的書有: “人的見識” (With the Eyes of a Man), 1905年出版; “給女兒的信” (Letters to a Daughter), 1906年出版; “快樂的道德家” (The Happy Moralist), 1907年出版; “奧利維亞的彈簧鎖匙” (Olivia's Latchkey), 1913年出版。

④ 今天 (1919年), 在大部分研究政治科學的出版物幾乎都打上了一個社會主義的記號, 而且除了已被揭露出來的關於今天的資本主義的組織的研究之外人們還可以預料到會有更多的關於未來的社會主義國家組織的研究的時候, 人們是難於體會我們當時革新的範圍的。在1889年, 英國讀者所能看到的, 除了社會民主同盟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 和社會主義者聯盟 (Socialist League) 所出版的、主要是威廉·莫理斯 (William Morris)、貝爾福·巴赫 (E. Belfort Bax) 與亨德曼 (H. M. Hyndman) 所寫的各种宣言, 以及這些人和其他作者所寫的十多本小冊子而外, 只有亨德曼所寫的“眾人的英國” (England for All), 1881年出版; “英國社會主義的歷史基礎” (Historic Basis of Socialism in England), 1883年出版; 以及貝爾福·巴赫先生所寫的一本文集和“社會主義的宗教” (The Religion of Socialism), 1887年出版。關於卡爾·馬克思, 只有他在1848年所寫的“共產黨宣言”是在1888年以英文出版的。

誤了以及哪些方面被我們所忽視了。今天，沒有一個讀到這本三十年前所寫的論叢的讀者不會發現，在圓滿地解釋英國社會主義方面，作者們做得很差。即使在本書注腳中所提及的許多其他著作對社會主義理想作了許多詳細的研究，但仍然不能提供出一個完整的概念。^①

也許具有意義的是：本書中從頭到尾能夠經得起嚴格考驗的乃是關於經濟分析的那一部分。我想這不僅只是由於友誼的偏愛使我認為本書觀察社會經濟演變的第一篇文章，在內容的簡潔豐富以及出眾地通俗化方面，至今尚未被任何文章所超過。據我的推斷，叢書中純然屬於經濟的部分，在今天也和初寫時一樣，文筆仍然是犀利和正確的。經過了整整一代人的更多的經驗和批評的考驗，我敢說，在1889年，我們了解我們的政治經濟學，而且我們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是健全的。

儘管我相信我們的历史記載基本上是正確的，但它顯然是以不夠堅實的知識基礎為依據的。按照我們現行教育的課程表，我們對於那些造成在我們之前的近幾代的一切事變的魔影，顯然還沒有充分地深入研究。在輿論和制度兩方面，從一個主要是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論點逐步過渡到主要是以集體主義為基礎的論點，並不出現在任何宣傳家的刊物上，而是更充分和更詳細地登載於“劍橋現代史”第十二卷“社會運動”這一章中，這是很值得重視的。費邊社已得到劍橋大學出版委員會的允許，把這章書換用一個新的標題刊印出來。^②

此外，關於我們本國社會和工業的力量，我們所具有的知識也

^① 關於一個特別的宣傳者的呼喚，參閱威爾斯(H. G. Wells)所寫的“擦皮鞋者的悲慘境遇”(This Misery of Boots)和“以新世界代替舊世界”(New Worlds for Old)及“現代烏托邦”(A modern Utopia)。

远不完备。我們显然沒有充分說明工会运动的重要性，本書从未把工会运动当作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沒有把它当作是組成社会結構的主要部分。显而易见，在1889年，对于任何一种“职业团体”所具有的持久性的价值和不可少的社会机能，我們还只有一点概念；而且我們也沒有預期到（如像今天所公認的一样），它是社会組織的一个永久的部分，而且是注定了要在“明日的国家”里起重要的联系群众的作用。我們立刻就着手补救我們知識中的这一特殊缺陷，而且在1894年出版了“英国工会运动史”^②，1897年末又出版了“工业民主主义”（Industrial Democracy），对整个工会的組織和它的作用进行了广泛的分析，有效地把工会运动貫輸到我們共同的意識中去。我們也許可以說，它所起的作用还不止此，它为年輕的一代奠定了基础，而且可能有助于鼓励他們展开整系列的有关职业团体的各个方面以及这种团体在未来的社会中的地位等的研究。不論我們对于他們所苦心經營的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看法如

② “走向社会民主？”（Towards Social Democracy?）1916年，費边社出版，訂价一先令。还可參閱基尔伯特·斯莱特（Gilbert Slater）所写的“现代英国的形成”（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and），1913年出版；赫琴士（B. L. Hutchins）和艾姆·斯宾塞（Amy Spencer）合写的“工厂立法史”（The History of Factory Legislation），1911年修訂版；湯尼（R. H. Tawney）所写的“鏈条制造业中的最低工資”（Minimum Rates in the Chain making Industry），1914年出版；“服装業中的最低工資”（Minimum Rates in the Tailoring Trade），1915年出版；里奧·其奧饒·曼尼爵士（Sir Leo Chiozza Money）所写的“富与貧”（Riches and Poverty），1905年最新版；“未来的工作”（The Future of Work），1914年出版，及其他著作；庞白·雷維斯夫人（Mrs. Pember Reeves）所写的“每周約一鎊”（Round About a Pound a Week），1913年出版；費边短論第124册（Fabian Tract No.124）“国家对托拉斯的控制”（State Control of Trusts）；以及馬克洛士岡（H. W. Macrosty）所写的“托拉斯与国家”（Trusts and the State），1901年出版；“英国工业中的托拉斯运动”（The Trust Movement in British Industry），1907年出版。

③ “英国工会运动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可參閱陈建民譯中譯本，商务印書館万有文庫 0193号。——譯者

何，这种主义或許可以被認為是本世紀社会主义思潮所从未有过的最重要的新增部分。^①

我們也同樣不了解“合作运动”。也許是由于受到傳統的对合作社未能达到它的理想的誹謗的影响——这种誹謗忽視了生产合作社与消費合作社之間的根本差別——以致我們沒有認識到工人階級的合作商店在未来的社会結構中所具有的地位。因此，在我們建設性的預見中，我們沒有利用合作主义者自1844年以来在实际組織中所碰到的最重要的發現；我們沒有認識到，在哪種限度內，这些發現會使得社会生产活动的目的不僅是为了利潤，而是为了把滿足实际需要的企圖变为可能；我們也沒有認識到，这些發現如何地表明了日用品供給这样一种广泛事業中，能够用一个基本上是集体的組織来消灭那些唯利是圖的資本家。我們的这个遺漏是被后来加入到我們之中的一員在1890年所出版的“英国的合作运动”所弥补了。^②

① 特別參閱柯尔(G. D. H. Com)的各种著作，他對我們的一般見解往往給以尖銳的批評，特別是見于下列各書中：“勞工世界”(The World of Labour)，“工業中的自治”(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英国的勞工”(Labour in the Commonwealth)，“鐵路工人中的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 on the Railways)及“工会主义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rade Unionism)。还可參考：“職業联合会”(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英国教師和他們的職業組織”(English Teachers and thei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這二者系“新政治家雜誌”(The New Statesman)1917年4月21日及28日和1915年9月25日及10月2日的增刊。路易(C. M. Lloyd)所寫的“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1915年出版；加尔騰(F. W. Galton)所寫的“服裝業”(The Tailoring Trade)，1896年出版；伯薩拉·德拉克(Barbara Drake)所寫的“工業界中的婦女”(Women in the Engineering Trade)。

② 貝特麗絲·波特(Beatrice Potter，即塞德尼·韋白夫人，Mrs. Sidney Webb)所寫的“英国的合作运动”(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in Great Britain)，1890年出版。對於合作运动的較近的分析，參閱費邊研究部(Fabian Research Department)所寫的“合作生产与利潤共享”(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Profit-Sha-

我們對於地方政府比對工會運動或合作運動更為注意些；但是在 1889 年，與大多數社會主義者（而且，在這方面也與大多數個人主義者）一樣，我們仍在盲目追求那種使地方當局（Local Authorities）在“社會有機體”（Social Organism）中得到應有的地位和作用的光輝的理想。在這些論文中，我們流於把地方當局想像為將要為失業者組織生產、並終于會與資本家的企業并駕齊驅地發展為另外的一些工廠和商店，它們在“鎮會”（Town Council）和“州會”（County Council）的管轄之下，在資本家所經營的行業中用資本家的武器打垮了資本家。在 1889 年，我們就沒有想到，教區公民會（Parish Vestry）、市政當局（Municipalities）以及州會都像合作社一樣，主要是消費者的組合而不是生產者的組合；在這些組合里，所有當地居民都必須成為社員而不能隨意不加入，這樣做的作用在於把公民作為消費者，集體地供給他們所需要的物品。當我們認識到這個觀念時——這對社會主義理論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我們立刻就看到：在任何一个高度組織起來的和人口眾多的社會里，廣泛的職權不應該如過去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劃歸“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而應該劃歸“市區社會主義”（Municipal Socialism）；我們明白了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內，各種以民主方式組織起來而實際上等於自治的地方管理機構（Local Governing Bodies）所應該擔負的重要作用。我們終於很清楚地理解到，這些地方管理機構的多方面的作用的意義就在於：一方面它替我們取消了唯一的全國性的僱主（這種僱主其本質是不可避免地要官僚主義化的）的假設性的專制，另一方面也把我們從普遍的社會生活

ring) 及“合作運動”（Co-operative Movement）這兩篇報告，它們是作為 1914 年 2 月 14 日及 5 月 30 日“新政治家雜誌”的增刊而出版的。還可參閱沃爾夫（L. S. Woolf）所寫的“合作與未來的工業”（Co-operation and the Future Industry）。

一律化的惡夢中解放出來。在“明日的國家”(State of To-morrow)里，如我們所想像的，那些不喜歡哈姆斯泰德地方的安排的人們，隨時都可以搬到海爾蓋特^①地方去，並在該地的地方政府之下生活。由於有了這種認識，我們就看出：在一個最完全的與無所不包的集體主義之下，有一條使個人自由的意識大為增加的途徑，有一個使生活無限多样化的遠景，並有一個能使個性無限地多方面發展的機會。我們奮力地投身於“市區社會主義”的研究和宣傳，這種主義的理論不斷發展的結果，不僅大大地推廣了集體主義的現有經驗，而且在1919年，實際上使數千個工黨黨員進入了地方管理機構，同時也把“社會主義國家”(Socialist State)的理想大大地充實起來了。^②

① 哈姆斯泰德(Hampstead)及海爾蓋特(Highgate)是倫敦附近的兩個地區名。——譯者

② 在關於這種市區社會主義理論發展的著作中，可以提到的有：蕭伯納所寫的“市營商業常識”(The Common Sense of Municipal Trading), 1908年出版；塞德尼·韋白所寫的“倫敦綱領”(London Programme), 1892年出版；以及他寫的“補助金”(Grants in Aid), 1911年出版；韋白夫婦合寫的“救濟區與州”(The Parish and the County), “采邑和自治市”(The Manor and the Borough), “公路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King's Highway)；庇斯寫的“市區飲料問題”(The Case for Municipal Drink), 1904年出版；梅白爾·艾金森(Mabel Atkinson)寫的“蘇格蘭的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in Scotland), 1904年出版；雷門·烏文(Raymond Unwin)寫的“市鎮計劃的實施”(Town Planning in Practice), 1909年出版；瑟沃多·哈里斯(J. Theodore Harris)寫的“公社通貨的實例(古爾尼西商場)”(An Example of Communal Currency (The Guernsey Market House)), 1911年出版；亞爾伯特·勞德(Albert Lauder)寫的“市政手冊”(The Municipal Manual), 1907年出版；赫琴士寫的“公共健康運動”(The Public Health Agitation), 1909年出版；路易寫的“地方政府的改革”(The Reorganisation of Local Government), 1919年出版。許多費邊短論都討論到地方政府，值得注意的有第8冊，“倫敦人須知”(Facts for Londoners)；第62冊，“救濟區與區會”(Parish and District Councils)；雷蒙·烏文寫的第109冊，“農舍計劃與常識”(Cottage Plans and Common Sense)；第122冊，“市營牛奶與公共衛生”(Municipal Milk and Public Health)；第125冊，“地方市有化”(Municipa-

我們對於“中央政府”(the National Government)的职能也像對“地方當局”的职能一樣，雖然多了解一些，但仍然模糊。多年來我們僅只是以一般的名詞來談論“國有化”，但主要的是後來的一代，才在交通運輸業特別是礦業上，以及在某種程度上在銀行保險及國際匯兌上，對這種政策完成了實際可行的詳細計劃^③。對於農業的前途問題，雖然我們本能地幸免于同情使國家倒退到以農民為主的國家，但在1889年，我們對這個問題幾乎完全沒有加以考慮。^④

lisation by Provinces); 第137册, “教區會與農村生活”(Parish Councils and Village Life); 第138册, “市營商業”(Municipal Trading); 第148册, “一個衛生委員會能夠做些什麼?”(What a Health Committee can do?); 第156册, “一個教育委員會能夠做些什麼?”(What an Education Committee can do?); 韋白寫的費邊短論第172册, “論地方稅或市財政與市自治”(What About the Rates or Municipal Finance and Municipal Autonomy); 艾世莫·貝克(Ashmore Baker)寫的費邊短論第173册, “論公營電力供應與私營電力供應”(Public Versus Private Electricity Supply)。

③ 參閱“正在形成中的集體主義國家”(The Collectivist State in the Making), 1914年出版; “鐵路國有化”(The Nationalisation of Railways), 1908年出版, 1911年第二版; 愛彌兒·戴維斯(Emil Davies)寫的“鐵路國有問題”(The Case for Railway Nationalisation), 1913年出版; 費邊社研究部在1916年5月15日出版的“論國營企業與市營企業”(State and Municipal Enterprise); 同一研究部在1916年出版的“如何支付戰爭費用”(How to Pay for the War), 以及單行出版的各部分: “郵政局的發展”(The Development of the Post Office), “鐵路與水路運輸的公共服務”(A Public Service of Railway and Canal Transport), “煤供應的國有化”(The Nationalisation of the Coal Supply), “國家保險部”(A State Insurance Department), “所得稅的革命”(A Revolution in the Income Tax); 以及康寧汗(W. Cunningham)寫的“我們的鐵路需要國有化嗎?”(Should Our Railways be Nationalised?), 1906年出版; 海越士(W. Hayes)寫的“國家工業化主義——集中的故事”(State Industrialism (the Story of the Phalanx)), 1894年出版; 彼塞克·勞倫斯(F. W. Peshick Lawrence)寫的“對資本的徵稅”(A Levy on Capital), 1919年出版; 韋白寫的“國家財政與對資本的徵稅”(National Finance and Capital Levy), 1919年出版; 庇斯寫的費邊短論第164册, “黃金與國家銀行”(Gold and the State Bank), 及第147册, “資本與賠償”(Capital and Compensation)。

現在从結構談到职能。今天,显然可以看出,我們对失業問題和关于失業者們的論点是走了錯路的。这并不是由于我們对失業的罪惡談得太多。我們当时是(而且也應該是)对家庭破产的可怕悲劇感到非常納悶的: 仅只是由于反复出現的周期性的經濟蕭条的結果,許多家庭流离失所以至整个地被毀灭了。但是,如何与這個問題搏斗,無論是在它的預防方面或者在它的医治方面,我們并不比別人知道得更多。由于对于这种現象缺乏充分考察,我們不仅与其他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而且也与普通的經濟学家及政治活动家一样,錯誤地認為泛濫很广的失業現象的周期發生,除了在一个完全組織起来的集体主义之下而外,沒有其他有效的預防方法。并且,与其他許多意見不同的善意的人們一样,在 1889 年,我們尚在推敲把“失業者”組織起来,以便通过他們在各种生产上的努力而互相滿足他們的共同需要的可能性。我們的失敗不仅在于对于那些“無工作能力者”规划不出可行的办法,而且对于那些被迫失業的健康成年人,也想不出办法。就社会主义者这方面來說,在 1889 年,他們对于社会上沒有工作能力的人,無論是孤兒、患病者、殘廢者、被迫失業者或老年人的社會保障,既無研究又無办法。

④ 后来在这方面所作的,主要是历史性的和敘述性的研究,或者是致力于立即可行的各种改革的研究。參閱哈本(H. D. Harben)写的“农村問題”(The Rural Problem), 1913 年出版;基尔伯特·斯萊特写的“英国农民与圍地运动”(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格林(F. E. Green)写的“罕小的保有地”(The Small Holding), 1903 年出版;“英国的覺醒”(The Awakening of England), 1912 年出版, 1919 年新版;“地方苛政”(The Tyranny of the Country Side), 1913 年出版;及其他作品;湯尼写的“十六世紀的農業問題”(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1912 年出版;毛德·戴維斯(Maud Davies)写的“英国农村生活”(Life in an English Village), 1909 年出版;費边社会主义者丛書(Fabian Socialist Series)第二輯“社会主义与農業”(Socialism and Agriculture); 費边短論第 161 册,“造林与失業”(Afforestation and Unemployment)。

大多数对于未来社会制度的看法，几乎純然地以为，社会似乎是而且應該是完全由健康的人所組成的，这些人永远不会遭遇到事故，而且他們即使不会长生也会不老。我們知識中的这个缺陷直到1905年乔治·兰斯伯先生 (Mr. George Lansburg) 及塞德尼·韦伯夫人 (Mrs. Sidney Webb) 被任命到“皇家恤貧律及失業困难救济委员会”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Poor Law and the Relief of Distress from Unemployment) 以后才被弥补起来。經過了有社会各方人士参加的历时四年的努力調查，才拟訂了一个煞費苦心的計劃——即“恤貧律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 (The Minority Report of the Commission)^①。首先，用下列方法切实地去預防即使在我們現行社会制度下也会广泛地或不断地發生的失業，那就是：按季、按年地把每周对雇佣劳动的总需要量維持在一个大致平均的水平上，这种水平是只要把公共工程和公共服务的当前状况重新安排一下就有可能达到的——这种办法已經証明易于統計，而且也是一个新上台的政府願意做就能做得到的。其次，計劃得很好的全面而充分的供应，在民主的管理之下，对“無工作能力者”各階層，从孤兒以至沒有亲友的老年人，都予以足够的衣食所需。在我們今天所認識的世界里，这种对于“無工作能力者”的社会供养，必須形成社会主义国家观念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为了这个主要的社会职能，就必须設置适当的社会机构。^②

一个影响到結構和职能两方面的更为普遍的缺点，是我們当时沒有“从国际性方面来思考問題”。除了威廉·克拉凱而外；我們之中任何人既沒有注意到欧洲大陆上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沒有注

^① “恤貧律” (Poor Law) 是英国在十六世紀伊利薩白女王时代所制定的法律，名为救济貧民，但实施以来流弊很多；直到1905年韦伯夫人等所草拟的“恤貧律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簡称“少数派的报告”，才对“恤貧律”作了根本的修改，并成为現代英国資產階級各种社会保險法令的先声。——譯者

意到国际关系。我們沒有参加恢复了的“国际”^③1889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一届会议，而且除了对于蒲魯东、拉薩尔和卡尔·馬克思的研究以及和亡命在倫敦的社会主义者們有少数的个人接触之外，我們完全不了解在我国以外的社会主义者的天地中正在發生着一些什么事件。但是，在这方面，我們同样很快地改进了我們的状况^④。費边社有代表出席了1891年在布魯塞尔召开的国际社会

② “恤貧律委员会少数派的报告”在1909年被韦白夫妇以“恤貧律之廢除”(The Abolition of the Poor Law)和“对劳动市場的公共組織”(The Public Organisation of the Labour Market)为名的两書出版。还可参閱韦白夫妇合写的“貧困的預防”(The Prevention of Destitution), 1911年出版；費边社会主义者丛書第四輯，“社会主义与国家最低工資”(Socialism and National Minimum)；韦白写的費边短論第159册，“社会的必要基础”(The necessary Basis of Society)。关于医藥問題，参閱大衛·麥凱尔(David McKail)和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合写的“公共医务”(A Public medical Service), 1913年出版；劳森·都德(Lawson Dodd)写的費边短論第160册“国家医务”(A National Medical Service)；韦白夫妇合写的“国家与医生”(The State and the Doctor), 1911年出版。关于青春期的特別問題，参閱雷金納·布雷(Reginald Bray)写的“城市兒童”(The Town Child), 1907年出版；“童工与学徒”(Boy Labour and Apprenticeship), 1911年出版；基林(F. Keesling)写的“联合王国内的童工”(Child Labour in the United Kingdom), 1914年出版；“男女童工的劳工介紹所”(The Labour Exchange in Relation to Boy and Girl Labour), 1909年出版；格林烏得(A. Greenwood)写的“学校兒童的健康与体格”(The Health and Physique of School Children), 1913年出版；“青工介紹所与病后調养”(Juvenile Labour Exchange and After-Care)；毛德·戴維斯写的“学校护理委员会”(School Care Committees), 1909年出版；阿諾德·弗里門(Arnold Freeman)写的“兒童的生活与劳动”(Boy Life and Labour), 1914年出版；瑪麗安·菲利浦斯博士(Dr. Marion Paillips)写的“家里的校医”(The School Doctor in the Home), 1913年出版；湯欣夫人(Mrs. Townshend)写的費边短論第145册，“托兒所問題”(The Case for School Nursery)；海登·介斯特(L. Haden Guest)写的費边短論第154册，“校医室問題”(The Case for School Clinics)。

③ 恢复了的“国际”指1889年在恩格斯领导下于巴黎召开的“第二国际”(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其前身为1864—1876年在馬克思与恩格斯直接领导下成立的“第一国际”(The First 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譯者

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下届会议，而且自那时起，費边社就一直参加了有关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但是我们有我们自己对国际主义的看法。我们不同情于有些社会主义者以及很多自由主义者或多或少有意識地坚持的那种“普遍的大同主义”(Universal Cosmopolitanism)的理想，这种理想，即使不是对馬志尼^⑤和柯布登^⑥的主張的曲解，至少也是对他們的主張的一种夸大。我们当时的目的，按字义講，就是一个有組織的“国际民族主义”(Internationalism)，在这

④ 參閱恩索(R. C. K. Ensor)写的“現代社会主义”(Modern Socialism), 1903年出版;伯特朗德·罗素(Bertrand Russell)写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Germany Social Democracy), 1896年出版;費边短論第109册;桑德斯(W. S. Sanders)所写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The Socialist Movement in Germany)和“德国工会主义”(Trade Unionism in Germany)。

參閱蕭伯納編輯的一个宣言“社会主义与帝国”(Socialism and Empire);蕭伯納所写的“社会主义与財政問題”(Socialism and the Fiscal Question), 1904年出版;里奧·琪奧蘭·曼尼爵士写的“財政辞典”(Fiscal Dictionary), 1910年出版;“財政問題原理”(Elements of the Fiscal Problem), 1903年出版。

塞德尼·奧利維爾爵士(Sir Sydney Olivier)写的“白色的首都和有色的劳动者”(White Capital and Coloured Labour), 1909年出版;“国际联盟与原始民族”(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Primitive People), 1918年出版。“印度与大英帝国”(India and the Empire), 1914年出版;“印度这个国家”(India a Nation) 1915年出版;以及安妮·貝桑特夫人(Mrs. Annie Besant)写的“印度問題”(The Case for India), 1918年出版。

布莱尔士福特(H. N. Brailsford)写的“为鋼鐵和黄金而战”(The War of Steel and Gold), 1914年出版;“一个国际联盟”(A League of Nations), 1917年出版;朱利亚士·魏恩特(Julius West)写的費边短論第184册,“俄国革命与英国民主”(The Russian Revolution and British Democracy);哈金(R. C. Hawkin)写的費边短論第186册,“中非洲与国际联盟”(Central Afric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里奧那得·沃尔夫写的“持久和平的条件”(The Conditions of a Lasting Peace),“康士但丁堡的未来”(The Future of Constantinople), 1917年出版;基尔伯特·斯萊特写的“欧洲的和平与战争”(Peace and War in Europe), 1915年出版。

⑤ 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 1805—1872年),与加富尔和加里波的一道,是十九世紀中叶意大利独立和統一运动的三个著名領袖之一。——譯者

⑥ 柯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年),英国自由主义者。——譯者

种主义之下,不仅各国政府的民族特点,而且各国从事体力劳动的雇佣劳动者的民族特点,都絕不会被抹杀或变为机械般的一律。它們不仅会个别地得到發展,而且还要比現在更多地受到区别对待。我們深信,每一个民族或国家,都可以不受阻碍地按照自己的方式前进,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因而更能發揮自己的特殊才能,从而扩大了它对整个世界所可能作出的特殊貢獻。为了丰富人类共同的未来,不仅仅是要有交换,而且要实际地繼續增加在質量上与成就方面令人滿意的多样性,即使是在次要的东西如服装及語言上也是如此。我們坚信,一方面要尽量地收到互相学习的好处,同时也要避免想像或追求一种优越感,因为在一系列的質的差別上,优越性是無法加以衡量的。我們認為英国人應該尽量把自己造成最好的英国人,法国人把自己造成最好的法国人。無論如何,这就是我們在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二者之間為我們自己所演化出来的綜合看法。我們坚持这种看法,我們一方面既不向“帝国主义”(Imperialism)屈服,另一方面也不向“小英格兰主义”(Little Englandism)^①低头,我們經常企圖以承認所有的国家和人民,来代替那种無知的种族优越感和帝国至上的主張。在所有的国家和人民之間——用約翰·穆勒的話來說——都應該有一种“最好的平等,也就是彼此間的优越感”。为了共同的利益,我們要經常勇于認識和承認一个民族有別于另外一个民族的特色,因为有了这种特色,会使一个民族超越于另外一个民族,即使那个被超越的民族正是我們自己。^②

① 指反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主張。——譯者

② 在沃尔夫所作的重要的研究之后,費边社委员会曾經进行过一次值得注意的嘗試,就是想把这个理想用切实可行的“超国家的行政机关”(Supernational Authority)——后来被称为“国际联盟”——的形式而付諸实现。參閱沃尔夫在1915年写的“国际政府”(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我想，一般地可以說，我們曾經把我們的思想過份地集中於實現有效的民主制度的各種實際條件上，這種民主能使廣大群眾自己尋求他們物質的繁榮、社會的自由、文化的發展以及唯有在這些條件下才能產生的個性發展。當時我們沒有充分地注意到下面的這些條件也是不可缺少的，那就是：全體人民都必須要感覺到他們是有發展前途的；必須要深切地感覺到他們是自由的；並且，作為一個完整的民主的集體，人民不僅要執政，而且要不斷地關心他們所掌握的政府機構。雖然有人經常無知地誣蔑社會主義者，說我們過分單純地相信“機器”（即使是社會機器），或者說我們對通常所謂的“人性”有所忽略，可是我們並不是這樣的。對於如何才能“把事情辦得通”的困難，我們是痛切地感覺到的（而且我們之中有的人是有過親身經驗的），對於一切社會變革中所不可避免的“時間因素”，我們也是有過這樣的感覺和經驗的。但是，我們沒有充分估計到這種心理狀態，那就是：沒有一個人是自由的，除非他認為自己是自由的；政治責任並不能使任何人得到益處，除非他自己意識到他也是在參與政治管理。我們曾經想出了一個在民主制度下獲得社會自由的條件，但是我們沒有想出一個使社會自由意識普遍傳佈的條件。而且，當我們在強調“自由”與“兄弟般的友愛”是民主的要素的時候，我們易於忘却“平等”也是社會主義中不可缺乏的因素。不久，由於與合作化、市政當局以及更重要地與工會運動的進一步的接觸，我們得到了一些我們過去所缺乏的東西。但是對於當時所引起的“社會心理學”的研究，我們還有許多東西要去學習。對這門科學，我們之中有的人曾有所貢獻。

假若這些論文對“男女平權主義”（Fiminism）談得很少，這並不等於說我們對婦女應該獲得最充分的機會去自由發展的這樣一個理想缺乏同情。我們在演講和宣言中堅持要求平等的成年人選

举权，我們从来没有放过一个机会把妇女問題摆在最广泛的基础上，而不只是为了暫时的方便。^① 費边社曾經成立了一个特別的部門来保証必須按照男女完全平等的原則去处理一切問題，而“費边妇女工作組”(Fabian Women's Group)的努力和所發行的刊物在宣傳男女平权方面曾經起过一定的作用^②。

对于男女平等的一再坚持——不仅只是在法律之前平等并同样地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而且是在物質生活方面的平等——

① 在妇女問題方面，值得提一下蕭伯納在1891年所写的“易卜生主义精華”(The Quintessence of Ibsenism)以及他后来所写的各种作品。另外还有格蘭維爾·巴克(H. Granville Barker)所写的書籍和剧本。而且，在另一方面可參閱克勞頓·布洛克(A. Clutton Brock)所写的費边短論第180册，“社会主义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Socialism)及其他作品。特別具有意义的是格拉罕·瓦拉斯(Graham Wollas)所写的“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1908年出版；“偉大的社会”(The Great Society)，1914年出版；还可參閱他所写的“福兰西斯·普萊斯傳”(Life of Francis Place)，1898年出版，1918年再版。

② 參閱韦白写的費边短論第131册，“出生率的下降”(The Decline in the Birth-rate)；哈本写的“母性的才能”(The Endowment of Motherhood)；赫琴士写的費边短論第157册，“妇女的工作生活”(The Working Life of Women)；庇白·雷維斯夫人写的費边短論第162册，“依靠每周一磅过活的家庭”(Family Life on a Pound a Week)；梅白尔·艾金森写的費边短論第175册，“妇女运动的經濟基础”(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the Women's Movement)；以及費边妇女工作組执委会(The Women's Group Executive)写的費边短論第178册，“战争、妇女与失業”(The War, Women and Unemployment)。

还可參閱：爱迪絲·摩里教授(Professor Edith Morley)写的“七种職業中的女工”(Women Workers in Seven Professions)；庇白·雷維斯夫人写的“每周約一磅”，1913年出版；赫琴斯写的“矛盾的理想”(Conflicting Ideals)；瑪麗安·菲力普斯博士写的“妇女与工党”(Women and the Labour Party)，1918年出版；梅白尔·艾特金斯和瑪格麗特·麦基洛普(Margaret McKillop)合写的“敘述性的和理論性的經濟学”(Economics, descriptive and theoretical)，1911年出版；“財富——对經濟福利各种原因的簡釋”(Wealth, a Brief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Economic Welfare)，1914年出版；麦基洛普写的“有效的方法”(Efficient Methods)，1917年出版；露絲·本廷克(Ruth C. Bentinck)写的費边短論第151册，“有关体面的事情”(The Point of Honour)。

在这方面，蕭伯納先生对英国社会主义是有貢獻的。^①

最后，对于一个我們未曾犯过而費边社却一直經常受到指責的錯誤，請允許我講几句话。虽然我們不相信那种“具有階級覺悟的少数人”以“武力”去获得胜利的革命，可是我們从来没有認為，如果不形成一个与自由党和保守党相对抗的社会主义政党而且参加到英国政治中去，社会主义就能实现或者就能有长足的进展。在本書里，特别是在最后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和“社会主义的远景”这两篇論文中，明显地強調了上述論点。我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們所謂的“渗透政策”(Permeation)——那就是說，把社会主义思想与社会主义計劃，不仅要注入到完全信奉社会主义的人們的思想里，同时也要注入到与我們見解不同的人們的思想里——我們不遺余力地不仅在自由党人或急进主义者中进行这种宣傳，也在保守党人中进行这种宣傳；不仅在工会运动者和合作主义者中进行宣傳，也在雇主們及金融家們中进行宣傳。只要有机会，我們就把符合于我們的方向的觀念和計劃向他們进攻。今天，在我們無法采取其他政治活动的时候，我不相信还会有人怀疑这是一种有力而且成功的宣傳。然而我們也同时在不断地爭取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党，这个政党具有社会主义的觀點，而且采取一个肯定的社会主义綱領。我們認識到(过去的事实明确地証明了这一点)，对于这样一个政党，在我国以及在我們这一代，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雇傭劳动階級，而唯一現成的机构就是工会組織。在1889年时，我們已經这样地做过两三年了。^② 我們利用每一个机会，用演講和散發小册子的办法，或是通过个人的交往，去劝說工会和工会联合会来組成这样一个劳工政党，对于这个政党我們答应給予个人所能給

(1) 參閱蕭伯納論“平等”(Equality)的演說，“全国自由俱乐部”(National Liberal Club)1914年出版，并載于美国紐約出版的“首都杂志”(Metropolitan Magazine)。

予的一切幫助。經歷七年之久這些努力幾乎沒有收到明顯的效果，直到1893年才成立了“獨立勞工黨”(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費邊社愉快地參加了這個黨。1900年，“各業工會聯合會”(The Trades Union Congress)終於被誘導而成立了“工人代表委員會”(The Labou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這個組織在1906年變成了現在的工黨——費邊社參加了最初的會議，而且一直成為這個政黨的組成部分，並派了一兩個社員到工黨的執行委員會里去。凡是讀過“工人与新社会制度”(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③這本書——它的詳盡的富于建設性的綱領曾經被工黨採用來參加1918年的普選——的讀者，就可以看出工黨是變得怎樣完全地并確然地“社會主義化”了；而且它是如何地與本書最後兩篇論文在1889年所預想的那樣完全符合。把工黨現在的綱領與我們本書第二篇論文里的綱領相對比，把它看成是代表我們致力於(即使只是名義上的)當時最進步的1888年的“急進主義”的一切主張，也是很有啓發性的。在今後三十年中(到那時人們也許要為費邊論叢的另外一版寫一篇新的緒論)工黨將把英國社會政治搞成什麼樣子，這是一個有趣的預言材料，但是關於這一點，我就不冒昧去着筆了。

1919年11月

② 特別需要參閱下列各册費邊短論：1887年出版的第6册，“真正的急進主義綱領”(The True Radical Programme)；1890年出版的第11册，“工人的政治綱領”(The Workers' Political Programme)；1893年出版的第40册，“費邊社競選宣言”(The Fabian Election Manifesto)；1894年出版的第49册，“工人的競選計劃”(A Plan of Campaign for Labour)。

③ “工人与新社会制度”，工黨發行，地址：倫敦西南區，艾斯克萊斯頓廣場(Eccleston Square)33號。每本售價二先士。

還可參閱議員阿瑟·亨德森閣下(Rt. Hon. Arthur Henderson, M. P.)寫的“工黨的目標”(The Aims of Labour)，1918年出版；康拉德·諾爾(Conrad Noel)寫的“工黨”(The Labour Party)，1906年出版；桑德斯寫的“人民的政治改革”(The Political Reorganisation of the People)。

1908 年版序言

肖伯納

自 1889 年以來，社會主義運動在整個歐洲已經完全改變了。這種改變的結果可以公平地說成是“費邊社會主義”的產生。在十八世紀八十年代，繼 1871 年巴黎公社被鎮壓下去之後，社會主義第一次在英國出現。人們起初還不曾認識到：那時真正被永遠鎮壓下去的，乃是 1848 年的浪漫的革命自由主義與急進主義。社會主義者們曾經自然而然地附和這些主義，這種情況，一部分是由於社會主義者們自己也是浪漫的和革命的，一部分是由於自由主義者們和社會主義者們在民主主義方面具有一個共同的目标。

除了這個共同的目标而外，自由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對於革命的方法，也具有一個共同的概念。他們二者都是突變主義者 (Catastrophists)。自由主義曾經在英國和法國採取突變的方法戰勝了專制主義與官僚政治，因而使工業在新的政治條件之下，凭借個人之間不受限制的競爭行為而盡量發展。簡言之，自由主義者的計劃是把國王的腦袋斫去而使其他的一切听凭大自然去支配。他們認為其他的一切在不受專制政府限制的情況下就會趨於經濟的和諧。社會主義者對於工業的巨大重要性的體會比自由主義者要深入得多，他們甚至激進到如像波克爾 (Buckle) 和馬克思一樣，認為不論任何的社会制度都受着經濟條件的支配，而且暴政基本上只有一種，即資本的暴政。可是，甚至於這些社會主義者們現在

也在自由主义学派里养成了他们的政治习惯，以致于他们很容易相信：假若你一旦把“资本之王”（King Capital）的脑袋斫去以后，那么你就可以期望看到各种事物会或多或少自发地趋于合理。

無疑地，这个概括性的叙述，把 1848—71 年的革命者们表现得比他们自己的历史纪录更为简单。普鲁东有过各种建议，其中的一个就是最低工资的建议。这种建议现在已变得具有头等的重要性，以致韦白夫妇已在工业实况与经济理论不可争辩的基础上把这个最低工资的建议提了出来。拉萨尔是真正懂得一点法律的本质、政府的实务及统治阶级的心理的。马克思虽然肯定地有一点自由主义宿命论者的味道（他不是说过暴力乃是进步的产婆吗？但他并没有提醒我们：暴力同样是混乱的产婆，而混乱却又是戒严令的产婆），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自由放任的信仰者。社会主义涉及到由一个有意识地寻求自己的集体福利的国家，把设计、筹划和相互配合等因素引用到目前那种争夺私人利益的工业中去。既然人们都明白这种情况不可能是用暴力推翻现存制度的自发结果，而且既然 1848—71 年的那些社会主义者们都不是盲目的，那么，人们就不可能有权利证实费边论丛是第一本把突变主义（Catastrophism）用来作为社会主义方法而加以摒弃的社会主义教科书。

因此，我们绝不能说 1848—71 年的革命者们和国际主义者曾经相信过这样的一回事，那就是：在一次暴乱之中，戏剧式地推翻了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继之而来的便会是一个新的天堂、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人类的产生。無疑地，他们全都是幻想家，全都是政治上的唯心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又像保守党人和自由党人一样的讲求实际（这两个党的党员们相信他们的党的成功将会为国家获得幸福与和平）。同样地，要诱导他们去讨论或想像以现存的

人类作材料去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谈到了各种公社，并且模糊而勉强地谈到了使各个公社相互配合起来的中央各个部门；但是，假若你敢于指出这些表面奇怪而浪漫的发明只不过是在地方政府委员会下面的一些城市社团的时候，那么，他们就会狂暴地否认上述这种说法，并且会责备你把当前社会制度下的情况了解为社会主义。他们具有老牌自由主义者对政府及官僚政治的全部不信任和资产阶级革命家们把工人阶级加以偶像化的一切旧癖好。他们并不怀疑社会存在本身有赖于行政者们和专家们的技能，也不怀疑群众的代表们需要具有怎样的智慧和坚强的性格才能控制这些行政者们和专家们。他们实际上相信：当他们在整个欧洲的努力向大资本家们所雇用的无产者们讲明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学以后，“全世界的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呼声便会得到响应；资本主义便会在欧洲工人的国际协会（International Federation）之前倒台。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某些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上述过程概括为二三个世纪的过程（在这种意义下他们就是正确的了），而是意味着把这个过程当做一个在二十年内可能由那些鄙视和完全脱离日常政治的社会主义社团立即可以付诸实行的行动计划。总之，他们是浪漫的业余革命家，作为业余的革命家来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运动的“科学”性与欧文、傅利叶和圣西门以及 1820—48 年时期另外一些人们的“乌托邦”社会主义相对比的时候，他们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奉承。当 1871 年巴黎的事变对他们给以实际考验的时候，他们在处理公务方面的笨拙无能使得他们的敌人用现代最可怕的屠杀手段消灭了他们——由于这种屠杀是一种对无辜者的屠杀，因而令人更加感到恐怖。

欧洲的舆论曾以诽谤被害者的惯技来附和这种屠杀。假若欧洲人在政治上受过教育的话，那么诽谤就会是不必要的了；因为纵

使人为地可以把所有在巴黎被机枪射倒的那些国际工人协会的会员们 (Federals) 诬蔑为纵火犯和暗杀犯，我们仍然要怀疑，不分皂白的屠杀是不是对待纵火犯与暗杀犯的正当手段。但是，对于那些全不称职的统治者们应该怎样办我们却是没有怀疑的。今天，在政治上被肯定了的一桩事情便是：假若有一群人推翻了一个现代国家的现存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去继续政府必需的和真正的那一部分工作，而且假若他们自己既然不能做那种工作而又不愿意让旁人去做，那么，他们之被取消便是一桩刻不容缓的事情。下面的这些情况对于他们来说是无所裨益的，说是他们的目标坚得比他们的先辈人高，他们的存心是好的，他们的行动不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而他们的反对者才是自私的而且是可以金钱收买的文牘主义者（这些人假若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权而不是暗中操纵旧政权的话，也会同样感到困惑的）。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巴黎公社的会员们的画像，便会马上看出他们在所有的外貌方面是比当时或今天欧洲任何执政集团的成员还要文雅得多。但是他们却不能完成他们自己所负担起来的任务，而提尔斯 (Thiers) 却能够完成他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社员们是一些英雄和殉节者而提尔斯和他的同盟者们乃是一伙强盗的这样一种论证是于事无补的。尽管马克思有关巴黎公社的著作在反对模糊了真实问题的道德欺骗方面无可否认地是一个最有力量的文件——它真是这样一个有力的文件，以致在它出版了三十年之后就像昨天才出现在“时代” (Temps) 或“辩论” (Débats) 上一样，把珈理菲侯爵 (Marquis de Gallifet) 打倒了。那些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们的和露可亲不但没有使他们把提尔斯消灭，反而被提尔斯把他们消灭了。但是感情上的和露可亲并不是治理现代大国的一个条件。

创立于 1884 年的费边社，不到两年就达到了成年，它是不愿

意讓人把它消灭掉的。我們之中的某个社員把殉节这件事描写成为“一个無需才能就能使一个人出名的唯一方法”。此外，假若我們也像那些巴黎的国际工人协会的會員們一样，使資產階級在沒有經過一系列較小的斗争而丧失战斗力以前就被吓坏了的話，那么，我們對於我們将会受到怎样的对待是不存幻想的。1871年，在巴黎，一般身心健全的人認為上街是不安全的，因而在家里躲了几个星期不敢出来，直到冒着被他們的同党看見就向他們开枪射击的巨大危險时才敢出来！这种一見人就开枪射击的情况乃是当資產階級發現巴黎公社只能像一个被圍住了的老鼠那样进行抵抗之后繼之而来的屠杀和殘酷的狂乱情况下产生的。自从那时以来，人类的天性並沒有改变过。在1906年5月的某个早晨，一个站在律务里街的費邊社論文作者發現他是巴黎市西唯一敢上街的人。在那个优美的地区內，那些有教養的居民們仍舊像以往那样地躲在家里。他們的藏肉庫內堆滿了火腿，浴盆內裝滿了活魚以便应付一个圍攻。而在那一天會發生革命的危險比之在今天晚上六點鐘櫻草丘^①會變成一個活火山的危險還要小得多。可以想像：對於政治嗅覺最愚鈍的人來說，法國政府和它的黨報當時是在製造恐怖以便達到恫吓資產階級在即將開始的大選中支持他們的這樣一個目的也是顯而易見的。當天晚上，那位費邊社論文作者在“革命廣場”看見一群看熱鬧的人們集合起來去參觀那個事先被布置好的暴動，而軍隊和警察也被集合起來去鎮壓暴動。（這很像1887年在倫敦的特拉法爾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所扮演的騷亂的滑稽劇）。偶爾，軍警驅散了一些看熱鬧的人，并逮捕了一些看熱鬧的人。好些被激怒了的人進行了一點力量薄弱的騷亂，因

① 倫敦近郊地名。——譯者

而提供了第二天清早報紙上一些关于逮捕的新聞。第二天，在这个被拯救了的社会里，人們从躲藏的地方跑出来了，他們把盆里的魚和庫內的火腿蝕本卖去（天气很热，火腿已在变味了），并且抱着感激的心情，去投票选举这个以假想的革命和可笑的“陰謀”把他們吓掉了魂的政府。英国人嘲笑那些巴黎人（虽然很多英国旅客也曾經为了逃避那“可怕的統治”而离开了巴黎）。然而就在次月，住在开罗的、被埃及的民族运动吓坏了的英国有产者們，堕入了卑鄙的与殘忍的狂暴状态，犯了登夏威(Denshawei)^①的暴行，把格林柯(Glencoe)的屠杀^②拿来与这个暴行相比較，不过是一桩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那种認為一再用“进步”这个令人迷惑的字眼就会使我們輕信我們是生活在一个比我們祖先生活过的更为文雅的时代里，以及認為来自新近致富的拥有汽車的階級的極端恶劣的恐怖与报复不如来自古老的貴族階級的恐怖和报复那样可怕，并不是一个費边主义者的特点。費边主义者知道，有产者对于开枪杀人这件事是不会犹豫的；現在，也和平常一样，失敗了的革命者会遭到毫不留情的誹謗、陷害、虐待以及司法的和武力的杀害。而費边主义者只要有办法的話，是不願意遭受这样的对待的。假若真有开枪的事件發生的話，他們願意站在政府这一边。他們知道，要实现社会主义是需要很多年的。但是，他們以为他們已經看清了自己的道路——勿宁說，他們已經看清了他們所未走完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他們早已走在这条路上了。

就在 1885 年，費边社不願突变主义者們的嘲笑，采取了防御的姿態，并下定决心，要把那个英勇的失敗变为一个平凡的成功。我們給自己决定了两項坚定不移的任务：第一，提出一个議会政

① 埃及地名。——譯者

② 指 1692 年在苏格兰發生的大屠杀。——譯者

綱，以便如像使庇爾^①轉而擁護自由貿易那樣，使一位首相轉而擁護社會主義；第二，使一個普通的令人尊敬的英國人就像做一個自由黨人或保守黨人那樣容易而自然地做一個社會主義者。

不顧那些比較富於幻想的同志們的厭惡，我們已經把這些任務完成了。現在，沒有人再把社會主義看作是一個破壞性的叛變，沒有人再認為社會主義假若成功就會變成為時千百年的荒唐事情。至於人們加入費邊社作為成員，雖然包括着公開宣布信仰社會主義，却并不比加入教友派(Society of Friends)甚至加入英國國教(Church of England)會引起更多的批評。順便講一句，工黨已在下議院中作為一個代表着單獨的政治利益的政黨而組織起來了，其結果就是在下一年度的國家預算中，第一次公開地承認了在国内存在着勞動所得的收入(earned incomes)與不勞而獲的收入(unearned incomes)。這種承認，縱然不是表示資本主義堡壘向社會主義的投降，無論如何它也是放下吊橋準備投降了；因為社會主義，就它進攻性的方面來說，現在是，而且一直是，向着懶惰進攻的。使私有財產權壽終正寢的決議已日益得到人們的擁護，因為人們已開始看出一個人對手杖的所有權及對財產的所有權二者之間的區別在於：前者是受到輿論的嚴格限制，它的所有者不能用它去打破鄰居的頭，或者用它去進行威脅詐取錢財；而後者却使得懶漢現在能夠從社會上其他人們的勞動所得的收入中，征收每年不少於六億三千萬英鎊的稅款。那種想把問題弄得混淆不清的舊企圖，即認為家庭、宗教、婚姻等等的存在是與容忍無意義的社會盜竊密切分不開的說法，在今天再也欺騙不了誰了；因為通過一年來倫敦銷路最廣的廉價報紙更無前例地利用了這些特殊形式所進行的誣

^① 庇爾(Sir Robert Peel, 1788--1850年)，英國首相，他曾經由主張保護關稅轉而擁護自由貿易。——譯者

蔑性的謾罵，並沒有使任何一個社會主義者的身價因此而降低分文。

報紙用來反對社會主義的唯一有效的武器便是沉默。即使是天主教們贊成社會主義并把以往認為政治經濟學、科學、宗教是維護我們現存的工業制度的那些陳舊虛偽的說法加以粉碎的時候，這些消息也是不能得到報導的。社會主義的宣傳家們現在很容易找到聽眾，以致即使入場卷的票價賣得高些而且無需通過普通登廣告的方法，寬敞的演講廳內仍然是擠滿了人。這些演講中充滿了事實和數字，對於那些不幸地、被經濟困難所攪擾而不關心官方政黨的納稅者和繳租者來說，這些演講對他們日常的經驗和經濟困難提出了令人不可抗拒的呼喚；可是這些演講中的任何一個字都沒有被允許通過普通新聞報導的方式向社會上洩露出去。然而這種保持沉默的陰謀對我們來說仍然是有用處的。我們已經把實際聽過我們演講的人們感化了。其他那些不了解我們活動的人，在我們的運動沒有確實掌握了群眾以前，是不會給我們麻煩的。現在，警報終於發出來了，留在我們敵人陣營內的，似乎只有無知者，政治上的白痴，對貪污發生興趣的人以及破產的、酗酒的和莽撞的唯利是圖者的隨從們，這些隨從們對任何反對擁有大量秘密警察經費的既得利益者的人隨時準備着予以誹謗。這種說法也許是太過份了，但是如果我們把今天反對社會主義的人的懦弱和卑鄙與二十年前的情況相比較，我們便不能不得到深刻的印象。在那時，當赫伯特·斯賓塞^①的最優秀的學生們，包括韋白夫人和格蘭特·艾倫在內，從信仰斯賓塞（他認為社會主義除了“未來的奴役”外是一無所有的）轉變為信仰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一方面和斯賓

^① 斯賓塞 (Herbert Spencer, 1820—1903年)，英國哲學家，社會學家。

塞爭辯一方面仍然尊敬他。今天，我們既不尊敬我們的反對者們也不駁斥他們。我們僅只是像杀死斯泰森·吉尔門夫人 (Mrs. Stetson Gillman) 的心怀嫉妒的謀杀者一样，“仿佛旁若無人地从人群当中走过”。

然而，我們并不低估操在那些由于懶惰和浪費而把一个資源丰富的国家弄得貧困不堪的人們手中的報紙对人民的巨大危險性。要在倫敦开办一家报社需要二十五万英鎊、还不一定成功；并且为它撰稿的每一个人，只要写了一个威胁到老板們和他們的階級利益的字的时候，便有丧失生活权利的危險。在这种情况下，被制造出来的势利的、反社会利益的輿論是很多的；有一种新的罪行——報紙唆使暴民去行凶甚至去暗杀的罪行——过去只用于宗教欺騙者，現在却开始被应用到政治上了。其結果适足以又一次地說明：要把个人自由与經濟独立結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为了要拯救工人階級免于灭亡（这种灭亡是那些身無分文的、有着挨餓的一家人的父亲們与那些富裕的雇主們“自由”地訂立契約的后果），我們需要抛弃自由契約这个东西。当報紙是屬于一个国家內的奴隶拥有者时，出版自由很少不是欺騙人的，而且沒有任何一个新聞記者真正是自由的。所以，在这里我們要警告我們的讀者們，不要用他們在報紙上所讀到的有关我們的記載来过低地估計我們的活動範圍或我們的影響，尤其是不要过低地估計我們的論点的力量。这样的一种嗜好，即認為一个人要終身从事苦役并处于無止境的經濟困难之中以便使某些懶惰甚至可能是墮落的人們为了享乐而对他进行剝削，是并不如報紙所希望我們去想像地那样普遍。甚至于保守党中胆子最小的人，也就是每年收入不到五百鎊（有时不到一百鎊）的中产階級，現在也开始在詢問自己：为什么自己的兒子在受过一半教育之后，就得要在十五岁的时候去做一个小職員，

而讓別人的兒子去上大学并完成學業，而这种大学教育是这些祖傳的懶漢所不想去加以利用的。如果我們告訴他對自己提出這樣的一些問題便是“自由戀愛”与“無神論”的严重的象征，是会吓他一跳的；但这种說法并不足以使他信服。社会主义的进化，从实行“共妻”（全是女性縱火者）的住在堡垒里的赤色魔鬼和“强迫性的無神論”，进化到費边社和基督教社会主义联盟（Christain Social Union）这一类合乎宪法的、可尊敬的、甚至是正式的、高貴而有头衔的团体，使他日益減輕了对社会主义的畏惧；而那不可避免的、愈来愈可怕的城市地主代理人和收稅人的敲門声，却日益增加了他的疑虑。

今天，每一个人都知道，不論是社会主义或任何一种主义进化的道路，都不牵涉到把早期形式轉变为晚期形式的问题。早期形式是与晚期形式繼續并存的，直到后者存心把前者消灭或使前者充分感到慚愧以致不再产生为止。这也就是費边社会主义进化中所發生的現象。費边社会主义还没有消灭各种早期形式的社会主义；虽然它已經使这些早期形式的社会主义感到慚愧以致它們不能再任意地滋生出来，然而信奉早期形式的社会主义的人們仍然在宣傳，在收集捐款，并且正在使很多准备与費边社走得同样远或者更远的高貴的公民离开了社会主义。有时，他們甚至于筹划在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在議會中爭取一个席位。他們在选举中得票最少的情況使資產階級的政党感到放心。在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某种信仰的日子里，他們所得到的票数是少于人們可能想像的任何人类中的候选人（只要他确实是一个地球上的人）所能得到的。可是，他們时常結成各种在政治上無足重視的党派，除了夏天的几个月而外，他們每尾期在某地聚会一次，在那里他們互相說教。在夏天的几个月內，他們打着紅旗跑到野外，公开地譴責社会，不

管社会上的人們不理睬他們，或者是有几个漫游的人在听他們的演講。現在，我們不要再抛弃这些同志們了。假若一个信奉罕庭登教派(Huntingdon's Connexion)的伯爵夫人使一个人承認了他的罪惡，因而进入了英国国教并且成为一个大主教，那么，他将会常常体贴这个教派而不願意攻击它，而且还会記得这个教派里的許多教友，比之那些明达时务的英国国教的台柱們，乃是一些較好的基督徒和較为良善的人們。对于許多当地称之为“社会主义者”的小社团，費边运动的主要領導人也会采取同样的立場去对待它們。我們知道这些社会主义者对馬克思的崇拜（对于馬克思的著作，他們大部分是不知道的；对于馬克思的主張，他們也是不能理解的），他們对于階級斗争和把一切生产、分配和交換的資料加以社会化的口号的重复，并不比加尔文教的神約(Calvanistic Covenants)更适用于实际政治。当克倫威尔想要把他的党派綱領与政府和行政的实际急务相調和的时候，这种神約也曾使他感到过憂慮。我們也知道，而且有时也被迫直率地說出：这些小社团是無知的，对公务是無能的；在很多情況下，他們之所以采取極端的立場，乃是在提出一些不可能实现的要求的掩护下，来为他們的一事無成作辯护；当他們偶然被选到群众团体中时，他們往往以反对他們所謂的神約派妥协性的机会主义的办法而一貫地投票选举我們的反对者，因而表現了他們不能創造性地采取任何实际可行的行动。有时，当他們对于推动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費边社來說已变为不能令人容忍的厭物的时候，我們只得正式开除了他們的社籍，并且警告公众說：这些人除了代表他們愚蠢的本身而外并不代表任何人。但是这样的一种声明，虽然在政治和行政的行为方面是正确的，总的說来，仍然是使人迷惑的。在英国，每一个人开初对于公共生活都是可笑地無知，而且不善于采取公共行动。保守党和自

由党在“櫻草会”^①的集会上或在自由主义者与急进主义者的示威运动中招收了新党员，在这些场合里，没有人讲过一句含有意义或含有真理的话，可是，一个新入党的人却觉得他自己是在一种同情的气氛中；同样地，甚至费边社也大部分是由游荡于那些“不可能论者”（Impossibilists）的小社团中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因此，我们不仅像人类天性所能容许那样地乐意去容忍他们，而且当我们不必为他们所犯的过错而特别负责的时候，我们还要尽可能地给他们帮助和鼓励。很幸运地，英国的民主机构在过去二十年內有了巨大的增加，从1888年成立的州会到1902年成立的各种教育机构，对于成千上万的小市民来说，已经起了公共生活的学校的作用，而这些人在过去由于缺乏公共生活的经验，势必成为一些“不可能论者”。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只要在地方当局的一个负有责任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为了提供公共所需要的东西并使用公共费用——即使只是两先令半——而设的）上列席一个小时，就能使他在后半生不致染上“不可能论”（Impossibilism）的毛病。这种治疗是每日都在进行着的，它把无用的热心者转变为有用的费边主义者。

对于这一本书我还要讲一句话。它不是费边论丛的一个新版本。除了价格有所改变而外，它是照1889年版那样原封不动地印出来的。要采取其他的办法是不可能的。当这些论文写成的时候，这些论文的作者只是三十几岁的人。今天，除了被埋在坟墓里的威廉·克拉凯一人而外，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那时我们都被看成是一些年青的无赖，公开地为社会主义奋斗因而牺牲了

^① 櫻草会（Primrose League），英国保守党员在1883年为纪念已故的保守党政治理论家培根非德伯爵（Earl Beaconsfield, 1804—1881年）而组织的团体。

一些上進的機會。我們現在是被用來作為那種新的理論的例証，那就是：社會主義者，如像教友會的會員（Quakers）一樣，會在全世界滋生。這是一種危險的理論，因為社會主義，如像所有的宗教和主義一樣，既能把意志不堅的人弄糊塗了，也能鼓舞和利用意志堅強的人。但是，值得我們庆幸的是：自從我們在年青時代越出常軌作為費邊論叢的作者以來，在這十九年當中，我們的主張已博得了公眾的注意。

不用說，根據我們目前的地位及我們所獲得的知識，如果這項工作需要重做的話，我們會寫出一部完全不同的書來。但是，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去打一匹死馬，無論這匹馬在 1889 年踢得怎樣厲害。我們更應該小心，不要使人們產生這樣一種空想，以為可以用使失業者就業的辦法來把社會主義的序幕揭開。誠然，自從我們不再無情地拋棄失業者，讓他們去受盡熬煎，或是愚蠢地用施舍的辦法來安慰我們的良心的時候起，失業的問題就強迫我們要把失業者組織起來，養活他們並訓練他們。可是，順利地解決失業問題的第一個條件就是放棄那種陳舊的觀念，這種觀念認為：失業的裁縫可以被安排了去為失業的鞋匠縫衣服，而失業的鞋匠又可以替失業的裁縫做鞋子。真正的問題不在於衣服和鞋子的稀少，而在於愚蠢地把用來購買它們的金錢作了不適當的分配。在實現社會主義的時候，我們也許應該多注意人類的取舍，少注意經濟的壓力和歷史的演進。簡言之，我們應該提出我們解決社會問題的干脆辦法而不是提出這些辦法的精神和理論。我們也應該另外寫一本書，這本書雖然比費邊論叢更能引起行政專家們、銀行家們、律師們以及具有建設性的政治家們的注意，但是對於年青人以及對於這些事情不是內行的普通公民來說，這樣的一本書是沒有吸引力的。

此外，青年人与老年人的观点的差异并不一定是正确与错误的差异。把我们的过去作为达到更高境地的阶梯的丁尼生式（Tennysonian）的办法，其用意是虔诚的，但是，这种办法有时不是引导我们上进反而是引导我们退步。当赫伯特·斯宾塞在晚年从他的“静态社会学”中把他所期望于亨利·乔治的有关“土地国有化”的不可争辩的论点删去的时候，我们不能承认晚年的斯宾塞有任何权利对青年时代的斯宾塞施以这种暴力。纵使这二者完全是陌生人的话，我们也不能反驳或承认斯宾塞的这种立场。有了这个教训以后，我们就感到我们无权去删改甚至不再能代表我们最近的结论的那几段文字。很幸运地，在主要论点方面我们没有什么是要撤回的，没有什么是值得抱憾的，没有什么是要向人道歉的，而且有许多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因此，我们让这本书像它初次诞生那样地再出现。我们仅只是像律师那样，先写上“可能有错误”的字样，就是说，我们坚信，即使有错误存在的话，也是不太要紧的。

1908年5月21日

1889年初版序言

本書的几篇論文是去年为倫敦及附近各地的各界听众所准备的一套講稿。为了出版，曾經加以修改但并没有重新写过。这些問題不是像一个作家对一个学生那样地提出，而是作为只有一小时可供使用的一个演講者对听众作报告的方式提出的。乡間的讀者們可以把本書当作自願的演講者們在倫敦的工人俱乐部的政治团体內进行宣傳的一个样本^①。城市里的讀者們更有这样的一些便宜：他們可以不受報紙評論的影响而与作者們面对面地，从作者們的身上剝去了印刷的障碍，并在一个不致引起畏敬的环境中，在一群最有耐性的听众面前，对演講者反复詢問、批評并請他們回答。因为在任何一張載有演講目录的星期日报上都可以看到，在什么地方可以免費听到七个作者中某些人（即使不是全体）的演講；并且在所有这些場合下，提問和討論乃是會議程序的一部分。

这些演講的规划和安排并不是某一个个人的工作。名义上的編輯也只是受命去安排本書的出版并在整个印刷过程中負責处理必要的編輯手續的一个社員。通常在一本書的写作和編輯方面所包含着的一切事体，在本書是由构成費边社执行委员会的七位作者完成的；而且假若有某个作者对于另外的六个同事和費边社是一个陌生人的話，任何一篇論文都不可能是它目前的这个样子。

^① 到1889年4月为止的这一年内，仅只要边社社員所作过的演講就有七百次以上。

可是这样做也并没有牺牲了作者们的个性——我们没有企图把七人之中任何一个人所不愿对它负责的任何一句话或一个意见删去。假若对各章节的安排不是像目前这个样子的话，那么处理它们的方法必然会有所不同，尽管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本书所有作者都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认为必须把工业组织和生产资料委诸一个以完全民主的方法而与人民合而为一的政府去管理。但是这一信念对于个人的偏见说来并不是特殊的；这是条条道路所通向的一个目标；而且至少有七条道路是由费边论丛所代表了；因此，读者们不仅在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必畏惧会因为某种特别的心理状态占了优势而感到压迫，现在更无需有这种畏惧。

目前还没有社会主义的权威导师。本书作者们不过是一些健谈的学习者罢了。

倫敦

1889年12月



第一部分

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主义的經濟基础

肖伯納

所有的經濟分析都是从土地的耕种开始的。在天文学家的心目中，地球是一个沒有深远动机而在空中旋轉着的球体。在原始耕种者的肉眼中，地球是一片广闊的綠色平原，在那里，用一把鋤头去挖掘，就可以使麦子及其他可吃的东西生长出来。在世故的城里人的眼中，这一片广闊的綠色平原就無异是一張巨大的賭桌，在这一个賭博中，你勝負的机会主要是看你把你的賭注摆在什么地方。此外，对于經濟学家來說，这綠色的平原乃是一种秘密珍宝的埋藏地，在那里，人类的一切深謀远虑和勤勞努力都被那埋藏珍宝的力量的反复無常所愚弄了。聪明而有耐性的劳动者用他的鋤头在这里掘了进去，花了巨大的劳动只不过得到質量低劣的大麦、不多的馬鈴薯、大量的蕁麻和一点兒用来医治他的刺伤的酸模草罢了。而在篱墙另一边的愚蠢的浪費者，懶洋洋地注視着陽光下閃爍的沙土，忽然觉察到大地正在把黄金献給他——正在用黄金在他那沒精打采的眼前舞动，唯恐他看不见它。另外一个人在

探寻更多的诱人的黄金时，却碰到一个蕴藏丰富的煤矿，或者一个石油泉。人就是这样地被他的后母大地^①所作弄、而且当他拉住了她握紧的手时，他永远也不知道这只手里是有鑽石呢还是有火石，有好的麦子呢还是有一些粘满了泥土和生了虫的白菜。这样一来，他也变成一个赌博者，而且嘲笑那些空谈勤勉、老实和平等的理论家们。然而对这样的命运，他是永远反抗的。因为既然在赌博中，只有多数人输少数人才能赢；既然在人人都不老实的情况下，谈老实就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不平等使所有的人（除了地位最高的人而外）都感到很痛苦，而又使地位最高的人感到悲惨地孤寂，以致人们终于极为希望大自然的这种反复无常的恩赐会被某个具有权力和善意的机构所截住，而这个机构会把这些恩赐按照每一个人在集体寻求它们时所花的劳动公平地分配给他们。这种愿望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们曾经设计过公社、王国、公国、教会、庄园等，作为满足这种愿望的工具。最后，当所有这些都屈服于古老的赌博精神以后，又设计了尚未尝试过的“社会民主国家”。与社会主义相反，赌博的精神促使人们不容许敌对者插足于他私人的权力与后母大地之间，而宁愿从她那得到几亩土地，去碰一碰运气看能不能得到鑽石而不是得到白菜。这便是“私有财产”或“非社会主义”。我们自己的选择表现在下列这些方面：我们不断地渴望占有财产，我们共同欢呼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我们把“可敬”这个字眼专用在得到财产的人们身上，我们把卓越的宗教信仰归于禁止侵犯财产的戒律，我们认为人们中间的法律和秩序是与保护私有财产相一致的。因此，要具有关于我们社会的活生生的知识，最重要的是把私有财产从它贪婪的根源到它的混乱

^① 一般称大地为人类的母亲，意即指大地对人类仁慈。此处作者称大地为人类的后母，意即指大地对人类不仁慈。——译者

的終結的每一个步驟弄清楚。

讓我們以“政治經濟學家”的姿態，來探討一下按照私有財產制以及未被打亂的法律和秩序移民到一个地方的效果。你自己可以設想，这个国家里一大片未被開發过的广大的綠色平原正在等待着人的来临。于是，你可以想像来到了第一个移民者，那个經過了若干世紀的文化熏陶才变为“亚当·斯密”的最初的亚当，他正在探尋一塊适合于做“私有財產”的土地。正如“政治經濟学”基本上所假定的，亚当是“志在牟利”的；因此他把鋤头挖进他所能找到的那一塊最肥沃的和位置最好的土地上去，并且在它周圍打起柵栏来。当他把它耕作以后，那部“政治經濟学”被这种情景所鼓舞而預言，它把亚当的这一小塊耕地比喻为一个池子，池里的水将要高涨并淹沒整个的土地。讓我們不要忘記这个譬喻：那就是經常碰到的成語“耕种边际”的解答，在这句話里面，如像現在可以見到的一样，埋伏着一点兒人們过去所沒有覺察到的詩意。果然这个池子很快就擴張起来了。其他的亚当們也来了，人人都志在牟利，因此人人都一定要預先占据与第一个亚当的土地最接近的那些土地，这是一方面由于他已經選擇了最好的位置，另一方面是为了和第一个亚当交往和談話的乐趣，再方面是由于两个人联合起来的时候，这种双人的力量是比两个单人的力量要大得多，而且有时确乎成为一种新的力量，全然足以打破認為社会只不过是构成它的各单元的总和的那种愚蠢的一般假說。这些亚当們，也各自带来了他們的孩子^①，他們并不互相殘杀，而只是預先占据邻近的土地。于是这池子的水繼續高涨，边际擴張得离中心愈来愈远，直到池变成湖，由湖再变成一个内地的大海。

^① 原文是“bring their Cains and Abels”。Cain 和 Abel 都是亚当的兒子，Abel 为 Cain 所杀，故事出于“旧約聖經”創世記。——譯者

地 租

但是在池水泛濫的過程中，大自然的那種反復無常的作用就開始發生了。亞當所選擇的那塊特別肥沃的地區遲早就會完全被佔據了；新來者除了次一等的土地而外沒有什麼可佔據的。再說，勞動分工在亞當的鄰居們之間開始了；當然，隨之而來的，就是市場的建立來交換他們分工製造的產品。在這種情況下，與那個市場離得很遠是不合算的，因為遠離市場，就要引起為道路、負重的牲口，以及來回旅行的時間等等而支付的額外費用。所有這些，對於住在耕地中心的亞當都可以避免，而由住在耕地邊緣的新來者所負擔。假設亞當及新來者都是同樣的勤勞，讓我們估計亞當的年產量的價值是一千鎊，在耕地邊緣的新來者的年產量的價值是五百鎊。對於最初到來的一個人便有一個明顯的每年五百鎊的利潤存在。這五百鎊就是經濟地租。這種僅只是一個收入上的差別而不是一個佃戶給地主的明顯的支付，是不關緊要的。這兩個人同樣地勞動；而一個人由於土地較為肥沃和地位的便利，便比另一個人每年多得五百鎊。這種由於土地肥沃而多獲的部分便是地租；而且不久我們即將看到它被當作地租並以我們所熟悉的方式去支付。因為亞當為什麼不以每年五百鎊的租價把土地租給新來者呢？由於那塊土地的產值是一千鎊，那新來者將為自己留下五百鎊，或正好跟他在邊緣上耕種他自己的那一小塊土地所能得的同樣多；此外，住在人煙稠密的中心地區，比住在邊緣地區要更為愉快一些。新來者將會自己提出這種安排；而亞當也可以像一個懶惰的地主一樣靠每年五百鎊的終身養老金而退休。亞當的土地的超眾的肥沃性自那時以後即被認為地租，而且如像今天一樣，照例由勞動者付給懶漢。我希望我們的經濟學家們所敘述的關於這

种简单而易于了解的交易方式的一些例子,可以在此处被引用,而不致于看起来像它們在我所摘录的教科書上那样的困难。

斯圖亚特·穆勒(Stuart Mill)^①說:“地租是由超过最劣等耕地的报酬之上的那个超过額所构成。”福塞特(Fawcett)^②說:“地租代表一塊耕地所具有的、超过在耕种中的最劣等耕地的那种利益的金錢价值。”馬歇尔教授(Professor Marshall)^③說:“一塊土地的地租,就是它的产量超过了毗連的另外一塊土地(这块土地假若要支付地租就不会有人去耕种)的产量的那个超額部分。”西狄威克教授(Professor Sidgwick)^④謹慎地說:“任何一塊[土地]每·亩的正常地租,就是这块土地的产品价值高于另外一塊值得耕种而利益最少的土地每亩純产品价值的那个超过額。”瓦克尔將軍(General Walker)^⑤宣称:“明确地講,任何一塊土地的地租,决定于它每年的收益和实际上耕种来供应同一市場的最劣土地的每年收益之間的差額,假設土地被当作一个生产要素,它的質量無論在上述哪一种情况下都未被这种耕种所損害或改进。”这些作者們提出了这些定义来作为对他們的大师李嘉圖(Ricardo)^⑥所下的定义的进一步發揮。李嘉圖說:“地租是土地的产物中为使用耕地原始的和不可磨灭的能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分。”

地方富戶

讓我們折回来討論我們的理想的乡村。亞当靠每年五百鎊而

-
- ① “政治經濟学原理”,第一卷,第十六章索引(1865年)。
 - ② “政治經濟学手册”,第一篇,第三章,第116頁(1876年)。
 - ③ “产业經濟”,第二篇,第三章,第三节,第84頁(1879年)。
 - ④ “政治經濟学原理”,第二篇,第七章,第301頁(1883年)。
 - ⑤ “政治經濟学簡明教本”,第二章,第二一六节,第173頁(1885年)。
 - ⑥ “政治經濟学及租稅原理”,第二章,第34頁(1817年)。

从生产事業中退休；并且当着有新的佃戶們出現的时候，他的邻居們也急忙仿效他。第一个結果就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傳統：在这个乡村里那些最古老的家族比其余的家族享有一种优越的地位，而他們的优越地位的主要好处就是他們可以不劳而获。然而，由于他們仍旧依靠佃戶們的劳动来維持生存，他們繼續对用大写字母开头的“劳动者”（Labour）給予一定的口头上的称赞；而那种由于懶惰而致富和对勤勉加以贊揚的結果实际上便是在行为和原則之間树立矛盾而破坏了道德，这就是我們这个时代的深染犬儒主义的秘密所在，因而也就产生了这种希奇古怪的李嘉圖式的現象^①：一个做买卖的人就像农村铁匠那样每个礼拜天都按时到教堂去，在他的上帝的面前，發誓要抛弃他在下一个礼拜內即将用他的全力去追求的那种行为方向。

按照我們的假說，那个內地的耕种之海現在已經远远地伸展到不毛之地，以致在它的边緣上一个人一年劳动的所得只有五百鎊。但是由于人口不断增长而經常引起潮水的泛濫，海的边緣不会停止在那兒；它終于要侵占到每一亩可耕的土地，高涨到山上的雪綫，下落到咸水海的岸边，但經常总是最后才到达最貧瘠的那些地方，因为我們的耕种者現在仍旧像过去一样，是志在牟利的，当較好的土地可以找得到的时候，他們是不会去开发劣等的土地的。假設現在終于达到了那个可以自由获得土地的最外边的那一带地区，在这带土地上每个人一年的劳动收益只有一百鎊，那末，显然地，应当最初那一塊耕地的地租，現在就会上漲到九百鎊，因为这正是这块耕地的产量超过此时不必支付租金的那塊耕地的产

^① 李嘉圖（Ricardo, 1772—1823年），即前述“政治經濟学及租稅原理”的作者，他一方面指出人类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另方面他本人又以从事股票生意而致富；蕭伯納在此处是諷刺资产階級言行的不一致。——譯者

量的超过额。但亚当已把他的耕地以每年五百镑的租价租给一个佃户了。现在这个佃户也相应地把这块耕地以每年九百镑的租价租给那个新来者，那个新来者在这个交易中当然是无所损失的，因为这个交易依旧留给他非满意不可的一百镑。于是他在亚当的耕地上劳动，从它的上面每年获得一千镑；他留下一百镑而把九百镑付给亚当的佃户，这个佃户又付给亚当五百镑而给自己留下四百镑，因此虽然他的收入比起较古老的家族中的那一个人要略为少一些，他仍然也就这样地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绅士。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的，亚当耕地上的私有财产现在已分给三个人了，第一个人毫不工作而得了所产的一半；第二个人毫不工作而得了所产的五分之二；而第三个人干了所有的工作却只得到所产的十分之一。附带提一句，那个必然曾经在某地宣扬过私有财产会鼓励勤勉，会产生健全的动机，会按照勤劳而分配财富的道德家，现在被暴露出来是一个无用的短视者，他事先从茫然无知开始，并演绎地推论到单纯的矛盾和公开的愚蠢。

但是，所有这些与后面要谈的事比较起来还只是一桩小事。当这个内地的海上涨到它的边界，当犁路与海浪之间除了沿岸的一条沙地之外一无所有，当那些波浪本身为渔夫们所利用，当牧场和木材森林达到了雪线的地方，总之，当所有的土地都成为私有财产，而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所有主，即使这种所有也许只是一个租赁权。他在所谓的公平地租之下享有固定的租期：那就是他生活得很好，如像住在完全是自己的土地上一样。所有这种地租都是经济地租；地主既不能把它抬高而佃户也无法把它降低；它是自然而然地被所租的这块土地和那个国家内的最劣等的耕地之间的肥沃程度的差异所决定。与我们今天所认识的世界相比，这种情况便是自由和幸福。

無产者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那块土地上却出现了一个形状奇异的人——一个从那高山上的雪綫徘徊到大海的岸边去寻找土地的人，他發觉沒有一块土地不是别人的财产，私有财产早已把他抛在九霄云外了。他走在路上时，是一个流浪者；他离开了道路时，便是别人土地的侵犯者；他是亚当的第一个沒有繼承权的兒子，第一个“無产者”。他的后裔将使地球上所有的后代子孙們享受幸福，但是，他自己現在却是沒有粮食、沒有房屋、無以为生、是一个多余的人，具有去做流浪者或奴隶的一切条件。可是，他仍然是一个具有头脑和膂力的人，能够想出办法并付諸实行。只要能够得到土地，他就能够大力把它加以利用。但是，怎样才能得到土地呢！“需要”乃是“發明”之母。也許这位第二个亚当，即偉大的“無产者”的第一个祖先，是具有这样一个少有的头脑的：这个头脑还不是“大自然”所賜給他的反复無常的礼物当中最小的一个。假若肥沃的土地产生地租，为什么丰富的头脑却不能够呢？我們所說的第一一个亚当的那一小块土地，对那租戶所花的劳动，現在仍然每年有价值一千鎊的产品，这个租戶，如像前面所說过的那样，还得要付出九百鎊的地租。假若这个“無产者”大胆地为这块土地付給那个人每年一千鎊的地租，情况又将会怎样呢？显然地，这样做的結果将会使这个“無产者”受到飢餓，因为他必須把全部的产品付給旁人。但是假若这个“無产者”能够筹划、發明、或預料到一种新的需要——使那块土地产生某一种至今仍梦想不到的用途——因而使过去每年只产生一千鎊的那块土地能够产生一千五百鎊，結果又将怎样呢？假若他能这样做，他就能把一千鎊的地租全部付清而剩余五百鎊作为他自己的收入。这就是他的利潤——他的能力租

金——也就是他的能力超越了一般愚昧者的产品。这样，这个灵巧的“無产者”就有了机会，他变成了那个現代的柏魯塔克——著名的作家山姆·斯迈而斯笔下的英雄人物^①。誠如拿破侖所說过的，对于有天才的人們，事業之門是做开着的。但是天哪！社会問題不仅只是白痴的命运的問題，也是聪明人的命运的問題。在一定时期，地球上又出現了另外一个“無产者”，他并不比其他的人們更聪明，他能与他們做同样多的事，但却不能比他們做得更多。对于他，就沒有有什么“能力租金”了。那末，他又将怎样取得土地的租佃权呢？讓我們来看一看吧。当然，到这个时候，不仅那个有本領的租戶的各种新的办法会被那些沒有天才發明新办法的人們所抄襲；但是，劳动分工、工具与貨幣的使用、以及对文化經濟地加以利用，都将会大大地增加人們向大自然取得財富的能力。所有这些增加了的財富，对于拥有土地租佃权的人是有很大的利益的。因为他从所拥有的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产品中拿来用作租金支付的数目是固定的，所剩的余額，就归他自己所有。可見地主們所預見不到的产品的額外增加会使租戶富裕起来。因此，情况很可能是这样：边际耕地的产量可能大大地增加，而这种边际耕地的产量如像我們已經知道的，决定整个地区內耕种者自己能剩下多少产品。假定产量增加了一倍；那么我們那些以前付出九百鎊地租之后还可以剩下一百鎊的老朋友們，現在由于总产值已增加到二千鎊，縱然仍旧付出地租九百鎊，自己还可以剩下一千一百鎊。現在，对于我們这个并不更为聪明的“無产者”，却造成了一个机会。例如，他很可以每年出一千六百鎊的代价去租种那塊土地，而自己每年还可以

^① 柏魯塔克 (Plutarch) 是古代傳記作家。山姆·斯迈而斯 (Samuel Smiles, 1812--1904年)，英国社会改良家，原为医生，后为作家，所著“自助” (Self Help) 一書，銷行一时。——譯者

剩餘四百鎊。這樣將會使上一個得到租佃權的人，作為一個攸閑的紳士而退休，他每年得到七百鎊的純收入，也就是從每年那一千六百鎊的總收入中，用九百鎊去付給地主。而這個地主又以五百鎊轉付給最先的那個地主。但是要注意，這個每年七百鎊的純收入並不是經濟地租。它不是最上等與最劣等土地之間的差額，它與邊際耕地無關。它完全是為獲得使用土地的特權的一種支付——也就是為了要獲得那種現在已成為非公開的壟斷權的一種支付。這種支付的數額並不是由土地購買者在他自己的邊際耕地上能為自己生產什麼來決定，而純然是一方面由土地所有者的熱望安閑，和另一方面由無產者的需要生存所決定。用當前流行的經濟術語來說，那個價值是決定於供給與需求的。由於新的無產者的到來，使土地的需要增加了，於是地價便上漲，成交的條件便越更苛刻。租佃權並非永遠授與租戶，從而使租戶可以長期地獲得預見不到的生產改良所增加的收益，而是按一定的期限出租的；租約期滿，地主可以修改租約，或把租戶趕走。租金會一直上漲，直到最初支付給頭一個地主的地租和退休地租^①，與中間的各道租佃權的轉讓人或中間人的收益比較起來，似乎已毫無意義。遲早租佃權的價格會漲得很高，以致實際耕種者除了能夠維持生活而外將別無所有。到了那個時候，租佃權的再度轉讓便宣告終結。土地吸引無產者去付出比經濟地租還更多的租金的情況也就停止了。

那麼，下一個無產者又將怎樣辦呢？我們為所有他的先驅者都找到了一種逃避的辦法，但是對他來說，就好像是毫無辦法可想了。大門外的牌子上，刻上了“只有可供站立的余地了”，或者甚至於刻上了那更有詩意的字句：“放棄一切的希望吧，進來的人

^① 退休地租 (Quit rents) 是指除了頭一個地主而外，其他各道租戶把租佃權轉讓給別人以後，自己可以不勞而獲并借以退休的租金。——譯者

們”^①。这个一出生就是無产者的人，只得以一个無产者的身份死去，留給他兒子的唯一遺產就是他的貧困。我們还不很明白，他是否还活得上十天，因为假若他不能得到土地，那么他的生活資料将从哪里得来呢？他必須有食物和衣服，而且两者都必須立刻得到。市場上有的是食物和衣服，但是它們并不是可以白白地得到的；要得到这些东西，还得要付出那得来不易的錢，而且馬上就要支付；因为对于沒有财产的人是沒有人願意賒卖給他的。于是金錢便成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金錢又只有出賣商品才能得到。这对于那些土地的耕种者們來說是沒有困难的，他們可以用自己的勞力来生产商品；但是这个毫無土地的無产者，既沒有商品，也沒有生产商品的工具。他必須出賣某种东西。然而他是沒有什么可卖的——除非出賣他自己。这样一个想法，似乎是孤注一擲的，但事实証明这是十分容易實現的。由于那些租用土地的耕种者們，沒有足够的体力或足够的時間去竭尽他們所掌握的土地的生产能力，假若他們能够在市場上买一些人來，而所出的代价較这些人的勞力对生产所增加的价值还少，那么，把这些人买来将是一种絕對的收益。这真正不过是一种形式上的購買罢了；实际上，这些人是不花一文就可以得到的，因为他們除了会生产出他們自己的那項买价之外，还替买主生产出一个剩余价值。在买与卖的历史上，从来沒有过对买方这样有利的交易。阿拉丁的伯父用新灯去換旧灯的事^② 如果与它比較，簡直是微不足道了。因此，这个無产者一开始出賣自己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买主爭着出价來买他，一个比一个用付給他更多的劳动产品和留給自己更少的剩余价值來互相竞争。但是，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出于但丁的“神曲”地獄篇第一章。——譯者

② 阿拉丁以获万能神灯致富，娶苏丹之女为妻，他的叔父用一盏普通的新灯向阿拉丁的妻子把万能神灯換了。故事出于阿拉伯民間故事“天方夜談”。——譯者

那出价最高的人，也必須要有一点剩余价值，否則他就不願意購買。这个無产者在接受最高的还价的情况之下出卖了自己，使自己公开地受了束縛。这样的做法，他并不是第一个，因为很明显地，他的那些先驅者們，也就是那些租佃权的購買者們，早就被那些靠他們所付給的地租过活的地主老爷們这样地奴役过了。但是，現在一切的伪装都被揭穿了：这个無产者不仅丧失了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丧失了为自己打算以及按照自己的喜爱去进行事業的权利。經濟方面的改变还只是形式上的；道德方面的改变却大極了。这种新的、直接的对人进行买卖的方法，很快就在市場上流行起来，并且代替了从前租佃权的买卖。要了解这件事的后果，我們必須对一般商品的交換进行分析，因为現在劳动力在市場上乃是与其他任何一种放在那兒出售的商品处于同等的地位。

交換价值

人們一旦开始不使用各自的劳动去滿足自己的需要，便立刻产生了交換的風气，这是很明显的。一个为自己做桌子和椅子、火鉗和茶壺、面包和黄油、以及造房屋和做衣服的人，乃是一个万事都能但又一無所长的人。假若他能專門从事于制造桌子和椅子，并且用它們向鐵匠去交換火鉗和茶壺，向面包师和酪場主去交換面包和黄油、向建造者和裁縫去交換房屋和衣服，那么，他就会發現他自己的工作进展得更快。这样做，他会感到自己所造的桌子和椅子是值多少錢——它們具有人們所謂的交換价值。为了大家的方便，人們曾規定了一些适当的商品来衡量这种价值。人們把用于这种特殊用途的黄金叫做貨幣。那制造椅子的人就知道他的椅子值多少錢，并且用椅子去換成貨幣。鐵匠也知道他的火鉗能值多少錢，而且用火鉗去換成貨幣。因此利用貨幣作为媒介，造椅子的

便可以用椅子去交換火鉗，鐵匠也可以用火鉗去交換椅子。這就是交換的結構；商品價值一確定之後，這種結構的運轉便很簡單了。但是它畢竟只是一種結構，它並不能決定價值或是解釋價值。要去發現是什麼東西決定價值的這樣一種企圖，本身就被各種顯而易見的矛盾所糾纏住，這些矛盾阻礙了理解這個問題的正確途徑；而且也被具有誘惑性的各種巧合所糾纏住，這些巧合使錯誤的事情看起來好像是有光明的前途似的。

那些顯而易見的矛盾很快就自己暴露出來了。由於人類的任何努力都不能夠把一件無用的東西變為可以交換的東西，因而任何東西的交換價值都決定於它的效用，這是很顯然的。可是用途最大以致完全不可缺少的新鮮空氣和陽光是沒有交換價值的，而從天空落到後花園里的一塊隕石，儘管它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不可缺少的古玩，却有很大的交換價值。我們很快就會發覺這是由於新鮮空氣多而隕石少這一事實所決定的。假若人們能以任何辦法使新鮮空氣的供給逐漸地減少，並用大炮向天空轟擊或用其他的辦法使隕石的數量逐漸地增加，那麼新鮮空氣便會立刻獲得一種漸漸增高的交換價值，而隕石的交換價值便會逐漸下降，最後一直到新鮮空氣會被人們像煤氣那樣地用一個計度表來計算着收費，而隕石會變得像普通小圓石那樣的一文不值。事實上，交換價值是隨着供給的增加而減少的。這是由於這樣一個情況，即供給繼續增加，效用就減少了，因為當人們有了一定數量的商品後，他們就部分地感到滿足，而對其餘的商品便不這樣地估價了。一磅麵包對於一個人的有用性的大小，決定於那個人是否已經吃過了一些麵包。每個人每星期都需要一定磅數的麵包：沒有人會需要多於這個數量的麵包；假若有人要多賣一些給他，他就不会願意付給很多的錢——甚至於不願意付給一文。對於一個人來說，有一

把雨傘是非常有用的，再有第二把雨傘便算是一件奢侈品，假若再有第三把，那雨傘對於他就只是一根木料罷了。同樣地，我們的博物館的管理員們需要收集適當數量的各種隕石，但他們並不需要每一種隕石都收集一貨車那樣多。在這樣的情況下，交換價值並不決定於效用最大的物品，而是決定於人們所積存的物品中效用最小的物品。舉一個例便可以清楚地說明事情為什麼會是這樣：如果市場上雨傘的存貨數量是大到足夠供給社會上攜帶雨傘的人每人兩把雨傘，那麼，既然第二把雨傘不如第一把那樣的有用，那理想的辦法便是把那些雨傘的一半，譬如說，每把標價十五先令，而把其他的一半，每把只標價八先令六便士去出賣。不幸的是：沒有人願意出十五先令去買一件只要八先令六便士便可以買到的物品，而且當人們來購買的時候，他們便會把八先令六便士的雨傘一概買光。當每人有了一把雨傘之後，其餘的雨傘，雖然標價十五先令，將處於第二把雨傘的地位，只值八先令六便士。這就是供給品中效用最小的部分的交換價值是怎樣地決定了所有其餘供給品的交換價值的情況。用專門的術語來說，這種情況乃是由無所偏愛法則所引起的。既然供應品中效用最小的那個單位通常就是最後生產的那個單位，它的效用就叫做商品的最後效用。最先的或是效用最大的那個單位的效用就叫做商品的總效用。假若世界上只有一把雨傘，那麼它的總效用的交換價值將取決於一個身體最脆弱的人在雨天的日子裡，不願冒雨而行，而寧願立即買一把傘所願付出的那個代價。但是實際上，幸亏有了無所偏愛法則的作用，那身體最脆弱的人，却不必比身體最健壯的人多出錢去買它，也就是說，他兩人對最後生產出來的那把雨傘的效用的交換價值——或是对那批雨傘的最後效用的交換價值，都付給同樣的價錢。這些術語——無所偏愛法則、總效用、最後效用——雖然在讀者們知道

它們的确切意义之先看起来已經是十分明白易懂的了，然而，就它們本身的意义講来，却是含糊不清的。某些經濟学家把我們前面講过的那个不断扩張的池子的比喻从耕种方面轉用于效用方面，并把最后效用叫做“边际效用”。对于我們当前的目的，任何一种叫法都是适用的，因为我們不打算再用这些名詞了。必須抓住的关键是：不管一种商品是怎樣的有用，如果把它供給量增加到超过人們的需要量时，它的交换价值就要貶低到一文不值。那个超过的数量既然沒有用途和沒有价值，是可以不花一文就能得到的，而且只要有不花一文就可以得到的商品大量存在，就沒有人肯花錢去买这种商品了。这就說明了为什么空气和其他必不可少的东西沒有交换价值，而稀有的無用的裝飾品却能得到很高的价錢。

这样看来，一个作为生产者和交换者的人所面临着的就是上面的这些情况。如果他生产了沒有用途的东西，他的劳动便是白花的了，他不会得到什么的。如果他生产了一件有用的东西，他所得的代价就以那件东西在市場上已經有的数量为轉移。假若他憑借使生产能够滿足当前的消費而有余的办法增加了供給，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会降低全部商品的价值。所以他應該很小心地去選擇自己的職業、并且努力从事这个職業。他所選擇的自然是在于去生产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較之生产它們所花的劳动具有最高的价值——事实上这些商品与它們的成本相比較可以得到最高的价錢。例如，假設一个乐器制造者認为制造一个豎琴和制造一个大鋼琴的成本是一样的，但是豎琴是漸漸地过时了，而大鋼琴却日趋流行，那么市場上便会很快地有超过需要量的豎琴，而大鋼琴的数量便减少了。結果豎琴的价值就下降而大鋼琴的价值便上升。既然两者的劳动成本是一样的，那么乐器制造者便会立刻用他全部的劳动从事于制造大鋼琴；其他的制造者也会这样做的，直到因供

給量的增加而把大鋼琴的价值降低到和豎琴的价值一样为止。那时流行的东西可能会从大鋼琴轉移到美国式風琴,这样,乐器制造者便会制造更少的大鋼琴和更多的美国式風琴。当風琴的数量也有了足够的增加,“救世軍”的努力又会創造出对于手鼓的需要,并使它們的所值超过生产成本四倍,于是,立刻就会产生一种把制造乐器的精力狂热地集中于制造手鼓的現象;这种精力的集中將繼續到因供給的增加,把制造手鼓的利潤^①降低到不如去制造大喇叭来满足群众的需要为止。最后,大鋼琴的价錢会便宜到不比豎琴更为有利可圖;美国式風琴的价錢也将降低,直到不比普通鋼琴更有利可圖;手鼓的价錢也将降低,直到和美国式風琴的价錢一样;因而最后制造大喇叭也不会比制造手鼓更賺錢,这就达到了一个一般的利潤水平,表示出了人們需要各种乐器的比例。但是获得了这个利潤水平后,人們仍然会在这样确定了的比例下生产出更多的乐器,直到它們的售价低于生产成本無利可圖为止。这样一来生产便肯定地要受到阻碍,因为进一步增加供給只会带来損失;并且若要損失金錢,人們無需麻煩去生产商品,只需把金錢拋出窗子外面这样一个简单的过程就行了。

这个乐器制造的例子中所發生的情况,实际在所有人們所制造出来的商品方面也同样發生。那些数量稀少从而价值相对較高的商品,引誘着我們去生产它們,直到因供給的增加把它們的价值降低到有如生产它們不如生产另外的商品还較为有利的程度。过去所达到的一般利潤水平会进一步地被利用,直到因数量的普遍增加而把商品的价錢降低到与其生产成本相等为止。这两者的相等有时被叫做它們的正常价值。这里,如果回头去看一看我們所

^① 这里所說的利潤用俗語說是指普通所說一件物品的价值超过其成本而言。

講过的耕地擴張的分析和它在地租現象方面产生的結果，便会提出这样一个問題：商品的生产成本是什么呢？我們已經明白，由于每一塊土地和另一塊土地在肥沃程度与地勢优劣上各有不同，以及生产成本在各个地区不相一致的緣故，边际耕地的成本是最高的。但是我們也已明白，地主会怎样把租种上等的和位置較好的土地的佃戶們所得的利益夺来作为經濟地租。这样把地主所收的地租加在生产成本之上的結果，会使那最上等的土地的生产成本增加到同最下等土地的生产成本同样高的水平。这样看来，生产成本的意義就是指边际耕地上的生产成本，它对所有的生产者都是一样的。因为他們在生产每一件商品中所节省的劳动是被他們为了要提供地租所必須生产的較多的商品所抵消了。只有徹底了解利潤逐漸降低到一般水平綫以下的这种行为以后，我們才能揭穿平庸的經濟学家企圖欺騙我們，要我們把私有財產制度当作是公平可行的制度的陰謀。他一来就告訴我們說，經濟地租并不被計算在边际耕地生产成本之內。然后他又告訴我們說，边际耕地的生产成本决定商品的价格，因此他爭論說：第一，地租并不被計算在价格之內；第二，商品的价值是决定于它們的生产成本。其含义就是說：地主們並沒有使社会受到損失，而且商品完全是按照它們所耗費的劳动而交換的。这种以膚淺的聪明所表示的狡猾办法，直到今天还是在我們的学校里作为政治經濟学来正式講授着。我們立刻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在变戏法而已。交換中的、或将要交換的商品并不是按照在它們的生产中所耗費的劳动去决定它們的价格，那些在边际耕地以內所生产的商品，也能获得与在边际耕地上以付出更多的劳动所生产的商品同样高的价格。地主并不是沒有使社会蒙受損失，实际上社会向他支付了这两者之間的差額。

但是，这并不是我們分析价值的目的。現在我們可以看出

“人”对于商品价值的控制純然是有賴于他对于供給加以調节的能力。人們常常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想法把供給量减少。曾經有人用各种巨大的陰謀来妨害世界上的大麦和棉花的收获，从而迫使它們的价格尽可能地漲到最高峰。为了要用限制供給的方法来維持价格，荷兰商人曾把东印度香料整船整船地毀坏掉，就如像現在整船整船的魚被毀坏在泰晤士河里一样。所有企圖操縱物价的商人們的联合壟断組織、托拉斯、囤积居奇組織、联合企業、专利公司和商業秘密团体都有同样的目的。每个人都認为他越能限制社会的發展，自己就越能得到利益。这样的一种意識，阻碍了生产和社会本能的發展。产生这种意識的理由，当然是認为当每个人使社会蒙受損失而自己得到利益的时候，整个社会也将因为每个人得到了利益而得到好处。有一桩事情，社会是可以放心的，那就是永远不会有以不断增加供給来降低价格的陰謀發生。当人們生产的東西的价格跌到生产成本以下时，不管成本是劳动或是劳动加上地租，人們就要停止生产。沒有一个人願意繼續生产面包直到它像陽光那样的不值分文为止，或是直到它变得像 1888 年夏天的雨水那样的討厭。到目前为止，关于人們自願地用劳动去过多地生产商品这一回事是用不着我們去操心了。

工 資

現在，我請你們听取那个被擱置下来的耕地逐漸擴張的問題吧。我們已經討論到一种新商品在市場上的出現——討論到那个無产者被迫靠出卖他自己米謀生！为了要立即認識这种情况所潜伏着的恐怖，你們只有运用我們的关于价值的考察以及价值的不可避免的法則，那就是唯有限制一种商品的供应才能避免它的价值最后下降到零。無产者所出售的乃是一种在生产上他所不能控

制的商品。他自己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驅使而去生产它。正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才把耕种和文化从中心地点扩張到高山上的雪綫，最后迫使人們把他們自己出售給拥有土地的老爺們；正是这同一的力量使得人們繼續繁殖，因而他們的交換价值緩慢地而且必然地下降，直到它完全消失为止——直到在各种膚色的人都可以不花一文就可得到的这块土地上，使被当作动产的黑奴們因值不得保留而被釋放为止。这就是我們英国劳动者們今天的状况：他們甚至于比泥土还要下賤，他們是毫無价值的而且是不花一文就可以得到的。找不到买主的失業者的存在，就为上述情况提供了証明。按照無所偏爱法則，当人們不花一文能够得到同样可供使用的人的时候，就沒有人願意出代价去买人。那末对于給予那些被雇用的、和当然不是白白地工作的人們的工資，又作何解釋呢？事情是令人可嘆地簡單。假設在英国馬匹繁殖到这样的数量，只要你开口要就能得到它們，正如像对被判处淹死的小猫那样容易得到。你仍然得要喂你的馬——假若你把它用作一匹漂亮的猎馬，你就要使它吃得好和住得好——假若你把它用作服賤役的牲口，你就会使它吃得坏和住得坏。但是养馬的費用并不意味着馬的本身有交換价值。假若你在最初不花一文就得到了它——假若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也沒有人会为它而付給你任何代价，那末虽然你花了錢去养它，它仍然是不值一文的。这恰好就是無产階級中每一个成員的情况，他可以在今天被另一个失業者所代替。他們的工資并非他們本身的价格；因为他們是不值一文的，他們的工資不过是他們的維持費罢了。只要給予維持生存的最低工資，你就能够尽量地雇到你所需要的普通劳动者，而且在刑法的范围以內，你可以任所欲为地去使用这些劳动者，因为一定会有一个資产階級的法官来对这刑法作有利于你的解釋。假若你对你的脚夫給予

比你的可怜的斫柴人較多的津貼，其理由正是与你要給你的猎馬豆子和清潔的馬厩而不給它切碎的稻草和污秽的畜舍一样^①。

資本主义

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劳动者的获得只不过是一个供給口粮的問題罢了。假若要修筑一条铁路，只消供給維持最低生活的粮食，讓足够数量的劳动者去修筑它便够了。例如，假若这条铁路需要一千个人五年的劳动，那末这条铁路的所有者們所花費的便只是維持这一千个人生存五年的东西。这个最低生活維持費的专门名詞就叫做資本。这笔資本是由铁路所有者們所提供的，这是由于他們沒有把从其他一些工資劳动者們創造出来的多于工資的整个超过額消費掉而得来的，他們只不过从其中提出一部分足以維持筑路工人生存的数額来。在这种情况下，資本可以被宣称为是節約的結果，或者，如像某个有天才的辯护者巧妙地所說的那样，是对忍欲的报酬。这种說法至今仍不失为資本的論文助兴的一点幽默。几乎不用說，節約者乃是那些有着多于他們想花費的錢的那些人們；而忍欲者乃是那些錢比較少的人們。到了上述的五年之末，那条筑好的铁路便是資本家們的财产；而筑路的人們却仍旧像过去那样無依無助地回到劳动市場上去。有时，铁路的所有者們把那条筑好的铁路称为他們的資本；但是，严格地說，这不过是一种說話的技巧罢了。資本純然是多余的生存資料。以現行利息率标示的資本的市場价值，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下降；而信用好的股票的

① 当掙取工資的各种条件之一乃是維持某种生活状况的时候，維持生存的工資也許会达到使这个术语看起来令人可笑地不恰当的数字。例如，一个倫敦时髦的医生不能从每年一千鎊的收入中有所积蓄；而爱尔兰总督这个职位只能以在每年的正式薪金二万鎊以外还私人能掏得出腰包的人来充任。

市場价值，則随着人口的增加而上升^①。假若戈士成先生被他在减少統一公債 (Consols) 方面的成就所鼓舞，以剛够重修一条鉄路的代价作为对征用那条鉄路的全部賠償而要求“倫敦及西北鉄路公司”的所有者們加以接受时，他們对于他的这种大胆行为所表示的驚訝必然使他立即感觉到鉄路与資本二者之間的区别。按俗話講，一份有农場在上面的財產，叫做产生地租的土地；而在它上面筑有鉄路的另外一份財產，就叫做产生利息的資本。但是从經濟上說，一旦它們变为收益的源泉时，它們之間就沒有区别。假若像鉄路这样一个費用龐大的企業，能单独地被一个地主用自己的剩余財富在他自己的土地上把它修筑起来，那末这个道理便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来。正是为了需要把許多拥有剩余財富的人們联合起来，以及为了需要按照各人所提供的資金来分配产品而去設計一种金融机构，于是才把財產的名称及其外貌加以修正。但是修正并不是改变，因为股票持有者和地主，都同样是依靠無产者用劳动从他們財產中生产出东西来过活的。

“人口过剩”

資本主义制度的引用标志着对仅能获得維持生存工資的劳动者进行剝削已經变成了租佃权所有者們的主要生活艺术之一了。这种制度的引用也引起了一种虛伪的不会失業的希望，这种希望使無产者盲目地遭遇到那种小土地耕种者及自耕农們显然看得出来的迅速繁殖的悲惨后果。但是，真的，你愈是把劳动者的身份降低，剝夺了他們一切艺术的享受和从他們的同伴們那里得到尊敬

^① 在目前各种情况下，現行利息率必定逐漸下降到零，甚至变为“負数”。到了那个时候現在能賺来百分之百的紅利的股票可能賺来百分之二百或更多的紅利。然而利息率的下降會錯誤地被認為是利息消失的趨勢。实际上它标示着利息增加的趨勢。

和贊美的机会，那末你愈是把他們無情地推回到他們唯一仅有的欢乐和唯一的人类的联系上去——推到那种产生新鮮的人类供应的本能的滿足上去。你可能把这种本能贊揚为神聖的，直到最后，人的过剩供应，变成了一桩令人討厭的事情；产生了一种人滿之患的灾害；于是你突然發現这种本能是邪恶的，并且高呼“人口过剩”。但是你的奴隶們对你的呼声会漠不关心；他們像兔子一样地在繁殖；他們的貧穷产生了肮脏、丑恶、欺詐、疾病、淫乱、酗酒和謀杀。在他們的劳动使你們的財富积累起来的同时，他們的悲慘也增加了而且使你为之窒息。你带着厭恶的心情，离开了他們，搬到城的另外一端；你在你的鉄路上为他們指定特別的車廂；在你的教堂和戏院中为他們指定特別的座位；用你可能設計的各种階級障碍把你的生活与他們的生活区别开来，然而他們仍旧拥挤在你的周圉；于是你的臉上带着你已經成为習慣的对他們厭恶和怀疑的表情；你的耳朵里充滿了他們之間的最粗野的那些人的言語，以致当你失去耐性时你也使用了这些言語；他們毫無怜悯地毒害你的生活，正如你毫無心肝地牺牲了他們的生活一样。你开始热心地相信魔鬼。以后又产生了对他們革命的恐怖；产生了把他們一队队地加以訓練并武装起来以便去鎮压其他的人；产生了監獄、医院和各种瘋狂强迫的情緒激动，并繼之以各种瘋狂慈悲的情緒激动。而在这样的同时，人口却繼續增加起来！

“病 源”

人們有时說，在这个奇怪的可怖的人类文化从坏变到更坏的进程当中，財富是与貧穷一同增长的。財富随着貧困的蔓延而不断地减少这样一回事是永远不可能的。但是財富的不断增加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整个国家每年所生产的交換价值的总和虽然是

一日千里地在增长着，但是在某一个階級手中的財富的积累，以及因而产生的超額購買力的积累，不久就使这个階級对社会有用的財富感到过分滿足，而使他們去購買奢侈品。某种奢侈品一旦有了价錢，就取得了交換价值，而劳动就被雇用来生产它。例如，一位天性文雅敏感的紐約太太，为她死了的爱犬訂購了一个漂亮的鑲有粉紅色緞子的花梨木和銀子做成的棺材。这个棺材被做成了；然而就在这个当兒，一个活着的小孩，却赤着脚在外面那个冰天雪地的貧民窟中来回踟躕并且餓得發暈。那个棺材的交換价值被計算为国家財富中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能以食物和衣服供給它的兒童的国家，不能因为它对一只死狗供給了一个漂亮的棺材就被認為是一个富有的国家。事实上，交換价值本身，也像其他各种东西一样，变得邪恶化了，它不再代表效用，而只代表那种对情欲、愚蠢、虛荣、饕餮、瘋狂等等的渴望，这些渴望，被一般文雅的經濟学家专门称之为“有效需求”。奢侈品并不是社会的財富；用来生产它們的机器也不是社会財富；只能用来生产它們的技术劳动不是社会有用劳动；那些以制造奢侈品为生的男人女人和小孩們，并不比那些为了滿足他們的快乐才雇用这些人来工作的閑散的富人們还更能够自給。正是把这类交易中所牵涉的交換价值当为財富計算的那种習慣，使我們幻想到穷人是在富裕中挨餓。然而他們是在充滿了珠宝、天鵝絨、花边、成套的应用物品和賽跑的馬的富裕情况下挨餓，而不是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挨餓。在人民福利所需的那些东西方面，我們是赤貧的；今天英国的社会政策可以与那些为了要維持一輛馬車并和时髦的裁縫打交道而把她們的孩子弄得穿不暖吃不飽的女冒險家們的家务政策相比拟。但是这样的事情是很真实的：当財富和福利正在减少时生产力却是正在增加；不是別的事情而是把生产力轉用于生产社会無用的商品这一桩事，妨

碍了把表面的财富变为真实的财富。那掌握在富人手中的购置奢侈品的购买力就会被放在大众的手中来掌握真正的财富。然而私有财产仍然会把购买力集积在少数富人手中并使许多穷人的购买力减少。因此，到最后，私有财产所能够自夸的那个目标——所谓“财富”的巨大积累（这是私有财产所引为自豪的那种鞭策着男人和女人延长并加强每日的劳动的结果）变成了一个幻影。私有财产用它的全部精力，以它的斯迈而斯式的“自助”^①，用它的壮丽的商业企业，用它的凶猛的苦役和奴役的手段，用它的对于血汗和眼泪的任意挥霍，从它的奴隶们的微俸上面，究竟能堆积起来些什么东西呢？它只不过堆积了一大堆难看的旧衣物，一些腐败堕落的阶级文学和阶级艺术而已，而它的毒害和祸患却是不小的。

于是，上述的这种经济分析，判定了私有财产即使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不公平的，而且即使在财富的分配当中，如何才能使劳动者按照他创造财富所花的劳动而适当地取得报酬这样一个个人方面的问题上，私有财产也不能算是一个最后的解决办法。所有在私有财产制度上建立真正的社会的各种企图都已经失败了：这样建成的社会最接近的事物乃是文化，而这种文化已腐化为放荡和奢侈的中枢，终于被未开化的民族扫荡无余。关于我们自己的文化已经发展到腐朽阶段这一事实，是可以被認為有着统计数字上的证明的。假若私有财产制度仍被保留下来，它将进一步腐化而不是得到改进，这从经济方面说来乃是必然的事。今天，幸好原封未动的私有财产是行不通的了。虽然移民这一个安全活门在本世纪（指十九世纪——译者）曾经大大地起过作用，但是，人口的压力

① 見第 59 頁注。——譯者

已經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始用被大地主、租佃权所有者和资本家們从人民那里夺去的款項来向人民进行赔偿。所用的方式是征收所得稅，并强迫上述这些人們从他們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作为全国教育系统經費之用，另外还要对他們破坏工資契約的可怕的权力加以限制——虽然这仅只是一些力量不大的限制。可是，这些問題，在后面塞德尼·韦白先生所写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这篇文章中将会談到。假若經驗沒有在最近說服了所有經濟学家們，抽象經濟学的任何运用，無論它怎样严密地經過推論，除非能追溯到它在历史上的表現而实际地加以驗証，是不足信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末我就不应当提到它們。真的，我所談到的那个自由的交換者之間的私有财产的直接發展过程，在“旧世界”內需要間接而且迂迴地通过与各种政治、宗教制度和与它不相容的各种殘余进行斗争，才能使它自己实现出来。真的，耕种并不是以单独的移民者預先占据他的私有财产方式在西欧开始，而是在部落公社內开始的。在这些部落公社里面随即产生了反对原始社会专制的那种主張私人判断和私人行动的个人权利。真的，耕种并不是按邏輯的步驟由好的土地进展到不很好的土地；由不很好的土地到坏的土地；以及由坏的土地到更坏的土地；新国家和新区域的探險，以及对旧产物發現新的用途，往往使得耕地边际比耕地中心的产量更为丰富，而且，暂时地（当耕地从中心不断地向边际轉移时）使得地租与工資的运动直接与經濟理論相反。但是，把全世界看成一个国家，說耕地已从高山上的雪綫擴張到水边，这就不正确了。对于住在倫敦东端^①的最穷的做火柴盒的女人仍然可以有自由的土地，假若她能去到那兒，开垦那里的荒地，說那个地方的語言，受得

^① 东端 (East End) 是倫敦的貧民区。——譯者

住那个地方的气候,那么,当她清理了她的农场以后就在那儿吃、穿、住,学会了怎样去耕种,并且等待着收获。经济学家们曾经很巧妙地证明这个办法真能使她得到独立;但是我将不浪费时间去讨论这件事。实际上,不管西伯利亚、中非洲及荒野的西部^①的情况如何,纵然英国没有自由的土地,我所谈的经济分析对英国来说仍是正确的。此外,要说人们在生产,中单纯是被实现最高的交换价值这个决心所支配,并不一定是正确的。生产的冲动往往一来就采取特殊的方向;一个人虽然可以从做靴子或做帽子得到更多的收入,但他仍坚持生产图画或剧本。但是,他的特殊的冲动一旦得到满足,他就要尽量地去赚钱。他将不为五十镑而是为一百镑去出售他的画或剧本。总之,虽然并不存在着所谓的有名的“经济人”这样一种人,人既然是任性的而不是理性的,当任性的人满足了他的欲望以后,仍然会去要他能够得到的其他东西;因而他往往真的表现为经济人,即使开始并不如此,最后也是如此的。总的说来,历史,甚至旧世界的历史,是按经济学家所描绘的道路进行的。这种一致性在新世界也是丝毫不爽的。美国以及各殖民地国家住满了来自西欧的具有充分发展了的个人主义的亡命者,他们预先占据私有财产,这种情况正如我们所假设的关于耕地情况的考察一样。这些耕种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从来没有被盖上旧的政治的伪装,然而,为要证实我们分析的正确性,我们看到旧文化中所有的邪恶在他们之间滋长起来;虽然对于他们其结果还不止此,但是就是从他们那里,我们最近又听到了土地国有的伟大呼声。这种呼声是由这样的一个人所发出的^②,他曾经目击过私有财产的行为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在扫过美国正在迅速成长的城市时所造成的

① 荒野的西部, (Wild West) 指未被开发时的美国西部。——译者

② 蕭伯納所指的这个人 是亨利·乔治。——译者

整个悲剧。

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場来对个人主义的經濟行为进行分析，我們發現土地的私人占有乃是社会主义所反对的各种不平等特权的根源。实际上这显示了把土地作为公共财产乃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經濟条件。但是这个问题在目前并不牵涉到当真把土地归还給人民。土地現在是在人民的手中，但它的主人大多数都是离乡地主。私有财产的現代形式純然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它使人可以年复一年地在国家工業的产品中不劳而获地攫取一部分产品。私有财产并不特別爱好哪一部分产品或哪一种形式的产品；而在消費的过程中，私有财产的收入与劳动的所得不能被区别开来；因此大多数人習于把造成有产者的收入的那些商品叫做他的私有财产，看不出这种商品与造成劳动者的收入的那种商品之間有何区别，于是便把私有财产这个名詞也引用到劳动者的生存必需品上去，并且只能把对私有财产的攻击理解为每一个人有权去搶劫周圍其他所有的人的一种企圖。但是一个私人有产者的收入是可以用这样的事实区别出来的：这种收入是憑借反对公共福利的私人权利而無条件無代价地得来的，而公共福利乃是与不事生产的消費者的存在相矛盾的。社会主义牵涉到停止对这种收入的支付，并把如此节省下来的財富加在人們从劳动而来的收入之上。我們已經談过，来自私有财产的收入，其中一部分是經濟地租，一部分是年金（也叫租金，是由轉讓租佃权得来的），一部分是被叫做利息的租金（是由于使用資本使土地特别适合于生产而得来的）。所有这些收入，最后都由劳动者的劳动所創造的东西的价格和劳动本身在公开市場上以工資、薪金、賞錢或利潤的方式出售的价格之間的差別而支付的^①。除了經濟地租而外，所有这些收入都可以单憑停止对劳动者的勒索而直接增加劳动者的收入。由于肥沃程度不同或

地点的优越所产生的經濟地租，必須要經常被当作公共的或社会的財富，而且應該要像現在以征稅的方法所得到的收益一样，被用在公共事業上。在这些事業中，社会主义将要把社会保險及对重大事故的預防列为第一位。

社会主义的經濟問題于是就这样解决了；至于如何使这种經濟的解决方法行得通的政治方面的問題就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了。但是假若我們已經得到这样一种理智上的确信，認為我们的社会貧困的根源并不是产生混乱和邪恶的永恒的源泉，它仅只是一种人为的制度，容許受到無限的修改和調整——不，它实际是可以由人的意志加以摧毀和更替的，于是，除了某些不論自身是公开的或不公开的为了卑劣的动机而死抱住目前制度不放的人們而外，一个可怕的負担将从所有的人的心上被解除。在本世紀內，我們已經因为愚昧而得到过一系列严厉的教訓，这种愚昧使我們相信事物只不过是為了使我們感到愉快而已。一个人自以为每年有一千鎊的收入而环顧左右，并以勃朗宁詩中的大衛的口吻說道“到处有爱情，到处有秩序”是愉快的。相信我們在这个世界里懶于取得的那个机会在另外一个世界里会重新回到我們身边来是愉快的。相信有一支仁慈的手在引导着社会的發展、压制邪恶的出現而支持良善，并把目前的貧穷当作是未来的巨大祝福和奖励的預兆是愉快的。忘却塵世中的不平等的感觉而期待着我們在上帝面前的平等是愉快的。但是功利主义的疑問和科学的答复把所有这些安静的乐观主义都变为最黑暗的悲观主义。我們所看見的大自然是一个“牙齿上和爪子上都沾滿了血”的大自然，因为引导我們的这只手（指大自然——譯者）即使真是仁慈的，但它却不是万能的；

① 劳动的产品超过了它的价值的这个余额曾被馬克思作为一个单独的范畴而有深刻影响地討論过。他把它称为“剩余价值”。

于是我們对这只手的信心破产了。假若这只手是万能的，它就不可能是仁慈的；于是我們对这只手的爱慕就变为恐惧和仇恨。我們从来没有承認过，为了賠償塵世的悲哀的另一个世界的門对馬和無尾猿是敞开着的（虽然我們不曾因为这个緣故而对我們的馬更为慈悲一些）。現在，科学向我們指出，在我头上也有馬耳的耳尖，并把無尾猿当作我們的血亲而介紹給我們。对于另外一个世界是否存在，以及我們希望用来糾正由于貧穷所引起的罪恶的过錯的仁慈的权力是否存在，是無从証明的。事实一再証明：我們称为大自然的那个东西，对于我們的痛苦和快乐既不知道也不关心，正如像当我们走过田野时；我們对足下所踏碎的小昆虫是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的。我們不但沒有立刻就体会到，这种情况不过意味着大自然是既不道德而且对人又是漠不关心的而已；我們反而墮落到一种粗俗的对邪恶的崇拜，并且把大自然看成是一个缺乏怜悯的邪恶的力量。这种情况并不比那种旧的乐观主义更好，反而是無限地更为陰暗。它蒙蔽了我們的眼睛，使我們看不到这样一个真理，那就是：在人本身以外并没有殘忍和自私；而且人本身的主动的仁慈是能向殘忍和自私二者进行斗争并把它們消灭的。当社会主义者以社会改善者的姿态在这些方面出現时，那些除了私有财产就看不到有其他办法的旧派政治經濟学家們，就出来証明：仁慈的行为無力制止由于人口的增长而自然产生的貧穷。这正是我剛才分析过的情况。他們的結論完全与我們的这些新的观念相吻合。他們仍旧認为貧穷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自然的緣故，也就是由于生存竞争，由于弱者無情地被根絕，由于适者生存等緣故。总而言之是由于物竞天擇在起着作用。社会主义似乎好到令人不能相信的地步，它被当作仅只是那种愚蠢地把它的头去碰現代科学之壁的旧的乐观主义而被忽略过去。但是，对于个人主义、怀疑主义、

悲观主义以及把大自然想像为鬼神而加以崇拜等等所作的科学辩护，社会主义现在正向它们进行挑战。研究财富生产和分配的科学是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以政治经济学为武器对个人主义开火，使个人主义受到了不可挽救的灾难。自此以后，那种把世界当作是一个永远无法改善的狗窝的尖酸的讽刺者们，以及那时常念着“穷人要安贫乐道”这句不恰当的成语的安静的有钱人，都将在有高度文化的人们之中丧失他们所窃取的地位，并堕落到无知、浅薄和迷信的人们的行列之内。至于我们其他的人，由于自不幸的童年就被教导了去尊重有产者的体面，由于发现我们年幼的心灵是那样的僵硬和难以改悔，以致尽管有这种教导，我们仍然暗地里仇恨而且反对这种体面。因此，当我们发现了下述情况时，我们所得到的安慰是难以表达的。我们发现我们的心智一直是清醒的，今天所流行的体面并不是什么别的，而是一个正当的和科学的社会制度的巨大的倒置。这种倒置把高尚而幸福地生活的好机会沉溺在欺诈、无用、自私、过度的贫困与愚蠢的浪费之中。感觉到这一点是可怕的，然而害怕这一点是没有用的。想到穷人必然要挨饿会使你对吃饭感到羞惭，想到穷人必然冻得发抖会使你对自己穿着暖和的大衣感到羞惭。正是由于经济学——这个过去的“恐怖”，现在的“希望”——的赐与，我们才发现了那种私有财产的邪恶虽然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多得多，但私有财产并不是永恒的。只要我们决心奋起消灭它，它甚至是不能久存的。

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

塞德尼·韦白

民主主义理想的发展

在讨论社会主义的历史根据时，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从来没有人对社会主义特别声明，断言它具有历史的基础。恰恰就像每一个人一样，虽然他也許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誰，但是他是**有祖先的**；同样地，每一个观念，每一个偶然事件，每一个运动，在过去都有它自己悠久的、一系列的原因，沒有这些原因，它就不可能产生。以往我們总喜欢讓过去的事都过去了；現在我們却热心地留意到無論是关于人的記載或者是关于事物的記載。甚至不是为了有意識的功利主义的目的，我們自己也情願孜孜不倦地从事于事物起源的探求。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祖先，我們就不再以有祖先而感到驕傲了；但是我們現在比任何时候对于我們的祖先都更加發生兴趣，我們从他們身上找到了組成我們自己本身的若干零碎的东西。英国社会組織的以往历史，在本世紀中，可以証明社会主义所标示的各种理想的不可抗拒的动力。这一世紀英国社会历史的記載，是以一个几乎是完全的工業个人主义(industrial individualism)的試行和它的徹底的失敗而开始的。可是，在这种工業个人主义中，不受限制的土地与資本的私人占有却是伴随着对政治寡头的服从。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制度里，持久的因素是很少的。所以，随着政治解放运动的发展，生产手段的私人占有已經在这一方面或那

一方面不断地受到管理、限制和廢除；直到現在，我們可以公平地說：今天的社会主义哲学不过是把大部分已被人們無意識地采用的那些社会組織原則加以有意識的和明确的肯定而已。本世紀的經濟史乃是一种几乎毫無間斷的社会主义的發展史。^①

同样地，社会主义在它内部發展的記載中也有它自己的历史。从古到今，有志于社会改革的人們，自然会提出一种对新社会制度加以詳細說明的精辟計劃，来为他的理想的切实可行作辯护，似乎在他們所計劃的新社会制度中，当时存在着的一切罪恶就会被消除了。恰恰就像柏拉圖有他的共和国 (Republic) 以及托瑪斯·摩爾爵士有他的烏托邦 (Utopia) 那样，巴波弗也有他的“平等宪章” (Charter of Equality)，卡貝特有他的“伊卡利亚” (Icaria)，聖西門有他的“工業制度” (Industrial System)，以及傅立叶有他的理想的“法兰斯泰” (Phalanstery)。罗伯特·欧文花費了一笔财产去把他的“新道德世界” (New Moral World) 的理想强加于并不相信它的一代人的身上；而且甚至奧古斯丁·孔德，虽然比較他同时代的許多懦弱的人高明得多，他也必須在他的“实証主义哲学”中加上一個詳細的“国体” (Polity) 計劃。

所有这些主張的主要特色可以說就是它們的靜态性質。他們把那理想的社会描写为处于完全相称的均衡状态并且無需或者不可能在未来發生根本的变革。自从他們的那个时代以来，我們已經認識到：社会改革一定不能够按照这种方式来进行。主要是由于孔德，达尔文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的功績，我們不能再把这种理想的社会認為是一种不会發生变动的“国家”。社会的理想已經从靜态的变成了动态的，社会有机体不断成长与發展的必要性已經

^① 参閱“英国的社会主义”(1889年5月，美国經濟学会第四卷，第二部分)，在这部書中，曾包括着本文的一部分。

为人们所公認了。哲学家們現在不再去寻求什么別的东西，他們所寻求的乃是从旧制度逐渐进化到新制度，并且認為在这种进化过程当中，任何时候都無需破坏整个社会組織的連續性或者把整个社会組織突然地加以改变。新制度本身是会变成旧制度的，而且往往在它被人们有意識地認做是新制度以前就已經变成了旧制度。我們在历史上还找不到烏托邦式的和革命的突变例子。

虽然社会主义者已經較之他們的大多数反对者們更好地接受了这种教訓^①，可是这些反对者們对社会主义所作的共同批評还不曾注意到这种变化，他們所討論的主要仍旧是那些陈旧的、前进化时期 (Pre-evolutionary age) 的烏托邦。各种模仿“法兰斯泰”这本书中所想像的内部細节的那些著作，以及各种关于“布魯克农庄” (Brook Farm) 或“伊卡利亚”失败原因的那些教訓，現在都可以被人们当做是过时的与無关的东西而加以忽略了；社会主义者仅仅是鼓吹有意識地去采用一种社会組織的原理，这种原理，全世界早已發現，乃是民主主义与工業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社会主义此时乃是一个席卷整个欧洲的浪潮；并且由于我們对一系列表面上彼此沒有联系的事件缺乏理解，不了解正是由于这些事件并随着这些事件的产生，社会主义才在过去两个世代中迅速地降临到我們面前，——簡言之，正是由于缺乏关于社会主义智慧史的知识，我們今天在英国看到的政治領袖們，在当前政治面貌不断改变的情况下，表現出一种普遍惊惶失措的神情。两个大党都在它

^① “我留意到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有些人認為，几乎一下子就要把我們現今的布尔乔亚的各种安排全部加以摧毁，并且要把其他的东西加以改換。但是無論一种革命会怎样的成功，可以肯定：人类不能够立刻把他們的全部特性完全改变。旧的外壳确乎是打破了；但是永远不要忘记新的形式必須从旧的形式生长出来这一事实”。見亨德曼 (H. M. Hyndman)：“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1883年，第305頁。

們完全不認識或不理解的一種無名的暗流前面莫明其妙地飄浮不定^①。他們雖然有一些模糊的印象，他們記得曾經聽到過，社会主义乃是各種烏托邦空想當中的一種，可是這種空想在他們從事學末研究的青年時代，就把它當做醉心于博愛的法國人的那種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輕易地拋棄了，因而他們就像一個乡下佬闖過琪卜賽德 (Cheapside)^② 那樣，在整個十九世紀都走着他們自己的道路。也有一二人是歷史的愛好者，他們仔細地研究過以往的事情。可是這些人對現實的逃避也和其他人一樣。他們太過於注意個人的事件，以致他們對整個人類隊伍的向前推進熟視無睹。他們只看見樹木而看不見森林。

歷史不僅提供了理解當代事件意義的綫索；它也使得我們能夠去了解那些還未曾找到這個綫索的人。我們學會按照一種地質學的時空順序來對人和觀念進行分類。巴黎人孔德 (The Comte de Paris) 提供了我們許多絕妙的證據，證明在絕對君主專制的政體下，存在着唯一安全的社会制度。他是一個盛行於十六世紀的那種類型的遺老，在任一個歷史博物館里都可以去研究那個時代的光輝的化石。布萊姆威爾勳爵 (Lord Bramwell) 對於這樣一種信念提供了種種令人信服的理由，那就是：絕對的契約自由，在一种严厉的刑法的保護下，幾乎沒有例外地會保證人們有一個完美的“國家”。這位爵爺乃是最近這個時代的遺老。而在 1840 年前後，社会科学只是發展到這種程度。現在仍舊有一些人，他們對於那時以後的事情毫無所知。當我在南肯星吞地方 (South Kensington) 看見一匹海巴里恩馬 (Hipparion) 的時候，我並不會把它那

① 參閱威廉·克拉凱的論文：“英國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載於 1888 年，12 月“政治學季刊”。

② 倫敦的一個商場。——譯者

些对我不熟習的特点，認做是一个品种优秀的馬的特点，因为我知道它是一个过时的并且被廢弃了的品种，然而現在的馬却是从这种品种的馬發展而来的。至于“历史上的化石”^①，那就更加危險了；因为这类化石不仅大量存在，而且甚至在唐宁街或韦斯明斯特都是可以找得到的。但是在时代潮流的面前，这类化石到底是無能为力的。尽管有时他們似乎是胜利的样子，然而在他們自以为正在抵抗着的那个时代潮流的下一阶段中，却連續不断地發生着斗争。

在过去一百年中，把欧洲社会导向社会主义的那个主流，乃是不可抗拒的民主主义的發展。德·托克格維里 (De Tocqueville) 在两个世代以前，早就把这个真理敲进了“旧世界”的人們的那些厭惡听聞的耳朵里；并且自那时以来，我們大家就曾經自命把民主主义当做我們精神上的古董的一部分，把它带在身边。但是，就像大多数带有諷刺性的老生常談一样，民主主义並沒有普遍地为人們所認識；而且德·托克格維里所著的書，在适当的时机会变成一种經典，每一个人都引用它，可是却沒有一个人去讀它。事实上，民主主义的發展常常被人們想像为只不过是有一种政治的机器代替另一种政治的机器，例如亨利·梅因爵士 (Sir Henry Maine) 就是如此想的；而且今天許多政治上的民主主义者，他們不能够理解：为什么社会的或經濟的問題應該和政治問題混在一起。他們并不是为了社会的或經濟的問題才打破貴族政治的权力，也就是說，他們对多数人的爱所感到的激动，無論如何是沒有对少数人的恨那样深的^②；并且，正如人們曾經尖銳地說过一样——虽然通常

① 按“历史上的化石”，在这里是指頑固派。——譯者

② 甚至边沁也曾对詹姆斯·穆勒說过这句话〔見拜恩 (Bain) 所著“穆勒傳”，第461頁〕，但对于穆勒來說，这句话并不是眞实的。

是愚蠢的人所說的——他們是急進主義者，仅仅是因為他們自己不是貴族。但是，對於任何一個人來說，他是不能長久地堅持這樣一種信念的，那就是：社會的政治組織可以完全加以改變，而無需相應地改變經濟關係和社會關係。德·托克格維里曾經生動地指出：民主主義的發展和在舊制度下把整個社會聯繫在一起的那種關係的完全解体比較起來，具有同等的意義。繼這種關係的解体而來的是一個無政府的、在精神上個人和他的同伴相隔絕的時期，並且在這種限度內，繼上述關係的解体而來的乃是对社會觀念本身一種普遍的否定。但是，人是一個社會動物，因而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後，必然會有一種新的關係出現，這種新的關係是那樣地完全與舊形式的組織不同，以致於我們所說的那些“歷史的化石”會千方設法地否認它是一種關係，或者否認可能有任何新的關係或需要任何新的關係。主要是由於他們不懂經濟學，因而對他們來說，民主主義的發展，無非是舊的政治特權的破壞而已；並且，很少人能夠在單純社會解体與破壞中看出任何美好的事情來，這是不足為奇的。那些少數憎恨孔德和卡萊爾的人乃是純粹的、政治上的急進主義者，他們在社會問題上，乃是前科學時期（prescientific age）所遺留下來的經驗主義的遺老。

從另一方面說，那些單純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者，雖然他們想用那種毫無根據的、幻想的細紗，在他們自己私人的織機上織成完美的社會，一般而論，同樣地是不能夠領悟這個時代的問題的。在我們的想像中，他們乃是一些再生的、仁慈的暴君約瑟夫二世，如果這個舊世界是一些液體，那麼，他們早就把它倒入他們那些新的模型中去了。由於反對烏托邦社會主義者的那些膚淺的計劃，政治家、急進主義者以及政治經濟學家聯合起來了，因為他們對於那些為他們所不能控制的盲目的社會力量一概不加以考慮，而這些社

会力量却一往直前地、頑强地、为烏托邦社会主义者所不能察觉的那些方式，提出了挽救社会的方案。

这两个潮流在现今社会主义的运动中統一起来了，社会改造的鼓吹者们已經受到了民主主义的教育，并且知道：正是通过群众心理緩慢地、逐漸地向着新的原則的轉变，社会的改組才能一点一滴地实现。所有关心自己时代的事物的社会学者、社会主义者以及个人主义者都認識到，重大的、根本的变革只能是：（一）民主主义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对大多数人民来說，才是可以接受的，并且才能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二）漸进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無論进步的速度多快，才不致引起脫节現象；（三）被人民大众認為是合乎道德的变革，因为只有如此，才不致在主观上对他們来說是敗坏道德的；（四）合乎宪法的与和平的变革，至少在英国应当如此。可見社会主义者在他們的政治手段上，可以是和急进主义者十分相同的。从另一方面說，急进主义者也不得不認識到：仅只靠政治的杠杆，是不足以把国家从無政府状态与悲觀失望中挽救出来的。这两个派别都已經被迫承認：困难的根源是經濟方面的，而且愈来愈广泛地有这样一种共同的認識，那就是：民主主义的必然結果，不但是人民控制着自己的政治組織，而且通过政治組織的控制，他們还要去控制生产财富的各种主要工具；他們要以有組織的合作逐漸代替無政府状态的竞争；并且按照唯一可能的方式，他們最后要恢复約翰·穆勒所謂的“生产工具的所有者能够从产品中取得的巨大份額”^①。民主主义在經濟方面的理想，实际上也就是社会主义本体。

^① “政治經濟学原理”，1865年最后一版，第477頁。（轉引浮高来（Fevgueray）的話）

旧的社会組織的解体

上一世紀中叶^①，西欧社会仍旧建立在一种实际上是以残余的封建主义为基础的制度之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从本質上說乃是一种上級与下級的关系。社会权力仍旧操于君主手中，或者是操于大地产的所有者之手。某些侵蝕这种完全匀称的社会組織的因素早已形成了，其中最显著的是城市的成长，以及当时少数商人階層的兴起；可是，絕大部分的人却可以被排列在一种宗教階級的階層系列之中，受“权力”的約束而彼此联系起来。

我們往往以为英国在这方面是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并且往往以为我們普遍的自由，如果不是在1648年获得的話，也应该是在1688年就已获得了；或者甚至于早在大宪章里就已获得。但是对于广大人民來說，这主要不过是一种政治形式的差异而已。在英国，贵族寡头政治比君主专制还占优势；在法国，帝王制战胜了投石党(Froude)。这两个国家中的人民群众，除了服从而外是別無他法的。

甚至在英国，那时整个行政权也是由国王和豪族来分享，而且每五百个人当中还不能有一个人得到一票。直到1831年才有一百五十人被选而形成下議院中的多数（參閱莫尔士华斯：“改革法案史”，第347頁）。一度作为国际友爱的一种普遍民主組織的教会，那时只不过是地主豪紳的藩屬罢了。司法权和行政权完全操在他們的手中，在国会中則充滿了他們的領袖或是他們提名的人。甚至那些非常有天才的人民的子弟，也是沒有进身之阶的。群众感觉到他們自己一生下地就处于終身要依附于一个出身高貴的阶

^① 指十八世紀中叶。——譯者

級的地位。

当时英国的經濟組織也具有与上述情况类似的特点。人民有三分之二从事耕种，他們散居在国内人烟本来已經稀少的那些孤寂的村落里。虽然他們有着古代农村公社的某些殘余的权利，实际上他們是依附于所在教区的农場主(farmers)的，这些农場主們用一种經常受到默認的陰謀来規定他們的工資^①。而这些农場主們都是那些大地主們的恭順的奴僕，对那些大地主們是要支付一种由習慣決定的地租的。尽管农場主和劳动者們在名义上是可以自由移动的，然而他們实际上由于無知与貧困却同样地被束縛在貴族的領地之上了。^②虽然貴族已經喪失了他們在自己領地法庭上私設刑法的权利，但是作为“保安官”(Justice of peace)，他們的权力仍然是完全和以前一样的。他們不受到限制地拥有土地的权利，使他們能够为自己以地租的方式去取得除最低劣的耕地而外所有耕地的全部利益，并且那些殘存的領地特权甚至也从最低劣的土地上为他們提供了貢賦。在整个农村中，他們的話就是法律，并且他們的权力是不可以抗拒的。这乃是一个依靠强权、經濟和政治而联系起来的社会，这种社会只能由習慣来調整，它本身缺乏变动的刺激因素。穷人們那时不一定在物質生活方面比現在更坏。真的，农業劳动者在1750年显然地要比1450年到1850年这一段时期之内的任何其他年分过得好些^③。但是，当时那个社会，

① 參閱亞丹斯密在“國富論”，第一卷，第八章中所說的那段有名的話。

② 至于那种所謂“定居”法律所規定的那些限制（見查理士二世第十三年和第十四年的“定居”法律，第十二章），那就不用着提了。这种法律授权只要两个法官就可以任意立即把任何一个移居的劳动者送回他原来所在的村子。

③ 这一点是馬尔薩斯指出的。參閱他的“政治經濟学原理”，第225頁。也可以參閱佐罗德·罗吉士教授(Prof. T. Rogers)的“农業与物价史”，和他的“关于六个世紀中的工作与工資”。

在政治的、經濟的以及社会的关系方面，主要地仍然是一个中世紀的社会。也就是說，当时那个社会乃是一个在本質上和以往的封建主义沒有区别的、具有階級差別和永久的社会不平等的社会。

然而，这种制度早已开始衰退了。由于貿易的發展而引起的城市的兴起，漸漸地产生了独立自由的新的中心地区与新的階級，这些新的階級打破了旧社会所有的那种階級差別的种种束縛。有錢的城市階級以及从印度發財回来的“財主”(Nabobs)闖进了各个农村地区，想把封建的觀念加以消灭。在宗教方面，新的派別的發展对个人进行反抗提供了新鮮的論据，而这些論据往往又不断地退化为一种精神上的無政府主义或者是非社会的無为主义(unsocial quietism)。知識的傳播，使得那些已經察覺到圍繞在他們身边的各种耻辱的人們，建立起一种微小而積極的、对旧社会具有分解作用的力量。但是把人民从他們的政治束縛中解放出来的真正的帕修斯(Persaus)^①乃是紐康門(Newcomen)或瓦特(Watt)，哈格里弗斯(Hargreaves)或克倫普頓(Crompton)，凱伊(Kay)或阿克萊特(Arkwright)。無論他們的哪一種發明，都意味着朝上一世紀的工業革命大大向前跨進一步^②。由于这些人的發明，产生了机器工業及其不可勝数的派生結果——工厂制度以及北部和中部工業城市的兴起^③，以及利用傳賣灰色衬衣料子而在荒廢地区傳播宗教。整个英国三分之一的面积中，在貴族的領地上出現了工場

① 帕修斯系希腊神話中的一个神，他杀死了危害人民的女妖怪密那拉(Medusa)。——譯者

② 进一步的細节可以在本書下一篇文章中看到。也可以參閱安諾德·湯比(Arnold Toynbee)的“工業革命”。

③ 在1801—1845年这一时期当中，曼徹斯特的人口增长了109%，格拉斯哥增长了108%，利物浦增长了100%，里茲增长了99%（据“大城市衛生状况委员会報告書，1843—1845年”）。

或矿区。封建贵族为了充分地利用这种变动，就必须渐次地放弃他所掌握的政治与社会特权；而这种变动使他们由于得到无止境的地租和矿区使用费而富有起来。于是在英国就出现了中古精神 (Medievalism) 的最后崩溃，这不是由于“大暴动” (Great Rebellion)，也不是由于1688年“辉格党的政变” (Whig Treason)，更不是由于“伟大的下议员” (Great Commoner)^① 取得了统治权，而是由于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这个革命创造了今天的英国。在两个世代中，乡绅们在工场主的面前垮下去了，而且自此以后，封建主义只能在迅速不断缩小的农村范围内以及在那些空洞的、替人们举行仪式的残余组织中拖延时日了。事实上那种中世纪的安排是不可能农村小手工业 (Cottage industry) 没落以后继续存在的。主要是由于新发动机的使用，才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把个人主义者的财产观念摧毁了。地主和资本家都发觉：蒸汽机乃是消灭他们的怪物 (Frankenstein)^②，最好是以前不要去生产它；因为随着蒸汽机的使用，城市的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以及社会主义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使政治变革受到头等影响的大事乃是法国大革命。所有受到新观念感染的人们，都一致为巴士底狱的攻克而欢呼。查里士·詹姆斯·福克斯 (Charles James Fox) 写道：“在世界上空前发生的这个事件是多么地伟大，是多么地美好啊！”^③ 它曾经向人们（或者似乎曾经向人们）表明：一种真正的社会的改造不仅是需要的而且

① 指威廉·彼特 (William Pitt, 1750—1806年)，他在二十三岁时即成为下议员领袖，后来出任英国首相。——译者

② Frankenstein 是雪莱夫人 (Mary W. G. Shelley) 所著小说中一个医科学生由坟墓中及解剖室中取来的材料所作成的怪物的名字，后来这个怪物把这个医科学生弄死了。——译者

③ 引自列库 (W. J. Lecky)：“十八世纪史”，第五卷，第453页。

也是可能的。法国的国民会议 (National Assembly), 虽然是一种古老而受人尊敬的寡头政体, 对尚未完成的立法手續指出了道路。

当英国的統治者們看到至少在法国自命不凡的統治者真正地被打倒了的时候^①, 他們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加强現存的組織。即使最温和的鼓动也要被他們用殘酷而堅強的手段鎮压下去。輝格党在下議院的代表减少到只有六个人。一方面物价繼續上漲, 一方面工資却不断下跌, 最沉重的租稅負担則是落在遭受苦难的人民身上。于是出現了“和平时期”^②, 并且出現了卡斯特雷福 (Castlereagh)^③ 的“白色恐怖” (White Terror), 其結果釀成了1819年“彼得卢大屠杀” (massacre of Peterloo) 和賽德茅斯勳爵 (Lord Sidmouth) 的臭名昭彰的“六个条例” (Six Act)。但是旧的社会制度是注定要毀灭的。卡斯特雷福的自杀不仅只是他这个人的生命的最終, 而且也是那个旧制度崩潰的标志。由于一系列的政治斗争, 因而廢除了“檢驗与公司条例”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 (1828年), “天主教的解放” (Catholic Emancipation, 1829年), 这也就是立法与行政改革的开始。最后也产生了1832年的那个偉大的“改革法案”, 根据这个法案, 中产阶级的統治代替了貴族的統治。但是人民并没有比以前得到更多的参政权。“工厂”战胜了“庄园”, 并不是为了工厂劳动者的利益, 而是为了工厂主的利益。民主主义已經在門口了, 但是它仍旧是不得其門而入。然而, 它的进入大

① 原文系“Humpty Dumpty was actually down”。按此处系指路易十六。——譯者

② 指英国1815年对法战争结束后开始的和平时期。这个和平时期一直延續了十五年(即到1830年为止)。在这一时期中, 由于战争的破坏而招致大量工人的失業和貧困。工厂主尽量压低工資, 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陷于飢餓和死亡的境地。——譯者

③ 卡斯特雷福(1769—1822年), 曾担任过英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于1822年自杀。——譯者

門，不过是時間問題而已。自从1832年以来，英国政治的历史乃是純粹在时代趋势的逼迫之下，一个階級勉强地把参政权交与另外一个階級的紀錄。在这些早已得到选举权利的階級中，从来沒有一个階級衷心地願意允許新的选民去分享他們已經取得的特权并力圖把他們已經取得的权力貶低；但是为了和自己的对手相竞争，每一个政党都輪流地被迫去采取冒險的行動 (Shoot Niagara)。1832年的“輝格党人法案” (Whig Bill) 給予中产階級参加国会的权利；1835年的“市区社团条例”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 又給他們以管理地方城市的权利。經過历时一个世代的宣傳鼓动以后，托利党最后才在1867年給予城市居民以戶主选举权 (Household Suffrage)。十一年之后，保守党的多数通过了查理士·狄尔凱爵士法案 (Sir Chales Dilke's Act) 把参政权授予房屋租戶 (这是1878年的事)。在1885年，自由党人为了企圖永远毁灭他們的对手，曾把选举权交給农業劳动者。去年 (1888年) 托利党人不日失败，給予农業劳动者管理各州地方行政的权利，并把倫敦市政府放在一个由普选产生的参議会的掌握之中。任何一个政党都不能說对各种改革法案具有功劳。因为这些改革法案之勉强得到通过，并不是由于这些政党对民主主义有何信仰，而是由于它們对反对党派的畏惧。甚至在今天，英国的公民仍旧因为各种可能的立法和行政方面的特殊規定而丧失了自己的选举权，所以在我們的成年男子当中，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是沒有选举权的^①，另外，沒有享有选举权的还有全体妇女。保守党和那个自命为“人民大众的党” (Party of the Masses) 都沒有提供証据，来表明它們有任何真实的願望去給予这个剩下來的、为数并不小的人們以选举权。它

^① 在上次选举 (1886年) 之日，在超过九百万的成年男子人口中，登記过的选民人数只有5,707,823人。

們两方面只是口头上尊敬民主主义。每一个人都知道：哪一个党将被迫去走第二步，这只不过是它們两党之間的一种互相观望的竞赛游戏（Waiting race）而已。政治革命的实际完成已經不远了；由于巴士底獄的占領而有效地傳播到整个世界的那些新观念所具有的动力，人們所能提供的証据，再也沒有比英国的这种民主主义的胜利更加显著的了。还不到一个世紀，民主主义在英国战胜了經過十个世紀的成长的、政治上的中古精神（Political mediævalism）。

这种胜利的全部重大意义还没有被普通的政治活动家所發觉。工業方面的进化使得劳动者在自己的国家里成为一些沒有土地的异乡人；可是政治方面的进化却迅速地使他們成为自己国家的統治者。参孙力士（Samson）^①正在感到他在抓住大殿的柱子了。

無政府状态时期

工業革命在猛烈地反抗旧日官僚主义的专制政体的过程中瓦解了中古精神，其結果是使社会的一切新的因素处于一种毫無約束的状态。在可以自由地私自購買生产資料这种意义下的个人自由，在本世紀开始时达到了最大限度。沒有什么从感情出發的規章足以阻碍有产者去自由地利用土地和資本而取得最大可能的金錢利益，尽管許多男人、妇女和兒童的生命在这种追求利益的过程中被消耗了。那些無知的或冷酷的資本家們至今仍旧兴高采烈地談論那个可怕的时期。某个資本家說：“不是百分之五或百分之十的利潤，而是百分之几千、百分之几万的利潤，才造成兰开夏（Lan-

^① 参孙是聖經上的一个大力士，他被人所害，弄瞎了眼睛，为了报复，他把敌人聚集在內的大殿柱子拉倒，因而使大殿倒塌，把敌人打死（見旧約士師記，第13—16章）。按此处暗指無产階級將摧毀旧的社会制度。——譯者

cashire)地方的那些巨額的財富。”

赫伯特·斯宾塞先生以及那些贊成他的个人主义崇拜者們^①，显然希望恢复人們那种可以采用“白奴制度”(white slavery)的法律地位，而这种制度却被“立法者的罪过”(sins of legislators)把我們剝夺了的。但是，从来就沒有人認真地企圖去廢除任何一个工厂条例。妇女們在煤矿中半裸体地工作着；青年兒童們整天在地下道的恶臭气氛中拖着运貨的車子；兒童們在棉織品工場的高温空气中每天要在紡織机上工作十五小时，并且只有依靠工头的鞭打，才能使他們不打瞌睡；所有的人，無論青年或老年，都要整天地不分鐘点地劳动，劳动的时间，只受到体力所能忍耐的最大限度的限制；对于迅速增长中的人口所必不可少的衛生設備是完全沒有的。所有这些以及其他难以名状的种种不平等的事情，已被人們当做是契約自由与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的結果而載入史册，关于这些紀錄，我們是可以在那些連續發表的藍皮書(blue-book reports)^②的公正篇幅中看到的。但是，当时那些信奉自由主义的工場主們，由于得到政治經濟学家們的支持，他們仍旧頑固地抗拒每一种干預按照他們認為是最有利的方式去使用“他們的”資本和“他們的”劳动人手的自由企圖。他們(就像他們今天的繼承者一样)預言，每一种限制，要是可能付諸实施的話，那么，必然不可避

① 但是，斯宾塞先生事先假定土地国有化作为个人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这种观点，好像在他的信徒中是沒有人能够認識到的。(參閱“静态社会学”，有关各章节)

② 在今天，不时还有人坚持說，当前那些关于在契約自由这种制度下的工厂生活的描述是太过夸大了。然而实际情况并不是如此，在各种官方的調查報告書中所揭露的可怕事件，甚至比普通为人们所引用的那些可怕事件还要厉害得多。为了充分体会当时的立法以及这种立法所根据的事实，請參閱馮·普兰納(Von Plenar)的“英国工厂立法”。关于这个問題的主要官方報告書有：1815—1816年下議院委員會的報告書；1819年上議院委員會的報告書；1840年皇家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及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引用的其他許多事实。也可以參閱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階級狀況”。

免地会破坏出口貿易，并且会把他們的一切利潤全部剝夺。

但是，十八世紀各国政府在經濟方面犯了錯誤以后，“个人主义的突然盛行，由于沒有受到各种陈規的束縛并得到了無灵魂学派的学者們几乎是宗教般的認可”^①便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人們能够对經濟規律作科学性的考察以前，虽然曾經自然而然地干預过各种社会方面的安排，可是所得到的結果却是十分不能令人滿意的。当一个特別浪費或特別节儉的国王把通貨的价值貶低以后，他会驚訝地發現：尽管施行种种严厉的禁令、物价仍旧上漲，而且所有的銀幣都逃往国外去了。聰明的政治家們，为了保持工資水平不变，采取了毁灭爱尔兰的毛紡織業的办法来扶植英格兰的毛紡織業，可是他們后来惊异地發覺：英格兰的工資由于爱尔兰貧民的移入反而降低了。历届仁慈的議會企圖凭借恤貧律規定的各种津貼来提高工人的收入，可是他們后来却發現他們实际上是把工人的收入降低了。信奉基督教的国王們，当他們把有技术的工人从他們的王国中清除一半以后，他們會發現：由于他們使得工業陷于瘫痪的境地，因而使其余有技术的工人也跟着遭殃了。政府的檢查員們尽管發号施令，說布匹應該如何紡織、應該織成什么花样，以及布匹的口面應該有多寬，一直到制造商們都在失望中呼吁別管他們的閑事。

早期的經濟学家們，当他們認識到甚至那些好意的、凭借法律去管理經濟关系的各种企圖是根本錯誤的，以及这些企圖会怎样普遍地加深私人壟断的时候，他們会过分地依靠自己的推論傾向于完全的个人自由。管理一个人数众多的国家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当管理是以一些錯誤的原理为依据的时候，那么結果必然是一

^① 參閱倫敦大学教授福克斯威尔(Prof. H. S. Foxwell)的論文，載于“劳动者的要求”，1886年，爱丁堡，合作印刷公司出版。

困糟。因此人们自然会鼓吹说，与其忍受那些愚蠢的和既得利益的笨蛋们的干涉，反而不如干脆没有什么管理为好。由于受到法国哲学家和英国诗人所组成的有名学派的崇拜而被美化了的大自然，在它那种数不尽的“生存竞争”的罪恶还没有被人们察觉的时候，在表面看来至少要比“卡斯特雷福”可靠得多。在“白色恐怖”时期，甚至在继之而来的较为温和的辉格党伪善统治之下，真正的民主主义的管理似乎还是令人失望地遥不可期。显而易见，当时值得努力和奋斗的第一等“好事”就是把一切“现存的权力”（Powers that Be）削弱到无为与中立的地步。这些权力的影响，那时是与人民敌对的，因此把这些权力的影响全部消除乃是人民的义务。所以就产生了赫胥里教授（Professor Huxley）自那时起就称为“行政的虚无主义”（Administrative Nihilism）的学说。这种主义就是对自由放任的頌揚。

虽然经济学家们自那时起就应该对现在差不多每一个人都看出的经济的与社会的错误负责，可是休谟（Hume）和亚丹·斯密却都没有像他们的法国同代人以及他们的仿效者那样，在很大的程度上感染上自由放任的狂热病。英国的工业地位和法国的不一样。“重商主义”也如我们今天的“公平贸易”一样，意味着对外贸易应该按照这样一种方式来加以管制和鼓励，那就是：它要足以引起进行对外贸易那个国家的商品存货（特别是铸币和金銀）有所增加，这种要求，对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政治革命早已部分地完成了，这也就更为明显地标志着封建主义的枷锁早已被打破了。那时没有一个英国人会被强迫着在封建领主的磨坊上去磨他自己的玉米^①，牺牲自己的时日无偿地为领主犁田和割草，或者花费他夜間的时间为领主搅动池沼中的积水，以免青蛙的咯咯叫声打扰领主的安眠。我们的劳动报酬很早

以前就已經用貨幣來支付；由於通貨價值的變動，這種勞動的報酬已經變得很少。我們的學徒法和行會條例迅速地不斷失去了效力。也沒有什麼繁重的苛捐雜稅阻礙了我們的各種製造工業。

那時專制壓迫和經濟掠奪還是十分盛行的，但是這並沒有採用了干涉和侮辱個人的形式進行。非貴族的法國人受到了束縛，這是他們知道的。中產階級的英國人在很大的程度上以為他們自己是自由的；他們對經濟上所受到的奴役，雖然感到厭惡，但卻不能把這種奴役明顯地和大自然的吝嗇（niggardliness of nature）區別開來。法國的地主乃是一個顯而易見的暴君。他的確（通過經濟地租的竊取）引起了一種人為的勞動者報酬的低廉，但是由於這種低廉的報酬為時太久並且經常如此，以致人們沒有看到它是一種人為的結果，而且也沒有把它當做是一種人為的結果那樣地加以仇恨。農民也沒有起來反抗這種虫害般的病症。因此，自從1381年以來，我們在英國從來就沒有一次燒毀地主別墅（burning of the chateaux）的事件發生。同樣地，亞丹·斯密並不能算是一個完全的放任政策的戰士，因為，儘管他的偉大著作的成就主要是在於它掃清了對外貿易方面的各種約束與管制，並且在於通過確認勞動者有在地區上往來的自由，以及選擇最有利的時間與地點去訂立工資契約。英國的經濟學家們，由於不合邏輯地忽略盧梭（Rousseau）、哥德溫（Godwin）以及今天的科學無政府主義者

① 這種說法，雖然一般地對英國來說是正確的，可是並不是絕對如此。因而仍有必要用1758年所頒布的那個國會條例（喬治二世第三十二年法令，第61章）去使得曼徹斯特的“鄉村”居民解除以往他們必須在領地的水磨上去磨他們全部的玉米和谷類所交納的那種負擔（參閱克利福特：“民事立法史”，第二卷，第478頁）。甚至於遲至1809年，曼徹斯特的居民在他們組織一個公司來設備一個水廠以前，還須征得當地領主奧斯瓦爾德·莫斯萊爵士的同意（上書，第480頁）。里茲這個地方在理論上直到1839年還是被迫要在領主的磨坊磨玉米、谷類以及麥芽的，實際上當時居民須付出13,000英鎊來消除這種封建的“貢賦”（上書，第498頁）。

(Scientific Anarchists)所宣傳的那種完全的自由，只是擁護一方面足以造成蘭開夏資本家們的巨大財富和另一方面又足以創造出現代的無產階級的那種自由。關於這方面的思想，功利主義者與政治經濟學家便結成了伙伴。雖然亞丹·斯密並不屬於他們的學派，可是發展和普及這門新的經濟科學的工作幾乎全部是由他們完成的。直到“和平時期”以後——當邊沁、詹姆士·穆勒充分地展開活動並不久就得到奧斯丁(Austin)、維利爾(Villier)、約翰·斯都亞·穆勒(John Stuart Mill)、羅布克(Roebuck)、格羅提(Grote)、里嘉圖(Ricardo)以及其他學者的支援時——政治經濟學才在英國變成一種力量。研究這門新科學的動機與熱情無疑地起源於功利主義的倫理學。假若人類唯一的主宰者是快樂與痛苦，那麼，具有對於表現社會行為過程的自然規律的知識，能夠控制快樂與痛苦，就會成為非常重要的了。正如巴萊(Paley)和奧斯丁說過的、假若人們應該追求快樂乃是上帝的意志，那麼，研究如何才可以得到經濟方面的舒適生活就會變成一種神聖的義務。譬如馬爾薩斯、恰爾麥斯(Chalmers)、莫理士(Maurice)、金斯萊(Kingsley)這一流有理性的神學者以及今天的那個年青的“高教會黨”(High Church Party)從來就認為是這樣的。基督教精神和現代思想的發展過程開始攜起手來，我們也可以看到巴克萊主教(Bishop Berkeley)以及巴萊乃是聖馬太協會(Guild of St. Matthew)^①一類組織發展起來的先驅者。

功利主義哲學除了有助於經濟科學的普及而外，還強烈地影響了這門科學初期的性質。從反對權威而起的騷亂與暴動的国家與世紀之中繼承下來的那種自由放任的趨勢，由於邊沁對於所有

① 參閱它的宣傳報“教會改革”，地址：倫敦亞德非區，公爵街八號(London: 8 Duke Street, Adelphi)。

那些受人尊敬的、旧时代的残余作了毁灭性的批评而得到发展。他问道：当时存在着的社会制度的每一个组成部分，究竟有什么用呢？它对于个人的快乐究竟产生怎样的结果呢？的确，在那时的社会组织中，只有少数的法律与风俗才能经得起这种考验。那时英国充满了旧日环境所遗留下来的各种腐朽的残余，而且整个行政机构乃是阶级统治和滋养寄生者的工具。工业革命的发展迅速地不断使所有的法律、风俗、谚语、格言以及童话都成为过时的了。人口的突然增加，不断改变着人们的一切期望，并且破坏着一切旧的安排。最后，人们无意中接受了每一个人必须为自己奋斗的思想作为哲学与经验中的教义。“恶魔把走在最后的人抓走” (devil take the hindmost) 变成了当时仍旧被认为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所公认的社会信条。功利主义变成了社会学的新教主义 (Protestantism of Sociology)，由于“怎样使自己和家庭取得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被认为不仅是人生的目的，因而也是每一个讲求实际的英国人应尽的义务。

理智与道德方面的反叛及其政治后果

“哲学激进主义” (Philosophical Radicalism) 的新信条并不全部是这种主义所特有。这种信条的原理，对于工场主、豪商以及所有能够对于自己在生活的战斗中所表现的那种力量而感到愉快的人们都是适合的。但是这种信条实质上乃是麦德斯頓 (Murdstones) 和格拉德格林德 (Gradgrinds)^① 之流的信条，而且最初在理智方面与道德方面的反叛乃是由艺术界掀起的。尽管德·昆西 (De Quincey) 曾以当时仍旧没有人能够超越的方式完成了关于这

^① 麦德斯頓和格拉德格林德都是迭更斯小說中只重物質利益而不重精神和感情的人物。——譯者

种信条的抽象的经济学，可是在湖泊区的“歌唱之鳥的巢夕”^①还不曾有这种反叛。虽然柯勒利吉(Coleridge)^②曾經尽他的最大努力用德国的先驗主义来淹沒这个信条；罗伯特·欧文和追随他的那些热情的共产主义合作者曾經坚定不移地提出了一种更为高尚的理想；并且广大的工資劳动者从来沒有向当前“白奴制度”所借以持續下去的那些原理屈服；但是第一个真正地在个人主义的盾牌上打上一个凹痕的人乃是卡莱尔，他知道如何吸引人們去傾听他的言論。他那些特殊的建議，錯誤的往往較正确的要多。他有办法使人們保持那种具有更加高尚的信仰，使人們不願在塵世中發財和在死后灵魂得到挽救。以后，又出現了莫里士、金斯萊、魯斯金(Ruskin)以及另外一些学者，他們敢于責难对当前中产阶级的崇拜。最后，通过孔德、約翰·斯都亞·穆勒、达尔文以及赫伯特·斯宾塞等人，“社会有机体”(Social Organism)这个概念，虽然还没有見諸書本，可是最后却已深入到人心，甚至深入到我們的政治經濟学的教授們的心中去了。

同时，那些講求实际的人們，虽然不关心这些事情，也無可抗拒地被引入了同一的方向。不管政治經濟学講些什么，不管拥有工場的自由主义者作了怎样的努力，英国却被迫要伸出她的手去帮助和保护她那些較弱小的成員。任何数量的“地方改良条例”(Local Improvement Acts)、“排污条例”(Drainage Acts)、“行車条例”(Truck Acts)、“矿区管理条例”(Mines Regulation Acts)、“工厂条例”(Factory Acts)、“公共衛生条例”(Public Health Acts)以

① 指英国北部湖泊区，即以华茲华斯等人代表的湖濱詩派的發源地。

——譯者

② 柯勒利吉(1772—1837年)，英国詩人和哲学家。他是英国詩人华茲华斯的好友，两人曾同游德国。他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很深，在思想上是自由主义者。——譯者

及“防止伪造条例”(Adulteration Acts)等等不断地变成了法律。^①财产的所有人憑借收取經濟地租及利息而去压迫沒有财产的人的那种自由开始在各个方面受到約束、削弱、阻碍和禁止。由于社会受益的各种限制使資本家不能任意地使用資本，于是資本的利潤逐漸地减少了，物价也因而降低了。由于租稅逐漸从消費者轉嫁到那些享有高于英国平均收入水平^②的人們的身上，因而来自地租与利息的收入就一部分一部分連續地被减少了。英国的政治权力和政治組織也一步步地被使用于工業。一直到今天，劳动者的最大雇主乃是国王的部长之一（即邮政总长），而且几乎每一种可以想得到的貿易，不論在什么地方，現在都由教区、市政当局、或中央政府本身来进行而用不着任何中間人或資本家的干預了。那些非难政府当局把組織劳工这件事情掌握在政府手中的理論家們，尽管他們把政府当局的这种行为看做是一件在經濟上不純潔的事情，認为这种行为不但和頑强的、英国人的个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矛盾，而且也超出了实际可行的政治領域，可是他們很少發覺到这

① 有关工厂立法的起源可參閱“道德与健康条例”(Morals and Health Acts)。見乔治三世第四十二年(1802年)法令第七十三章，另外一些条例在1819年和1831年也接着被通过了。但是，由于沒有視察員的緣故，这些条例的条款几乎全部被厂主們規避了。在“改革法案”通过以后，于1833、1844和1847年所作的較为严厉的立法获得了某些改进。1878年的那个条例使这方面的法律加强了。激进主义及社会主义沿着这一方向进一步發展的各种提案可以在本卷第117頁看到。到1845年止，曾被通过的“地方改良条例”将近有四百个。在以后的年代中又通过了种种一般性的条例，这些条例自那时以后由于便于参考而合并于各种地方条例之中。第一个“公共衛生条例”是在1848年通过的，接着于1855、1858、1861和1866年，为了衛生的目的，又分別对这个特定的立法作了各种补充的規定，因而加强了1871年有关这一方面的各种条例，并且最后于1875年完成了現今的衛生法，它現在成为一厚本关于限制自由使用土地与資本的書籍了。

② 应納所得稅的最低收入为150鎊，这个數目相当于按戶計算的平均收入。參閱“費边短論”第5册，“社会主义者須知”。

种行为已經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①。除了我們的国际关系、陆軍、海軍、警察和法院而外，在英国各地，政府当局現在掌握了邮政、电报、小件商品的运送、貨幣鑄造、測量、通貨的發行与鈔票的管理、度量衡的規定、街道公路和桥梁的建造清扫照明和修补、人寿保險、年金的發放、造船、股票买卖、銀行、农業以及貨幣貸放。政府当局为我們成千上万的人預备了从生到死所需要的一切——接生、保育、教育、飯厅与宿舍、防疫注射、看护、医藥、公共祈禱、娱乐以及埋葬。政府当局提供并維持自己的博物館、公园、美术馆、圖書館、音乐厅、公路、街道、桥梁、市場、屠宰房、救火机、灯塔、領航、輪渡、木船、汽船、救生船、墓地、公共澡房、洗衣房、养魚塘、港口、防波堤、碼頭、医院、藥房、煤气厂、自来水厂、电車、电报、配給站、牧场、机械工人的住宅、学校、教堂以及閱覽室等等。政府推动地質学、气象学、統計学、动物学、地理学、甚至神学的研究并出版研究的成果。在我們的殖民地，英国政府进一步允許并鼓励当地公众为他們自己經營铁路、运河、典当業、戏院、森林、金鷄納农場、灌溉、癩瘋病疗养院、俱乐部、沐浴設備等等；并且允許他們可以移民，买卖沙石、海鳥糞、奎宁、鴉片、食盐等等。除了陆軍、海軍、警察、法院而外，所有上述業務过去曾有过一个时期由私人去經營，因而就成了个人合法地进行資本投資的主要方面。一步步地，政府当局把这些業務部分地或者是整个地吸收过来，于是私人进行剝削的範圍縮小了。和这种进步的工業的国有化或市有化同时并进的，还有在企業管理方面的那种純粹的私人因素的消除。老一輩的經濟学家們曾經怀疑过除了銀行業及保險業而外，其他的任何業務是否可以由股份企業來經營。現在，从每一种可以想得到的

^① 參閱“社会主义的發展”，倫敦現代出版社出版，該社地址为：London: 13 Paternoster Row, E. C., 訂价一便士。

工業直到面包業和牛奶銷售業，都卓有成效地由悠閑的股東們所擁有的那些大公司中領取薪俸的職員來管理了。整個英國的企業，以所使用的資本來衡量^①，有三分之一以上現在是由股份公司經營的。這些公司的股東們所擁有的財產，是可以由公眾來加以剝奪的，而這種剝奪對於這些股東們所經營的工業所引起的脫節現象，並不會比每天在股票交易所中的那種股票的買賣所引起的脫節現象更為嚴重。

除了直接代替私人經營企業而外，我們的國家現在還對幾乎所有尚未被吸收過來的工業業務進行登記、視察和控制。除了對出生、結婚、死亡和選民進行登記而外，國家進行登記的還有：在下級法院出庭的律師、在高級法院出庭的律師、公證人、專利代理人、經紀人、報社老板、撲克牌製造商、釀酒商、銀行家、海員、船長、商船的大副、醫生、馬車夫、小販、典當商、煙草商、釀酒商、金屬版販賣商、游藝品販賣商；此外進行登記還有：保險公司、互助會、有財產基金的學校和慈善組織、有限公司、土地、房屋、證明書、賣契、債務協議單、船隻、武器、狗、馬車、公共汽車、書籍、劇本、小冊子、報紙、原棉的轉移、商標、專利權、寄宿舍、公寓、娛樂場、戲院、音樂廳、祈禱的地方、初等學校以及舞廳等。

這種登記並非僅只是一種形式。大多數前面所提到的也如像所有的鐵路、電車、船隻、礦區、工廠、運河船隻、公共交通工具、漁場、屠宰房、制酪廠、牛奶店、麵包店、小農場、煤氣計度表、學習解剖學的學校、活體解剖室、炸藥工廠、蘇格蘭青魚業以及普通宿舍一樣要受到國家的檢查與批評。

這種檢查通常是詳細地而且是嚴格地執行的。在大多數大工

^① 參閱“費邊短論”第7冊，“資本與土地”，第7頁。

業单位中，国家規定了工人的年齡、工作的时数、通風程度、照明、每一个工人工作的空間、溫度、衛生設備、假期以及吃飯時間。并且还要規定：工資应在什么地点，什么时期以及如何支付；机器上的梯子、升降机的进出口、矿井和采石場應該如何設置遮栏和防护，設備应在什么时候并如何去清潔、修理和使用，甚至某些貨物将按那一种包装方式来出售都适当地作了規定。因此，作为个人的資本家当然不能够利用他所处的地位而占便宜。他在每一个方面都要受到政府的登記、檢查和控制，而且最后要被政府所代替。在目前，他将被迫从他的租金与利息收入中，把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讓渡出来用于公共事業。

甚至在那些仍旧讓私人企業任意去經營的領域中，为了使在本世紀初作为唯一确实有利于社会的行动准則而建立起来的貪圖私利的無政府状态竞争不致完全把国家毀灭掉，因而私人企業的活动也同样地日益受到严密的限制。所有这一切都是由那些“講求实际”的人們来完成的，那就是說，是由那些对任何科学的社会学一無所知的人們来完成的。他們不但把社会主义認為是最愚蠢的梦想，而且把他們認為是吹牛的各种社会改革要求完全忽視了。可是他們的每一种行为都会促使他們所輕視的那种社会主义得以实现，并且会把他們仍旧相信的那种个人主义的信念摧毀掉，这是不可抗拒的扫蕩一切的社会趋势。实际上他們所建設的要比他們所知道的更多得多。

我們决不能認為，沒有个別的社会改革者的有意識的努力，社会改革的初步工作也能够付諸实行，或者扩大社会改革的各種建議也能够被提到日程上来。“时代精神”(Zeitgeist)是强有力的，但是沒有立法者，“时代精神”并不能使国会条例通过，沒有市議員，它也不能建立市立圖書館。虽然时代环境会决定我們的各种决

策，并至少会粗略地决定我们的目的，不管我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每一代人仍然可以决定自己的目的。但问题还要取决于个人是否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根据他的性格与見聞去抵抗社会进化或推进社会进化。人們对于当代社会趋势的完全自覺之所以重要，就在于这种自覺的存在和人們对它的理解往往决定我們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特殊行动才是方便的。就是說，我們要順着时代潮流走而不要去抗拒这种潮流。

人們之所以普遍地不能夠認識到我們的那种不自覺的社会主义已經进展到了什么样的地步，乃是由于人們对于自己所在的城鎮以外的地方行政差不多是一無所知的。这是由于人們对社会主义缺乏認識，为了要証明每天都在發生的那些事物不可能發生，他們不斷地在紙上宣布并煞費苦心地提出各种最可笑、最不切合实际的反对社会主义者的論証，因而造成了時間和勞力上的巨大浪費。在使我們的工業生活“社会化”方面，事情做得最多的就是各地市政当局，可是本世紀的市政史还没有人編写过。关于这种进步的工業“市有化”，这里我們可以举出几个特殊的例子。在我們当中，多数人都知道，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責是：管理公路、街道、桥梁（它們曾經一度由个人企業任意經營），并照料所有的公用大路的照明和清潔，以及設置陰沟、排水道和“暴雨排水道”。也許知道这样一种情况的人并不是太普遍的，那就是：仅只在英格兰和威尔斯，每年用于这些服务業的支出就不下七百五十万鎊，这个数目大約等于整个英国地租額的百分之五。市場、市集、港口、防波堤、碼頭、医院以及公墓和葬地的設置仍旧是由政府和私人資本家分攤經營的，而操在政府手中的那一部分，每年投資約为二百万鎊。公园、娛樂場所、圖書館、博物館、澡房以及洗衣房每年花費公家的資金在五十万鎊以上。然而所有这一切，相对說来乃是一些不重

要的服务業。由于供应煤气、自来水和电車，地方当局才大規模地把劳工組織起来。在英国的煤气消費者当中，实际上有半数是由公家的各个煤气厂来供应的，这些煤气厂設立在一百六十八个分散的地区，它們每年的支出超过三百万鎊^①。这样一种情况是几乎用不着多說的，那就是：尽管政府在許多場合下要为这些工厂支付很大的代价，可是公众所得到的利益也是巨大的；而且煤气工業进一步的市有化正在以很大的速度进行着，仅在一年之内，就有不下十二个地方当局曾經为这个目的（并且有一个地方当局为經營电灯）而获得貸款（見“地方政府委员会报告書”，1887—1888年，C—5526，第319—367頁）。具有同等發展速度的是自来水厂，它变成了一种商業的組織，用于水厂的公共支出每年已經将近达到一百万鎊。在1887年到1888年，有六十五个地方当局借款来建立水厂，这些水厂是平均地設置在农村地区和城市地区的（前引报告，C—5550，有319—367頁）。电車和渡船也正在經歷着同样的發展。几乎包括着所有較大的州的中心区在內的三十一个城市，都拥有当地的电車路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分。曼徹斯特、布萊德福特(Bradford)、伯明翰、俄尔德翰(Oldham)、桑德兰(Sunderland)和格林諾克(Greenock)把它們的企業租出去，而在市政当局当中，赫德斯費尔德(Huddersfield)的市政当局是有見識的，它經營自己的企業而不要任何“中間人”的干預，結果群众得到很大的好处。屬于地方局的电車路的哩数，自1878年以来已經增加了五倍，从而占全国电車路哩数的四分之一以上（見“下議院报告書”，1887—1888年，第347号）。由“城市工程委员会”(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所完成的最后一个重要的工程是在泰晤士河上

^① 根据“政府关于1887—1888年的財政报告書”，參閱“貿易委员会会刊”，1889年1月，第76—78頁。

建立的“免費汽船渡口”(Free Steam Ferry), 这个渡口的費用是由地方稅來維持的。这件事情, 从某些方面看来, 乃是在各种企业的發展中最有重大意义的一件。但是, 免費的汽船与免費的火车之間的差別显然只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別而已。

另外的一些实例也是值得我們提到的。格拉斯哥建筑并經營七所公有的“公共宿舍”; 利物浦設置科学講座; 曼徹斯特建筑并装备了一所美術館; 伯明翰开办了各种設計学校; 里茲开辟了广大的牲畜市場; 而布莱德福特則按低于成本的价格供应自来水。全国有将近一百个可以自由閱覽的圖書館和閱覽室。公共团体現在所經營的次要服务業是不可胜数的^①。人們借助于地方公債的發行而使得这种“市区社会主义”成为可能, 而現在这种公債的数目已經超过了一亿八千一百万鎊^②。每年用来支付債務的利息和留作償債基金的数目将近一千万鎊, 这就是市有化所得到的金錢上的利潤所减少的数目。除了得到金錢上的巨大利益而外, 政府組織劳工所具有的全部好处仍旧是保留着的^③; 而客觀的經濟方面的階級分化(通过懶惰的食利金者和經理或企業家的分离)大大地有助于群众去了解被人們認做是利息的那种經濟貢獻的性質。此外, 在追加的利息負擔是依靠地方稅來籌措的限度內, 支付給資本

① 人們并不是普遍地知道, “倫敦股份公司”实际上从1681年到1683年曾經營火險業務, 但是由于那些对私人企業感到兴趣的人們的反对, 这个公司被迫放弃了火險業務。这些反对者最后得到一道以“皇家裁判所法庭”(Court of King's Bench)名义發出的命令, 用以限制和他們相竞争的市民(參閱瓦尔福爾(Walford)所著“保險業百科全書”, 第三卷, 第446—455頁)。

② 參閱“地方政府委員會報告書”, C—5550, 第436頁。順便提一下, 这个数目恰好大約等于英国一年的地租。我們为了得到地主的允許而居住在英国, 每年要付給他們的地租数目是和地方政府当局購置巨大财产的全部債務費用相等的。

③ 參閱“政府組織劳工”, 这个文件是1886年費邊社的一个委員會所提出的報告書。

家的利息主要是在牺牲地主的利益的情况下来课征的，因此，我们就有了一种与利息负担的数目相等的经济地租的“国有化”。在十一年中，地方税已经增加了36%，或者说将近增加了七百万镑，而且仍在继续不断地增长。单就英格兰和威尔斯而论，地方税现已达到二千六百万镑以上，或者说大约等于全英国的地租的17%（前引报告，C—5550，第174页）。

没有任何明显的迹象可以看出，这种不自觉的放弃个人主义的步调会减缓下来。至今还没有任何国会议员提出过一个法案使赫伯特·斯宾塞先生的那种“个人对国家”（Man Versus the State）的无政府主义的原理付诸实行。“自由与财产保护联盟”（Liberty and Property Defence League）的具有私心的各种努力甚至都不能阻止保守党历届国会进一步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立法。格莱斯頓先生（Mr. Gladstone）在1886年对一个朋友说，“地方自治”问题会使自由党变成急进党。他也可能说过，“地方自治”会使这两个党都变成社会主义的党。假若那些一半是由公款来维持的所谓的“自愿捐款办理的学校”（Voluntary Schools）不被取消的话，那么，免费的初等教育和公共技术教育现在实际上是为下议院中的两党所接受的。张伯伦先生以及较年青的保守党员们，公开地鼓吹通过国家与市级的机构来实现社会改革的各种深谋远虑的计划，他们把这些计划拿来作为取得群众支持的手段。“全国自由同盟”（National Liberal Federation）选择了特殊的城市地价税来作为它的内政纲领的主要特色^①，然而这个建议的特点，在旧式的自由主义者看来，不过是从地主那里没收了相当于地价税那么多的财产而已。以约翰·摩里先生（Mr. John Morley）为主席的“伦敦自由

^① 参阅该会在伯明翰的“年会报告”，1888年，9月。

主义者与急进主义者联盟(The London Liberal and Radical Union), 甚至提議授权給倫敦州会用只向拥有城市地产的地主征税的办法来改建倫敦的貧民区^①。因此, 这样一种情况是不会令人感到惊异的, 那就是: “各業工会联合会”現在要由大多数代表两次宣布贊成“土地国有化”; 或者是: 倫敦州会的大部分議員要折回来采取在本質上是社会主义者的政綱。誠然, 最严格的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那些立即切实可行的要求, 現在往往是全部被包括在当前急进主义者的綱領之中了。我們下面所揭示的这些社会主义者的要求, 是从 1888 年 8 月 8 日“明星报”的篇幅中摘引下来的, 它們可以用来作为对当前社会主义者关于进一步的立法的各种要求的說明^②。

修訂租稅的建議

目的——为了逐漸并且最后把地租与利息的收受者作为一个階級加以消灭, 必須把加在各級工人身上的負担全部地轉嫁到地租与利息的收入者身上。

办法——(1)除了对烈性酒类課稅外, 廢除一切关税和国产稅。(2)增加所得稅, 这种所得稅应有区别地对劳动所得的收入課以輕稅而对不劳而获的收入則課以重稅, 并且应按照各級收入水平而采取差額累进稅制。(3)划一并增加遺產稅, 并把所得到

① 參閱 1889 年 2 月 8 日倫敦州会依据該会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的建議而采取的決議(見 2 月 9 日“每日新聞报”(Daily News)。国会議員斯圖亞特教授(Prof. Stuart)現在已經提出一个包括着上述这些惊人的建議在內的法案。

② 把社会主义者这种主要是坚持經濟方面和社会方面的改革的綱領拿来和宪章派的那个只是空洞地具有政治性質的“五点”綱領加以比較是有趣的。宪章派的“五点”綱領就是: 成年男子的选举权; 無記名投票; 每年改选国会一次; 議員領受報酬而且选举資格不受财产限制; 全国选举区須平均划一。

的稅款作为資本来应用，而不作为所得来消費。(4)把租戶所負擔的各种地方捐稅及房屋稅轉給房主負擔，任何与此相反的契約一概無效。(5)強迫繳清現行的土地稅并重新針對所有的城市地產租金及其增值部分課稅。(6)廢除各种就業執照費。(7)廢除各种違警費。

扩大工厂条例适用范围的建議

目的——用要求人們公認最低工資和最高工作日的办法来普遍地提高工人的生活水平。

办法——(1)把工厂和工場条例(或者斟酌情况而把矿区管理条例)的一般条文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包括所有使用劳动者的雇主在內。(2)強迫所有雇用三个(?)以上工人的雇主进行登記。(3)大量增加工厂視察員的人数,其中应当包括妇女,而且这些視察員主要应从工資劳动階級中去挑选。(4)立即在所有的各級政府部門中、所有的矿区中以及所有的特許壟断組織中(譬如鐵路、電車、煤氣厂、水厂、碼頭、港口等等),把最高的工作时数减少到每天八小时,而且在其他任何一个行業中,只要大多数工人要求,也应照样办理。(5)凡是为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提供物資的合同中,必須強迫加入以下条款:(甲)不得轉包工,(乙)受雇的工人每天不得工作八小时以上,(丙)工資的支付不得低于規定的最低工資。

改革教育的建議

目的——使所有的兒童、甚至是最貧窮的兒童,不仅可以受到某种程度的教育,而且可以受到他們的才能所能接受的最好的教育。

办法——(1) 在公費或私人捐款办理的公立初級学校中，应立即廢除一切学杂費，并相应地增加政府的补助。(2) 設置教育部长一人掌握整个教育系统(从初級学校直到大学)，并掌握所有的教育补助金。(3) 在有需要的地方，应即設置公立技术学校和中等学校，并設置大量的公立中等学校奖学金。(4) 在任何情况下，应在夜校繼續实施初級教育。(5) 登記并檢查所有私人办理的教育机构。

改組恤貧律管理机构的建議

目的——慷慨地并毫不带侮辱地对老年人、病人以及因暂时失業而陷于貧困的人給予生活費用，同时也不放松对被救济者的“檢查”(Tests)，以防止身体健康的懶汉享受补助。

办法——(1) 通过建立一种普遍的养老金制度以及建立公共的疗养院，使对老年人及对病人的救济和救貧院制度分开。(2) 把所有身体健康的貧民組織起来从事劳动并給予技术教育。(3) 給予失業者以临时的救济工作。(4) 由各个地方的地方行政当局来接替貧民局的工作。

扩大市政当局活动的建議

目的——逐漸由政府把勞工組織起来为公共事業服务，并把私人資本家和中間人加以消除。

办法——(1) 提供便于取得土地的各种措施，凡經發現不宜于居住的住宅应無償地予以拆毀，并由市政当局对技术工人供給住宅。(2) 在倫敦以及其他所有城市中，应尽量加强市政当局对煤气、自来水、市場、电車、医院、公墓、公园、博物館、美术馆、圖書館、閱覽室、学校、碼頭、港口以及河流等等的管理。(3) 給予地方

农村行政当局以取得土地的各种便利，以便它们把这些土地拿来作为份地、公共牧场、公共会议厅以及阅览室等等之用。

改善政治机构的建议

目的——随时收集大多数人民所反映的各种愿望并使这些愿望能够得到最正确的表达。

办法——(1) 改革选民登记制度，以便给每一个成年人以选举国会议员及市议员的选举权。(2) 作为选民登记资格之一的任何居住期限的规定应予废除。(3) 由专门委派的政府职员对选民每半年登记一次。(4) 国会每年改选一次。(5) 包括竞选演说词及投票证的邮资在内的各种选举费用应由公款开支。(6) 对全体国会的、州的或市的公众代表给以薪俸。(7) 在决选时实行第二次投票制(Second Ballot)。(8) 废除或无需经过痛苦地把上议院取消^①。

这就是一个世纪的工业革命所带给急进的工人阶级的纲领。虽然不像约翰·穆勒^②那样明显，可是工人阶级同样已经从一种纯然的政治民主主义转向了一种完全的(虽然是不自觉的)社会主义了^③。

^① 几乎用不着多说，各种“自由土地”(free land)、自耕农制、或租户选举的方案在社会急进主义者或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现代纲领中是没有地位的。它们乃是正在过时的个人主义的急进主义(Individualistic Radicalism)的残余。企图代表人民“呼声”(cry)的候选人是愈来愈避免这些反动的建议的。

^② 参阅穆勒的“自传”，第231—232页。也可以参阅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1865年通俗版，第四篇。

^③ 当社会主义者的纲领的全部目的与意图被人们清楚地认识时，关于它必然要碰到的各种困难的预测，可参阅本书中第八篇赫伯特·布朗德所写的论文。

新的社会組織

几乎用不着多說，这个时代的社会哲学并不是不曾受到政治进化和工業發展的影响。一种新的社会联系和一种新的社会生活目的的观念目前正在緩慢地侵入人們的心灵。人們發現了（或者重新發現了），一个社会不仅只是許多个人个体的总和，那就是發現了社会的存在和它的任何一个組成部分的存在是有区别的。人們認為一个完美的城市是胜过任何数目的良善公民的——对于城市，我們不能用考察个人的那种尺度去衡量，而要用其他的尺度去衡量。社会不論是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必然是以本身作为一个社会而繼續存在为目的，就是說，社会的生命要超过它的任何一个成員的生命，而作为一个組成单位的个人的利益，必然时常和整体的利益發生冲突。虽然社会有机体本身曾經是由单个的人們的联合进化而来的，可是作为社会有机体的一个組成部分的个人，現在却是社会有机体的产物，他的生命是从較大的社会有机体的生命中产生；他所具有的特質是由社会的压力所形成；他的各种活动和其他人們的活动千絲万縷地交織在一起，同是屬於社会整体的活动。离开了繼續存在的与健康的社会有机体，沒有人能够在現在还活着或者滋生后代。因此，社会有机体的繼續存在，乃是個人的至高無上的目的。他的有意識的行为动机，对他自己來說，也許是（并且經常必須是）个人的行为动机，但是，只要这种行为表明对社会的福利是敌視的，那么，这种行为迟早必須由社会整体来加以制止，以免社会整体会通过它的成員的錯誤而陷于毀灭。由此可見，社会健康的条件乃是一个值得科学地加以考察的問題。任何时候，都会有某种在当时当地所容許的某种社会关系的特殊安排，这种安排，在“大自然的吝啬”中，只会具有最低限度的人类貧困。五十

年以前，人們曾經假定：在个人的或“男子汉的”独立意义下的那种自由之外，再加上一套刑法，就会自发地为每一个特定的国家造成上述这种安排。这种假定的后果，就是在哲学上对自由放任的崇拜。今天每一个学者都知道，这样一种乐观的假设是不能够由现实生活的事实来加以保证的^①。现在我们知道，在自然淘汰方面，当有文化的人类的存在尚处于危险状态的那个发展阶段，那些被保存下来的单位，并不是个人而是社会。自然淘汰的作用，虽然在最初各个阶段是类似的，可是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在低等动物中，生理上的力量或敏捷乃是有利的品质。假若在墨鱼当中，某个从天上派下来的天才墨鱼发展了一种文雅的作诗才能，然而这种高贵的品质并不会延迟它向拙笨的邻居屈服。从较高级的动物来看，当智力上的狡诈变成唯一有利的特质时，大脑上多打一个皱纹，就使原始人可以发明火或工具，并且使一个比较虚弱的野蛮人能够变成他的同伴们的征服者和优胜者。

照这样说来，大脑文化是大踏步地发展了。但是我们还没有彻底地认识到，这种大脑文化本身作为“被选择过”的特质已经被社会组织所接替了。有教养的雅典人、撒拉森人(Saracens)以及普罗文沙尔人(Provincals)，在生存竞争中，都在他们各自的竞争者们面前失败了。这些竞争者们作为个人来说是低劣的，可是他们那时却具有一种更加可贵的社会组织。法兰西民族在上一次战争中被打败了^②，这并不是因为一般的德国人较一般的法国人高出一吋半，或者是因为一般的德国人多读了五本书，而是因为德国人的社会有机体，为了达到当时的各种目的，在效率方面要比法国人的

① 参阅牛津“耶稣学院”(Jesus College)研究员兼教师里奇(D. G. Ritchie)所著“达尔文主义与政治”(1889年伦敦 Swan, Sonnenschein and Co. 出版)。

② 指普法战争。——译者

社会有机体优越。假若我們希望把我們的直接影响加于未来的世界，并使未来世界的人們不仅只回忆我們的美德的話，那么，和我們自己个人的完滿發展比較起来，我們必須更加注意去改善我們作为一个組成部分的这个社会有机体。或者更正确地說，每一个人的完滿而恰当的發展，并不一定就是他自己人格的至高無上的修养，而不过是他以最可能的方式在这个偉大的社会机器中履行了他的卑微的义务而已。我們必須放弃那种認為我們是独立的个体的自高自大的幻想，并把我們的那种只注意于自己的修养的忌妒心轉变过来去服从那个更高的目的，就是服从公共福利。这样一来，有意識的“直接适应”（direct adaptation）就不断地代替了那种無意識的、浪費的、屬于早期生存竞争形式的“間接适应”（indirect adaptation）。随着社会学知識的每一步进展，人們愈来愈了解到，人不仅只可以主宰“事物”，而且也可以有意識地控制社会命运本身。

这个新的关于社会有机体的科学概念，已經使政治經濟学家和哲学上的急进主义者的那些受人珍爱的原理完全丧失尊严。我們以往曾听任这些原理在自由放任的河流上愉快地駛进無政府状态。然而自上述这个新的科学概念产生以后，时代的潮流已經改变了。1848年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学”的出版，适当地划定了陈旧的個人主义經濟学的界綫。穆勒的这部書，以后每出版一次，更加趋向于社会主义。在穆勒逝世以后，人們从他亲手写成的自傳中^①，知道他是从一个純然的政治民主主义者發展到一个深信不疑的社会主义者。

自此以后，人們的論調已經作了如是的改变：某个有才干的經濟学家，尽管他公开地反对社会主义者^②，也不得不遺憾地昭告人們：所有年紀較青的人以及許多年紀較老的教授，現在都是社会主义者了。的确，主要地正是从这些方面，人們才認識到早期經濟学

的各种論断是如何的虛伪，尤其是認識到这些論断作为社会或政治行动的指南是如何的不完备。因此，人們現在只会在社論、講道集、牧师或主教的演說詞中碰到这些論断了^①。而且經濟学家自己也不願再去知道这些論断了。

社会学的这种發展的结果，就是强迫人們去修改自由与平等的相对重要性，而自由与平等乃是作为社会管理的原則而被人們念念不忘的。按照边沁企圖規定在民法中的那些有名的“目的”(ends)，自由是駕凌于平等之上的。理由是：完全的平等只能憑借丧失取得劳动果实的那种保証才能够維持。这种解釋一直被認為是正确的；但是需要决定的問題仍然存在，那就是：要有多少自由呢？經濟学的分析，已經把人們对別人的自由要同样加以尊重这样一个陈旧标准的价值摧毁了。边沁的經濟学是有缺点的，他根本不考虑永远建立在別人劳动果实上的那种貢賦，而这种貢賦不可避免地会由在土地方面财产的完全私有所引起。在他看来，自由及财产的安全意味着每一个工人應該自由地去取得自己的劳动的全部果实，而在自由与安全两者之間似乎并没有什么矛盾。政治經濟学家現在知道了，由于自由竞争以及在土地和資本方面的私有财产，个人是不可能取得自己的全部劳动果实的。此外，研究工業發展的学者也發現了，要追溯每一个分散的个人的劳动的精确結果是什么，乃是愈来愈不可能的。例如，完全的自由权与财产权，

① 見穆勒：“自傳”，第231—232頁。

② 見湯頓獨立學院(Taunton Independent College)校長艾維林神甫(Rev. F. W. Aveling)所著：“打倒社会主义者”，1888年8月單張印刷版。也可以參閱西狄威克教授1886年11月在當代評論(Contemporary Review)上發表的那篇評論“經濟社会主义”(Economic Socialism)這一著作的文章。

③ 那就是說，不幸得很，我們幾乎只能在所有自命是可以指導我們的社會行動和政治行動的言論中碰到這些論斷了。

必然会引起那种为了克兰里卡德勋爵(Lord Clanricade)的利益而对爱尔兰佃农的掠夺。于是,边沁的那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原理会变成什么呢?当边沁主义者开始了解地租法则时,自由权与财产权二者,他愿意放弃那一个呢?他不能够逃避经济学家们、政治家们以及“讲求实际的人们”同样地教导过的这个本世纪的教训,那就是:由于私人可以无限制地拥有生产财富的工具,因而完全的个人自由是和公共的福利不可调和的。在我们自己当中进行的那种不受约束的生存竞争,威胁着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健康的与永恒的社会有机体而生存下去。赫胥里教授宣称^①:进化就是在每一种有机体的各个个体当中,以有意识的受到管理的那种协调去代替那种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竞争。三十年以前,赫伯特·斯宾塞就表明了:在土地方面,财产的完全私有是和现代民主主义的国家观念相矛盾的^②,而且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家现在都宣传同一的学说。急进主义者从实际经验出发,也迅速地得到类似的结论。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理的不断加强,市区行政的发展,以及租税负担直接地向地租与利息的迅速转嫁,在这三个方面都标志着政治家们不自觉地放弃了陈旧的个人主义,而且也标志着我们无可抗拒地要滑进集体主义性质的社会主义(collectivist Socialism)。

民主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学习上述这种教训。由于群众痛苦地意识到,个人主义不能够为五分之四的人民^③创造一种适宜的社会生活,因而我们可以预见到:个人主义是不能够再度恢复它的政

① 参阅1888年2月“当代评论”。

② 参阅“静态社会学”有关各章节。

③ 参阅里恩·里维教授(Prof. Leone Levi)给泰晤士报的信,见1886年8月13日泰晤士报;并且参阅菲德烈克·哈里逊先生(Mr. Frederic Harrison)在1885年1月举行的“工业报酬会议”(Industrial Remuneration Conference)上所发表的演说词(见该会报告第429页)。

治权力的。假若在地与資本方面的私有财产，为了使少数懶汉保持富有（不是由于他們自己有什么劳动）而一定要使許多工人永远保持貧困（不是由于他們自己有什么过失），那么，土地与資本方面的私有财产将不可避免地会走上被它所代替了的封建主义的道路。經濟学的分析証实了遭受苦难的人民的上述这个粗略的論断。工業进化的历史也指出了同一的結論；而且在过去两个世代中，世界上主要的倫理学大师們曾經不断地努力宣傳同一的教訓。無怪乎个人主义的天堂就像一卷紙一样在我們眼前正在包卷起来，而且甚至主教們都相信这点并感到發抖了^①。

就如亨利·美因爵士以及其他的人們所暗示的那樣，这样一种情况当然是可能的，那就是：本世紀的整个經驗是一种錯誤，政治权力将会再度折回到一个君主或一个貴族寡头的手中。真的，正是由于对民主主义缺乏信仰，才使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社会主义同情者不能够坦白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原理。关于这种政治的隔代遺傳（Political Atavism）在經濟方面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容易預測的。机器工業和蒸汽动力几乎是不可能被人們用地方选举委员会和投票箱来廢弃的。不管怎样，只要民主主义在行政方面繼續作为支配的原則，尽管那些民主主义的反常現象或变种曾經到处掀起一种短命的君主政体或一种行不通的独裁政治，可是人們仍旧可以很有把握地把社会主义推断为民主主义在經濟上的主要方面。無产階級的政治权力每有所增加，他們一定会把它用来保障他們的社会利益和經濟利益。至少在英国，本世紀的历史可以立即用来作为他們行动的指南和理由。

① 參閱1888年“兰貝斯聖公會會議報告書”，題为“社会主义”。也可以參閱1889年6月各教區區會中央會議的議事錄（特別參閱康能·費爾士的那篇論社会主义的報告）。

社会主义的工业基础

威廉·克拉凱

在本章里，我的目的是要对上一世紀或上一世紀半的經濟史作一个簡要的敘述。从这个敘述中，我希望得出一个教訓。这个教訓就是：曾經有过，而且現在也还有，一种与我們个人的願望或成見实际無关的經濟进化已在演进着；这种进化通过改变物質生产的条件而改变了我們整个的社会問題，并且事实本身在我們的現代生活中引起了一种革命。要弄清楚这个革命是什么？而且使我們自己能在适当的时机把它加以利用——这就是我所認为的社会主义的簡要意义。譬如說，由一个普通主教或国會議員所代表的無知的群众們，听到“社会革命”就会立刻想到街头暴动和由于武装政变(a coup d'état)把犯人整船整船地淹死的事件；会立刻想到八月十号^①那一类的武装政变，随之而来的也許是霧月十八的复仇。但是这些都不是社会革命。这巨大的經濟的变革是每天都在默默地进行着的，每一条通向沒有人迹的沙漠地带的新铁路，每一架代替了手工劳动的新机器，每一个由資本家們所組成的新的联合企業，每一个新的劳工組織，每一种物价的变动，每一种新的發明——所有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更多的力量实际上是在我們的眼前进行着的一个社会革命；因为它们根本上是正在改变着經濟

① 1792年8月10日的人民起义的日子。——譯者

生活的基础。很可能在某一个重要的关头出现一个伟大的戏剧式的偶然事件，这种事变，将对人们显示出导致这些变革的重大意义，而这仅只是具有最后表现形式的重大意义。未来的史学家们可能会把这种事件当作是一种“革命”（指特殊的革命）来列入史册，正如今天的史学家们把“巴士的”狱的攻克，或路易十六的处死当作革命来写成历史一样，好像构成法国革命的原因乃是这些事件而不是数百年来瓦解法国封建主义组织的一系列事件的最后条件。真正的预言家并不是一个能事先说出某种善恶之间最后决斗（Armageddon）^①的无知预言者，而是一个能够看出事物的不可避免的动向和趋势的人。我们可以大体上本着这种精神来研究现代工业纪元的经济史，以便认识它的意义，并了解工业纪元曾经引起了什么，从而了解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

假若我们在一百五十年前去参观一个正在进行工业生产的英国乡村或小镇，我们会发现什么呢？那时看不见冒着浓烟的高大烟囱，当一个旅行者在黄昏进入市镇的时候，不会看到有成百窗户的大厦在他面前发出令人目眩的灯光。听不到机器的响声；听不到汽锤的嘈杂声；也看不到巨大的鼓风炉，和闻不到从几哩外的化学工厂里吹送过来的气味。假若他所参观的地点是兰开夏的话，那么，他会看到一些红砖砌成的狭小的房子，前面有高的阶梯，房子外面有木制的百叶窗，就如像今天人们在兰开夏的某些古老的区域里仍旧可以看得见的那些房子一样。在每一所这样的房子里，都是一个既没有师傅，也没有学徒的小小的家庭工场，全家人靠双手的劳动共同来生产一匹棉布。父亲为自己准备好作经线用的亚麻线和作纬线用的棉花，他买来了已经制成的亚麻线，但作为

^① 见启示录。——译者

緯綫用的棉花則由他的妻子和女兒去梳刷和紡織，而且布是由他自己和他的兒子來織成的。在這個小巧的手工工場里，已經有了簡單的分工，但是生產棉布所必需的工具都是生產者自己擁有的。在那里，既沒有資本家，也沒有工資勞動者；織布者控制着自己的勞動，實現他自己的交換，而且得到了和他自己的產品相等的代價。這樣就是巨大的英國棉織業的開端。斐迪南·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曾經說：“包含由九十六個無產者和四個資本家組成的那種社會，就是你們的國家”。但是在從前的蘭開夏，既沒有資本家也沒有無產者。

也許在比較更晚近的時期，如果有人參觀過譬如說，斯塔福德的話，他不會發見巨大的現代製鞋廠和令人眼花撩亂的各種機器；每一架機器旁邊都站着一個被當作機器的人。因為製鞋業在當時純粹是一個手工業，需要熟練技能，判斷的能力，以及一定的藝術常識。每一個鞋匠在自己的小屋子里工作，從皮革商人那里買到他自己的原料，並且借助於少數簡單的和廉價的工具用自己的手做成鞋子的每一部分，他以為“沒有再比皮革更好的東西了”，而且他還沒有學到這樣一種藝術，那就是把不是用皮革做成的粗劣鞋底上在粗劣的靴子上，這種靴子幾乎在一個月的時間以內就會穿破了。很可能這個鞋匠沒有選舉權；但是他也不致於被他的雇主解雇，或者是被迫罷工來反對工資的降低，而他的兒子也偷了隔壁麵包店的東西來充飢因而被關在監獄里，或者是他的女兒為了要買新衣服而流為娼妓。我們先輩人那種簡單的工業制度就是如此。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是注定要改變的。赫伯特·斯賓塞先生說，一切的進步都是分化過程；而且這種不容忽視的分化過程在安靜的鼾睡着的英國開始出現了。大約在1760年一大部分花布印染業已經從倫敦轉移到勞動在當時是比較低廉的蘭開夏。當時物價

曾一度跌落，并且对于用亚麻作经线和棉花作纬线织成的印花布的需求增加了。于是曼彻斯特的商人们便不向织布者那里收买粗纹棉布和印花布，而开始用原料供给织布者，并且在工作完成的时候按每匹布支付给织布者以一定的工价。这样，曼彻斯特商人就成为法国人所谓的企业家了；而且独立的织布者开始变成工资劳动者。工资铁律和失业的问题也开始隐约地显露了头角。因为织布者本人既受雇于商人，便只好把自己的一部分工作转给别人，而且往往发生了包织者从他的雇主那里得来的钱比他自己不能不付给他所雇用的那些纺织者的工钱还要少。瓦茨先生 (Mr. Watts) 在他的关于棉花的那篇文章(见大英百科全书)里说道：“可是，他不敢抱怨”，而且也不敢过于降低纺纱人的工价，以免他的织布机闲置起来。在这种简单的制度下，借助于单线纺车可能生产亚麻线的数量是很少的。其总数不曾超过我们现在五万个纺锭机器所能生产的数量。因为一个人现在能够管理二千个纺锭，我们将会看到二十五个人使用机器，就能生产老兰开夏的整个人口所能生产的数量。1750年，棉纺织工业方面第一个重要的发明是柏里人克伊 (Kay) 所发明的飞梭。1760年，梳棉过程有了某些改进。1767年，哈格利夫 (Hargreaves) 发明了珍妮纺纱机，而且这种机器装用了八十一个纺锭。天才的哈格利夫有充分机会去对“失业”问题作实际的研究，因为纺纱者们中，有些曾因为新的发明而被迫失业，他们闯进哈格利夫的房子捣毁了他的机器。不久以后，有一种普遍的高潮遍及于工业区的兰开夏；贫穷的手工劳动者，他们具有预见性的灵魂显然是在梦想着即将发生的事情，他们巡行全国打碎了他们所能找到的梳棉机和纺纱机。可是分化过程的发展，并没有注意到兰开夏的工人们捣毁机器的情况。1769年，阿克莱特 (Arkwright) 设计了纺纱机，而且获得了用滚轮来纺纱的专利权。1755

年，波尔頓人克倫普頓 (Crompton) 發明了珍妮驟机，能紡品質最精細的經綫。1792年，曼徹斯特人波拉德 (Pollard) 以及格拉斯哥人凱利 (Kelley) 对这种机器作了进一步的改良。1785年在諾丁汗夏地方蒸汽第一次被应用来紡織棉花。1784年，肯特人卡特萊特牧师 (Rev. E. Cartwright) 發明了动力紡織机，并于1787年8月完成了他的發明，取得了专利。于是，在这方面，大約在四十年的时期以內，一系列机器的發明，使生产方法有了絕對的改变，生产量大大地增加；并且把从前一家人在单独的一間小房子的四壁之內所进行的生产劳动分給上百的人去做；这些人在从前每人只能担任复杂过程当中一个簡單工作；也把成千上万的人在新的环境之下聚集在一起；使以往隔絕的地区与遙远的外国地方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并且使紡或織的工作和完成这种工作的各种工具的所有权分离。独立的織布者已經消失了；說得更正确一点，他遭受到像变形虫那样的一个分裂的过程，但与这种分裂过程所不同之处在于：形虫是由于分裂产生了其他类似的变形虫，而織布者却被分化成为一种叫做雇主和另一种叫做雇員或“劳动人手”的人。把这种“劳动人手”增加到数千人，我們就有了工場或工厂，它們分为若干部門，每一部門有它工作的特殊細节；每一工作細节又同其余細节互相配合。每一架机器把前一架机器所留下的工作担負起来，在联合产品中都尽了它的一份力量。把雇主們联合起来，大大的增加了他們的資本；解除了国境綫上足以妨碍他們活动的障碍，并解除了他們个人监督的职务，于是我們就有了股份公司的資本家。

讓我們暫停片刻来考虑一下当这些工業过程正在繼續进行时那些器囂塵上的震撼世界的事件吧。加拿大的征服，克萊弗 (Clive) 在印度的胜利，七年的战争，美洲殖民地叛变的成功，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的編制，弗里德利克大帝 (Frederic The Great) 的功

續，彼特 (Pitt's) 的取得政权，华盛顿 (Washington's) 的当选总统，巴士的監獄的攻克，米拉波 (Mirabeau) 的死，旧的法国君主政体即“国民議會”的衰落——所有这些震动世界的事件都与英国的工業革命是同时代的产物；而工業革命在它的前途力量方面比上述所有这些事件却更为重要。

我願意談一談另一个巨大的工業，那就是鐵工業的發展。从前，大部分鐵矿是在英国南部开采的，主要是在現在純然成为一个农業地区的苏塞克斯 (Sussex)。十八世紀中叶，重要的鐵矿工業已經开始集中在柯尔不魯克带尔 (Coalbrookdale) 附近；关于采鐵方面許多工業上的变革首先就在这里被采用，从1766年到1784年，关于制造軋鉄的方法以及把鑄鉄变为熟鉄的方法都有所改进。1784年發明了混合熔鉄爐；給予制造工業巨大的刺激。1828年热气鼓風代替了冷气鼓風；1842年納斯曼斯 (Nasmyth) 發明了气錘；1856年比士麦 (Bessemer) 炼鋼法取得了专利。以后我們就有了西門子 (Siemens) 的熔鉄爐和煤气制造机，用机器来代替手工炼鉄，由于發明了在大的压力下鑄造鋼鉄以及比士麦法的改进的結果，使过去几年来的鋼鉄产量，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方面大大地增加起来。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們都看出了一系列的現象，而所有这些現象都趋向于大的壟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大大地受到刺激；在竞争的冲突中所必需的巨大資本使只有大的生产者才能生存下去；于是我們得到这样一种純效果，那就是：一方面是明显地意味着資本的集中，而另一方面是工人对机器的依附。

我曾提到的制鞋工業在过去是一种純粹的手工業。1809年，把外底和鞋跟上到內底上的简单的机器生产过程开始被采用。从那时候起相繼而来的各种發明就把这种純粹的手工業改变为世界上最机械化的各种工業中的一种。1881年在美国至少有五千万双

靴子和鞋子是用不來克馬克機器縫制的。今天，一個到制鞋工廠參觀的人會看見下列的各種機器：切皮機、皮鞋底的壓滾機、鞋底和鞋跟的壓型機、上釘機和折縫機、鞋筒或鞋面的嵌綫機、鞋面折疊機、鑽眼機、保色機、修剪或刨皮機、洗刷機、磨光機、打印機、切釘機以及釘了敲平機。參觀了所有這些過程怎樣地在一個巨大的工廠裏進行，就有助於使我們充分地理解到上一世紀那種陳舊的個人工業幾乎就像第三世紀產的乳齒象一樣地被消滅。也理解到今天制鞋廠裏的一個工人可以說就如同龐大而複雜體系中的一架機器一樣。大工業已經代替了小工業；這種大工業，牽涉到資本的集中，因而小生產者們的競爭是沒有希望的和不可能。因此無產階級中生存競爭的強度增加使工資不斷地下降，失業的限界不斷擴大。小生產者必須變為經理、工頭、工人這一類的工資勞動者。假若一個單獨的鞋匠或織布者去和一個機器世界工業軍隊相抗衡，那么就無異於想用弓箭米和格林炮相對抗，或者用亨利五世的軍隊渡海去在阿經柯特（Agincourt）^①戰場獲得勝利的那種小型輕舟，來與裝有炸彈的鋼甲巡洋艦對抗一樣。工業革命不限於一種工業或一個地方，它在英國得到充分的發展，它也正在擴張到一切國家的工業中去。誠然，克魯泡特金親王（Prince Kropotkin）在1888年十月號十九世紀雜誌的一篇有趣味的論文里提醒了我們，目前仍舊有許多小的工業在城市和鄉村里存在。無疑的，情況就是如此；在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可能存在許多小行業，而且有些甚至於還可以發達起來，這並不是不可能的。但是，小規模的工業最發達的國家，大多數也正是機器工業很少因而也就是資本主義不很發達的國家。克魯泡特金說，沒有一個國家像俄國一樣有

① 1415年亨利五世對法國作戰取得的勝利。——譯者

那么多的小生产者。确实，按照人口和资源的比例来说，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俄国那样，既缺乏机器，又缺乏有效率的铁路系统。另一方面，按照人口和资源的比例来说，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广泛地使用机器；而且也就是美国，它的小规模工业最少。就像克鲁泡特金所承认的一样，许多小规模工业仍旧是由那些被机器所代替了的、抛掷在劳动市场上而遭受失业的人们来经营的，或者说是由那些因为在乡下找不到工作而流浪到大城市特别是流浪到伦敦的人们来经营的。这些人的绝大多数，充其量只不过获得一种艰难和不安定的生活而已；并且从没有售卖任何东西流浪于市郊的街道和公路上的小贩和叫卖商人们的数目来判断，我们可以想像到为数众多的人们是无法生活的。

此外，当克鲁泡特金提到血汗榨取者的牺牲者们以及提到在乡间小规模地生产布匹或家俱，并把它们卖给大城市里的商人等等的那些人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只要人工比机器便宜的时候，资本家才雇用人工。资本家用不用机器就要以机器赚不赚钱为转移，就如像人们在上议院血汗制度调查委员会上提出的证据所说明的那样，假若资本家能以支付一种仅供糊口的工资来无限度地使用失业的劳动者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这样做。虽然我承认有许多小规模工业是存在的，而且有些将永久继续存在下去，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类事实会违背了这样一种一般性的论点，那就是：未来的趋向是用机器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这种生产会涉及到人的聚集和资本的集中，以及因而这样地牵涉到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

甚至于农业（那旧式的个人主义认为是安全的行业），也受到资本主义的支配。达柯塔和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些大农场（每一个农场能包括许多哩长的麦田），大部分为股份公司所拥有，并且是

用专门机器耕种的。正是在这些农场上机器代替了人工，以及在采矿业中的危机引起了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地区发生失业现象，因而促使亨利·乔治先生(Mr. Henry George)写成他的那部“进步与贫困”。如像抵押农场的统计数字所指出的那样，这些巨大的农场和纽约及芝加哥的小麦“垄断”组织以及美国的大铁路公司联合起来，使密士失必河流域的许多小农受到摧残。当美国农民们愈来愈被迫与日益增长的用世界上最低廉劳动生产的印度小麦相竞争的时候，我们会想到他们的前途并不是很光明的。

为了要清楚地看出机器工业的巨大发展及因而产生的工人被机器代替，人们必须依靠数字来说明，仅凭词藻的修饰是无用的。下列的数字引自美国，因为美国公开的统计数字比英国的好得多，既完全而且也容易得到。下述事实是从1886年华盛顿美国劳工统计局的第一次年报里得来的。这个局长研究了工业危机，发现危机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在股份制度之下机器工业巨大发展的缘故，他逐行逐业的举例，证明了人工是怎样的被机器所代替。他说，在木材业中，十二个劳动者使用波克尔式(Bucker)机器就可以刨一万二千块木板。以同样数目的人用手劳动，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刨二千五百块。在造纸业中，现在一架用来把纸弄干和切开的机器，由四个男子和六个女子操纵就可以做从前一百个人所做的工作，而且还做得更好。在制造壁纸工业中最明显的例证，说明了机器代替人工的比例是一比一百。在南加洛里纳州的磷酸盐矿中，十个人用机器就能完成一百个人在同一时间内不用机器所完成的工作。在胶靴和胶鞋的制造业中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工被机器所代替。在南加洛里纳州的陶瓷业中用机器生产的产量，是十倍于用体力劳动的产量。在锯子制造业中，有经验的人认为在五个人中便有三个人被机器所代替。在纺织业中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力，

在纖維業中有百分之九十的人力被机器所代替。一个巨大的肥皂制造公司仔细地估计过在它的工厂里的机器代替人力达百分之五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葡萄酒工业中采用了一种压碎机，用这种机器一个人在一天之内就可以压碎八十吨葡萄，并且把葡萄梗去掉，这种工作相当于以前需要八个人做的工作。在毛織品工业中现代化机器已经在梳毛部门中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的体力劳动。在紡毛部门减少了百分之五十。在織毛部门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在某些紡紗部门中，机器代替人工的比例相当于一比一百。1886年整个美国的机器等于三百五十万匹馬力。假若要雇人来做的话，那么就需要有二千一百万人才能生产出全国实际的总产品，而美国实际雇用的人数是四百万。要完成美国1886年用动力机器所完成的工作以及在铁路上的运输工作便需要有一亿七千二百五十万人口的工人。而美国在1886年的实际人口尚不满六千万人，或者是比上述人口三分之一多一点。

劳工统计局长对这些很值得注意的统计数字评论说：“由于机器的采用以及繼之而起的再分工所引起明显的恶果，自然是在很大的限度内，由获得的利益抵销了；但是下面这种说法是正确的，而且是难以反驳的，那就是这种动力机器的采用和推广对这些工业化的国家所需的新奇的工业状况来说，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主要原因之一。”这种“新奇的工业状况”的结果之一以1885年的美国来说，失业人数据不同的估计是从一百万至二百万人，这些人当中有一些像流浪者所处的情况，为美国报纸提供了许多悲惨而带有讽刺性的报道题材。这里所提出的这类事实指出一个新的国家会很快地降低到这样一种状况，这种状况一方面是资本的集中，而另一方面则是工人的失业，这样的一个国家较之几世纪以来充满了贫困和压迫的古老的欧洲国家只不过是稍好一点而已。附

帶講來，這些事實也說明了移民的這種手段，假若不是用來作為掩飾而是用來作為解決問題的辦法，便不過是一個騙局罷了。這種推斷似乎是不可反駁的。正如像資本家們很快地發現採用新式機器可以賺錢一樣，人數不斷增加的無產階級的無所求助，也會很快地在增加。“失業”問題就像斯芬克斯 (Sphinx) ① 神一樣，假若我們不能解答她的謎語她就會把我們吞食掉。

蘭開夏驚人的擴張也許可以提供從個體工業改變到集體工業的最好例証。在被人稱為陰森的“地獄般巢穴”的蘭開夏城鎮中的紗廠是一個奇怪的地方，裡面充滿了使人眼花撩亂的各種機器。在這裡是有一架所謂展棉機的機器，在五十六小時之內就可以把一萬五千磅棉花展開。那裡有一架精紡機，它能使紡錠每分鐘旋轉六千到七千次。這裡有一個人，借兩個搓捻器的幫助，把紗的斷頭接起，就可以管理二千個紡錠。其中顯然被分別使用的機器還有：開棉機、打棉機和卷棉機、牽引機、初紡機、中紡機、梳洗機、精紡機、自動紡棉機和手搖紡棉機、雙折機及雙折紡棉機或捻綫機。用這些設備獲得了下列的結果：從 1792 年到 1800 年的八年之內，從美國輸出到蘭開夏的棉花數量曾經由十三萬八千磅增加到一千八百萬磅。1801 年蘭開夏由美國獲得八萬四千包棉花；1876 年，從美國獲得二百〇七萬五千包；而在 1875 年來自印度的棉花卻只有一萬四千包，可是到 1876 年除了來自巴西的棉花大大的增加，以及從埃及新進口三十三萬二千包而外，又從印度運來七十七萬五千包。1805 年，在不來克拍恩 (Blackburn) 市場上全年銷售了一百萬匹花布；這被認為是很大的一批買賣。在 1884 年，根據埃理遜的棉花貿易年鑒 (Ellison's Annual Review of the Cotton

① 斯芬克斯是希臘獅身女而有翼的怪物，常出謎給過路行人，如果不能解答，就遭吞食。——譯者

Trade),除了为国内消费所生产的大量布匹而外,还出口了四十四亿一千七百万碼布匹。1875年,在兰开夏共有棉紡織厂二千六百五十五个代替了在一世紀以前使用手織机的那些农村小手工业,现在已有三千七百五十一万五千七百七十二个紡錠和四十六万三千一百一十八架动力織布机;生产了重达十亿八千八百八十九万磅及九千五百四十四万七千英鎊的紗和布。我們同样也看到通过机器的使用生产成本是怎样的降低了。在1790年,要紡在技术上称之为100号紗每磅的成本是四先令;而1826年紡这样的一磅紗便只是六便士半。100号紗的售价在1786年是三十八先令;而在1793年这种紗的售价降低到十五先令一便士,1803年降低到八先令四便士,1876年降低到二先令六便士。随上述各种成本降低而来的便是生产方面节约,而节约本身又有賴于机器种类的增加;这件事情轉过来又需要愈来愈大的資本,这又必然引起資本的集中并且打垮了不能使用机器或不能在竞争中获得利潤的小企业。

瓦茨先生(Mr. Watts)在推测外来的竞争会破坏兰开夏工业优势的可能性时,在大英百科全书中写道:“这种事件也許足以引起我們的讀者們的注意那就是在商品成本中現在用手工劳动的那一小部分,由于采用了新机器代替人工,甚至于連这一小部分也每天在减少。”^①瓦茨先生是以一个专家的身份来写的;因而人們就不得不从他的金石之言中得出这样的論断,那就是:資本的集中与壟断的形成必然繼續發展;而且“失業問題”也必定要强加在兰开夏的身上。我們不是专家的人們只敢以極大的怀疑来批評瓦茨先生的乐观論調;但是應該指出:印度的資本家可以使用到世界上最低廉的劳动、現在也可以完全不受法律的限制来使用劳动。印度

^① 參閱大英百科全书关于棉花这一条。

和俄国亚細亚部分的棉花是在生长棉花的地区附近加以紡織的，在这些地区里又可以容易地控制广大的亚洲市場。因此，人們發覺孟买的紗厂引起了兰开夏某些憂慮是毫不足奇的。并且似乎没有什么合理的依据去假定这种憂慮将会減輕；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断的竞争将会使兰开夏大量采用机器或是降低工資以求减低生产成本。这两种办法当中的任何一种都会迫使社会問題加深。

現在我接着来討論这样一个社会問題，这个社会問題由于新的工業情况实际上已經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加以注意。

資本主义的不受約束的力量，很迅速地使英国大部分地区陷入悲慘的状况。慈善界的吉来拜斯夫人們 (Mrs. Jellybys) 忙于用宗教册子和毯子来救济波利奥波拉格哈 (Borioboola Gha) 地方的人，这两种物件当中的任何一种对于那些被救济的人是絲毫沒有用处的。但是波利奥波拉格哈和文明的英国比較起来还算是一个地上的天堂。在太平洋群島上沒有一个野蛮人，不比英国工業区域的大部分工人吃得更好，更幸福，更健康，而且更滿足。人們發現兒童們大量被运到英国北部，在那里，他們被安置在毗邻工厂的畜欄般的房子里，从事于工作日很长的劳动。这种工作是日以繼夜毫無間断地在进行；因此据說床鋪就从来不曾冷却过，因为当一組兒童休息的时候另外一組就去織布，所以为全体童工們准备的床鋪只有人数的一半。結果流行性热病盛行。医务檢查員們报告說，在迅速蔓延中的疾病有骨骼的畸形病、佝僂病、心脏病、脫腸病、發育不良病、哮喘病以及兒童和青年人的未老先衰。这里所說的兒童和青年們被制造商們毫無节制的加以使用。在同一時間内兰开夏製造業的利潤便达到百分之数百甚至于达到百分之数千。在矿井里存在着最可怕的情况，在里面衣不蔽体的男女兒童們每天在一起工作十六小时。在恶臭的通道里会看見七岁、六岁、甚至于四岁

的儿童在工作。妇女们有很多甚至是怀着孕的被雇用在井下从事最吃力的劳动。生了小孩以后，不到一个星期，产妇又回到充满硫酸气息的环境里工作。在某些地方的妇女们忍受着高热整天站在水深及膝的地方做工。有一个妇女在被检查的时候说：她整天都是全身遍湿，并且整天拖曳煤车，拖得肉皮脱落。妇女和六岁的青年儿童用带子系在他们的腰上，并且用铁链在他们的两腿之间把煤车系好用四肢沿着矿井的通道匍匐爬行。苏格兰的一个调查委员报导说：他“发现六岁的一个女孩，运送六十磅重的煤每天照例要走很长的十四踮路程。沿着这条道路每走一踮所爬的高度，远远地超过了圣保罗教堂的高度”。一个十七岁的女孩说：每天“二十四小时”的这种工作“我已经屡次地做过了”。工头们比之野兽还残忍；儿童们常常被弄得残废了，有时甚且遭受无辜的杀害。酗酒自然是普遍的现象。短命的和凶暴的人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了。据说“这些男工人们就像得了肝病的羊一样的多而且快，每一代刚过五十岁就死亡了”。这就是在英国资本家们无限制统治之下的工业化的英国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毫无疑问英国贫困的普遍比较奴隶时期美国南部各州的贫困更为厉害。奴隶就是财产——往往是有价值的财产；而且对于这些奴隶主来说，他们不值得把奴隶虐待到不能成为财富生产者的地步。可是假若“自由”的英国人受到了伤或被杀害的时候，那么，资本家就可以不花一文的找到几千工人来接替他的地位。

假若这种情况继续下去的话，我们就会不折不扣地回复到那种互相残杀的自然状态去了。在这种情况下之下的人类我们可以用丁尼生(Tennyson)的诗句来加以描述：

“荒古的龙蛇，

在泥沼中互相撕扯的，
比起他来要等于好听的音乐。”

虽然在商業制度下培养起来的英国政治家們不願意去干涉資本家的壟斷，但是这种壟斷显然必須加以限制。自由放任的全盛时代在上一世紀之末就已經結束；但是一个巨大的組織在它开始崩潰以前往往看起来好像是很美好的。第一个劳动法就是1802年的“道德与健康条例”(The Morals and Health Act)，这个条例規定雇主必須按照規定供給童工膳宿。部分由于欧文的努力1819年通过了紡紗工厂条例，把童工在工厂工作的年齡加以限制；并且把这些童工的劳动時間限制在每周七十二小时以內。对于一个應該在草場上玩耍的九岁兒童來說居然就要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可是这种情况比起以前來說已經是有了巨大的改善。随后在1825年为急进主义的政治家約翰康·霍布豪斯爵士(Sir John Cam Hobhouse)所通过的一个条例，把星期六工作時間縮短了。工人們，急进主义者們，托利党人們和慈善家們参加了保守党国会議員里查·奧斯勒先生(Mr. Richard Oastler)所領導的、爭取通过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的运动。在1831年霍布豪斯提出一个法案企圖縮短紡織工業的工作時間，但他为英国北部的制造商們击败了。輝格党的領導人阿尔若普(Althorp)虽然帮助击败了霍布豪斯，但自己却不得不提出一个禁止青年人在夜間工作的办法，并且把每星期的工作時間縮短为六十九小时。同时紗厂主們要是在違背法律的时候就沒有充当审判的資格。这一个办法被普列能博士(Dr. E. Von Plener)在他的那本有用的手册中認為是第一个真正的工厂条例。繼奧斯勒之后为工厂职工的利益而斗争的領袖托瑪斯·沙德勒先生(Mr. Thomas Sadler)1832年提出了

一个限制十八岁以下的人的劳动时间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遭到了代表制造商利益的議員們的强烈反对而把它撤銷。

繼承沙德勒領導地位的杰出人物是亞胥黎勛爵 (Lord Ashley) 他的更著名的名字是遐福慈宝利勳爵。他为工人階級所做的事情也許比我們这个时代任何其他著名人物所做的要多。在这里，讓我暫停片刻指出急進主義者和大部分的托利黨人怎樣站在職工方面來反對輝格黨人。擔任官職的保守黨人以及製造商階層。後一階層有時被認為是自由主義者。我認為實際的情況是這一個階層在相當時期內奪取了和守住了自由主義的堡壘，而且使自由主義符合於它的政策和利益。假若這階層的人們具有吉伊·谷爾德先生 (Mr. Jay Gould) 帶有玩世的坦率的話，那麼，當法制委員會詢問他們說：“谷爾德先生，你是屬於那個黨派？”的時候，他們就會仿效谷爾德先生的回答：“噢，在共和黨的選區里我是共和黨人，在民主黨的選區我是民主黨人；可是我永遠是依利 (Erie) 鐵路公司的人。”亞胥黎勳爵的勁敵之一就是蘭開夏一個資本家的兒子羅伯特·庇爾爵士 (Sir Robert Peel)；但是最厲害的和最頑強的勁敵却是約翰·布萊特先生 (Mr. John Bright)。亞胥黎勳爵提出了一個包括成年人在內的十小時工作日的提案。阿爾索普勳爵雖然拒絕把成年人包括在這個提案內，但是在 1833 年他自己却提議通過了一個條例禁止十八歲以下的人在夜間工作；規定了兒童的最高工作時數每星期為四十八小時，而青年人則為六十九小時，也規定每天入學的時間和一年之內一定的假日。當這個條例把 1831 年的那個條例廢除以後，製造商們在審判工廠中的案件時又有資格出庭陪審；雖然有許多違犯條例的事件為工廠視查員所告發，但在許多情況下違犯者却安然逃脫了。1840 年亞胥黎勳爵促使國會注意在礦山中被雇用的青年人的狀況；並由於他的努力通過了

第一个矿业条例，这一条例禁止妇女及十岁以下的男孩在井下工作。于是在1844年底尔通过了统一的“工厂条例”。亚胥黎勋爵提議把青年人的工作時間限制为每天十小时；但是庇尔就用假若这个提案得到通过他就要辞职的威胁来打消这个提案。按照1844年的工場条例，兒童的工作時間限制为每天六小时半；并規定在每个星期的头五天之内他們每天必須有三小时的上學時間。次年即1845年，亞胥黎勋爵获得了禁止妇女夜間工作提案的通过。1847年費尔登先生 (Mr. Field) 提出了一个把所有妇女和青年人每天的工作限制在十一小时以内，并自1848年5月以后限制在十小时以内的提案。庇尔和工厂主們加以反对；但是这个提案却被通过了。1850年的条例更进一步縮短了妇女和青年人法定的工作日；并且1853年的条例禁止了雇用兒童在上午六点鐘以前或下午六点鐘以后工作。1860年漂染工厂受到了工厂法的限制。在1870年产生了对这个工業部門进一步的立法。1860年通过了矿业条例，而且1862年的关于安全和通風方面規定更为严格。1861—1864年通过了关于花边工業的条例，1863年通过了关于面包厂的条例，1864年通过了烟囪清扫業和陶器業的条例。1867年通过了关于小規模商業和手工業的工場管理条例，并且在1871年通过了一个统一的工厂和工場条例。現在有效的工厂及工場条例仍然是1878年的那个条例，它是按照1883年的条例对某些工業方面的規定修正过的。1872及1887年进一步又通过了矿区管理条例。

上述这种关于破坏了自由放任制度的立法的簡略而不完全的考查，已經足够达到我的目的来証明：(1) 由于必要的生产工具是归私人所有，像十八世紀的改良者們所理解的那种个人自由必定愈来愈受到限制，也就是說，在我們現存的經濟条件下，个人自由主

义是不可能的和荒唐無稽的。(2)甚至对个人自由抱有敌意的或漠不关心的政治家們也不能不承認这一点。(3)不受限制的资本主义,如同封建制度或奴隶制度一样,必然趋于使用殘酷与压迫的手段。(4)补救方法在事实上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質的,它包括着集体对个人貪婪的防止以及为了劳动群众的利益而把資本的利潤加以削減。以上这四个論点几乎是不可以反駁的。

在上述各种条件之下英国工业的巨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英国取得了广大的国外市場,在这个市場上,它长期以来沒有遇到任何巨大的勁敌。十八世紀英国所参加的大多数战争,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直到最后人們才了解到这些战争乃是一些旨在为取得商業霸权的战争。斯圖亚特王朝君主专制政体的推翻,是直接和富裕的中产階級特别是倫敦的商人取得政权有关。1688年的革命标志着中产階級已經确然取得政权,而这个階級發見了輝格党是实现他們目的的有力工具。拥护教会和国王的老托利党豪紳們与拥护輝格党和汉諾文王朝的新的商業权貴之間的区别曾被司各脫爵士(Sir Walter Scott)在他的“罗伯罗依”(Rob Roy)这本书里詳尽的描写过。英格兰銀行和苏格兰銀行以及国債乃是新的商業統治者們賜給他們的子孙們幸福的一部分。他們也开創了政治腐敗的新紀元,这种政治腐敗往往是以資本家在国家中的統治地位相密切連系,就如同我們在法国、在美国以及英国各个殖民地所看見的一样。列庫先生說^①：“有錢階級牺牲乡紳的利益去取得政权的願望是政治腐敗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之一,这种政治上的腐敗很快地蔓延到整个議會政治的制度里面去了。”残余的貴族政治往往易于和新的財閥政治結成联盟;并且正是这二者的結合

^① “十八世紀史”,第一卷,第202頁。

在十八世紀時統治了英國，尤其是決定了它的對外政策。這種對外政策的目的是在於獲得國外市場以及擴張英國的貿易。拿破侖嘲笑英國為“商人之國”不是不應該的。加拿大的征服在克利文和瓦林·哈斯丁斯 (Warren Hastings)^① (後者是一個大資本家集團的代理人，從他在印度的事業看來，很足以證明了他的那個階級的種種致富方法) 領導下殖民政策以及為了英國資本家們的利益而對愛爾蘭製造業進行卑鄙的破壞，所有這些都是同一計劃中的各個組成部分。這個政策在彼特所發動的對法國大革命的戰爭中成功地實現了。這個大革命本身主要是由於貧窮所引起的。不僅是法國農民變成了乞丐般地貧困；而且從英國帶來的一些新的機器使許多人遭到失業。因而蜂涌地圍攻並占領巴士的獄的人們主要就是失業工人^②。對法國大革命給以猛烈反對的主要就是彼特。他的動機是什麼呢？奧地利和普魯士君主們、僑居的貴族們、低能的英國國王以及托利黨的英國主教們也許十分相信英國是為了神壇和王位而作戰。但是彼特却不是這樣地妄想。雖然他從他的有名的父親那里得到一種英國的真正的自豪，可是他所奉為神聖的東西卻是賬簿和錢櫃。他不是頑固的迷信家；甚至於他在劍橋大學肄業的時候，是一個接近亞當斯密的学生；他以一個改革家的身份，開始了他的社會生活，並且在 1801 年因為拒絕屈服於喬治三世無知的成見而犧牲了他的官職。這充分地證明了他最初對法國大革命並無劇烈的反感。經過了一段很長的時期以後他才參加了擁護君主專制的聯盟。但他本質上是一個偉大的資產階級政治家，是瓦爾波爾 (Walpole) 的政治上的繼承人，是庇爾的政治上的前

① 瓦林·哈斯丁 (1732—1818 年) 是東印度公司的職員，於 1773 到 1785 年任印度第一任總督。——譯者

② 見莫爾斯·斯梯芬的“法國革命史”第一卷中所含有的例證。

輩，他看到法国的胜利可能严重地威胁英国的社会組織，而且假若英国的主要勁敌被打倒的話，那么英国商人階級就可以統治全世界的商業。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他巧妙地把食利金者、承包人、地主、金融家以及商人都密切的联合起来；并且他說服了国内比較單純的那些人，使他們以为他是为了宗教和道德的神聖理由而斗争。他把反抗他的那些人关进牢獄或运往海外。当长期的战争結束了以后，工人階級陷入了悲慘的境地，虽然在那些日子里也有詭辯的政治家們企圖向人民証明从来沒有过像那个令人心滿意足的情况。1823年当兰开夏的織工們向国会請求調查他們痛苦的时候，一位尊貴的議員（他即使吃得并不聰明但却吃得很丰富）曾大胆地宣称，織工們比資本家的情况还好——这种說法与我們最近听到的不無相似之处。事实上，地主們通过保护政策和高額地租，資本家們通过巨大的利潤，都富有到“超过了貪婪的梦想”的程度，但是这两个階級之間的冲突时候已經到来；这种冲突就是众所周知的自由貿易的論战。保护政策不再为制造商們所需要，他們在無限制的可以获得原料的世界市場上取得了霸权，而且在機器和工業組織方面的發展远远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从另一方面說，地主階級則絕對依靠保护政策，因为用进口关税的办法把英国在經濟上与外界隔絕，这样就保持了高昂的食物的价格，这种价格就是高額農業地租的来源。恰恰相反，資本家的利益则是与英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之間的相互交往有着密切关系的；推翻这种交往的障碍的时间已經到来了。因此自由貿易的胜利在經濟上就意味着旧的純粹的地主階級的沒落和資本主义的胜利。資產階級在最初并不見得比地主們更为爱好自由貿易。自由貿易破坏了資產階級在爱尔兰的毛紡織業的利益，而且假若不是由于麻塞諸色州和維吉尼亚州的抵抗成功的话，那么，自由貿易就会窒息了英国在美洲殖民

地的貿易。資產階級只要保護政策是適合于自己目的的時候就是保護主義者。但是當資產階級需要為它的織機獲得廉價的原料，以及為它的工人們獲得廉價麵包的時候；也就是當它不再擔心國外的競爭者以及它自己在印度、在北美洲、在太平洋已經建立起來穩固的基礎的時候；於是它就要求自由貿易。列庫先生說：“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任何政治上的欺騙再比反對谷物條例運動時期所散布的這樣一種意見所獲得的成功更為希奇的了，這種意見就是：在保護政策和自由貿易的問題上，從事製造業的階級特別是無偏見的和開明的，而占有土地的階級則特別是自私的和無知的。事情確乎是這樣：在本世紀內當人口對於生活資料的壓力使得谷物條例的改變成為不可避免的時候，從事製造業的階級就把他們自己置于自由貿易運動的先鋒地位從而他們就必然獲得主要的利益，而把整個的風險和犧牲轉嫁到別人的身上。但這樣一種情況也同樣是真實的，那就是：在英國幾乎沒有一個製造業不是用最狹隘的和最富於妒嫉的壟斷精神來受到保護；並且在法國大革命以後，商人階級權勢的日益增長是再沒有比英國商法中所規定的各種多樣性的限制表現得更為清楚的了。”^①

英國製造商凭借着在一個世代的時間以內陸續制定的一系列的法規獲得了廉價的原料；而且機器已經是這樣的發展以致於產量大大地增加。英國把它的紡織品和金屬品運送到世界各國；而且國內的製造商們支持的正是這個政策，這個政策使得他們能夠獲得商品的市場或者取得在他們的工廠里進行加工的原料。柯布登主義(Cobdenism)^② 占了上風；而人們也愈來愈從商業的觀點看

^① “十八世紀史”，第四卷，第450頁。

^② 里查·柯布登(1804—1865年)英國議員主張自由貿易為反對谷物條例的領導人。——譯者

待国家。所谓的“曼彻斯特学派”，主要是一个主张和平的集团，因为战争削弱了作为商业基础的那种信心。但是这种对于和平原则的拥护并没有阻止了柯布登自己去宣布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作为保障商业的一种工具。它也没有妨碍曼彻斯特在1857年支持巴尔门斯吞(Palmerston)的对中国蛮横无礼的政策，或是1882年对埃及同样蛮横的侵略；因为二者都被认为是有助于曼彻斯特的贸易。为了要把英国的贸易扩张到新的市场上去，英国曾经对中国、埃及、苏丹、缅甸及西藏发动过战争。德国用谨慎的步伐追随了英国。冒险家们如像伊明(Emin)、斯汤列(Stanley)和巴特罗特(Bartelott)的被雇用，以制止奴隶买卖为借口，用甜酒和手枪为工具去“开发”非洲，以便使它受到文雅的文化影响。法国也不甘落后，为了巴黎投机商人的利益去开发安南(Tonquin)。不愿是非的意大利政府为了欧洲有钱人的利益，企图把全国的注意力从国内的革新转到对非洲的探险。也许最伟大的这一步尚未到来，那就是在广大的中国市场上的这一步。为了这一步，英国、美国、法国以及德国必然相互竞争。为此，他们早已采用了试探性的步骤。由于英国对缅甸的并吞及其在西藏的活动，她已经更加接近中国。由于法国取得安南，事实上她已经和中国发生实际的接触。美国或许会用一种适当地降低关税的办法，并且把它的商品从大西洋沿岸各个港口通过巴拿马运河或从不久的将来就要开通的尼加拉瓜运河送到太平洋沿岸各地来和英国竞争。总而言之，全面开发亚洲和非洲的机构在迅速发展中。整个地球很快就会成为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

在我们的时代里运输和交通的发展，有力地帮助了殖民地的占有；的确，没有交通和运输的发展这就不可能。假若不是由于铁路和电报把地球缩小仅仅依赖机器生产是不可能产生今天的这种

經濟結果的。由于通过这些發明，資產階級才会变成世界性的，才会打破了各种旧的习惯，破坏了地方性的各种社团；只要是利之所在，它絕不饒过美丽的或神聖的东西。它把各个地方的生活条件加以同化，造成了普遍的統一性，这种統一性造成了我們在現代生活里所感到的許多無聊的事情。

因为英国是第一个發展机器工業的国家，所以它也是第一个發展铁路和組成一支强有力的商業艦队的国家。通过后者，英国掌握了全世界約百分之六十四的海上運輸業。在六十年之內地球上大約建筑了三十五万哩的鐵路。当火車穿过那些野蛮部族所居住的遙远的非洲地区并且穿过了死了的和被埋藏了的文化遺迹的中央亞細亞荒蕪地区的时候；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間已經有好几条軌道連接起来。这个現代世界上最巨大的动力，主要是操縱在壟斷組織的手里，这些壟斷組織也如像制造工業中所看到的一样，有同样的必要的集中趋势，不过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而已。首先建筑的用来連接相距不远的城鎮的那些短小的鐵路，陸續同其他的鐵路連接起来；就如同原来全长不到二十哩的司脫克頓到达林頓的鐵路一样，我們今天有了一条偉大的与資本雄厚的东北鐵路(North Eastern Railway)。在美国，单独的一个公司控制着七千多哩的鐵路；在本世紀之末，我們也許真正能够看到偉大的西伯利亞到太平洋鐵路的出現。与鐵路的情況相同，汽船方面的情形也是如此。像古納德(Cunard)、奧利安特(Orient)和密沙吉利斯(Messageries)馬利太姆斯(Maritimes)这类巨型的商船它們是为世界性的資本所拥有，而且承担着不仅是一个国家的，甚至于不仅是一个大陆的，而是整个世界的運輸和貿易。这就是在我們这个时代里由于采用資本主义制度而产生的在分配方式方面的巨大革命。

現在我們必須考慮“資本家”这个名詞所表示的意思是什么。

假若这个名词在半世纪以前就被人使用的話，那么，它可能就是用来指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就大体而论也许是不讲道理的，目的卑劣的，缺乏教养的，而且很少有纯良的同情心和想像力。然而在那时候它是社会上一个有用的阶级，它完成了一些真正的任务。现代哲学的主导思想认为每一种制度在它的發展过程中，本身都有一种把自己取消的趋向。每一个制度的特殊的机能都是由于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也就是说，它的發展是取决于社会上所發生的种种吸引力量或种种排斥力量，而且这种發展会产生某种趋于否定原来机能的作用。因此，在早期欧洲亚利安民族的社会里，一个領袖在战争或議會中發展成为一个真正具有职权的国王，其过程就如像在英国可以清楚的追溯得到的一样，那就是：發展成为像威廉一世那样一个战时人民的領袖或是像亨利一世那样一个强有力的統治者或政治家。至于說像这类人是残忍抑或邪恶，是無关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些人在一个野蛮而混乱的社会里的确完成了某些不可缺少的任务。但是王权本身的实施引起了反抗；因而会产生联合起来的集团的武装反抗；最后会导致王权的推翻，推翻的方法或者是把国王毁灭或者是剥夺他的一切实权并把他降为一个仅供裝飾的傀儡。这种原来被認為是仁慈的王权現在却变为是暴虐的了：因此愈来愈需要对这种王权加以限制直到最后把它消灭为止。我們就看見了他虽然是一个君主但沒有权統治的奇怪的矛盾現象。历史充分地証明人們不仅仅是因为統治者們是邪恶的和腐朽的而起来把他們推翻。像路易十五 (Louis XV) 那样的国王安然地死在床上，而沉默的威廉国王 (William the Silent) 或林肯 (Lincoln) 却成为暗杀的牺牲品，这些都是历史上可怕的諷刺的一部分。人們所不能长期容忍的事物不是成为前进的障碍便是成为那些無用之物。

現在，假若我們把這些觀念应用到資本家的進化方面去，那麼我們將會看到什麼呢？資本家本來是一個企業家，是一個在他的企業里辛勤工作的經理人，而且接受經濟學家所說的“管理企業的工資”(Wages of Superintendence)。只要資本家仍舊處于上述地位的話，他可能在各方面受到約束和控制，但是他卻不會被取消。他的“管理企業的工資”往往確乎是太多了；但是他完成了實際的任務；而且在社會還沒有準備好來接管那些任務以前，也不可能把他取消。可是如像英國的國王一樣，企業家還得要受到前面所提到的工場立法的約束，因為他的權力引起了他的工人們的許多痛苦。但是現在資本家正在迅速地變為毫無用處了。當他發見了和他的本階級的其他資本家們合併成一個巨大的企業比較容易和更為合理的時候，他就放棄了管理人的職位，而委任一個領薪水的經理替他來執行職務，因而他就變成了一個純然的租金或利息的收入者。他所收到的租金或利息是人們為了使用壟斷權而支付給他的，這種壟斷權並不是由於他個人的努力，而是由於很多人以他們的共同的努力所創造出來的。

經理和資本家的區分是不可避免的。這種區分是由於機器工業所引起資本主義進化過程的一部分。就如同競爭在生產中引起了浪費一樣，競爭同樣在資本家當中也引起了利潤的削減。要防止這種利潤的削減，把資本集中起來是必要的，這樣一來，大資本家就能夠用低於那些資本比他小的競爭者們所能標售的任何價格來推銷商品，這些商品是大資本家用機器生產和用代售網來銷售的，這些機器和代售網在最初又是由於需費很大並非任何單獨的競爭者所能購買或插足的，現在為了要籌集這種數目龐大的資本，就需要幾個資本家來籌集股款；因此出現了股份公司(或 Compagnie Anonyme)。通過這種新的資本主義的組織，一個在英國的人就

可以持有安梯波德斯(Antipodes)地方一个企业的股票,而这个企业是在他从来不曾到过也从来不想去参观的地方,因此这个企业也是他不能用任何方法去“管理”的。他和其他的股东们可以雇用 一个经理并指示他精打细算的方法。这个经理的任务是要为他的雇主们赚得最大可能的红利,假若他不这样做,他就会被解雇。旧日工人与雇主之间那种私人关系是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不过是金钱关系而已。要获得高额的红利,这个经理将使工资降低。假若工资的降低遭到反抗,那么就会发生罢工或关厂的情况。这个经理可能向国外雇入廉价的劳工;而且如果工人们用威胁或有组织的来加以抵制,那么国家(工人们帮助着维持的国家)的武装力量会被用来反对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工人们只得屈服。这就是今天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的一幅恰如其份的图画,也就是说,资本家已经变成懒惰的红利收入者。正统派政治经济学的格言,如像有资格被认为是权威的已故的凯尔尼斯教授(Professor Cairnes)所说的那样是:

“基于道德和经济的理由,我们坚持这样一点是重要的,那就是:一个懒惰的富有阶级的存在,不会产生任何一种公共利益。他们的祖先以及其他的人们为他们的利益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当它用作资本的时候,无疑地有助于维持工业;但是他们在奢侈和懒惰中所消耗的并不是资本,而且除了有助于维持他们那种对社会无益的生活而外,无助于任何事情。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得到租金和利息,因为那是写在股票上的;但是让他们像雄蜂在蜂窝里一样保持他们适当的地位,在他们毫无贡献的盛餐上饱吃一顿吧。”^①

现代资本家不仅是无用的而且肯定地具有破坏性这一事实,

^① “政治经济学要义”,第32页。

可以从去年二月七号倫敦和西南鐵路公司所开的股东大会上得到很好的証明。有三个股东竭力主張減低三等車費。大会主席指出,这样減价,可能就要減低紅利的这样一个显明的事实,并問,大会这种事实是否就是他們所希望的。当然,他所得到的回答是“不,不!”的一連串呼声;于是所有減低車費的言論也就終止。这就是一个显而易見的例子,說明了公众的利益是由于資本家的利益而受到牺牲(还可以引証成百上千的这类的例子)。

人人都知道股份資本主义 (Joint-Stock Capitalism) 是在迅速地擴張。根据白萊斯先生 (Mr. Bryce) 所說,在美国,股份公司的財富估計达全国财产总值的四分之一^①。在英国每一种行業从釀酒業、銀行及紗厂直到制造甜食的自动机器業都不断地落到股份資本家的手中,而且必定会这样繼續下去。二十年以前誰会想到像居因尼斯 (Guinness) 那样的一个釀酒厂或者是像格林,米尔斯公司 (Glyn, Mills, and Co.) 这样的一个銀号会变成一个股份公司呢? 今天我們知道它就是这样。資本主义不断变成非个人的和世界性的了。并且控制生产的联合企業愈来愈大,数目却愈来愈少。巴林 (Barings) 公司逐漸占有了南非鑽石产地; 少数的公司控制了宾文法尼亚州全部無烟煤的生产。我們当中的每一个人完全可以“自由”的去和这些巨大的联合公司“竞争”,就如同摩納哥公国 (Principality of Monaco) 一样,假若他的利益受到法国的威胁,它就可以“自由”的去和法国作战。自由的形式尽管存在,但是壟断使它变为毫無用处的了。与地球上的原料远离的现代国家,就不能担保它的公民享有竞争的自由; 然而正是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才产生了資本主义。因此我們看出資本主义已丧失了它的初期

① “美国共和国”,第三章,第 421 頁。

的原則——就是它不能否定自己的存在。在考虑资本主义的最近各种形式以前，我們要在這裡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合作运动方面去，这也許是适宜的，这种合作运动就某方面而言至少是与股份公司的發展密切相关的。

合作运动在英国有着社会主义的根源；因为它的創始人是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就如同賽利格曼先生(Mr. Seligman)在政治学季刊中很中肯地說道：“欧文是英国合作运动的創始人，这一事实今天往往为那些流利地使用合作运动这个名辞而又完全不能鑒別它的真正意义的人們所忽略”。欧文自己曾公开自論他的偉大的最終目标是“土地共有”，并且他希望“把土地公有制与所有人們無限制的合作結合起来，以达到人类生活的一切目的”。因此把合作运动和罗伯特·欧文——这个純潔而神聖的名字——結合在一起是重要的，因为有很多人認为这种合作运动是从1844年罗琪达尔先鋒社(Rochdale Pioneers)^①开始的。实际上，罗琪达尔运动开始了股份商店的办法，但这种办法是与欧文的目的極不相同的。

在莫里士和金斯萊領導下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合作运动。金斯萊說，“在世界上一切狹隘的，自滿的，偽善的，無政府主义的和無神論的計劃中，柯伯登(Cobden)和布莱特(Bright)的計劃是最坏的一种。”現代正統派經濟学的結論在金斯萊的手里可算是倒遭到了惡运。他說：“要是有人告訴我們說，我們只應該耐心地靜靜地在大自然之下，讓它把我們冻死、毀灭、餓死、并

^① 这是罗琪达尔城的二十八名織匠为欧文的合作原理所感动，于1844年，每人每星期各湊三便士的公共基金，开始在批發店裏买面粉及白糖等，借此省出零卖商所賺的盈余。这个社后来擴張范围，竟成一个大公司，在这个社鼓舞之下，合作运动傳播于不列顛群島全部，不但組成購買物品和分配物品的合作社，还有制造商品合作社，甚至有合作的銀行。——譯者

以臭气把我们窒死的这样一种态度去考察大自然；那么，無論他以化学家抑或是政治经济学家自称，他都是一个傻子。”这些基督教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們深深地感觉到工人們的痛苦与貧困以及財主們的自私的無情。金斯萊說，“每一个喝醉了的士兵被鞭打的时候，財神 (Mammon) 总是發出仁慈的尖銳的声音；但是他却用男人的肉和妇女的皮膚，用伤風敗俗、流行病、野蛮行为、和絕望等来修飾他的大衣和裝飾他的腿子；于是对他的裁縫的賬单得意地發笑。这些人都是伪君子”，他們滤除了小虫，却吞食了駱駝是見小不見大的人。^① 所有这些话都是很可贊美的；但是廉价的衣服并不是单单地或主要地为財主們制造，而且也是为群众，为穷人們制造的。这种情况可悲的諷刺的一部分就是絕大多数人不得不穿廉价衣服或者一絲不挂。但是由于英国的气候和英国的品格高尚的太太們联合起来完全否決了史前时期那种單純的一絲不挂的形式，因而为了有衣服可穿，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必須默許工人階級的另一部分人去流血流汗。

“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是莫里士和金斯萊的机关報紙，关于經濟問題的真正性質表現了極大的無知。它忽視了歐文的“土地共有”的原則，而且以为人們共同在一起工作和用公平的价格售賣品質優良的物品，就可以消除貧困，可是在社会里每一个工人仍然把他的經濟地租的貢賦付給生产工具的所有者們。因此他們所主張的这种运动是沒有經濟基础的；当合乎道德的理想主义脫离了这种运动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仅仅是为了追求“分配”和零售股份商店是不足为奇的。关于零售股份商店的經濟优点，罗伯特·索麦斯先生 (Mr. Robert Somers) 曾經在“大英百科全書”(合作条)中作

^① 見聖經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第24节。——譯者

了如下的概說：“它們售賣有益的商品，立刻兌付，每一股股本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紅利，而且對非社員按照他們的購買總值分給紅利”。像零售股份商店一樣，合作也是一個有用而便宜的分配方法，這種方法無疑的已使很多的人得到好處；但是，認為合作可以解決社會的經濟問題的這樣想法，乃是一種“空想”，這就是英格萊猛博士 (Dr. J. K. Ingram) 所告訴我們的現代經濟學家^①的意見。誠然，只要看一看英國每一千人中有九百六十一個到死的時候還沒有家俱、投資、或價值三百鎊的動產的事實^②，就可以想見合作運動的後果。現在，合作運動初期的那種熱潮已經消失，從經濟方面說，合作社不過是巨大的股份企業附屬的一部分。從倫理上講合作的效果往往是有疑問的。在合作的主要根據地的蘭開夏，人們可以看到合作的信徒們當中有一種狹隘的自私心，這種自私心是貝斯瓦特 (Bays water) 地方的最有教養的人們都不能超過的。合作運動的理想並不是要把整個工人階級地位提高，而只是把這個階級中的某些人提高到中產階級的地位。假若合作運動的鼓吹者們會取消他們的主張，而且僅只宣稱：(1) 他們的方法在較低的中產階級和較高的工人階級當中是一個有用而經濟的分配方法；(2) 通過合作社的代理機構工人們能夠學到組織與管理的重要作用，從而他們的主張就會被人們自由地承認。但是假若他們更前進一步的話，他們超越一切的雄心就不能實現。照目前合作社的發展速度和資本家的股份公司的發展速度比較起來，必須要經過好幾世代的時光合作社才能給人們任何深刻或普遍的印象。在目前，除非經濟地租從現在接受經濟地租這個階級轉到創造經濟地租的群眾手里，否則合作社社員們如像我們其餘的人一樣，必須向

① “大英百科全書”中之“政治經濟學”條。

② 莫爾哈爾 (Mulhall)：“統計辭典”。

地主和財主納貢。但是對於合作運動值得注意的事情乃是它本身的存在證明了我們在這裡所堅持說明的工業和資本的集中過程，仍舊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偉大的社會因素。因為合作社用社會分配的方式來代替個人，可以避免了許多僱用店員的小商店不可避免的互相競爭（這些小商店的主人沒有一個能夠過相當好的生活）的浪費。所以合作運動很好的證明了目前這一時代的經濟進化。

現在我要講一講資本主義的近代形式，也就是“聯合壟斷組織”（ring）和“托拉斯”（Trust）資本主義取消了它自己的自由競爭的原則，成為一個賣主，資本家們聯合起來代替競爭。當資本家把勞動當作一種商品買進的時候，他是按競爭的原則來進行這種購買的。資本主義無限地擴大了的勞動市場，使得資本家能夠去這樣做；因為他知道工人必須出賣自己的勞動以取得生活資料。因此，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在最廉價的勞動市場上購買勞力。但是當他轉過來作為一個賣者面對着公眾的時候，他就完全不顧競爭的原則，而且使自己成為一個堅固的聯合組織。在開始時，人們認為是必要的競爭，假若不加以限制，那麼最後人們會被發現它是浪費的和帶有毀滅性的，它需要在廣告方面花出一大筆費用；它需要僱用很多的非生產性的勞力；它會產生無限制地降低物價的趨向；它引起供給過剩和危機，而且使商業的活動成為冒險的和不穩定的。為了要避免這些後果，互相競爭的人們或企業同意組成一個嚴密的聯合組織來維持物價，增加利潤，取消無用的勞工，減少風險，並控制產量。這就是一種“聯合壟斷組織”，因此也是一種公司的聯合。“聯合壟斷組織”和“贏利均分同盟”（Pools）的典型例子在美國可以找到，在那裡，資本家的活動比之在歐洲更不受限制和更為大膽；而且在那裡幾乎所有聰明和活動的人們都會被吸引到那些支配美國生活的各種商業行業中去。

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篤信者們常常告訴我們，当限制被解除以后，自由竞争就会解决所有的问题。物价会下跌，而且給予“消費者”以不可描述的滿足；适者就能生存；至于其他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是难以逆料的，而且实际上这也是沒有关系的。無疑地，“消費者”由于生产的增加和物价的下降会大大的得到好处；但是現在那里有“自由竞争”呢？几乎只有那些在破产边缘上發抖的小商店的主人是在互相竞争着的，只有工人們才是在互相竞争获得工作，以謀求生活。联合企业在不断地并吞商業。下面就是几个关于“联合壟断組織”的例証。

几年前在美国一些过去相互竞争的企業組成了一个鋼軌联合企業。这个联合企業發現了鋼軌制造得太多而且价格在削減。于是，这种联合企業的工厂之一——如聖路易 (St. Louis) 的凡尔干 (Vulcan) 工厂——关闭了，而且有好几年沒有开工；同时，这个工厂的厂主們因不再制造鋼軌而每年从这个联合企業中的其他工厂那里获得四十万美元的津貼。这就是凡尔干工厂的厂主們如何去获得他們的“管理工資”的方法。不用說，这个厂里不工作的工人們是得不到工資的。他們流落街头去默想美国独立的宣言所賜与他們的“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此外，再用宾夕法尼亚州的無烟煤产地的情况为例。这个产地約占二十七万畝面积，它的股东是利丁煤鉄公司、里亥河流域鉄路公司、得萊威尔、拉卡瓦納和西部鉄路公司、得萊威尔和哈得孙鉄路公司、宾夕法尼亚鉄路公司、宾夕法尼亚煤炭公司以及这些公司的分支机构。这些一般通称为“煤炭大王”的富有的老板們，虽然同意把煤炭的批發价格絕對地固定下来，但往往在冬季来临以前就把煤炭的价格大大的提高。在美国無烟煤生产中，像自由貿易或公开竞争这类事情，是从來沒有听到过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

在美国組成各种联合企业的公司有西部的面粉厂主、紐約造冰商、波士頓的魚商、下水管的制造商、銅矿开采商、电灯制造商以及陶器、玻璃、箍鉄、子彈、鋤釘、糖果、淀粉、糖、罐頭水果、葡萄糖、椅子、蒸气爐、石灰、橡胶、螺絲釘、鏈子、收割机、別針、食盐、五金器材、鉛字、銅管、絲和电綫等的制造商。在这些行业中，生产和銷售的自由曾經暂时局部地或全部地被摧毁。当工人采用了抵制手段的时候，美国的商人是很憤怒的；但是当他的利益引导他走向这条路的时候，他也会立即去抵制别人。1882年，做压有花口的洋鉄器的制造者们組成了一个联合壟断，把那些用低于規定价格出售洋鉄器的会员們开除出去，甚至不容許这个联合壟断里的任何一个人把东西卖给犯規者。以上这些事实是从亨利得·罗意得先生(Mr. Henry D. Lloyd)^①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引用过来的，他曾以丰富的知識和观察力考察过資本家的联合企业。下面的一段話是我从同一篇文章中引用来的：

“1882年四月一日，当我们中其他的人都沉迷在愚人节輕率的狂欢里的时候，四十一个平头釘制造商发现了平头釘生产得太多，就用三百万美元作为資本，組成了波士頓的中央制造公司。在这种联合企业中的各个工厂一星期內大約开工三天。当这个联合企业在几星期以前把一个匹茲堡的競争者的工厂收买光而把这个競争者击败的时候，制造商們并没有把这个工厂的机器拆卸。这些不冒烟的烟囱和閑置的机器必然会阻碍新来者开办另一个平头釘工厂，或者即使新来者不受到其他阻碍的話，开工来也是要失败的。这个联合企业最初的成就是把平头釘的价格提高了两倍。”再引用罗意得先生的話：

^① “工業巨子”，載于“北美洲評論”，1884年，六月号。

“制造寿衣和棺材的人們，組成了一個組織严密的公司，通称为全国装殮業联合会，并且去年在芝加哥举行了年会。他們秘密地把棺材价格提高，把棺材的数目减少，以免死亡率受到阻碍。”

从棺材業到餅干業是研究資本主义方法中一个簡短的步骤：

“西部餅干、面包業联合会二月里在芝加哥开了会，除討論其他問題之外还討論到‘不可饒恕的减价制度’（那就是不可饒恕的自由竞争制度，而这种制度当資本家在購買劳力时却告訴我們說它是拯救我們的制度）。他們首先举办一个宴会。經過他們的‘欢乐与消遣’以后，这些縱飲狂欢的人們，正如亚当斯密所描写的一样，轉过来討論‘一些提高价格的妙計’。报纸上报道，‘价格单被完滿地訂出来后，于是他們就休会了’。”

1875年在火險公司中，由于以前的一个贏利均分同盟的瓦解而爆發了一場剧烈的竞争；这个竞争七年之內仅仅在紐約城就使他們損失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因而在1882年他們組織了一个布满全国的新的联合企業，这个联合企業被罗意得先生称为是富有的、团结的和强大的企業。虽然倫敦的火險公司并不存在贏利均分同盟或联合壟断組織，可是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說，它們彼此之間有一种共同的諒解。最著名的联合企業之一就是早在1888年引起全世界注意的那个偉大的銅業辛迪加（Copper Syndicate）。这个辛迪加是由一些法国投机商在1887年十月所組成的，而且在它存在的十八个月当中，它在全世界各个市場上把銅价維持在全然是任意規定的水平之上。这个辛迪加的头子是尤金·賽克利坦先生（M. Eugène Secrétan），他是五金公司（The Société des Métaux）的總經理，这个公司是全世界炼銅的大买主和貿易商。这个辛迪加的代理人把所有可以看到的和市面出售的銅都把它买来，他們投机的結果致使倫敦市場上銅价由不到40鎊一吨而漲到80

多鎊一吨，美国苏比利湖(Lake Superior)銅价从每磅 $10\frac{1}{2}$ 分漲到 $17\frac{3}{4}$ 分。賽克利坦先生(Secretan)告訴一家倫敦的杂志社說他的計劃純粹是慈善性質的。他說：“我們的唯一目的，就是使每一个采矿业者、商人、以及制造商应该因他从事工作而得到公平的報酬。”感謝賽克利坦先生的仁慈，銅、錫、鉛、和鋅的价格大大地高漲；有好几个行業或多或少地癱瘓了；在法国，大量的工人遭受失業。我們不要認為登福特·罗吉魯先生(M. Denfert Rochereau)的自杀，是壟斷世界的銅矿第一个企圖的失敗——这种失敗是由于錯誤地估計了在提高銅的价格的刺激之下，銅的供給会增長的緣故——登福特·罗吉魯先生的自杀並沒有保證这种企圖不会再一次地出現。恰恰相反，他的自杀表明了人們应当怎样安全地去壟斷世界的銅業。那些不幸的投机者們所囤積的金屬，到現在为止仍然被擱置起来，一直到目前还没有拿到市場上去賣，因为銅价还不正常。康乃尔大学的依·本杰明·安德魯斯先生(Mr. E. Benjamin Andrews)說：“沒有發生任何事情足以指出一个如像美孚油托拉斯(Standard oil Trust)那样組織起来的并具有活力及殘忍手段的銅托拉斯会遭受失敗。”^①

那些以为自由貿易加上私有财产就会解决一切經濟問題的個人主义者，自然要对这些联合壟斷組織感到惊异，这些联合壟斷組織推翻了个人主义者所有的粗淺的經濟学概念；而且他会很不合邏輯的去要求制定法律来防止他所产生的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假想前提。注意到这样的情况是很有趣的，那就是：那些主張他們所謂的自恃和自助的人，当自恃和自助超过了純粹是武斷的限度时，他們就是第一批要求国家来干与那种自助干与那种私有企業的自

^① “經濟学季刊”，1889年，7月。

然結果的人。按照一般的商業原理，为什么一个銅的辛迪加不能掌握全世界所有的銅呢？这不过是适者生存的道理罢了。从最有才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們看来，他們全部論据是依照达尔文的学說而来的。然而当銅業辛迪加或“煤炭大王”生存下来的时候，他們引起了人們反对他們的猛烈的和从商業观点說来是最不合情理的反感。就如像犯了罪后会带来死亡一样，資本主义当它成熟的时候也同样会带来壟断。并且人們可能与明白的事实去發生爭執就如同他們埋怨荆棘不結葡萄，或者埋怨紫苑不結無花果一样。

資本主义成长的故事还未講完呢。“联合壟断組織”正被一种更为严密的称为“托拉斯”的組織所代替。虽然在英国像食盐联合公司 (Salt Union) 那样巨大的联合組織正在迅速兴起，然而我們仍然需要到美国去了解所謂的“托拉斯”是什么一回事。关于托拉斯問題最詳細的报导要算紐約州州議会的立法委员会的报告，这个委员会是被指定来調查新的联合企業的。經過調查的托拉斯如下：食糖、牛乳、橡胶、棉子油、信封、电梯、油布、美孚油、屠宰、玻璃、以及家俱等行業。这个委员会把托拉斯定义为是一种联合企業，它“通过股票持有者們和其他的公司或股票持有者們的联合，組成各种公司合并起来的股份公司，否定了这些公司的权力，把所有的权力集中在理事們的手中从而消灭竞争，限制貿易”。这些托拉斯的一般目的和作用被說成是“控制一般商品和必需品的供給；消灭竞争；規定品質；并且以远远超过于商品和必需品的公平合理的价格把商品卖给消費者”。我們沒有必要来討論所有这些托拉斯，因为它们都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我只选择其中的一两个，特别是巨大的美孚油托拉斯和棉子油托拉斯来加以叙述。

美孚油托拉斯可算是世界唯一最大的壟断企業，依照已提出的証据，它的全部包括各种利息在內的价值估計約为二千九百六

十萬鎊。在上述紐約州議會委員會的報告里，這個托拉斯被認為是“在美洲大陸上最活動的而且可能是最巨大的一個金錢力量。它的勢力伸張到美國的每一個州，甚至於在偏僻的鄉村里也有它的勢力；它的煉油廠的產品，幾乎在世界上每一個港口都可以找到市場。”這個巨大壟斷企業的起源是一個在商店里當會計的洛克菲勒和他的做搬運夫的朋友用借來的錢，購買了克利弗蘭（Cleveland）附近一個小的石油提煉廠開始的。洛克菲勒認識了一個有錢的威士忌酒商人，這個酒商墊出了款項並把他的女婿弗拉格勒（Flagler）安插在這個煉油廠里。洛克菲勒的信條是被人們描述為：“他說，在生意場中，談不上什麼情感；在買賣中沒有什麼友誼；假若他能把他生意上的勁敵陷入絕境的話，那麼，他就要使他永遠陷於絕境”。這樣的一個人顯然是適合於做一個壟斷企業的創始者：他是一個自助的英雄；因為他使自己得到一切所能染指的東西。第二個煉油廠是建立在俄亥俄州，在紐約又有另外的一個倉庫開業。這個煉油工廠壯大了，並且合併為美孚油公司。這個公司被人控告說它會機智的用金錢收買俄亥俄州和賓夕法尼亞州的州議會的議員而獲得特殊立法保護。它與一些主要鐵路公司締結協議獲得了特價的運費。它建立了新的煉油廠並且在賓夕法尼亞州買了新的石油產地；它的資本增加了；每年所做的買賣非常之大。不久以後，這個公司就控制了每一條運輸的道路；操縱了國內所有最大的煉油廠；因而它無論在購買原料或者在運輸產品方面都把它的一個競爭者排擠掉。雖然名義上是有區別而實際上是在同一批人控制之下的一些新的石油公司在新澤西州、俄亥俄州、西維吉尼亞州及其他各州中成立起來了。據說這個壟斷組織通過了向它具有很大的政治勢力的俄亥俄州的議會進行賄賂，就把它的一個主要股東選入了美國參議院。這些策略就是人所共知

的“煤油政治”。当然所有的这些卑鄙行为是通过代表人来进行的，公司的董事们则装得完全是清白的。1882年所有的美孚油公司合并成为美孚油托拉斯^①。股东们把股票交给协议之下产生的由九个人组成的理事会，从理事会换取了代替原来股票的证券，这个托拉斯的代表们和各个炼油厂的股东们共同来对各个炼油厂进行了估价，并按估价的金额来发给证券。这样一来，几个分散的公司就合并为一个庞大的企业，由九个人（他们拥有大多数的股票）来控制，这个企业几乎垄断了美国所有的石油产地，控制了立法机构的选举，它与铁道业及航运业组成一个坚固的同盟，精确地决定了应该生产和精炼多少加侖油，并且精确地把每一加侖油的价格计算到应该是几分几厘。这个托拉斯1887年发放了合百分之十的现金红利，此外还对四年合计的证券付予百分之二十的股票。这些理事们除了握有大量股票之外，还得到了五千镑的年薪。这种联合企业的经济效果是什么呢？这个托拉斯并没有像参议院托拉斯调查委员会所控告的那样提高了价格。相反地，在1877—1887年十年当中价格却是不断的减低。油的消耗量也大大地增加了。由于解雇了不必要的劳动者和大规模地改进机器使营业费和生产费大大地降低了；托拉斯所有的输油管代替了五千七百个马队和一万一千四百个处理石油的工人。因此，关于这个托拉斯，我们可以说，虽然用来建立它的各种手段在道德上是有疑问的、甚至是不好的，这些手段的政治效果是带有灾害性的，可是，除了由于机器发达的结果而解雇了不必要的劳动者因而形成了一个失业阶级之外，这些手段的经济效果是有益的。

棉子油托拉斯是两三年前在阿干萨州 (State of Arkansas)^②

① 参议院托拉斯调查委员会的报告，第419页。

② 同上报告第233页，及以下各页。

組織起來的。以前有七十個以上不同的公司彼此之間互相競爭，結果遭受到嚴重的損失。他們的工廠是比較小的并裝置着不完備的機器，他們高興合併；那些不願意合併的都被迫關閉。這七十個公司的絕大多數同意合併的股東們，都把他們的股票交給理事會換回了票面價值為一百美元的若干證券。各個工廠每月送一個報告給托拉斯；假若某一個工廠的職員們不按照規定的辦法售貨，他們就會被托拉斯解雇。^① 據某一個証人宣稱，這個托拉斯的目的是防止破產、改善方法、尋求市場、發展企業和賺取利潤。它的經濟效果是機器代替了勞力和形成生產方面的巨大節約。更多的棉子油偶爾是賣給法國和意大利的買主們，這些買主用少許的橄欖油摻進棉子油之後仍舊把它輸出到美國和英國，這兩個國家里心地坦白的群眾就把它當做純淨的通斯康 (Tuscan) 橄欖油來購買——這是一個有關國際貿易道德的有趣的例証。對於那些認為貿易是“自由的”和認為競爭占統治地位的人們來說，牛奶托拉斯和屠宰托拉斯的考查對他們應該是一種啓發。牛奶交易所的董事們於 1885 年 4 月 29 日在紐約開了會并一致決議：

“從五月一日開始直到另有規定以前由干草和優良谷類喂養的牛所產的牛奶，其市價每夸脫為 2 ½ 分，用酒糟、葡萄糖及玉米糊的渣滓喂養的牛所生產的牛奶，其市價則每夸脫為 2 分。”^②

綿羊和小羊屠戶互濟會 (The Sheep and Lamb Butcher's Mutual Benefit Association) 的一個代表作証說，這個因體的會員們同意：他們只從綿羊經紀人聯合會 (The Sheep Brokers' Association) 購買綿羊和小牛，違犯這個規定則每購一頭綿羊或小牛罰款壹角五分。絕對的獨裁專制以及這種規定所包含着的監視制度

① 參議院托拉斯調查委員會的報告，第 244 頁。

② 同上報告第 305 頁。

是明显的。下面是綿羊經紀人联合会所公布的一个文件：

本会理事会准許西蒙·斯特拉斯 (Simon Strauss) 在紐約市場上購買綿羊和小羊，但不得向外人購買，如反違則每头罰款一角五分。

秘書里查·吐宴 (Richard S. Tobin)

1888年1月9日于紐約^①

这个綿羊經紀人联合会有时也放寬了尺度。这个会在1887年11月5日的記錄上說：

“第二号文件，約翰·海萊 (John Healey) 要求給与購買少数綿羊和小羊而無須向本会經紀人繳納每头一角五分罰款的特权。已同意办理。”

这不是在哈利發 (Caliphs) ^② 統治之下巴格达的記錄，而是共和党的紐約州 (The Republican State of New York) 的記錄呵！人們往往滔滔不絕地談論社会主义有专制的危險性；可是对于今天实际上存在的专制人們又将怎样解釋呢？

这种托拉斯的考查究竟說明了什么呢？这种考查說明了：假定容許原料的私人占有 (从这种原料里，憑借科学赋予我們的各种新發明，財富便可以大規模地創造出来)，那么其最后的效果必定是现代民主国家当作是它的首要原則的自由本身的破坏。貿易的自由，交換产品的自由，人們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購買东西的自由，按照別人所享受的同样的運費和同样的条件，并且不受主权之内的主权 (imperium in imperio) 的限制，而运输自己貨物的自由等等，当然是民主主义的基本原則。可是壟断組織，把每一个民主主义原則不是加以限制就是加以否定。因此，資本主义显然是

① 參議院托拉斯調查委員会的报告，第497頁。

② 哈利發是中近东伊斯兰教国国王的称号。——譯者

与我們現在所了解的民主主义相矛盾的。資本主义的發展和民主主义的發展不能够不受限制地齐头并进。更正确的說，它們好比在同一条鉄路上从不同方向互相駛近的两輛火車。这两个敌对力量之間的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民主主义和威胁着它的新的資本家联合企業，二者都是进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产物。因此，我們不得不考虑这样一个問題，那就是：联合壟断企業，辛迪加，或托拉斯是否能够消灭或者是否應該加以消灭的問題。我們可以指出：这些联合企業，乃是最經濟的和最有效的組織生产和交換的方法。我們可以防止浪費，鼓励采用机器，解雇無用的劳动者，促进运输，稳定物价，并提高利潤——也就是說，从資本家的观点看来，联合企業是实现貿易目的的最好方法。現在，社会主义的反对者們說，沒有具有这种企業心的資本家我們就不能生活。他們說，資本家“提供就業的机会”。好罢，假若我們需要資本家的話，那么，显然我們必須要付給他以代价。假若資本家天然地壟断了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那种机能，那么，社会必須接受他所提出来的各种条件。簡單的說，这些条件就是資本家所有权下面的大規模的联合企業。用这种方法資本家就能够最好的来組織企業；就是說，假若我們不讓他这样做，那么，他根本就不会替我們去做任何事情。从資本家的观点來說，这就是他所采取的公正立場；并且这种立場把托拉斯的个人主义反对者置于一种尷尬的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反对托拉斯的人必須屈服于托拉斯或者把資本家抛弃，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就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社会主义对資本家的答复是：社会可以沒有他而仍然生存，正如同現在的社会不需要有奴隶主或封建領主也可以生存一样，而这二者在从前都被認為是社会的幸福，甚至是社会存在本身所不可缺少的。当社会为自己組織企業的时候，它能够

用足以使资本家发挥能力的任何报酬的标准来雇用资本家，——他们是熟练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可是那些纯粹的红利获得者必须不再容许把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而必须从事有益的劳动来谋生，就正如其他以及更善良的人们所做的一样。

可以说，社会实现上述转变的时机尚未成熟，现在它确实是不成熟的。民主主义国家的形式尚未达到完善的境地，经济进化也还没有普遍地得到充分的发展，甚至在英国也是如此，至于那些较不发达的欧洲国家，那就更不用说了。很多的工作还须通过教育知识分子和发展一种更高尚的公德心这二者来完成。但是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似乎是正在迅速地走向这样的一条死路，以致必须采取某些非常巨大而明确的扩张集体权力的措施。这种扩张一方面牵涉到劳动时间的普遍的减少，而另一方面牵涉到要把社会所创造出来的一部分社会价值，由社会加以吸收的尝试。说到城市土地的价值，我们可以预料到各个地方民主当局会要以他们所认为便当的任何方法，来获得这种价值，并且把它用在人民身上。

至于资本的巨大联合企业，国家可以采取下述三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行动。国家可以禁止和解散这些巨大的联合企业；国家可以向它们征税并控制它们；国家可以接收它们并管理它们。不论采取那一种办法，社会主义的理论本身在事实上被承认了；因为国家所采取的上述任何一种办法，都是一个自白，那就是对工业资本实行集体控制是好的。假若第一种办法被采用的话，那么肯定就是采取了一种显然是倒退的政策，也就是克利弗兰德先生 (Mr. Cleveland) 所谓的“资本的共产主义” (Communism of Capital) 的恐慌政策，也就是倒退到“自由竞争”的混乱状态的政策，以及把联合企业所得到的毫无疑问的利益加以取消的政策。这样一种政策意味着强迫地限制财产的获得，而财产的获得正是对个人主义者

最心爱的事情。假若現在显然是依靠联合起来才能获得财产的那些权力受到了限制的話，那么，对于“勤劳的动机” (incentive to industry)，对于“忍欲的报酬” (reward of abstinence)，以及一切其他陈腐的、在辯論中往往被应用的成語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假若辛迪加或托拉斯是代表資本主义的合法后果的話——假若它在安排貿易和防止無限制竞争的破坏性的浪費方面是必要的話，那么，国家对資本家說：“你必須使用你获得财产的特权，直到竞争很可能毀灭你的那种地步；但是到达这一点你就應該停止。一旦你和你的朋友們联合起来防止浪費、調节生产与分配、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我們將以各种麻煩的規章来防碍你或限制你”，这样說是多么荒唐的啊！对于这些話也許可以假定資本家会回答說：“在这种严重的冒險情况下我不能尽我的社会責任。因为我将永远不会有安全——甚至对于我被公認有权取得报酬的這一回事，我也将永远是沒有十分把握的。假若你宣布了我可以自由的去获得生产财富的原料之后你又故意这样来限制我的行动——假若你强迫我停止在純粹是你任意規定的界限上，那么，我必須告訴你，我不打算在这样一些条件之下来从事企業。”难道資本家不会說类似的話嗎？而且从他的观点看来，难道他不是正确的嗎？

假若可以立刻做得到的話，那么我們就会把資本家的話信以为真；我們就應該剝夺必要的生产工具；把这些生产工具作为公共财产，并把他們所創造的价值归社会所有。可是人类在最后采取正确的行动方向以前，往往要試尽愚笨的人所能够提出的各种办法。所以我認為，大概某些無效力的征稅方法和公众对联合企業的控制，事实上也就会被采取。这类的立法在某些方面会大大地限制个人自由，会产生更多的摩擦，而且也許可能妨碍生产；直到經過一系列的实验以后人們将会發現什么才是整个社会去获

得他所生产的财富的最合理的方式。但是無論如何个人主义或者任何在本質上是自由放任的东西，都会成为泡影。

最后，什么是有头脑的經濟学家和真正的社会改革家在目前所應該采取的政策呢？他們的座右銘必定是“不留下一点痕迹”。对于各种欺騙性的建議他們必定提出坚决的反抗。这些建議会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那就是：这些建議企圖恢复社会所从以产生的某些經濟条件。一个欺騙性的建議会希望恢复到古老的英国的小农制度；另一个欺騙性的建議会談些关于“公平貿易”的廢話；第三个欺騙性建議会提出“三亩地和一条牛”的朴素的农村生活；而第四个欺騙性的建議認為解救之法在于取消长子繼承权和限定繼承权并把兴旺的劳动者“种植”在土地上——好像劳动者們会像树木一样在那里生长起来。那些理解經濟危机的人們就会热心地去支持任何微小的改革使社会向前推进一步；可是他們不能支持任何一种使社会倒退到过去的努力。他們可能在把我們从合作共和国（The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分离开来的深渊上面，帮助建設一座新的桥梁；但是他們却永远不能把折回到个人主义去的古老的倒塌了的建筑物修复起来。所以当政权从無用的有产階級軟弱的手里落下来的时候，真正的改革家不是企圖来廢除資本家不自覺地为人民所做的那些事情，而是宁願按照一种真正的工業民主主义（a true industry democracy）的原則来教育人民和組織人民，并把政权拿了起来。用这种方法階級斗争連同它所具有的貪婪、仇恨与浪費就会宣告終結，因而惠特曼（Whitman）在他的“說理之歌”（Song of the Exposition）中所暗示的那种生活就可以达到了；那首歌的一段說道：

“实际的、和平的生活；人民的生活。生活在和平里的人民，举止昂然，容光煥發——他們安全，而且傲然自得。”

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

塞德尼·奥利维尔

作为社会主义评论第四章的本文，其论点可以姑且说成是一种企图，目的在于借助于被人们普遍接受，并为实证的伦理科学的成果所支持的判断道德的准则来替社会主义的理想加以辩护。前几篇文章已经明白地指出了，我们所讨论的社会主义是夏菲尔(Schaeffle)下过定义的那种狭义的社会主义^①，其目的在于“以集体资本代替私人资本；那就是说，用建立在社会全体成员把所有生产工具当作集体财产这样一个基础上的生产方法，来从事全国性工作的合作组织”。我们不把社会主义当作一种宗教来讨论，也不把它当作有关性或家庭的问题来讨论。我们自始至终主要是把它当作一种财产形式，当作一个供给人类社会生存所必需的物质需要的工业制度来加以讨论的。

假设承认建立这样的一种制度只能保证下面这一些东西，即：贫困将被消灭，只要每天从事适当的工作，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得到保证有换取足够的衣着和食物的机会。然而，我们仍然不能够使一些人信服，实现这样一个理想，对于全世界会是一桩好事情。仍然有许多人，他们虽然也许不附和那种普遍的预言，说这样一种制度

^① 参阅“社会主义精华”(The Quintessence of Socialism)，斯旺·索宁士琴公司(Swan Sonnenschein and Co.)出版。

的主要結果，将会增加酗酒和其他愚蠢的放縱行为^①，然而他們仍舊把飢餓和貧困看成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秩序的一部分，当作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是有益于他們所高兴地称为“最适当的”生活方式的幸存者。这些批評家們認為：任何把智慧和适应力有意識地結合起来去反对飢餓和貧困的企圖，任何以共同的努力来消灭我們作为个人經常不断地与之作斗争的原始野蛮主义灾害的残余的企圖，都是对社会进步有危害的。因此，虽然他們也許乐于承認社会主义的目标中含有一种短視的善意的因素，但是他們認為这种社会主义的目的本身，并不完全合乎他們的道德判断的要求，并不完全合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他們的关于什么是善的那种意見的要求。另外的一些人們，由于受了比进步观念更为古老的宗教观念的影响，并且由于把德性当作一种私人的事情以及每一个人的一种灵魂状态，而不認為德性是决定于社会的进步，因此他們偏向于把社会主义者所要消灭的物質貧困，看作是一种必需的教育和紀律，缺少了这种教育和紀律，个人的德行就会敗坏。

針對着这些教条，社会主义者仍然認為，为了保証人类大众已經获得的社会进步的益处，并使它有秩序地繼續發展下去，以及为了在个人和国家方面实现我們所从未想像过的最高的道德，根据社会主义的原則安排国家生活及世界上个人与社会团体之間的关系，仍然是唯一有效的和不可缺少的过程。

談到这里，要估計到人們也許会向我們挑战，要我們对“德性”这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下一个定义，并简单地解釋一下在随后的整个討論中我們所采取的立場及所使用的方法。必需記住：这篇

^① 例如，參閱塞奧多尔·巫尔塞 (Theodore D. Woolsey) 所写的“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 (Communism and Socialism)，倫敦辛浦森·洛公司 (Sampson Law and Co., London) 出版。

文章的标题是“社会主义的道德基础”，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对道德基础的看法”。只要我们在进行讨论的时候注意到，形而上的伦理学肯定是普遍地为人们所具有的，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什么社会主义的特殊伦理或德性，那末我们就可以公正地把长久以来关于什么是道德的基础这样一个争论所引起的漩涡澄清下来。由于采取这样一个谨慎的步骤，我们虽然确实牺牲了这样一种迷人的野心，即凭借从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演绎而来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系列辩证概念，把存在于赋与宇宙以生命力的那个“观念”中的正式的基础揭露出来。但是我们也避免了这样一种必然的损失，那就是在我们刚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只抓住了同意我们基本论点的少数人而失去了其他所有的人。在我们降而采取经验主义的朴素方法的时候，我们还要作更进一步的牺牲，因为这样一来，我们就放弃了向社会主义者及其他虔信这种主义的人们所普遍具有的诉诸神学心灵习惯的权利。在美国宪法下受过教育的亨利·乔治先生，对于上帝的意旨及人的自然权利也许像宪法起草人一样熟悉，他可能像赫伯特·斯宾塞先生在他勇敢的年青时代一样，去证明土地的成为私有财产，是与每一个人去生活并获得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基本权利相矛盾的。但是实证的伦理学对于人的自然权利与基本权利是一无所知的；也就是说实证的伦理学对于个人自由是一无所知的，对于平等是一无所知的，对于基本的统一也是一无所知的。然而在这里我们的损失也得到了某些补偿，因为一个扼要的调查就会使我们确信，在具有代表性的第一原理上存在着分歧的各派道德哲学，它们都一致为社会主义辩护；而且现代人类对于哪一种行为是“道德”的以及哪些情况会增加“一般道德”的各种实际判断，事实上多半是一致的。至少，它们提供了一大堆假设的意见或偏见，对于这些意见或偏见，我们可以把社会主

义提出来，要求它们对它的道德性予以批评。然而这样的一个法庭绝不是不会错的，而且当代普遍的博爱意识也许要被考虑在内。但是，假若要从伦理的观点来达到对社会主义的批评，我们还得要比现在更深入一步。当我们接受目前关于德性现象的意见作为我们的一部分资料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跟随着伦理思考的探索，深入到这些意见的原因和它们的发展的厂史中去。由于考察了把这种或那种行为当作是好的或坏的，当作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这些信念的起源，就能帮助我们来判断哪些信念看起来似乎很有可能被坚持下去和被加强，哪些信念会被修改、被削弱或被抛弃。假若社会主义的主张是建立在后一类信念的判断上，那末我们就知道这种主张只是一个气息奄奄的幼童；假若这些判断认为这种社会主义的主张功绩多于困难，那末我们可以预言这种主张是有前途的；假若社会主义的主张是被那些对于个人及社会的生存来说似乎是主要地要加以坚持的判断所支持，那末我们可以确信这种社会主义的主张在将来必然能够实现。

社会主义看起来好像是个人主义的后裔，好像是个人主义者斗争的后果，而且好像是达到个人主义者理想的必要条件。在把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加以对比时，人们通常会认为这两者是对抗性的，就如像人们现在由于习惯的缘故，会偶然地分不清“人格”(Personality)和“动产”(Personalty)、分不清一个人的生活与他所拥有的丰富的东西一样。其实社会主义不过是合理化的、有组织的、披上了外衣的和神智清醒的个人主义而已。社会主义在进步的各个社会中正在形成，而且社会革命必须通过无数的个人的有意识的行动才能得到正式的实现。这些人希望为自己以及为他们所关心的人们的幸福和自由，去寻找一条通向合理而且愉快的生存的道路。所有有意识的行为，所有对环境的有意识的改变，都是为

这一类个人的慰借、滿足或表現的願望所鼓舞，是为要逃避某种身体的或心智的苦惱的企圖所鼓舞。黑格尔說：“正是主觀的意志，也就是热情，使人們采取行动。除非人們觉得某种事情的得遂会使他們的个性得到滿足而外，人們是不会对任何事情發生兴趣的。”我們从整个有記載的或可追述的历史中看出，这种共同的目的，这种获得个人慰借或滿足的願望，推动着地球上的每一个生物。当我们把这种共同的目的再向后追溯的时候，我們發現它在沒有知觉的有机体中被融合为一种显然可見的求生的意志，在無机体中被融合为一种不能加以破坏的能量。在这样想像下的活动領域会呈現出一个范围相当大的一覽圖；但是我們需要加以研究的只不过是这个圖中的一小部分罢了。不管德性的本質和基础是什么，在社会还未开始形成，在人們之間还未处于有意識的联系以前，德性必然是我們所無法識別的东西，而且我們也無法認出它是正确的或錯誤的。

假若我們能够設想有这样的一个人，他是絕對地被孤立了，而且不与其他有感情的生物發生任何联系，那末無論在什么时候或在什么地方、只要他高兴，他就可以随意地去吃、去喝、去睡覺、去呼吸、去洗澡、去运动、去咳嗽、去打噴嚏，我們也不能說他这样做是道德的或是不道德的。他在这些活动方面的行为对于我們來說必然是絕對無所謂的。对于这个人的“自我”（我們也許可以这样称它）的尊严和發展所必需的条件，我們也許有过某些模糊的想像出来的假定；但是对于这种假定，这个人也可以装得就像我們所知道的一样多；而且我們确实也沒有正当的根据来歧視那退隱的印度托鉢僧的習慣，相反地，他倒有很多权利可以被看成是一个特別的聖人。但是对于任何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假若他把自己餓得不能工作，假若他飽食或烂醉，假若他不分季节地睡覺，假若他摒除了

使他的身体健康和相貌愉快所必需的新鲜空气、清洁和运动，假若他过度劳动而耗损了他的精力，那末我们可以说他的行为是错误的、不道德的、不合情理的，甚至在极端程度的情况下还是疯狂的。（疯狂只是我们给予那种离开了人们所公认为合理而聪明的欲望与行为的反常现象的名称）。假若对于这一类与当事人最有关系的行动，可以笼统地被认做是自尊的行为，那么，对于那些必然地而且毫无例外地要影响到别人的行动愈更是如此了。那些主要会被认识出来的、具有主观德性的个人与同伴之间的关系，离开了社会是不存在的。主观德性既然只有在一个国家内才可以识别，那末我们那个一览图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因为在每一个异邦的或本国的社会里，以及在我們今天的“世界国家”（the World-State）里，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发现个人的行动以及每一个人类个体的欲望和热情，在很大限度内是服从于我们所谓的道德习惯的。在生活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形成过无数类型的社会。在这些类型中最古老的那个社会里，我们识别出类似今天维系着我们人类社会传统德性的各种因素。我们研究蚂蚁的生活方式，我们发觉它们是聪明的。

我们发觉在所有社会里，那些趋向于保持社会存在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和便利的行为和习惯，才被我们认为是道德的；而那些带有或者看起来似乎带有相反趋向的行为和习惯，则被认为是道德的。很明显，没有一个经常把这些道德判断颠倒的社会能够继续存在；这件事情说明了为什么对于有益于社会的行为，我们普遍地表现一种固有的认可态度，而对于被认为是有害于社会的行为，我们普遍表现一种固有的厌恶态度。这种取舍形成了我们称为意识的一大部分。许多这种公共的判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以致它们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意识范围；它们自动地或本能地被遵循

了，而無需行動者在心里思考一下它們是否合乎道德標準。例如，為了社會的存在，每一個公民就不得隨意殺人，這種自制顯然是合乎情理的，它的違犯者顯然是與常識相違背的，因而當我們發現有人不是因為任何感情的沖動，而是為了愛好流血而殺人的時候，我們審判這個破壞社會生命的人，就像驗尸法庭的陪審員們日常判決破壞自己生命的自殺者一樣，我們並不認為這個殺人犯是不道德的，我們寧願說他是精神失常的。

大多數為了維持個人的肉體存在所必需的行動和規避的習慣，正如為了維持社會的存在所必需的道德的行為和克制一樣，早已成為自動的了，因而，在公眾意見方面來說，已經是不再屬於道德批評的範圍以內的事了。一切有助於人體健康的非自願的營養和維持機能，都是在長遠的時間過程中逐漸獲得的；所有這些機能，都是動物求生意志的表現所必需的條件，它們企圖在物質環境所允許的情況下去獲得最大的與最自由的生活。正如每一個種屬（species）的典型個體，曾經得到，而且形成了某些肉體的機能作為他決心生存所不可缺乏的機構一樣，社會的形式和制度以及它的成員之間的关系和相互間的行為，也被調整和建立起來。它們是要生活得更圓滿的決心的表現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是擴大自由和使熱情與靈感得到滿足的機會所不可缺少的條件，而這些精力和活動的表現，可以看作是更為複雜的生命形態從無機的及植物的階段演進到有意識的或半有意識的階段的特征。

我們必須推論到的各種人類社會的原始形態之所以能成長和存留下來，就只是因為這些原始形態增強了人類作為一個捕食和鬥爭的動物的效能，這些形態對人所起的作用，正如它們對狼、海狸和螞蟻所起過的作用一樣。到了現在，社會不僅已發展成為人類獲得食物和保護所不可缺少的保證，同時也成為人類去幻想和

取得千万种更为文雅的满足机会的保证。就一个人要获得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愿意做什么人就做什么人的这种自由而论，他只有通过社会的进化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当一个社会灭亡的时候（如像处于强大的敌对者之中的那些组织脆弱的社会所曾经遭受而且还要遭受的那样），个人也随之而灭亡，或者被迫使自由受到损害而后退，直到一个新的社会形成，并且扩大了他的自我发展的能力。如像塞德尼·韦白在一一六页中所指出，各种社会在今天必须保护自己的存在的理由，是与过去一个社会之所以形成的理由完全一样的。社会的成长是为了人们的方便，为了要在他们本身之外的——我们称之为大自然的——野兽和竞争者的压力之下得到防护和安慰，为了在原始生活的风暴和困苦之下得到一小块喘息的空间，得到一点活动的余地。而且自从社会产生以后，它就不断地发展、日趋完善，它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为了那些积极活动的个人的方便，一直发展到今天，人一生下来就像是大树上的一片叶子，就像海绵里的珊瑚虫一样，可以过他的私生活，在他这样生活的时候，他也就改变着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那个社会有机体。

在回顾社会为了满足个人求生并按照想像中的最好方式去生活的愿望的各种条件的发展过程的时候，我们在道德观念的发展过程中看出了在当时环境之下，那种最合理的个人生活方式以及社会制度的发展过程。我们曾经指出：某些反社会的行为是如此地不合情理，如此显然地有碍于自觉的人们去达到他们共同的目的，以致我们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行为称为疯狂的行为。可以作为例子的就是个人方面的极端的不纯正或放荡行为，以及极端的残忍或嗜杀成性。我们不把其他反社会的或各种间接的自杀行为列为疯狂的行为（虽然人们不断地有把它们当作疯狂行为看待的趋势），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个人的某些行动，虽然对别的公民

是有害的，（就像一群狼或一个搶人的部族对附近的社会有害一样）但其目的—般是为了满足尚未發展到嗜杀成性这样稀奇的冲动和欲望，因而它們沒有被当作是不合情理的或無价值的行动，甚至在它們的固有范围以內，还被認為是無害的，适当的和必要的。

（在英国），这是一种公認的社会習俗，即偷窃和欺詐是不道德的。仅仅在最極端的情况下，我們才把这方面的追求当作癲病的証据；因为虽然不公平和不誠实是与社会的健康不相容的，因而实际上是不合情理的和間接自杀性的，然而驅使人們从事偷窃和欺詐的欲望最坏也不过是追求财富或生存資料的欲望的夸張。而每个人都知道，财富和生活資料的取得，却是为了繼續生存所必需的条件。不仅如此，当另外一条路就是因缺乏生活資料而死亡的时候，許多人都不把偷窃和欺詐当作是不道德的。在另外的一个極端，当本能驅使人們去从事一种蔑視理智而又不是有心要获得实利的搶劫行为，例如簡·烏尔金搶劫了小薩伏雅^①，或是一个高貴的伯爵把方糖鉗子偷偷地放在口袋里，我們把这种行为称为神經錯乱或盜窃狂。

自衛的例子也是与此相類似的。爭吵和粗暴是有害于社会存在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会妨碍社会的更趨完美。但是易于發怒和易于向人揮动拳头，在很多世紀以来是个人生存所必需的；而且在更多的世紀內，与它們類似的剛強和勇猛等社会品質，由于是社会生存所必需的，因而也被列為是美德。現在，把你的另一边臉轉朝打你的人的这种劝告，即使对于被倫敦警察所襲击的社会主义

^① 簡·烏尔金(Jean Valjean)是十九世紀法國小說家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年)著名小說“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中的主角。他因搶了一片面包給他受餓的外甥吃而被判罪，虽然他为人正直却終身被統治階級認為是“罪人”。

者來說，也是一个值得推荐的格言的过分夸张；因为使自己毫無理由地被杀害显然是，而且無疑是不道德的。当西方世界从战争时代进步到工业时代的时候，愈来愈多过去曾經被認為是軍事美德的东西，現在却被認為是个人的無德性了；到了今天，过去各种使人可能有資格去当酋长的凶猛脾气，今天可能把那个人送到监狱或瘋人院里去。

为了当前的目的，前面所論述的例子仅是涉及到个人行为对于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我們确然可以断言，一般說来，反社会的行为并不能使个人永远地得到滿足（除开个别的例外，例如雪萊所写的欽起伯爵）^①；但是，除了这个例外，从表面看来，个人的行为和嗜好之所以被他的同伴們認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主要是根据人們所估計到的它們对社会的影响如何而定。每一个活着的人都具有为所欲为的这样一个目的，但是，假若他所高兴做的事妨碍了其他的人，那末其他的人們就会采取措施来限制他这样做。他們以法律或道德的習慣法为手段来力圖收到这个效果。法律与道德的習慣法二者之間的主要差別，在于前者可以由国家的官員把一种懲罰强制地直接施之于人。这种对于法律和道德的習慣法的接受，就引起了一系列派生的对于是与非的判断；因为不論法律本身是不是好的，破坏法律总被認為是不道德的；不論習慣是否仍然合乎情理，脱离習慣是要受到非难的。如像过去那样，这一种派生的道德，是个人的一种防护物，在个人沒有充分力量以前是离不开它的，而且假若要充分实现自由，他就非依賴它不可。在他受教育

^① 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年)，英国著名詩人。欽起(Cenci)是他的名著之一。写的是佛朗西斯柯·欽起(Francesco Cenci, 1549—1598年)一家的悲剧。欽起是羅馬一个富裕而性情粗暴的伯爵，被他的子女所謀杀，而他的子女又被教皇判处死刑。——譯者

的过程中，成为風俗的道德阻止他損人利己地去追求自己的滿足。在受教育的过程中，他認識到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來說，自我这两个字包含着比个人这两个字更为广泛的意義。嬰兒很快就会感到对他的母亲有害的东西对他也是有害的；小孩子也会知道，他父亲沒有收入就意味着全家要遭受困苦和飢餓。縱使不談有关同情心的事，每一个生在先进社会里的人，很早就会知道，他的單純的物質需要的滿足完全有賴于他周圍的那个社会的各种活动，就好像有賴于他自己的活动一样。通过了国家和社会的成长，这种个人之間的相互依存的各种复杂性增加了，社会意識的范围扩大了而且融合起来了。这种社会意識的范围从孤独的穴居人扩大到家族或游牧部落，从部落扩大到国家，并通过商業，从国家扩大到世界，一直到每一个民族的財富都具有影响其他每一个民族的劳动者的希望和恐惧的权力；因此，我們今天有包括在上百种从坚苦中得来的文化中的艺术、知識和文学可以現成地被利用，而且世界上各个国家以及它們的光荣都可以在瞬息之間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但是人类并不只靠面包生活。在人类进化过程的初期被整个社会所厭恶的那一类人，必然是由于自然选择而被排斥和制服了。社会本能，那种不是为了物質利益而是要在同志般的友誼之中得到安慰的那种氣質，在人的身上是一个显著的古东西；因此，我們有理由把这种氣質称为人的基本的和起碼的特点之一。要以种族生存的条件来对这种合群性，这种感情，这种同情心的根源提出各种理論是很容易的，但对我們來說，重要的事情乃是这种氣質显然是易于培养和伸張的。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做使他的朋友們愉快的事情而不做使他的朋友們不愉快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他喜欢被人認為是一个好人，或希望得到利益的报酬，而只是为了他这样做能立刻得到各种快乐。对于有害于他的朋友們的那些东西

他是敏感的，这不是因为他恐怕他的朋友们受到伤害会削弱了他自己的防衛，而是由于当他把他的意識扩大到把他的朋友们包括在內的时候，他們实际上变成了他自己的一个部分。这种社会本能，这种仁慈的同情的氣質，看起来几乎就像个人求生的欲望那样地無法可以消灭；而且在無數的情况下，事实証明了它比个人求生的欲望还要强烈得多。

当每一个人認識到他对于社会的依賴或对于自己的利益的敏感，以及他对社会的关心或对社会利益的敏感，这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就反映出一个对各种反社会的或不道德的行为極其敏感的社会意識的复雜組織。个人的道德教育正式表现为學習的过程，完全是憑借知識和經驗的擴張，而不是憑借其他的东西，才使他認識到他如何才能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这两方面或在这二者的結合中把自己的願望協調起来，并把它加以貫徹。他必須学会用什么样的的一种方式去滿足他肉体生活的需要，而同时又不妨碍别人也这样做的那种自由。在这方面，法律和道德慣例首先会指导着他；但是在这个人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以前，我們不能說他是自由的，因为当他預見到滿足了这些基本的願望以后，一些新的欲望必然会出现，这些欲望的滿足会使他更为称心如意，而且他認為这样做是合理的。社会的存在和安定，是普遍滿足个人基本欲望的不可缺少的唯一保証，因此，用不道德的行为来削弱社会是不合理的；但是社会的存在和健全，对于派生的欲望的普遍产生和滿足，更是必不可少的保証。这些派生的欲望創造了所有那些在文化中被認為是最珍貴的东西，而且它們在艺术、文化、社交、爱情等方面找到了滿足。个人的道德教育就是这样的一个教訓，那就是：欲望并不是一种禍害，一个人并不需要摒除欲望才能得到自己的自由，因为那样做就是死亡，或是遺弃，而許多活着的人都热望得到更为丰富的

生活。但这种教訓指出：更为广泛的、更为充分的滿足是建立在比較簡單的欲望的滿足上，而公共道德就是使这些欲望可能得到較广泛而充分的滿足的条件。这种教訓指出：假若个人要保全他的生命的话，那末某些方式和方法是他所不可或缺的。这种教訓指出：爱情、社会本能以及作为系統知識的科学，乃是他在实用道德方面唯一可靠的导师。

但是人在社会里并不仅仅是过着个人的生活，他同时也按照着理智的指示去修正社会制度的形式——这种方式，依照他的了解，似乎是可以使他更有效地获得他生活的自由。恰如个人行动的某些形式那样，在它們进入和通过实証的批評領域的时候，起初看来好像是無所謂的，因为这些行动只关系到个人；随后即被認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因為他們被認為是影响到社会的，到后来这些行动純然被区别分为合理的或瘋狂的。到了这个地步，道德就正式地与理智等同起来，而缺乏道德就与愚蠢等同起来，以致最后变为習慣的、本能的和不自覺的。同样地，显然是起源于偶然形式的社会制度，开始被当作是生存机构的有用的和有价值的附加物，得到所有宗教权力和法令的支持，最后通过人的常識而無条件地被接受了。到了某个时候，个人生活条件中的某些根本改变，也是由于类似的某些沒有預見到的原因所引起的，那就是旧制度的形式已不再对公共的目的有所裨益：它开始束縛了大多数不再需要它支持的人們的自由。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一些少数人，他們表面上是为了公共福利而控制着那个旧制度，实际上是处于純然为了他們本階級的利益而管理那个旧制度的地位。这些人，由于他們的存在是依赖于他們这样地管理那个旧制度，除非人們把社会制度修改到使任何一个階級都不再可能按照这种制度的当前形式获得特殊利益的时候，人們是不可能革除这种習慣的。

在历史上,这种过程是这样地类似,以致于要把它的发展追溯到君主制、贵族制、僧侣制、奴隶制、代议制或它的其他无数种形式来做例子时,会是浪费时间。容许占有某些物件的私有财产制度,对于人类的绝大多数来说,在很多方面是合理而且方便的,而且对于那些领导部落文化开始发展的强而有力的人们来说,更是显然有利的。因此,在他们的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这种私有财产制度就得到了道德习惯、宗教和法律的认可。对于一个工业社会的建立来说,每一个人应该得到他自己劳动的果实,并且拥有使他能够有效地劳动所不可缺少的工具,这显然是必要的。但是,当法律和道德习惯的认可仍旧紧紧地抓住旧的财产定义中所包含着的一切的时候,在本书第三篇中所叙述的“工业革命”,已经把人们在这种工业革命下面生产财富的条件以及人们所用以工作的工具的特点完全改变了。假若那些人们经常靠它来为财产法辩护的观念得到实现;假若人们能够得到保证去获得他的劳动果实^①并拥有他用来工作的工具;假若财产法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用地租和利息的方式把别人的劳动果实攫去的寄生阶级,那末我们必需修正我们对私有财产的处理方法。我们必须承认,由于农业劳动者不能单独地拥有他所耕种的农场和农场上的牲畜、农具,就好像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不能单独地拥有工厂一样,因此,除了在少数人拥有所有这些财产而大多数人一无所有的情况下,土地和工业资本方面的私有财产是不可能的。

社会主义者争辩道,在土地和资本方面的私有财产制度,对于为幸福的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公共道德唯一得以实现的条件有着积极破坏的作用。有些人否认在一般人的天性之中,具有实现真正

^① 当然,对聪明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句话是无意义的,但是对于那些使用这句话的非社会主义者,为了取悦群众,它是可以合法地被使用的。

合作的共和国所不可缺少的节制和仁慈的能力。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人的这种信心完全不予重视。社会主义者认为：现代的私有财产制度的发展（这种发展只是过去几个世代的一种发展，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愈来愈驱使人们采取反社会的趋向和行动，因而就破坏了只有社会有机体的健康和进步的发展才能给予他们的自由和丰富的生活的希望。当私有财产制度的效果乃是如此的时候，就好像改变过去统治过我们的封建贵族制度，并且永远废除使一个人能占有另外一个人作为奴隶的法律那样，我们向着能够给予我们自由的方向去改变当前的各种制度显然是合理的。

希腊有这样的一句谚语：一个人解决了生活问题以后，他就应该开始讲求道德。我们都会抗议说，一个人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应该讲求道德，但是只要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就会承认我们对于什么是道德行为的判断乃是取决于这种行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采取的。我们是否赞成一个人去杀死另外的一个人，完全取决于这件事情发生的情况；几乎任何一种在我们的法律中被认为是犯罪的行为，在假想的情况下，都可能被认为是合理的行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传统意见对于什么行为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是适用于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一般情况，而这种社会本身却被人们假定为是和諧的，在它里面不含有阶级之间的主要区别或个人情况之间的巨大差异。

但是，在我们现存的私有财产制度之下，成为社会主义者主要攻击目标的因素就在于：处于生产工具已成为共同使用的这个时代，生产工具、土地和资本的私人占有将会，而且无可避免地必然会（如像前面的几篇文章所企图证明的一样）把社会分为两个阶级，这两个阶级的生活是依靠完全不同的方式来维持的。典型的

無产者的生活是依靠运用他的才能从事有用的活动而获得的；反之，典型的資本家或財產所有者的生活，不是依靠他或她的活动的任何貢獻，而是依靠一种被称为地租，利息或紅利等的年金方式而获得的，这种年金来自無产階級每日活动所創造的財富，并由法律加以保証。

讓我們从道德現象上来观察一下这种区别的效果。关于社会道德，我們大多数人的普遍意見是适合于这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一个公民都貢獻着積極的勞务。最古老和最普遍的对于人类美德的判断，例如勤勞、忠實、人与人之間的忠誠和容忍、交往上的节制、剛毅和公平等等都指出了社会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必要条件。在这种社会里，每一个平等而自由的个人都依靠使用他的才能，依靠他与他的同伴之間的合作無間而生活。但是假若有一个階級或社会，它不是依靠自己的勤勞而生活，而是像寄生物一样地依靠別的社会或階級来喂养它；当这样一个寄生社会中的人們的生活或他們的自由絕不是依賴于他們之間的合作無間，或者依賴于他們与喂养他們的那个階級之間的任何个人关系的时候，那末遵循勤勉和合作的社会的傳統道德，在很多方面对于一个寄生社会生命的延續，或者对于組成这个寄生社会的人們的愉快的存在便是不必要的。所必要的一切乃是要那个勤勉的階級必須繼續遵循那些已經公認的法律和習慣（“在招雇管家的广告里，都注明了他必須是一个忠實可靠的人”）。由于現代有产階級的存在終究要依賴絕大多数人民对傳統道德的遵循，因此，有产階級公开地承認他們尊重而且遵循那种在私人的行为中早已認為是陈旧的習俗。这种复杂的情况就是一种不断的、虛伪口号的来源。在这方面我們要感謝鼓吹絕對禁酒的威廉·哈尔柯特爵士^①和推荐基督教的阿瑟·貝尔弗先生^②的壯举。此外，还有懶惰而奢侈的人們

关于勤劳和节俭的不断教训，以及其他种种关于魔鬼斥责罪恶的论调的启示。节制、基督教道德、勤勉、节俭都具有很大的社会效用；但是对于有产阶级中的成员来说，它们并不是有产阶级存在的条件所必需的，因而在有产阶级中它们既不被奉行，而且通常也不被当作道德批判的标题。

再单独地考虑一下勤勉的情况——考虑一下以有用的活动来赚得个人的生活资料的道德习惯。假定食物有了保证，那么对于这方面的努力就不是迫切的社会需要了。无疑地，杂务女仆的天堂——在那里她永远无需做任何工作——是智慧未得到发展的人的天堂。一个被解除了提供自己的食物的机能的社会无需墜入一个普遍的冬眠状态，虽然处于这种情况下的个人结果往往是墜落为无用的人。对这种人宣传他将在诚实的劳动中获得最充分的满足是无用的，他只会当面笑你，而且他会出去打鸚鵡、打猎、划船、或者去蒙提卡洛 (Monte Carlo, 著名的賭場——譯者) 或洛磯山。他發覺以他的能力去从事这些活动能使他接連几个月得到想像中最大的享受。他可能完全不願意为那些为养活他而劳动的人們的福利去工作。如像我們其他的人一样，他所需要的只不过是找到某些办法以惬意或令人兴奋的方式来消磨他的时间。因此，在我們国内自称为“社会”的那个阶层，实际上是一个以经济的寄生而和普通群众相分离的社会。我們發現这一个社会的活动的特点，就是不断以惬意而令人兴奋的方式来消磨时间。一个时髦社会的目的既然是如此，它的道德法典自然是与适用于各种勤勉的社会

① 威廉·哈尔柯特爵士 (Sir William Harcourt, 1827—1904年)，英国自由主义政治家，作者。——譯者。

② 阿瑟·贝尔佛 (Arthur Balfour, 1848—1930年)，曾任英国海軍部长、外交部长、首相等职。——譯者。

的道德法典大不相同的。在这些社会里，人们把忠实当做一种首要的美德而加以宣传。撒谎自然在各个阶级中都是普遍的，而且普遍被认为是道德的；但是在时髦的社会里，撒谎不仅被认为是谢绝一个不受欢迎的访客或其他任何不愉快的经验的完全合法的手段，它甚至被认为是传统的文雅和良好礼貌的绝对必要条件。在时髦的社会里撒谎实在是无害的，它几乎是一个美德。现在我们转过来谈勤勉的美德：虽然国家生活所必需的人民的传统道德要通过一些震动才能渗透到它所笼罩着的这个寄生社会里去，虽然一个真正聪明的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得到的无穷的满足使得有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从事有用的活动，但是有产阶级实际上的公众舆论是与他们的生活状况绝对一致的。一个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在他得到一个自己选择工作而无需再做其他工作的这样一个职位时，他的中产阶级的朋友们就会祝贺他的幸运；而且一般人在习惯上会去假定他将要像特拉法尔加广场的喷泉一样，只从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除了中饭休息时间而外）出来露面一下。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关他的活动的一种适当的说明，要紧的乃是这样的一种假定不应当被认为是带有侮辱性的。但是假若一个服务于私人雇主的英国工人被发现用大多数公务员对待他们的计时工作的态度（这种态度是善意地被假定了，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反对的暗示）去对待他的计时工作时，上述的那些中产阶级朋友们将会如何愤愤不平地责备这个工人的懈怠和不可信赖啊！

这种过时的基本社会道德现象在依靠财产收入过活的妇女方面表现得更为突出。她们是加倍地与生活的基本条件相隔离了，她们更不会像男子们一样参加家庭以外的任何可能设想的社会性的工作；而且她们的智育既然往往是远不完备的，因此，自然而然地，她们的道德观念也必然是更密切地适合于她们的阶级状况，而

不很适合于人类社会的一般情况。我們都知道，天上的天使是沒有消化器官的，而且穿着得像野外的百合那样地随便。在任何一个这样地供給了各种公共需要的社会里，为生活而工作，由于时间的浪费，必然会被認為是不道德的。资本主义的一般观念是：人生来既然比天使稍微低一些，在这方面应该用获得财产的办法把他自己提高到天使那样的地位。这一个获得财产的过程，一般被愉快地認為是获得能力或独立的过程，也可以說是去获得依賴和無能的权利的过程。这种观念結果产生了一种偏見（这种偏見直到最近几年来才开始严重地被动摇），那就是：要一个女子自己去謀生，要一个紳士为了賺錢而学一种手艺，要一个貴族去做生意，都是羞人的甚至是不名誉的事情。在一个阶级社会里，这样的一种偏見是有很多正当理由的，但这些理由显然是阶级道德的一部分，它是与承認有用的勤勞是值得贊美的那种公共社会道德直接相冲突的。这种偏見現在已經屈服于經濟压力与發財的欲望的刺激之下了。而且不願瓦尔特·貝桑特先生 (Mr. Walter Besant) 的抗議，妇女們正在被驅使，而且将要不断地被驅使从事大多数制造妇女用品的手工業，尽管有些手工業仍旧被認為不屬於可尊敬的范围之內。虽然販賣牛羊業和屠宰業在英国尚未被認為是适于貴族的职业，但經營大畜牧农場在美国却被認為是适于貴族的职业。“掌管”公司和贊助性情暴躁的“志願上校”都是取得头衔的合法的方式。为了維持体面的关系，人們用对于無用的职业的虛偽的贊美来抵消对于有用的职业的偏見。被櫻草会女會員 (Primrose Dame) ① 所珍愛的小說，認為富人是穷人的僱主，懶人是勤勉人的供养人的

① 櫻草会 (Primrose League) 是英国保守党在 1883 年为紀念培根非德勳爵而組織的一个团体。培根非德伯爵 (Earl Beauchamp, 1804—1881 年) 是英国政治家和小說家。对保守党政治理論有巨大影响。——譯者

說法，在今天比把個人的惡習認為是公共的福利的粗野主張有着更為陰險的形式。鄉紳們的逸樂和那些純然是消遣的活動，在民族評論雜誌上被稱頌為“堅苦的工作”^①。有閑階級自命為文化和美術的不可缺少的保護人和贊助人。把他們在這些方面的作用當作是美德的主張，乃是對感情的直接讓步，那就是：人們必須作出某種努力來顯示寄生社會的各種實踐是與這種社會所宣傳的公共社會道德相一致的。

同樣的需要又引起了對於不是出自強迫而是出於社會本能所做的各種真正有用的工作的過份贊揚。這一類的活動，往往被從事這些活動的人們的朋友們認為是非凡的美德的證明。每周花幾小時去了解窮人的生活情況，無酬地花幾個小時去從事一些地方行政工作，養成愛好文學或科學的任何一個部門的習慣，所有這些，都被把工資勞動者指責為懶漢和怠工者的那些人們算作是他們過份的正義感。他們認為這些活動是職務以外的工作，是只能加以贊許而不能加以要求或期望的。財閥政治還沒有採用“被迫的貴族”（noblesse oblige）這樣一個箴言。對於那些把每日的大部分時間花於謀生的工作以後，還能把空閑的時間或部分空閑時間從事上述各種無償的活動的人們，也應當給予類似的夸奖和贊許。我們可以把握地說，絕大部分這類工作，是由從事於中產階級各種職業而賺錢的人們或是由從事於較不費力的職業的工資勞動者們來做的。他們絕大多數都可能過這樣的經驗，那就是他們的富裕的朋友們對於他們這種無償的勞動所給予的稱贊，往往是不適當到可笑的地步。毫無疑問，他們的這些活動是道德的；但是這些活動並不能使人覺得是一種美德或是一件值得贊揚的事情，他們這

① 參閱珍妮塔·馬勒士夫人（現為羅特朗公爵夫人）在1888年2月號民族評論雜誌上所寫的“富裕的地主們真是懶惰嗎？”

样做不过因为看起来这样做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做是普通常識所指出的能满足个人去扩大自由和爱情的道路。

階級道德的各种現象对人們來說是很古老和熟習的。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它們随着階級区分的基礎的性質之不断改变而变迁。两性之間的巨大而永久的区别，以及男女之間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是在形成今天的世界的那个已往的文明时期中产生的），其結果不仅为两性的貞操訂立了不同的法典，并且还产生了反对这一个或那一个性別的人参加与两性的生理差别絲毫無关的活动的無数偏見。由于自由与教育方面的不平等，它們甚至于在造成两性之間心理習慣的显著差別方面获得了成就。这些習慣，当男人們和女人們面对着忠实、荣誉和邏輯等問題的时候，就不断地表現出来。我們几乎無需再去深究便可了解：大多数这些两性之間的道德差別，显然可以追溯到私有財產制度这个問題上，并可追溯到私有財產集中在男性手中的这一問題上，因为在一个互相竞争的社會里，男子是两性之中力量較强的人。把社会秩序完全建立在身份 (status) 或种性制度 (caste) 之上的那些社会階級道德，已經形成無数文献的研究題目。把所有这些階級道德的区别追溯到它們的經濟环境的根源，絕不比調查两性道德的經濟基础更令人發生兴趣。但是，即使“教会問答教授法” (Church Catechism) 的解釋者，也放弃了把階級拿来作为解釋責任的基礎的办法；世代相傳的貴族制度这种观念已經死亡了，然而階級区别及其附屬的倫理，現在还是直接而显然地建立在財產上面的。

我們已經看到当前的財產制度不断破坏資產階級社会道德傳統的某些效果。私有財產制度的基本观念，也就是人可以像天使一样地無需工作就可以生活的这样一个观念，(幸好) 在实际生活方面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在人类社会里，沒有一个階級可以不工

作而生活,除非另外有一个或几个阶级加倍地为这个阶级而工作。地球上的这个假设的天使般的社会,必须拥有被当作财产的奴隶,否则必须是一个接受献礼的军事阶级,或者是一个寄生的或剥削的阶级,它们按照前面几篇论文所分析过的工厂制度的办法来取得租金和利息。如像我们大家所注意到的这样的一个阶级和这样一个制度,无论比起奴隶制度或封建制度来,它的办法都是更为毒辣和富于变动性的,并且更会招致自身的毁灭的。在人类不平等的这三个阶段中,工资奴隶的这一个阶段将必然是最短的一个阶段。而在目前,有产阶级自以为是为代表着文化;有产阶级所认可的道德被人们在教堂和学校里加以宣传和讲授。这种道德贬低了我们的公众意见,这种道德直接毒害了现在寄食于富人的许多劳动者们,无论他们是作为富人的奴仆或者是为了富人们的特殊的逸乐和奢靡而服务。从来没有能像时髦的裁缝那样装腔作势的人,而且在无产阶级的各个阶层之中,也从来没有像仆人这样一个缺乏教养的阶层。

假若对于生活已有了保证而且所受的教育与熏陶使得他们具有更高的动机去遵循道德的那个阶级其效果是如此——假若我们在这里看到道德被从根勒死而且在挨饿,那末,当我们折回来看生活没有保证的公众,我们又将会发现什么呢?也许我们的希腊人会说:要使公众行使美德是不可能的,因为如像柏拉图在“共和国”中所指出的,奴隶及无产者没有受过训练理智所必需的智育,只有哲学家这个阶层能够真正地讲求道德。但是在现代各文明国家里,工资劳动阶级的绝大多数人生活都得到了一定的保证,因此他们都彻底地浸染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那就是说,从习惯和喜好方面讲,工资劳动者是勤勉而仁慈的,因此显示了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这两个条件。虽然竞争和资本主义是直接地与诚实相矛盾的,但

工資勞動者在很大限度內仍保持着誠實的德性。商業道德的“十誡”對於偷竊、謀殺、假証和貪財有它自己特殊的解釋；但假若一個安裝鉛管的工人被叫來修理煤氣管的時候，他乘機把自來水管拆開了並且把一柄拂塵丟在排水渠里，那末，城市里的最不謹慎的破壞者的很文雅的感情，也將被這個鉛管工人的階級道德所激怒了。在優良的勞動者認識到好好地工作不僅是值得的而且將會導致加重他的同伴們的負擔的這樣一種制度下，雇主一定會為懶惰和壞的工藝產品不斷增加而感到驚訝。

但是對於無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我們的私有財產制度在破壞基本道德方面的作用是最為顯著的。僅就無產階級或甚至被排斥於無產階級以外的那些人來說，這種極端的效果才表現得更清楚。現代工業經濟運轉的特點，就是不斷反復地把單獨的或是成群的勞動者從他們的社會組織的老家中排斥出去——就好像把珊瑚蟲從它借以生長的那個洞里拋出去一樣。資本主義的農莊制度把農業勞動者從村子里面排出去；機器把手藝人從技術工人的隊伍中排出去；在每一個行業中的不斷的競爭和資本的集積，破壞了這個行業中的就業並且瓦解了其他的行業。每一年的生產過剩，使得千百萬工人在下一年沒有工資收入。非熟練工人的隊伍，即失業者的大軍，就是以這些方式集合起來的。但是根深蒂固的社會習慣，極度的忍耐，以及要把自己的願望與自己所熱愛的人們的願望堅強地結合在一起等等，在大多數情況下使得工人不去接受那種把他從社會中排斥出去的判決。假若他是體格健全的、聰明的和幸運的人，他會與堅苦的歲月作鬥爭，直到他在一個生疏的環境中找到新的工作為止；但是假若他是衰弱的、年老的、不講求實際的，那麼他就倒霉了。在這種情況下，他幾乎無可避免地要變成一個貧民或一個流浪者，變為在每一個大城市中腐蝕着社會金字

塔根基的那种無技术的、失業的、無利可圖的、無依無靠的人类渣滓中的一員。而他的孩子們将要变为無家可归的流浪兒、扒手、幼娼或小偷，当他們长大成年的时候，接受了在社会生活圈子以外的地位，而且过着人类祖先的野兽般的生活——从事于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而掠夺邻居的純然是搶劫的和非社会的活动。在社会出現以前是沒有道德的，对于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与他們無关而且無份的那些人們來說，他們要使道德适合于他們的流浪状态。然而即使在盜賊之中也有荣誉存在，就如像在寄生的富人之中也有道学家的口头禪和不誠恳一样。但是在現代工業不息的漩渦中，一个只在教养院和貧民窟之間受过撫育的青年，縱使他願意，也几乎沒有机会找到一个立足的地方，而要把他所能勉强找到的这样一个立足的地方永远保持下去的机会就更少了。

当社会生活的条件变成这个样子的時候，一个人可能并不是由于自己不适于合作而被排斥于社会之外，或者是由于他生来就沒有获得适于合作的机会，这样一来，我們就回复到面对着原始时代的情况了。假若你迫使一个人折向基本的本能，那末下述的两种情况中的一种将会發生；或者，假若这一个人由于體質的恶化而衰弱下去，或者他無能与他的流浪同伴們相結合，他都将被社会压碎、弄死，并使社会的神聖地方为之腐爛；或者，假若他具有不屈不撓的生命和精力，他将要訴諸原始力量的爭辯，他将要使社会翻轉过来并且使它爆炸。因此，在这里我們會害怕爆炸，因为在極端的事情方面我們并不像文化受到阻碍的印度無产者那样的恭順。但是对于我們來說，自由不断受到私人資本主义活动所威胁的那个階級，也就是由于它的政治地位而掌握和控制着工業組織关键的那个階級。那就是說，这个階級的成員，只要他們願意，就可以修改英国关于財產和遺產的法律。只要他們看清楚什么是需要的，

他們就能够把新制度来代替那个由于無用和有害而变为不道德的旧制度。这个新制度将要把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及与这个新制度相适应的道德可能性重新建立起来——那就是使每一个人得到謀生的机会，并且迫使每一个人去为自己謀生。

撇开对那些“人类的渣滓”和“犯罪的階級”不談，我們發現即使無产階級之中受到雇用的那些劳动者也絕不完全是道德的。尽管在一般的关系上他們的行為是非常健全的，但在他們的習慣上普遍是粗俗的；他們缺欠娱乐的才智和优雅的嗜好。这种情况發展到最坏的结果就是暴飲、賭博及相联带的各种刺激方式的流行，以及它們所引起的暴行和鄙俗的后果。但是只要社会一旦保證了人們有滿足他們基本需要的机会——一旦保證了他具有健全的身体和善良的生活，那末他在优雅的社会道德方面的进步，他对他的派生的和显著的人类欲望的形成和滿足，便只是而且完全是一个教育的问题了。这是每一个只要經過把基本的情欲轉变为派生的情欲的男女都可以証明的。但是在这个意义下所暗示的教育，是一个从十四岁就离开了学校而且一直就每个星期辛苦地工作六天的少年所完全不能享受到的。

現存的衰老的天主教是一个具有相当重要性和广泛性的最古老的社会主义制度。天主教一贯坚持有帮助穷人的义务，它这样做并不是有鑒于“人类的渣滓”对社会的危險性，而是由于人类仁慈本能的更高级的呼吁。与它的时代文明相比較，天主教發展了本世紀以前全世界从未見过的最广泛最自由的教育制度。天主教的基督教信仰，憑借着它認為上帝化身于人的革命的观念，粉碎了認為人的思想是不断地想像着去做坏事的可怕的迷信，而代之以每一个人的灵魂都可以趋于完善的信念。天主教憑借着它的光輝而有力的論断，認為上帝必然就是“爱”，因为再沒有比“爱”更好的

东西，而且由于神的内在的指导，人是不会犯法的，因此，天主教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宗教在社会道德方面的贡献更大。

在英国，新教的个人主义破坏了天主教，在它所没收的领土上建立了现代的土地制度；破坏了中世纪的慈善和教育机构；在宗教上恢复了魔鬼，恢复了原始罪恶的教义以及理智和认真工作等可诅咒的危险^①。

在天主教的残骸上，在新教的解体过程中，大约经过了三百年时间，相继出现了两个伟大的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恤贫律和教养院。以基督教义务为基础的伪装，渐渐地从恤贫律中消逝，直到恤贫律被公认为只是一个社会的安全措施以后，这个初步的社会主义机构的个人性质的和商业性质的经营，甚至于丧失了它的基本作用方面的效能。有些人把救济院看作是破坏他们的家庭的一个所在，把到救济院看作是被判耻辱的苦役；因为那里的工作是无用的和浪费时间的，他们宁愿采取一种不太丢脸的办法，无论是自杀或勉强地参加到“人类的渣滓”行列里的办法，来逃避社会，因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情况：救济院除了被用作老年人和病人的医院而外，主要是被用作一大群习惯于流浪和乞食的人们的俱乐部和旅馆；而且对于一个在奋斗中的无产者来说，除非堕落到流浪和乞食的这样一种境地时，他是不会到救济院那里去找“工作”的。

社会主义者认为假若一个社会里存在着不能靠勤劳来谋生的个人，那末这个社会就是严重地有毛病；社会主义者认为唯一正确的用来实现恤贫律的理想的方法，就是把生产加以组织并把必要的生产工具加以恢复使用。照社会主义者们看来，假若社会制度只

^① 作者为天主教徒，故对新教加以攻击。——译者

能給人們受到馴服的野獸的那種安適，那麼不斷用地租和利息等攤派方式把勞動所創造的財富從勞動者身上奪去並不是很重要的問題，而且這種沉重負擔的實際壓力也不致就迫使人們採取社會革命。正就是因為有了經常的憂懼和不安，有了工業危機的加速出現，我們這個時代才有了革命的宣傳者；正是由於社會上最下層和最上層的社会道德條件的消失，才喚起了物質利益未受影響的那些人們的注意。

雖然並不完全是因為對於這些貨物的嫉妒或憤恨才激動了我們去進行戰鬥，但是假若要使辦學校的這個理想達到它的社會目的，那末我們確實需要把這些貨物收回。因為辦學校的理想包含着：第一，要有學習的閑暇，那就是說，要把兒童從所有無教育意義的勞動中解放出來，直到他們的身心的發展都得到了一種良好的開始和訓練為止，並且要廢除強迫成年人去做任何多乎社會所必需的定額工作。公共教育的實際支出也必定要大大地增加，至少在父母們更普遍地有能力去教導他們的子女以前應該如此。但是一旦心靈被訓練得能夠欣賞世界的無窮盡的興趣和美麗，能夠區別好的文學和壞的文學，那麼余下的一部分教育，只要給予閑暇，便成為一樁花錢不多的事情。文學會變得很便宜，所有其他富於教育意義的各種藝術也能为人們共同享受。成年人的學校將是報紙和圖書館、社交、新鮮空氣、清潔而美麗的城市、野外的歡樂、博物館、美術館、演講廳、話劇和歌劇；而且只有當所有這些學校是免費而且人人可以享受的時候，認為無產者是粗俗的那種非難才能消除。

然而我們不僅要從較高級教育的這些因素所引起的直接作用中去找補救社會道德的最重要影響，我們更應該從財產和工業的各種社會主義形式中去找這種影響。因為財產和工業的各種社會主義形式，才是我們認為能否使這類較高級教育影響大多數

人的主要条件。再沒有任何事情能够像把一个人的物質生活条件和他的同伴們的物質生活条件等同起来更能訓練一个人把他的生活与社会生活等同起来的了。簡言之，再沒有任何事情更能像工業合作化那样訓練一个人把他的生活与社会的生活等同起来的了。像目前这样地强迫个人去承認社会倫理，只不过是几个世紀的事。因为自从早期的各种部落共产主义解体以来，直到現在，在比这些部落大几百倍的范围內，个人才第一次地不是靠本人直接的生产，而是靠一种复杂的合作来謀自己的生活，并滿足自己最基本的欲望。在这种合作的情况之下，个人努力的效果和价值几乎是無法加以識別的。对于个人主义私人占有的辯解，現在是被共产主义的生产事实的邏輯打破了：沒有人能够自以为是地有权去要求自己的劳动果实；因为他的整个能力和工作机会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遗产和貢獻，对于这个遗产和貢獻他不过是一个过渡的和偶然的受益人和仆人而已；而他把这些东西轉变为他自己所有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人們对于他的服务的欲望和需要。工厂制度、机器工業、国际贸易都推翻了个人主义的生产；而合作形式的完成（这是个人主义的資本主义促使我們前进的方向）将带来一个与社会倫理相符合的、可以使个人生活得相当好的普遍条件。

这种期待已經得到当代輿論現象的認可。适合于社会主义的道德观念正在渗透着整个現代社会。它們不仅在無产階級之中是显然可以被識別出来的，而且也表現在有产階級份子不断增长的慈善活动之中。这些有产者們一方面把社会主义非难为对社会的健康所必需的一种危險的夸大，一方面又很忠实地努力于不可抗拒地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各种緩和的改革。也許，形式不能胜过精神，正如精神不能預料形式一样；也許本文已經提出了一些根据，足以証明社会主义道德，如像以往的各种制度的道德一样，只不过

是人类生活条件所必需的道德，只不过是永恒的生命热情企圖通过个人对最自由的和最丰富的生活的追求而得到滿足的一种表現而已；在摆脱社会和个人从已产生的那种軟弱和愚昧而不断向前發展的过程中，社会主义不过是走向强健与文明的一个阶段而已，在这个阶段中，人們可以看出并选择自己前进的道路；社会主义不过是从沒有道德的混乱情况走向認識到道德就是理智的有意識状态；而且本文已作过一些企圖来証明社会主义的主要美德只不过是“常識”的証据而已。

第二部分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組織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财产

格拉罕·瓦拉斯

在社会主义的初期，一个人要是沒有准备好一套关于未来应该有的那种“社会”的完整說明，那么，他是不敢出面来解釋社会主义理論的任何一个論点的。每一个先驅者都有他自己一套关于組織财产、教育、家庭生活以及财富生产的方法。每一个先驅者都十分自信：假若人类为了要像神話中的王子和公主那样从今以后永远快乐地生活着，那么，他們只有按照他所規定的模型来改变他們自己。这样一来，每一年都会像上一年一样；而且不再有什么历史需要去編写了。甚至在現在，到处还有像格龙朗德 (Gronlund) 或伯伯尔 (Bebel) 之流的思想家，尽管他們对于企圖去預測不可知的事物感到抱歉，他們仍旧按照上述这种古老的精神来草拟一种理想的共和国計劃。但是社会主义者們，即使不比他們精神上的先驅者們更聰明些，至少現在已經普遍地不大願意使用他們的想像力了。部分地由于达尔文的貢獻，人們已經日益認識到个人与社会在發展上的因果关系；过去半个世紀社会主义运动所經歷的

斗争与失望；以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不断地采用了各种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倾向于放弃关于一种最后的与完满的社会改革的任何希望。我们现在更加倾向于把缓慢的与通常是不知不觉的“时代精神”的进步当做是社会进步唯一适当的原因，而且更加倾向于宁愿企图去发现并宣告未来的社会必定是什么，而不宁愿去把决心要使未来的社会应该是什么的人们组织起来。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新观念，和那种旧的社会主义观念一样，都是带有危险性的。五十年前，社会主义者们总想夸大社会主义理想的作用，总想从一种不可能的、所有的人们的良心的突然改变去指望每一件事情。可是今天我们却总想把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贬低——我们总想忘记，甚至时代精神本身只不过是个人奋勉和抱负的总和而已；并且我们一再忘记，在历史上那些可能会被推迟若干世纪或者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变革，都是由于人们坚持不懈地宣传某些新的和更为高尚的生活而得到实现的，这种新的和更为高尚的生活并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希望的产物。社会主义者们认为，在所有的問題当中，人们需要清醒地记起并明白地了解的，在今天没有再比财产这个问题更为重要的了。

人们对于财产这个名词的使用，几乎是和使用法律这个名词一样地赋予了很多的含义。我所知道的关于财产的最好的定义，乃是约翰·奥斯丁所下的定义。他认为财产是指“授予当事人的、关于使用或处理目的物的权力或自由的任何一种权利……这种权利一般地只受到所有其余的人们的权利的限制^①”。这个定义只能适用于私有财产。在讨论国家、市行政当局以及个人的各式各样

① 约翰·奥斯丁：“法学演讲集”，第四十八讲。

的债权时，把财产这个名词在较广泛的意义上不但用来指个人的“权力或自由”，而且也用来指“所有其余人们的权利”，也许是恰当的。在这个意义下，我将谈到国家的财产或市政当局的财产；而且我将把以物的形式表示的财产（或取得规定的物质对象的唯一权利）、以债务和未来劳务表示的财产以及观念表示的财产（版权和专刊权）区分开来。这种区分也许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区分而不是一种法律上的区分。

有价值的产权能够借以存在的实物可以粗略地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最低等的、依靠水果及昆虫为生并自己用树枝搭成草率的篷子以供夜宿的野蛮人部族当中，在生产行为与消费行为二者之间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可是，在一个人口众多与文明的国家里，甚至人们的那些最简单的欲望，都很少能够直接地由大自然来满足。几乎人们所消费的每一件物品，都是凭借把人类的劳动仔细地运用到物质对象上来生产和更新的。“土地”乃是人类的劳动借以发生作用的一般的物质资料。任何和这种一般的资料相分离或者已经由人类的劳动大大地加以改变了的物质资料，假若是被人们用来帮助生产，或者是在被人们消费掉以前需要进行加工的话，那么，这些物质资料叫做资本。当这些物质资料现成地可以被人们拿来消费的时候，它们就成了“可资消费的财富”。这样一种分析，虽然普遍地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所采用，却不免是太粗略了。任何一个人，除非他知道人们消费某一物品的方式，否则，他就不能够断定该物品是否现成地立即可以用来消费。一个处于天然状态的松树林是现成地可供具有风景僻好的公爵消费的，因为他将让这些松树在他的眼前枯萎下去。棉花在一个医生的手里是一种制成品，而在一个纺织工的手中却是一种原料。社会主义者们为使社会拥有生产资料和使个人拥有消费资料而努力这样一

种說法，是很足以代表他們的实际目标的。社会主义者們并不願意去阻止社会在任何时候把它的财产用于直接消費，例如，把一块公共土地用来作为公园，或者是把市营自来水管的利潤用来維持一个市立的圖書館。社会主义者們也不考虑有任何必要去阻止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对他的占有物进行加工，从而使它更有价值。甚至格龙朗德，虽然他非常討厭私营工業，即使他願意的話，他也不能够阻止任何一个公民为了追逐一种有利的买卖而在公共的火爐上把白面包制成加黃油的烤面包。但是，只要生产的果实公平地加以分配，那么，人們联合起来进行生产，較之联合起来对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财富进行消費，仍旧是更为适宜的。誠然，联合消費在經濟方面的节省和联合起来的生产在經濟上的节省是同样地巨大的，而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們主要考虑的正是这些問題。他們經常相信，假若几百人能够被說服而把他們的占有物和劳动所得拿出来組成一种公共資財，并把这种公共資財按照公共計劃加以使用的話，那么，一个在地上的天堂就会被創造出来了。从那时起，一系列徹底的实验已經証明，任何如像傅立叶的“法兰斯泰”或欧文的“新和諧村”(New Harmony)那样完整的联合消費制度，尽管这类制度明显地在經濟上是节省的，然而除了在十分特殊的条件下而外，大多数人就像現在一样对这类制度总是沒有兴趣的。我們的美术館、公园、工人俱乐部、或者是有錢的人們开始在由公共僕役的照料下的公寓中居住这一事实，的确表明了联合消費一年比一年更得到人們的了解和欣賞。但是这样一种情况仍旧是存在的，那就是：由大多数人的意志所選擇的那种快乐往往絲毫不被人們認做是快乐。

只要情况仍然如此，私有财产甚至私营工業就必然会和公共财产和公营生产同时并存。例如，現在每一家人都坚持要有一个

单独的住所，并且坚持要在单独的厨房中每天单独地做饭。这样做的结果，浪费与不舒适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目前，各个家庭宁愿选择浪费与不舒适，而不愿选择只是凭借组织和宣传才能买到的那种富裕。此外，英国的家庭在目前构成了若干孤立的、或多或少是受到专横管理的共产主义化的集团。我们越来越意识到我们个人的责任，越来越意识到妇女和儿童们所应享有的各种个人权利，这似乎已经把一些集团的孤立状态以及它们内在的依附关系减少了；但是在社会可以包办家庭生活或者是在家务可以由社会加以管理以前，上述这种趋势必须要更进一步地发展。这样，在我们不再感觉到一个英国人的家应该成为他自己禁止别人自由出入的堡垒以前，一切家庭生活资料的联合生产才能够发展到一个很高的水平。的确，建造房屋所用的土地是可以立即变成社会的财产的，而且当人们想起大多数的英国人民现在是如何住宿的时候，显然地他们是乐意居住由国家建造并为国家所拥有的舒适房屋的。但是，他们在目前似乎愿意坚持有他们自己的陶器和椅子、书籍和图画，并且愿意坚持以一种年收入或周收入的形式从他们所生产的价值中去取得一定的部分，而这个部分他们可以随自己的高兴把它花掉或把它储蓄起来。现在关于这一类东西，不管它是什么，只要我们容许一个人去占有，我们就必须容许他去交换，因为，除非进行交换的双方当事人都相信他们自己可以通过交换而得到利益，否则，交换是永远不会发生的。此外，我们还须容许财产的馈赠，因为，除非得到一种强大而带有检查性的公共意见的支持，否则，任何温和的遗产税或财产税一定会被人们逃避的。不仅如此，假若我们愿意妇女和儿童能够得到个人的独立，那么，只要我们完全容许人们拥有财产，他们的财产在未来一个长远的时期内就必须最小心地予以保护。

因此，留归社会拥有的将是土地（就这个名詞的最广泛的含义而言）以及各种形式的生产、分配和消費的物質資料，这些物質資料是可以方便地由比家庭集團更大的各种社團來經營的。这里的主要問題是在每一种情况下去确定所有权的範圍。就主要的交通工具和某些形式的工業而論，經驗已經証明，对它們加以控制的範圍愈大，管理的效率也就愈高。因此，邮政系統和鐵路系統，以及在可能的範圍內某些較大的工業所使用的物質資料，應該由英国人所組成的国家所有，直到在一个遙远的未来，当它們會轉給“英帝国联邦”（United States of the British Empire）或“歐洲联邦共和国”（The Federal Republic of Europe）所有为止。一般地說，土地掌握在較小的社会单位手中也許較为妥当。城市或农業区域的地租仅仅是部分地取决于各种天然的有利条件，这些有利条件可以輕易地、一劳永逸地、由一个英帝国委派的稅务官來加以估計。瓦尔魏克（Warwick）和伯明翰土地課稅价格的差异，主要不是由于这两个城市的位置不同，而是由于这两个城市居民的勤勉和性情有差异。假若一般的伯明翰人宁願緊張地努力以得到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不願过瓦尔魏克地方的那种比較簡單和比較宁靜的生活，那么，要讓瓦尔魏克人負担如像伯明翰城市土地那样多的地租，就有如坚持要人們在巴黎和在布列唐尼（Brittany）^①維持同一的舒适生活水平一样，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同时，作为整个国家生活必需品的各种天然財富，以及占有某些地区（例如矿区、港口或水源）的壟断組織必須“国有化”。今天的食盐联合壟断組織和煤炭联合壟断組織，将来在一种使得从事采矿的人們成为矿井的絕對共有者的制度下，即使同样是可能的，

^① 布列唐尼系法国西北部半島，該島系以农業为主，一般生活水平較低。

然而也同样是不方便的。甚至在土地绝对地为各种地方团体所拥有的地区，这些团体将仍旧必须把它们收入中的若干部分交给国库。至于组成社会的各个单位的大小，在每一种情况下，都将依据方便原则来确定。“州政府条例”(County Government Act) 以及教区制度和市区制度的发展，很可能迅速地为我们准备好各种管理的单位，而这些单位会可以很容易地被转变为占有财产的单位。

公社 (Communities) 的储蓄——假定我可以用公社这个名词来表示从教区起直到整个国家为止的任何社会民主主义单位——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目前资本积累所采取的那种形式，那就是说，公社储蓄的一部分将会包括着工场、机器、铁路、学校、以及其他用于未来工业的专用材料；而另一部分将会包括着譬如食物、衣服之类的货物储备，以及在工人们进行不能立即得到报酬的工作时用来维持他们的生活的货币。个人的储蓄，一部分将会包括着可资消费的货物或尚未实行社会化的那类工业所使用的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将会包括着延期支付的、人们提供给公社的各种劳务的报酬。这类延期支付的报酬可以采取一种在领受人达到一定的年龄时即行支付的养老金的形式，也可以采取一批货物的形式或者采取提取即付的货币形式。

各种自愿组织起来的社团，无论是股份公司，宗教团体，或者是共产主义性质的集团，在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看来，只不过是包含着许多被允许拥有财产权的个人而已。它们在将来也如在过去一样，可以起很多极为有用的作用；但是，各种城市公司的历史、新河公司 (New River Company) 的历史、罗琪达尔先锋社 (Rochdale Pioneers) 的历史、或英国教会的历史，都向我们表明，虽然这一类社团可以公开地为了慈善的目的而存在，可是把永久的财产权给予任何一个不随着公社一同发展的社团总是危险的。甚至就各个大

学的情况来看，虽然在这方面人們發現独立拥有财产的社团制度运行得最好，可是国家仍旧應該只讓它們来代表国家拥有财产权，而不應該把财产权分讓給它們。

在这个論点上，現代社会民主主义者所采取的經濟立場是和目前合作运动的那种美化了的合資主义 (Joint stockism) 或早期社会主义者的那种目标有很大的距离的。对于早期社会主义者的目标來說，一个完整的公社总是要比一个完整的、把所有的公民包括在內的社会重要得多。甚至今天的社会主义学者也并不一定了解到：为了达到使公民掌握财产的目的，必須按照合資的原則或地区的原則来对公民进行分类。尽管格龙朗德在他所著“合作共和国”一書的某些部分中充滿了矛盾的觀點，但是他仍然宣称：“每一組工人将有权把他們的产品的全部交换价值在他們自己当中进行分配”。这句话可以意味着，只要工人們在工作，他們就一定会成为他們所使用的那些物質資料的絕对的联合所有者，或者也可以意味着工人們將一無所有。現在，人們認為，由公民自願組織起来的任何社团都應該在生产資料方面掌握絕对的与永久的财产权，这种主張似乎并不是向社会民主主义前进一步，而是对整个社会民主主义观念的一种否定。当然，这种情况是会使我們感到下述困难的：假若我們的公社甚至在初期就已經把整个人口包括在內，然而却是与外界隔絕的，也就是說，假若我們的社會仅限于包括最初的那些成員以及他們的子孫，那么，新來的人們将会如像羅馬的平民 (Plebeians) 或雅典的“麦提人”^① (Metoeci) 那样組成一个階級，尽管他們获得充分的个人自由，然而他們却不能分享公共的财产。这样一个階級的存在，对于社会來說，必然永远是危險的。从

^① 古代移居希臘的民族，他們不是希臘的公民，他們必須照規定繳納指稅，但較之臨時居住在希臘的外國人，享有某種權利。這種民族大多集中住在雅典。——譯者

另一方面說，假若新來的人們可以立即得到充分的經濟權利，那麼，任何一個在自己境內建立了社会主义或者建立了接近于社会主义的任何制度的國家，將會立即受到來自生產資料仍舊嚴格地被壟斷的那些國家的無產移民的侵犯。假若這種情況是容許的，那麼，通過報酬遞減律以及以它為基礎的人口法則的作用，這個國家的（甚至一個社会主义國家的）全體居民的生活就會被壓低到只能維持生存的地步，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們似乎沒有必要去作出這樣一種結論：假若社会主义將在任何地方建立起來的話，那麼，它必定會在整個世界上建立起來。我們所必要作出的結論，就是我們面臨着這樣一種日愈明顯的事實：在任何一个單獨的歐洲國家中，任何一種下定決心的、旨在提高無產階級地位的嘗試，必須要用一種僑民法律來配合，這種法律一方面應該周到到足以防止對避難者的苛待，或者防止對那些會提高我國知識和工業水平的人們的來臨加以阻礙；另一方面又應該嚴格到足以排斥那種令人可愉快的“異邦人的洪流”（*diluvies gentium*），也就是排斥歐洲大陸上的各個軍事帝國有準備地向我們國家的任何一塊空地上所投進來的這種人類的渣滓。這種法律本身可能是一種禍害。它也許不會公正地付諸執行；它可能會滋長民族的自私並可能會危害國際的友誼；它需要我們劃出許多很難加以區分的界綫；可是人們至今還未曾進一步地提出充分的論據來反駁這種法律的必要性。

從歷史上的各個時期看來，歐洲的法律對於以債務表示的私有財產所採取的看法已經根本地改變了。按照古老的羅馬法律，債權人可以變成他的債務人的絕對所有者。在今天，非但一個人可以用宣告破產並交出他的一切有形財產的辦法來抵銷他的債務而仍然保留他個人的自由，而且按照工廠條例、雇主責任條例（Emp-

loyers' Liability Acts)、以及爱尔兰土地条例 (Irish Land Acts) 等等的規定，某些契約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說是不合法的。隨着社会主义的發展，上述这种趨勢將會加快。法律會以極端的反感來看待任何使當事人的一方那怕是暫時降低到奴隸地位，或使當事人的另外一方那怕是暫時無需履行任何有益於社会的義務而能夠生活下去的協議。由於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取得一定的生產資料乃是個人自由的首要條件，因而法律可以拒絕承認任何阻礙一個人去取得生產資料的協議，或者可以拒絕承認任何剝奪人們的勞動果實的協議。今天任何人都無須借債來為自己提供工作機會，也不容許為了得到一筆貸款而放棄工作機會。由於這種情況使得債權人收回貸款更為困難，因而也就會使可能成為債務者的人取得貸款更為困難。我們現行的住宅法 (homestead law) 將會在事實上被擴大到可以適用於國家認為對一種完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每一件事情。但是，只要私營工業和交換繼續發展到使私營商業制度感到方便的地步，那麼，各種期票 (Promisestopay) 也就必然會一直在流通，而且，假若有必要的話，這些期票是可以在上面指出的條件下用法律來強制流通的。

無論在何種程度上我們容許私有財產存在，我們必須在同樣的程度上也容許私人取得地租和利息。假若你容許一個自私的人擁有一張拉斐爾 (Raphael)^① 的繪畫，那麼，除非你讓他為給予人們欣賞這張繪畫的特殊權利而收取若干費用，否則，他會把這張畫鎖在他自己的房間里。這樣一種費用立刻就成為利息。假若我們希望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去欣賞所有拉斐爾的畫，那麼，我們不僅必須不容許人們為得到報酬而去展覽它們，而且必須不容許人們擁有

① 拉斐爾(1483—1520年)系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意大利著名的畫家。——譯者

它們。

上述这个論点，除了适用于拉斐尔的画而外，也适用于其他事物。假若我們容許一个人拥有一个印刷厂，或者一个犁田机，或者一套訂書工具，或者房屋或农場的租借权，那么，我們就必須容許他这样地来使用他的占有物，那就是：在不伤害他的邻居的情况下，他可以从他的占有物去取得最大可能的利益。假若不如此，那么，有鑒于社会并未負起責任去合理地使用这些东西，来自社会的任何干涉都很可能会引起对这些东西的全然不合理的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一切为私人拥有的生产資料，当它們未被它們的所有者实际加以使用时，就像是一个法院案件的各种实验材料一样，会完全被浪費了。人們容易識破，貝德福特公爵 (Duke of Bedford) 在以地租方式掠夺柯文特大菜市 (Covent Garden) ① 的群众。但是人們却不容易識破，邻近遐福慈宝利大街 (Shaftesbury Avenue) ② 的那些空地的所有者在过去若干年也曾以地租的方式掠夺过那里的群众，而这种地租乃是人們为了使用这些空地的所有者任其荒廢的地基而應該支付的。我知道某些社会主义者有时曾經說过：“讓我們允許制造商保留他的工場并允許阿 吉尔公爵 (Duke of Argyle) 保留他的土地吧，只要他們不把工厂和土地在以得到一部分別人所生产出来的財富的条件而租給別人来进行剝削就行了。”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告訴我們說，这个制造商或这位公爵将很快發覺：为了生活，他們必須刻苦地工作。对于有意去了解公爵們或資本家們是怎样刻苦地以他們的劳动去換取他們每天的面包的人們來說，这类意見是易于接受的。不幸得很，在英国可以充分有利地用来作为代替那些附有私人財產的田地与厂址的代替物而同时

① 倫敦的大菜市，因該地曾做过修道院，故名。——譯者

② 倫敦的大街。——譯者

又未被人們占用的田地与厂址是沒有的。假若群众願意对阿吉尔公爵和張伯倫先生 (Mr. Chamberlain) 的财产支付較少于其全部經濟地租的任何代价而不願意进一步生活得更坏的話, 那么, 群众仍旧是聰明的。因此, 假若我們既不允許这些老爷們把他們的财产租給那些願意使用这种财产的人, 又对于把这种他們的财产拿过来并為我們自己的利益而加以使用表示犹豫, 那么, 我們实际上就会是在浪費精力了。具有进步性的土地和資本的社会化, 必須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 那就是: 通过对地租利息征税并由公家用这种稅收所得到的資本把劳动者組織起来, 从而把土地和資本直接轉归社会所有。土地和資本的社会化是不能單純地用規定一系列限制它們用于私人剝削这样一种方式来实现的。这种和公有财产同时并存的私人剝削, 無論怎样地不受限制,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恢复資本主义那些原有的罪恶, 因为, 人們在習慣方面的任何改变, 或者是使得人們对任何一种物品大規模地实行联合生产而感到方便与有利的工業生产方法的任何改变, 正如同样的条件在美国立即引起一种联合壟断組織的形成那样, 都会立即引起我們的国家去对那种进行大規模联合生产的工業加以接管。

正是由于完整的所有权对于任何物質資料的最合理和最有效的利用是必要的, 因而任何只課征地租与利息的租稅制度, 除了作为向社会民主主义的一种过渡制度而外, 是不可能存在的; 甚至当人們采用如像亨利·乔治那种急进的、以国家作为总的遙領地主的土地制度的方案时, 其情况也是如此。的确, 那种只容許国家收受地租与利息而禁止国家雇用劳动者的無政府主义的理想, 显然是行不通的。除非我們願意以現金的方式把未来的“国有地租” (State Rent) 的一个份額付給每一个公民, 否則, 就必須像今天的各种稅收那样, 要把这种“国有地租”全部地用来支付公民們所完

成的工作。对于一个社会主义的立法机构来说，要去决定在何种限度内可以容许各个公社去举借债务或支付利息，总会是一种十分严重的困难。一旦社会主义被建立起来，上述这个问题，必然会成为对它的稳定性的主要威胁。关于来自一个参加辩论会的、初次考虑到这个问题的演说家或者来自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的熏陶下长大的有教养的人们的那种对社会主义的拙劣攻击，我们大家都是知道的。这些人告诉我们说，假若在明天就把财产将会加以平分，那么，在今后十年内，在每一百个人当中，将会有四十个人要拚命地工作，而其余六十个人则可以懒惰。可是在十年以后，偷懒的那六十个人会必然要拚命地工作并养活原来勤劳的那四十个人，这四十个人将会和以往的那六十个人一样地懒惰。要去解释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平分所有的财产是很容易的；但是，要防止作为上述论点的根据的那种人性方面的趋势的任何后果，那就不太容易了。人们对于现在的快乐和将来的快乐的相对估价是相差很大的。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要是每天工作四小时就可以维持生活的話，那么，总会有些人急于要工作八小时，以便为他们自己或为他们的子女获得未来利益的保证；并且一定也会有另外一些人急于要逃避他们的四小时的工作，为了现在的快乐，他们宁愿使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子女遭受未来的任何程度的贫困。只要实际情况如此，那么，各个公社也和个人一样，总想自己享受到那些特别能干而有远见的人们所慷慨地提供的种种劳务，因而会在这样一种借口下去举借公债，那就是：它们正在把对这类劳务所支付的款项，分摊到所有受到这类劳务的利益的人们身上。英国的市政当局、工程委员会、学务委员会等等早已举借了为数巨大的地方公债；除非人们在今后几个月内会变得更聪明一些，否则，各个新的州会必然很可能要增加这种债务的负担。只要我們

坐下来想一想、借助于一种禁止各个公社在任何情况下举債的法律，似乎就可以把任何未来的这一类困难防止了。但是，就中央与最高政府來說，这样的法律当然会是一种可笑的事情。假若在一个国家中，大多数人都願意忍受国家公債或任何其他灾害的話，那么，这个国家就不能够避免国家公債或其他任何灾害。我們确乎可以看出，各国人民对于他們的政府應該逐年使收支平衡的这种感覺是如何地一天比一天增强起来。甚至在法国，国家公債也不再以原来的那种满不在乎的飞快速度增长了。可是地方公債却仍然在增加。在普列斯頓，据說地方公債达到每年課稅价值 (Rating Valuation) 的七倍。虽然在目前 (1888年11月) 由于“文明边缘上的波浪” (Surf of the edge of civilization) 只掀起了三次小規模的殖民战争，因而我們自己的国家公債正在緩慢地下降。可是，假若明天我們会对任何一个欧洲的国家宣战的話，那么，任何一个內閣都不敢憑借对所得或财产的直接課稅来筹集所有的战費。也許有人会反对說，不能憑借对所得或财产的直接課稅来筹集战費这种危險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产生，因为任何可以提供一策公債的基金同样地是易于置于直接課稅的範圍之內的。但是，假若我們所談的是不久的将来的那个社会，那么，确乎会有許許多多非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們，或者是在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拥有财产的英国人，他們会准备在可靠的保証下借錢給胆小的、走头無路的、或不誠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此外，在極端窘迫的时期，一个国家的政府也許本身会認為有必要甚至去取得个人的占有物，在这一类場合，不論支付利息或不支付利息，要是不偿还这些私人占有物是会有困难的。在任何情況下，新的公債持有人和旧的地主之間所存在的經濟差別，并不比作为斯特朗德 (Strand) 地区的所有者的賽立斯伯里勋爵 (Lord Salisbury) 和現在已經把他的那些貧民

所居住的地区卖掉而买成统一公债的赛立斯伯里勋爵之间的经济差别更大。发行普通公债最严重的危险也许是由那些具有特殊能力的人们的报酬问题所引起的。经过了一连串合作的试验与失败以后，现在的社会主义者已经取得这样一种教训，那就是：除非按照工作的多寡与强度的不同而支付不同的待遇，否则，私人冒险所能得到的种种利益必然会使具有特殊经营天才的人们不愿为公社服务。为了保证充分的工作效率，这种待遇上的差异究竟要有多大，这只能凭经验来加以决定。当社会的教育与道德改进了的时候，当工业彻底实现社会化从而使人们要走私营企业的道路是不大切合实际的时候，像平等一类事情最后才有可能实现。但是，到了那个时候，那些过着繁忙和有益的生活的人仍应得到巨大的收入，因为这些人往往热衷于使他们在晚年得到优闲与舒适的生活，并使他们的家庭能够昌盛^①。我早已提示过：一个受雇于公社的人的若干工资收入，可以暂时保留在公共的金库中去积累而无需支付利息。现在，对于上述那些过着繁忙和有益的生活的人们以及对于他们同时代的那些较为懒惰的人们来说，把前者的劳务报酬订在一个很高的水平而留待下一代人来支付，可能对二者都是适合的；但下一代人也可能会愿意选择一种经常以小额支付的方式而不愿意企圖以一次付清的方式来偿还这种积累起来的资本总额。人们往往暗示说，防止人们采取上述这种支付的方式的一种办法，应该是培养每一代人以正确的冷淡态度去对待他们的先辈人为了他们的利益所举借的债款。但是，每一个新的世代的公民们，并不是经过长久的间隔时期才以集体的方式来取得公民身份，而是每一个星

① 幸好在推测关于社会化了的公社时，对于那些没有得到财产的孩子們特别是对于那些弱者或者是那些不大可能得到丈夫的妇女們的命运的一般忧虑，我們是可以不加考虑的。

期都以为为数不多的方式来取得这种身份。我們必須警告热中于貸款的人說，借故拒絕还債的事情是經常会由于机智地应用所得税这类紧急的措施而引起的；并且我們希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的發展在这类問題上会使人們具有并保持住某种一般的、最低限度的普通常識。假若这种最低限度的普通常識足够控制中央政府，那么，地方政府的公債便可以輕易地并严厉地受到限制了。

以劳务表示的财产当然是指以未来劳务表示的财产。人們可以交換或拥有过去的劳动所生产的财富，但劳动本身却是不能交換或被拥有的。現在我們所知道的一切法律制度都允許私人為将来履行某些劳务而相互訂立契約，并且对于这类契約的違約行为已經加以处罚或者允許受到处罚。在这方面也如在债务方面一样，我們对于个人自由的日愈尊重；已經使得法律对一切苛刻的協議（無論是一个公民本人訂立的或别人为他訂立的協議）表示反感。就像西狄威克教授所指出的，事实上“在英国，任何提供个人劳务的契約，几乎都不能給受約人以一种超过金錢上的賠償以外的法律权利——換句話說，几乎所有这一类的契約，假若不能履行的話，那么，就它們的法律上的效力而論，只能轉变成純然的貨幣債務^①”。对于这一条規則來說，婚姻契約形成了唯一主要的例外；但是甚至在这种情况下，在大多数欧洲的国家中，似乎也有一种放寬这种硬性法律的趨勢。

从另一方面說，在目前国家对于它的公民的劳务的直接要求权并没有显示出遞減的跡象。强迫服兵役与强迫受教育已經把法国和德国每一个男性居民相当大的一部分寿命占去了。就英国而論，强迫成年人以任何一种身份去服役，在过去一个世紀就已經受

^① 西狄威克：“政治經濟学原理”，第435頁。

到了譴責，因为人們認為强迫服役和公开市場的自由契約制度比較起来乃是一种浪費与压迫。大多数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似乎傾向于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替国家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应该由人們自願地去担任，并且应该用公营工業的产品来給予这些工作以报酬。

在考虑国家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有权要求其成員为它尽义务的时候，我們碰到了这个更大的問題——我們为社会主义工作到什么程度，并且将为共产主义工作到什么程度？在純粹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們对社会主义这个名詞是按它的最狭意的意义来加以使用的）国家根本不会对任何公民提供任何利益，除非他願意支付足以弥补生产这种利益的各种费用（例如，在这个意义上，邮政現在乃是一种純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条件下，国家就無权要求其成員为它尽义务了。强迫人們工作的情况只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發生，那就是：假若一个人不願意工作，那么，他就有受到飢餓的危險。从另一方面說，在純粹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如像路易·布朗（Louis Blanc）的格言所說的“各尽其能，各取所需”那样，国家将会滿足任何一个公民的一切合理的欲望而無需規定什么定額和价格。目前我們飲用的噴泉就是我們周圍的許多純粹的共产主义例証中的一个例子。但是，由于不用劳力就可以制造出来的东西是沒有的，因而国家所提供的各种物品必須用公民們自願的或强迫的劳动去生产。在純粹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假若需要强迫人們去进行任何工作的話，那么，这种工作必須是直接强迫的工作。我們必須要有若干具有共产主义性質的社会組織。事实上在英国这类組織正在日愈增多。的确，假若由于用在工業方面的最优等的与最劣等的物質資料之間的差异而引起的那种租金（Rent Fund）的全部或任何一个部分可以用租稅或其他方式而收归国有的話，那么，这种租金（或者更正确地說是这种租金的支出所产生

的利益)除了用共产主义的方式而外,几乎是不可能用别种方式加以分配的。由于人們現在已被我們商業制度的种种不道德的原則所浸透,因而国家在决定哪些欲望無需实行必要的直接强迫劳动就可以任意地得到滿足的时候,必須十分謹慎。国家决不会花用一个不可能担負的金額去供給每一个公民以設有臥鋪的勉强可住的住所,并且供給每一个公民以足够每天食用的稀飯、面包和乳酪、或者甚至杜松子酒和水。任何一个神志清楚的人都不会主張在現有的公共道德状态下去这样做的。欧洲的無产階級在过去一个多世紀的时期中,曾經被他們的雇主們迫得尽可能地少做工作。他們已經被講求实际的工会經濟学家教会了这点,并从他們自己痛苦的經驗中学会了这点,那就是:不論任何时候,只要他們当中的任何一个突然具有奢望或善意的人超出他的义务之外而尽量工作,他就不仅会加重他自己未来的無償劳动,而且也会加重他的伙伴們未来的無償劳动。同时,每一种單調、丑恶与使人焦慮的环境都必定会尽可能地使工作变得令人感到疲乏与厭惡。現在,所有的工人几乎毫無例外地把工作日視為是一段被奴役的时间,因而他們只有在交錯在工作与睡眠之間的那几个小时或那几分鐘中去寻找快乐。对于少数工人來說,快乐就在于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同志去作額外的思想工作和演講。其余的工人所关心的不过是对穷人和工作过度的人們都可能得到的那类粗野的快乐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假若他們梦想(就像人們指責他們在梦想那样)对世界上的各种好东西实行某种普遍的瓜分,也就是对使人們可以完全过悠閑生活(即使是一两个星期也好)的某些工具实行普遍的瓜分,那么,他們是可以有很多借口的。

但是,在工人階級胜利的时候,可以自由地相互提供而不致引起他們最軟弱的弟兄們放弃任何一种有益的社会工作的那些劳动

产品是存在的。在这类产品中包括着我们曾经借助于版权和专利权而使之屈服于私有财产的统治之下的那些思想。使我们感到幸运的是：这种私有财产的统治既不是完整的，也不是永久的。假若对我们光荣的宪法的大部分细节负有责任的辉格党的地主们也是追求利润的作家和发明家的话，那么，我们很可能应该取得最严格的永久财产权，或者甚至应该在思想方面取得最严格的继承权；而且现在就应该有一个莎士比亚公爵(Duke of shakspere)，我们所有的人应该为了取得阅读他的祖先著作的那种特权（假定我们把所借的那本书毫无损坏地在两个星期的末了归还的话）而付给他两个英镑或者三个英镑。但是，甚至在目前版权与专利权继续存在的年代中，那种允许一个作家或发明家垄断他的思想的制度，无论是在对他的作品给予报酬方面，或者是在满足公共的欲望方面，都是一种愚蠢而無益的办法。在每一种情况下，作家或发明家都可以用使很多人（很可能其中的大多数愿意读他的书本或使用他的发明）的欲望确乎得不到满足的办法来得到最大限度的纯净报酬。我们大家都知道，当公众付给滑铁卢桥的所有者的钱比这个桥的所有者凭借任何一个过路捐的方案所可能赚得的钱更多的时候，公众仍旧是做了一次很便宜的买卖。同样地，我们可以断定，任何一个为了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幸福的政府，都可以给予一个有能力的艺术家或作家以较多的报酬，这种报酬甚至可能要比他从现在的那些富有的赞助人那里所得到的报酬多得多，而且也一定比他把自己把作品在一个少数人占有财富（他们并不曾为取得财富而工作）的社会中去出卖或展览所能得到的钱还要多得多。虽然国家可以像这样地对某些类型的脑力劳动付给一种慷慨的巨额报酬，可是并不能因此而推论说，在没有任何其他重要的竞买者的情况下，国家也是会不得不如此去做的。

病人、身体衰弱的人以及入学的兒童經常总是存在的，这些人的欲望可以由公共的資財来滿足而無需要求他們承担任何一部分公共的負担。特別應該很好地用实际經驗去教导兒童具有节省和快乐的精神，这种精神，就那些适当地受过訓練的人來說，是从那种用于直接滿足欲望的联合組織以及在制造物質財富方面的联合組織中产生的。假若我們希望使兒童們和英国家庭的那种自私的孤立状态割断关系，和那种經歷了四个世代的資本主义所产生的比野蛮人的習慣更坏的習慣割断关系，并且和那种渴望刺激而又不能得到合理享乐的心情割断关系（这种心情乃是在英国的工厂中消磨工作日并在英国的街道上消磨英国式的星期日的自然而然的結果），那么，我們必須慷慨地与大量地对我們的学校予以捐助。假若我們这一代是聰明的，那么，我們这一代就应在教育方面不仅較以往任何一代人花更多的錢，而且也需要較将来任何一代人花更多的錢。我們这一代不仅應該以舒适的設備充实校舍，而且甚至應該以更高級的奢侈品充实校舍。我們这一代應該供应集体伙食，使人們可以在周圍装有美丽的圖画的餐厅中或者甚至在如像約翰·弥尔頓 (John Milton) 所提議的充滿了音乐之声的餐厅中布满花朵的餐桌上吃飯。我們这一代應該严肃地向自己提出易卜生的这样一种理想，那就是：每一个兒童應該被当做一个高尚的人来加以培养。不幸得很，我們这一代是不聰明的。

当人們考虑在一个处于如像我們現在所处的这种工業与道德的發展阶段的民族中財產公有的可能限度的时候，把注意力集中到（就像我所注意到的那样）社会主义所不可避免的困难与限制而不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主义未来發展的种种希望，也許是适当的。但是我們必須經常記住：社会主义企圖解決的問題是和本身不断在变动的各种条件有关的。如果說，在一个如像澳洲黑种人那样

由个人主义的野蛮人所组成的民族中，任何相似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一类的制度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这类制度除了凭借外力而外，也许就不能在一个如像布列唐尼农民那样的民族中被采用（因为对于这类民族来说，要求得到在任何一块无论怎样小的土地方面的绝对财产权希望立刻会成为他们最强烈的快乐与唯一而充分的勤劳的动机），那么，同样地，在一个比我们自己在社会方面和工业方面都更为先进的民族中，我们现在不敢为之奋斗甚至不打算去认识的那种社会状况将会可能出现。我所大致描绘的这种初步的和有限制的社会民主主义，乃是走向我们所希望的那种较好生活的必要的与确定不移的步骤。每一个人和他的同伴所共同具有的利益愈来愈趋向于比他自己所具有那些特殊利益更为重要。我们看到，上述这种过程甚至在目前就已经开始了。只要公共图书馆一旦建立起来，工人就会发现，作为一种产生快乐的手段，他自己书架上的那几本书和他在公共图书馆收藏中所享有的那个份额（虽然去生产这个份额甚至花费更要少些）比较起来，那是少得多么地可怜。同样地，一个手艺人所拥有的几十个英镑的财产，拿来用于生产方面是日愈无利可图了。因此，这个手艺人几年以前还可以作为一个小资本家去自己经营，而现在却要在某个巨大的企业中为得到工资而工作，并且他把他的微小的储蓄当做一种基金，以备在生病时可以维持几个月的生活或在年老时可以维持几年的生活。工人很快就会知道，作为一种生产食物的手段，他自己的火爐和公共的厨房比较起来，是多么地可怜。最后他也许不但要从公营的商店中去购买他的衣服，而且要从公共的陈列馆和戏院中去饱他的眼福，从公共的歌剧院去饱他的耳福；而且当我们目前那种在意见方面的无政府状态业已过去的时候，也许他还要从公众所选择的教师那里去活潑他的心灵。于是，这样一种生活最后将成为

所有的人都可能享受到的生活，而且甚至将成为今天最富有的人和最有权有势的人都不能享受到的生活。我們称之为社会主义的这种财产所有权制度本身無非就是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正如一个良好的下水道体系意味着健康或者印刷术的發明意味着知識一样，并沒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社会主义的确不是产生完滿的人类幸福的唯一不可缺少的条件。在最公平而又可能实现的社会制度下，我們仍旧必須面对那些并不是直接由于贫穷与工作过度所引起的罪恶和疾病；我們仍旧会遭受到各种精神上的痛苦和困惑，而这些痛苦和困惑，一些人說是由于宗教的信仰所引起，而另外一些人則說是由对宗教的怀疑所引起；我們仍旧会看到民族仇恨的爆發，并且会看到較弱小的民族的退化与消灭；我們仍旧会使这个世界变成除了我們人类而外的其他种屬的地獄。但是按英国每个六口之家就有五口人要靠周工資生活的这样一种情况來說，社会主义的确会是一种幸福的新生。工人們毫無兴趣和毫無希望地有如在一个罪犯的牢獄里一样每日要去从事的那种为时很久的工作，他們住所的那种可怕的污秽，尤其是那种令人憂虑的生活的不安定，以及那种作为資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后果的、不應該由工人忍受的灾难的經常恐惧等等，所有这一切将会消逝。可是教育、娱乐以及那种現在使工人們一想到就憤怒的那种悠閑，将会成为工人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就有如在伯恩揚 (Bunyan)^① 的小說中那頂王冠悬挂在那个扫粪堆的人的上空一样，社会主义現在是悬挂在工人們的上空的——只要他們願意抬起头来看的話，那么，社会主义是为他們預备好了的。甚至对于那些似乎要逃避社会主义并用使我們这一世紀遭受苦难的办法来牟取利潤的少数人來說，

^① 伯恩揚 (John Bunyan, 1628—1688年) 系英国的宗教小說家，其名著有：“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 等。——譯者

当他們由于充分認識到在他們周圍的那些人們的处境而产生的那种充分的同情心将会成为快乐的源泉而不是像現在这样成为經常憂虑的源泉的时候——当一个人公开地为他的最高理想而奋斗将不再被認為似乎是愚蠢或伪善的时候，社会主义也会使他們过一种新的和更加高尚的生活。对于这些人当中的每一个人來說，只要他一旦准备付出代价，他就可以有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他們可以按照他們的同胞所要求的同等权利来同样地过純朴的生活。他們可以凭借献身于最高尚的事業而使他們的生活具有意义。至于他們的报酬（假如他們要求任何报酬的話），他們是要如像其他的人一样必須等待的。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业

安妮·貝桑特

关于未来工业组织的计划，可以按照两种方式来加以拟订。在这两种方式当中，非常容易然而没有多大用处的是草拟一个乌托邦式的计划，草拟这样的一个计划乃是一种智力锻炼，在这种锻炼中，唯一需要的东西仅仅是一些有条不紊和生动的想像力而已。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需要关于实际情况的知识，这种知识对他确乎是一种障碍。对他来说，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不存在的。他认为，他自己就是规律；在他想像中的男人和女人并不是一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看到的、反复无常的、缺乏恒心的、没有规则性的有机体，而是一些服从他的操纵的自动机。一言以蔽之，他并不是在建设而是在创造；因为他把他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以及在他們身上发生作用的各种规律弄成是一模一样的，并使所有这些人和规律都去适合一个理想的目的。在描绘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达到完美境界的界限不过是这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像力的界限而已。

第二种方式虽则看起来不很动人，而且也较不容易，但是却比较有用。这种方式是从社会的现状出发，企图发现隐藏在这种现状后面的各种趋势并追溯这些趋势在制度方面的本来优点，因而不是去预测遥远的未来，而只是预测下一个社会发展阶段。这种方式把注意力集中到由进化所引起的各种巨大变革，而不是集中

到由災害所引起的細小變動；並且它把注意力集中到使社會發生改變的各種革命，而不是集中到僅僅是推翻王位并把國王斬首的各種暫時性的暴亂。我所選擇的正是第二種方式，因此，這篇討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工業的文章將從威廉·克拉凱關於過去一百五十年中已經在發展的工業進化的論點談起，在繼續發揮他的論點方面，也就是在預測關於社會可能經過的各種過渡階段方面，我將偶爾談到將來總有一天會出現的那種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我草擬的這個計劃本身必然要受到人們的各種批評，而這些批評是可以用來對准一個在理想上不是完美的社會開火的。因此，讀者必須記住，我只是試圖擬出在我們現在所理解的男人和女人當中切實可行的各種變革；我始終只是企圖提出可能的是什麼，而不是企圖提出在理想上最好的是什麼；並且我始終只是在各種可能的變革中去選擇那種目前正在通向理想社會並且更易于進一步接近理想社會的變革。事實上，本文乃是回答“為什麼”這樣一個問題的一種嘗試，而這個問題在我們討論社會主義時是常常可以聽到的。大多數人對於社會主義是全部地或部分地接受的，就是說，他們在理智上對社會主義理論的正確性是信服的，或者說，他們在感情上是受到社會主義理論的美好性所吸引的；但是他們對於參加社會主義理論的宣傳却是猶疑不決，因為他們“不了解你將從哪里開始”，或者“不了解你將在哪里停止”。這兩個困難都被這樣一個事實所消除了，那就是：我們並沒有“打算去開始”。任何社會永遠不會有一個從個人主義跨到社會主義的分界點。從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這種變革是永遠不斷地往前發展的，我們的社會現在已經走上了向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我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有意識地和在起着作用的各種力量相配合，這樣，我們就可以使個人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較之在沒有這種配合的情況下更加迅速。

本書的第三篇論文向我們指明：資本主义的胜利造成了一种立即为大多数人所不能容忍的局面，因而它也就易于被大多数人所推翻。目前，各种小工業的破灭已經使通常存在于大雇主和雇傭劳动者之間的大多数等級瓦解了，并且代之以一个悬隔的深渊，在这个深渊的两岸，一边是为数很少的資本家，另一边是为数众多而飢餓的無产者，他們相互对立。雇主在他和他的“劳动人手”的买卖关系中对于人类同情心的否認，已經教会了“劳动人手”把雇主当做是在自己同情范围以外的人。“尊重公众对于财产权的意識”，归根到底，無非是每一个人想保护他自己的一小点财产的私人利益而已。自从許多人丧失了自己的个人占有物并看到财产累积在少数人手中以后，这种尊重已經减少了。現在这种尊重不过是从上一个社会状况承繼下来的一种傳統罢了。这种“公众意識”对于是用来反对社会而不是用来为社会謀福利是属于那个非个人的抽象名詞“公司”而不是属于我們的邻居的那种資本的沒收，即将采取寬宥的态度，不，这种“公众意識”将会首先准許沒收这种資本，然后会进一步要求沒收这种資本。对于一般的人來說，国家夺取和我們的妹妹結婚的詹姆士·斯密的小商店，或者是夺取我們那个从早到晚为生活而工作的山姆的兴盛的企業，这是一回事情；然而，当詹姆士和山姆被一个由股東們（关于这些股東們，人們除了知道他們支付低額工資并取得高額紅利而外，对于他們的其他任何事情是一無所知的）所組成的大公司所击败因而被迫变成这个公司的傭工而不能拥有他們自己的商店与机器的时候，这又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抗議国家沒收股東們的資本，把詹姆士和山姆从在工头支配下的那种工資奴隶地位解救出来变为股東和国家職員，使他們在自己受雇的企業中对企業的管理具有發言权，这将对誰有利呢？

因此，讓我們假定：資本主義制度的進化只要沿着目前的各个方面向前推進一步，使工業的控制權集中起來，並不斷地以節省勞力的機器代替人工，那麼，這種進化就會伴隨以並且必然繼續伴隨以失業人數的增長。失業人數可能會增加或減少，就有如一個漲潮的某些波浪向前推進數尺時，另外一些波浪卻觸到了一個較低的水平面。但是，這個潮水會不顧微漪的波動而上升，同樣地，失業的人數會不顧暫時的上升和下降而不斷地增長。由於失業人數的增長，國家可能會開始初步把工業組織起來；但是迅速地隨着這種對工業的組織而來的將是社會對某些大托辣斯的接管。

英國之被分為若干具有明顯界限的區域，而且每一個區域有它自己選舉出來的行政當局，這對於任何一個有效的組織計劃都是重要的。正在到來的那種變革的徵兆之一，就是里奇先生在完全不意識到他的行為特性的情況下所創立的“公社制度”(Commune)。他把英國分為若干受州會管轄的地區，因而創造了一種管理的機構，沒有這種機構，社會主義就會是不切合實際的了。誠然，他僅僅是擬出了一個需要加以充實的綱要；儘管社會主義者無權提出這種綱要，但是社會主義者卻能充實這種綱要。留待解決的問題是：給予每一個成年人以選舉州議員的權利；把州議員的任期縮短為一年；給州議員以報酬，以便公眾有權規定州議員的全部工作時間；授權州議員為公眾取得並掌握土地——這是一個不自覺的社會主義團體即“自由主義者與急進主義者聯盟”已經要求的一種改革；解除一切法律的限制，以便使州議員們像個人自由地單獨行動那樣可以自由地聯合行動。在這些措施完成之後，我們的各種機構借以社會化的速度就要以社會主義在人民群眾當中的成長為轉移。對於被改變了的各種工業形式的穩定性來說，最重要的是：這些形式應該由人民來決定，而不應該把這些形式強加於人

民。因此，里奇先生作为礼物而贈給我們的那个地方政府的价值就在于：它使每一个地方当局都可以迅速地前进或緩慢地前进，可以在一个較小的規模上来实验，甚至犯了錯誤也不致于产生傳播很广的灾难。現在，社会主义者的命令就是：“改变选举人的信仰，并且夺取州会”。这些管理地方事务的州会以及管理全国事务的国家执行委员会，全部被注定要轉变为有效的工業組織者，而管理单位的大小則必須取决于被管工業的性質。邮政、电报、鐵路、运河以及各种可以組成托辣斯的大工業，就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情况而論，最好每一种都由一个单一的、为整个英国服务的中央机构来管理。电車、煤气厂、自来水厂以及許多規模較小的生产性工業，最好是由地方来管理。在規定分工的界限方面，必須以方便和經驗作为我們的指南。作出这种分工界綫的划分只是一个便当与否的問題，而不是什么原則問題。

促使州会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問題将是失業者的問題。州会必須賢明地或不賢明地安頓失業者。假若州会把失業者組織起来从事生产劳动，那么，它的做法就是賢明的；假若州会提供“救济性的工作”，并像一个倍加专橫的官吏班波(Bumble)^①一样，想用强迫丧失公民权利的穷人去从事不生产的与压迫性的苦役而牺牲社会其他人們的利益的办法来逃避困难，那么，它的做法就是不賢明的。在失業者当中，很多是沒有技术的劳动者，而只有少数是有技术的劳动者。他們必須首先作为有技术的劳动者和沒有技术的劳动者分別加以登記；并将有技术的劳动者按其技艺加以录用。然后，在州会所掌握的州营农場上，就可以开始对农村的劳动者加以組織了。州会将有自己的農業委员会来負責繁瑣的行政事务；而

^① 狄更斯小說中的小官吏，以专橫著称。——譯者

且这个委员会将挑选受过良好训练而有实际经验的农业家担任农场业务的指导人。此外，必须从城市的失业者当中，把那些为寻找工作而向城市游荡的农业劳动者以及许多没有技术的劳动者抽调到州营农场去。在这些农场上，机器的每一个优点，农业科学的每一种发现，都应该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种植什么样的农作物应该参照土壤与土地的方位仔细地加以选择——看是宜于种植谷类呢或者是宜于种植水果或蔬菜——而且应使耕作的方法合农作物的要求。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花用最少的人工去得到最大数量的产品。究竟土地是分成大块来耕种最为有利抑或是分成小块耕种才是最为有利，都将以所种植的农作物为转移。在州营农场的巨大面积内，大规模的耕种与小规模的耕种会各有各的地位。大批劳动者在农夫长 (head farmer) 指导之下进行劳动也会收到节省的效果，因为在需要他们的时候（比如在收获的时候），他们可以被集中在任何地方工作，而在季节性工作结束之后，他们又可以被分散去从事较为有连续性的各种耕作。

从失业者当中，也必须派遣一些有技术的劳动者到上述这些农场去，比如鞋匠、缝衣匠、铁匠、木匠等等，以使州营农场可以尽可能地自足自给而不致使生产力遭到浪费。日常生活所必要的各种小规模的工业应该在州营农场中经营，这样，一种工业公社就在州营农场上建立起来了。我们相信民主主义会把八小时的工作日以及舒适的住所规定为州营农场生活条件的一部分。可能每一个大农场，除了普通的农场建筑而外，会很快地有自己的和火车站相毗邻的中心商店；会很快地有自己的位于农庄中心的公用大厅，而这种公用大厅将作为演讲会、演奏会以及各种文娱活动之用；会很快地有它的公立初级学校和公立技术学校；并且可能会很快地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公共食堂，而这种食堂可以节省家庭主妇的

時間和麻煩，而且在經濟地利用燃料與食物的同時，又可以提供人們以較多的選擇機會和多種多樣的菜餚。設有很多房間的巨大住宅也許會代替老式的村舍，因為，當我們指出在我們當中已經存在的那種從孤立的自足自給的生活向着具有種種優點的集體生活轉變的趨勢的時候，值得注意的是，許多正在建造中的公寓中並沒有供僕役住宿的房間；房屋的清潔工作等等是由負責整段街道清潔的人來做的，並且每天人們主要的几餐飯是到飯館中去吃的，因而可以避免私人燒飯的麻煩和浪費。在創立各種新的工業組織的時候，最好是從最先進的工業開始，並且應該利用每一種向着較不孤立的生活方式發展的現代趨勢。社會主義者必須努力使市政當局去研究那些尚未被人們採取過的、達到更高尚的生活的途徑，而不要只是對貧苦勞動者的利用表示不平。當社會主義者知道他們努力的目标並且知道其他的政黨只顧目前而不顧未來的時候，他們應該能夠施用一種不斷的和始終不變的壓力，正是由於這種壓力是不斷的和始終不變的，因而它的方向將影響总的社會運動的方向。

組織城市工業的要点，也如組織所有其他工業一樣，必須使用每一個人去從事於他最擅長的那種工作，而不是從事於他最不擅長的那種工作。一個人具有兩種職業也許是有好處的，但是製造鐘表和把石頭打碎並不是輕易地可以互換的職業。有技術的失業者，當他們是屬於各地都在經營的那些行業（比如麵包業、制鞋業、縫衣業等等）的時候，他們就應該按他們自己所屬的行業受雇於市營工場，而且應該把他們的产品在市有的倉庫中儲藏起來。這些市營工場必須由工頭們來指導，有如在私營企業中一樣，這些工頭必須是精通技術并能監督和指導生產的技師。工作日必須是八小時，而且在目前，工資不應少於工會所接受的最低工資。於是，縫

衣匠就会不断地有衣服可缝，鞋匠就会不断地有靴子和鞋子可做，而不致于使他们衣服褴褛并赤着脚在街头流浪。鞋匠可以用他所得到的工资来购买缝衣匠的产品，缝衣匠也可以用他所得到的工资来购买鞋匠的产品。为了使失业者对自己提供生活必需品，应该给他们以工作，而不应该用向就业者课征捐税的办法来维持他们的生活。他们必须成为自己所消费的财富的生产者，而不是因被迫懒惰或在打石场上进行非生产的、处罚性的苦役而去消费他人所生产的财富。泥水匠、砌砖匠、铅管装置匠、木匠等等，可以安排他们去建筑给市营工业大军居住的、雅致而舒适的住宅——按照一排一排的公寓式样去建筑，而不是按照所谓模范住宅的那些营房式样去建筑。我特别强调这些住宅的舒适性。这些住宅将成为公民的住宅，而不是成为贫民的监牢；而且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这些住宅不应该造得美观动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就是国家、一切最好的东西都是为他们服务的；因为，我们应该记住：我们是面向社会主义的，并且我们将按照社会主义的路线来把劳动者组织起来。

很可能在失业者当中，我们会发现某些失业者的技艺只能在很多人集聚在一起工作的场合下才能施展，因而并不是由于城市中的某一个工业使得他们遭到游荡不定的不幸命运。这些失业者应该送到那些以他们的专长作为主要工业的城市里去，并使他们受雇于当地的市营工厂。

在对这种农村的和城市的非集中化的工业加以组织的同时，还须对由资本家为我们集中起来的那些巨大的、集中化了的工业进行接管，因此资本家们乃是无意识地为他们自己的被接替铺平了道路。每一种已经被组成一个托辣斯并暂时按托辣斯形式经营的行业，由社会加以没收的时机是成熟了。所有的采矿业最适宜

于按照这种集中化的方式来經營；并且人們很可能發現，以类似的方式去經營一切巨大的生产性工業——比如紡織業——是最方便不过了。当巨大的生产性工業可以由資本家所組成的联合壟断組織来經營的时候，要是說这类工業不能够由国家来經營，那是沒有意义的，因为，一个地方委员会，一个鉄矿委员会，一个錫矿委员会是可以輕易地如像对一群偶然聚合的股东負責一样来对国家負責的。在进行这种轉变时，不一定会出現生产的脫节現象，因为，一个托辣斯的积极的組織者們和董事們并不一定要（或者甚至通常不必要）拥有業已投入托辣斯的資本。假若国家發現雇用这些組織者和董事是适当的，那么，国家沒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做、并且雇用他們的时期的长短，国家可以随意選擇。在过渡时期，国家对他們的暫時性的安排必須依据方便原則来决定。

讓我們暫停片刻来估計一下我們到目前为止所談过的情况，失業者已在各个城市中、各个不同的行業中被改变成公社工人——他們将在英国各个大农場上工作，而这些大农場乃是經過改进了的美国式波南沙农場(Bonanza farms)^①。出售农产品和工業品的公营百貨商店将開設在各个使人感到方便的地点，并且店中将充滿了人們共同生产出来的各种貨物。作为托辣斯来經營的各种大工業将由国家来控制而不是由資本家的联合壟断組織来控制。可是私人資本家在企業領域中将仍旧是存在的，他們可以为他們自己的利益生产商品和分配商品来和公社企業相竞争，这些公社企業在那时将只占据工業領域的一部分。但是，除了在我們討論到劳动的报酬时将会認識到的那种压力而外，这些私营企業必然要在困难不断增加的情况下来进行經營。面对着这种有秩序

^① 这种农場是使用最新式的农具而获得巨大利潤的农場。——譯者

的、互相协助并有国家信用作后盾的公社的队伍，私人資本家的冒險活动，将会有如上一世紀农村小手工業面对着我們自己这个时代的工厂工業一样，必然是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的。托辣斯已經教会我們如何用联合起来的資本去把相互竞争的資本逐出市場。中央委员会或州会必然比任何私人資本家能够进一步地利用这种联合資本的威力。因此，使得工厂代替工場的各种經濟力量，必然使市营商店代替私营商店，并使市营工厂代替私营工厂。資本更加集中的好处以及劳动者联合起来的好处不一定是公社工人所享受到的唯一好处。一切浪費将受到限制，每一种节省劳力的工具将充分地加以利用。那时人們的目的是生产公共的財富而不是生产为一个阶级所占有的利潤。在前一种情况下，生产者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生产——仅就生产的享受取决于他們的劳动生产力而言——而在后一情况下，生产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将要大胆地尽量使自己的劳动不产生效果，以便使生产需要更多的劳力，从而提高劳力的价格。在公营工業的組織扩大并愈来愈代替了个人主义的生产者的时候，可能發生的需求将更易加以估計，并且可以調节供給来满足需求。市政当局及中央委员会必然要代替互相竞争的小資本家和由大資本家組成的联合壟断組織，并且生产将不像今天那样是無政府的与冒險的，它将成为有秩序的与合理的生产。不久之后，私人生产者必然消失，这并不是因为将有任何法律限制个人主义的生产，而是因为个人主义的生产将無利可圖。当人們可以为公社服务而享受到安适、自由与安全的时候，沒有一個人会願意去面对个人为生活而斗争所遭到的种种憂愁、煩惱与焦虑。

在过渡时期(甚至很可能在未来一个长时期中)，最好的工業管理形式将通过公社議會(Communal Councils)来进行，公社議

会應該指定各种委员会来监督各个工業部門。这些委员会應該为每一个商店、工厂等等聘請必要的經理和工头，并且應該掌握聘任权和解聘权。我不相信由雇員們直接选举經理和工头会在实际上产生良好的效果、或者会与經營任何大企業所不可缺少的原則相符合。对我來說，似乎較好的办法是：公社應該选出它的議會——这样一来，可以使一般的行政当局置于它自己的控制之下——此外还應該授权公社議會选派行政官員，以便在各个下級机构中，选派和解聘人員之权可以掌握在整个公社所指派的那些人們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直接有关的某个特殊集团的手中。

在管理普通的生产性工業的道路上，無論这种工業是大工業或小工業，实际上的困难是不存在的。因为，托辣斯与合作組織在它們当中已經把有关这些工業的一切問題解决了，或者已經使得我們走上了解决这些問題的道路。但是关于从事生产書籍和報紙之类的工業，各种困难是存在的。在过渡阶段，这些困难不一定会出現，可是，当所有的工業都由公社或国家來經營的时候，書籍和報紙應該怎样來生产呢？我只願提出下述这些建議。印刷業也如像面包業、縫衣業和制鞋業一樣，應該是一種由公社經營而不是一種由整个国家經營的工業。假定我們有了由公社議會控制的印刷局，那么，就如像今天一个私營的印刷厂可以冒着風險去出版書籍一樣，我們應該讓印刷委员会自由地去接受任何一种它認為是有价值的出版物。印刷委员会可以和作者訂立这样一种協議：或者是直截了当地收买版权，或者是按銷售的份数抽給版稅；不論照那一种方式辦理，一定數額的稿酬应作为作者的存款存入公社銀行。但是有很多作者，他們的作品并沒有人願意閱讀，因而強迫公社去出版所有劣等的詩歌将会是一种可笑的事情。我認為，在任何情況下，当印刷品委员会拒絕在使公社冒風險的情況下去出版作品

的时候，作者可以通过把足够补偿印刷成本的款項从他在公社銀行的存款帳戶上撥轉到印刷委員會的帳戶上来出版他的作品，这样一个原則我們为什么不可以接受呢？只要印刷成本由作者加以补偿的时候，那么，印刷委員會就無权拒絕承印。这样一来，表达思想的自由就可以当作一种宪法的权利来加以保障，同时印刷每一种拙劣的、流露心情的作品（心愛它的作者們可能認為是值得出版的）所花的費用，就不必由公社来負擔了。

報紙也可以按照类似的条件来發行，而且在补偿出版成本的条件下，應該讓个人或由个人組成的集团出版任何他們喜欢出版的东西。由于每一个公社的成員会享受到比較富裕的生活，因而任何一个真正有意使自己的意見讓公众听到的人，都可以凭借减少他在其他方面的支出来出版他自己的东西。

我們將碰到（虽然不是立刻就碰到）的另外一种困难是：人們为了要求受雇于某些使人工作起来感到較为輕快的工业部門而引起的竞争。在目前，一个失業的人会热中于抓住任何一个他能够担任而且待遇又好的工作机会。假若他既能够排字又能够縫衣服的話，那么，即使在这两种工作中他憑机会得到他較不喜欢的那种工作，他也不会梦想到他会發牢騷。因为，只要他可以在这两种工作中得到任何一种工作，他就会感到非常高兴了。但是这样一种情况是非常可能的，那就是：当人們的生活狀況不断改善的时候，假若杰士胡倫(Jeshurun)願意去制造显微鏡鏡片而人們却要求他去制造普通鏡子的話，那么，他就会生气并且要發怨言了。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恐怕杰士胡倫会不得不使他自己順从人們的要求。假若从事制造显微鏡鏡片的人数多到足够应付鏡片需求的話，那么，杰士胡倫必須同意暫時把他的天才轉而用到制造普通的鏡子方面去。尽管社会主义的确不能够使 $2 + 2 = 5$ ，然而杰士胡倫

的处境終归不会是十分可怜的。

但是，上述办法几乎是不可能解决如何把各个劳动者指派到不同形式的工作中去这一总的問題的。不过，那个机智的“从紀元后二千年回顧”一書的机智的作者已經找到了一个解决的办法。他借助于使各种职业具有同等的吸引力来划一自願就業的待遇，并使青年男女可以自由地选择自己的职业。在很多情况下，要是在一个很长的受教育的时期中听任个人天生的癖好本身自由地發展，这种天生的癖好就会决定他願意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很可庆幸的是：人們在能力和嗜好方面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說，使一个人感到兴趣的职业会使另一个人感到厭恶。但是，可以想像得到，事实上会有各式各样既令人感到不愉快而又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例如采矿、清理下水道等等，这些工作是不可能使任何人感到兴趣的。要使人們对这些工作感到兴趣，就应该使人們在这些工作中每天的劳动時間較之从事那些使人們感到較为輕快的工作所規定的正常工作日更短。許多强有力的、生气勃勃的人們，他們十分願意选择一种虽則令人討厭然而工作時間較短的工作，而不願意选择一种每天工作時間很长的案头工作。由于使个人享有最大可能的自由是适当的，因而上述这种使一切职业的好处均等的办法，将远胜于徒劳無益地为每一个人去选择职业的任何尝试。一个人要是直接被迫去担任某种工作，即使这种工作就是在他可以自由加以选择的时候他願意选择的工作，他也一定会对这种工作表示厭恨的。

此外，許多最令人討厭而又繁重的工作是可以机器来做的（就如現在一样，假若使用奴隶并不比使用机器更便宜的話，那么这种令人討厭而繁重的工作就要由机器来做了）。当派小孩子到烟囱上去扫烟囱变成不合法的时候，烟囱并不是不需要再扫，而是

因为人们已经发明了一种扫烟囱的机器。现在采煤的工作本来可以用机器来做，而不需要使一个人仰躺在地上冒着自己生命的巨大危险而从他的头端去把煤采下来；可是采煤的机器要比人贵重得多，因此采煤的工人们会继续被落下来的煤块打坏自己的胸膛。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们的生命和四肢必然要比机器更加可贵；人们将努力从事科学研究，以使用机器来替人进行工作。

老实说，机器的推广很有可能解决许多关于各种职业具有不同好处的问题。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在不久的将来，有技术的工人将不是一个能够进行一套特殊操作的人，而是一个在使用机器方面受过训练的人。职业上的差别将在于机器而不在于人，也就是说，无论产品是钉子或是螺丝钉，是靴子或是外衣，是布或是丝，是折纸机或是排字机，将取决于机器结构的内部安排，而不取决于使用机器力量的方法。我们很可能要做的工作将是教导我们所有的青年懂得机械原理并能够掌握机器，我们必须制造各种机器，以便把机器力量转而用于生产各种东西所必需的各个方面去。有技术的工人将成为有技术的机匠，而不是有技术的印刷工或靴匠。在现今这个时代，一个受过训练的机械师，只要进行几小时或几天的研究，就可以成为你所能够放在他面前的任何一种机器的内行。社会进步的方向就是：在每一个生产部门中都用机器来代替人进行工作，就是说，让我们的脑子计划、指导和控制生产，而让不会疲乏和不能够被摧残的铁与钢、蒸汽与电力去做今天耗损人类身体的全部繁重的苦役。认为我们是处于一个发明时代的末期是毫无理由的。相反地，在我们使用电力以后，我们刚好才开始摸索前进。在使用机器方面，存在着我们现在几乎梦想不到的种种可能性，可是在我们现今这个制度下所产生的人是太过于手脚粗笨了，以致不能够操纵各种精细而复杂的新机器。上面我所提示的办法，不过

是作为未来平衡各种形式的劳动的供給和需求的一种简单办法而已。至于我們当前的管理方法，必須要做到使各种劳动都能够得到均等的好处。

人們可以猜想得到，在每一个国家中，所有的委员会和公社行政当局最后必然要在某种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工业内閣 (Industrial Ministry) 中有它们的代表，而且农业部长、采矿业部长、紡織工业部长等等必然和其他国家类似的官員建立关系，因此，在国际范围内也如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一样，合作将代替竞争。但是这样的目的，我們現在还没有达到。

我們現在来探討一个比組織工人更为棘手的问题。劳动的报酬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說，个人、市政当局以及国家从产品中应该分别得到的份額是什么呢？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要以对前面所提出的那个问题的答案为轉移。把失業者組織起来是否为了要把他們改变为自食其力和自尊的公民？或者是否为了利用貧民們的劳力为非貧民們生产利潤而把組織失業者这件事情当做是一种剝削的方式？这就是整个问题的所在。除非我們下定决心，从一开始就反对錯誤的方法并为正确的方法而奋斗，否則，組織失業者将会成为現今这个制度的一个支柱而不是向一个較好的制度前进一步。关于救貧院的问题，已經有人在議論建立劳动者的聚居区了，因此，假若我們願意利用这种建議的好的一面而排除它的坏的一面，那么，我們就应该赶快把它付諸实现。各个州会也必然要使得市区就業的机会增多，而这种增加就業的方法乃是十分重要的。

被环境的力量所驅使而去組織失業者的一般教区委員們，他們会力圖以支付最低工資的办法，从使用貧民进行生产的农場榨取利潤来施惠于納稅人。他們会發現这种处理問題的方式是非常

有利的。假若这种情况是被容许的话，那么，他们只不过是愿意很快的把这种驱使奴隶的事业加以市有化罢了。假若对受雇于国营企业的工人是按照由市场竞争所决定的那种工资来进行支付的话，那么，市政当局和农村当局按照上述方式来组织劳动者是不会有好处（甚至在人们已经认识到组织劳动者的必要性及其优点的时候也是如此），这不过是改变了对劳动者的剥削形式，而且劳动者所生出的利润仅仅是被用来减轻捐税负担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使得全部捐税由公社工人来缴纳，而私人雇主则可以一文不付。这将不会是一种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仅仅是创造一个市有的奴隶阶级的一种新方式，这种方式会使我们的城市可笑地仿效古代握有奴隶的希腊人的“民主主义”。我们只要记取并应用社会主义的原理，我们就会发现这样一个更加确切的依据，那就是：劳动者应该享有他们辛苦劳动的全部产品。对我来说，要做到这点，似乎可以大体上采取下述的方式。

从公社产品的价值中，必须提出这样一些费用：应缴付给地方行政当局的地租，为经营各种工业所需要的设备的租金，按照通常方式加以决定和垫支的工资，各种捐税，预备费，公积金，以及为经营公社企业所必要的其他费用。在减去所有这些费用以后，剩下的那部分价值应该当做一种“红利”在公社工人当中加以分配。对于区一级的行政当局来说，要把这部分价值再加分割并将一定的份额分配给所属的每一个单独的企业——比如从各个煤气厂截留若干分配给受雇于各该厂的人员，从各个电车公司截留若干分配给受雇于各该公司的人员，等等，这样的做法，即使是可能的话，也显然是不方便的。远较简单而且容易的做法是：把市区的所有雇员当做是为一个单一的雇主即地方行政当局服务的单一体，因而由公社议会所经营的全部企业的盈余应该无区别地在全体公

社雇員当中加以分配。至于如何分配的問題很可能会引起这样的爭論，那就是：各个份額是否應該相等？或者所有的工人是否應該比照人們所認定的关于他們的工作的高貴性或卑賤性而得到相应的報酬？不管怎样，不平等总是令人討厭的。我已經在前面（見二三〇頁）提示了一种使不同种类的劳动去适应一种平均分配純产品的制度的方法。这个方法既解决了不同种类的劳动使人們感到不同程度的厭惡这样一个困难，又無需界綫分明地把任何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劳动提出来作为是較之其他任何劳动更加令人尊敬的劳动——这种区分在本質上是非社会主义的和有害的。但是，在公共事务中，倫理是容易受到摧殘的，而且人們对社会正义的呼吁往往是听而不聞的。幸好上面我所提出的这种情況下，倫理和方便二者統一起来了。估計每一个人的劳动所分別产生的价值之不可能得到任何实际上有效的結果，人們彼此間所会产生的那种傾軋，人們彼此之間所会引起的那种嫉妒，以及在人們当中会流行的那种不可避免的不滿、偏愛与假公济私，所有这一切，必然要把公社議會驅上正确的道路，即对所有的工人給予平等的報酬。一旦公社議會走上了这条道路，簡單化的原則就会傳布开来；因而人們立即會發現，这样做是适当的，那就是：所有的公社議會應該向一个中央委員會呈遞它們的报告，在这种报告中应当叙明它們的雇員人数，它們所生产出来的价值的總額，为支付租金及其他費用所应減去的數額，以及它們可資动用的剩餘額。把所有公社議會所掌握的剩餘額加在一起然后用公社雇員的總數去除，这样就会得出每一个工人应分得的數目。各个国营托辣斯首先應該分別沿着类似前面我們为公社拟訂的那些方向去經營；但是往后这些国营托辣斯應該和其他的托辣斯进行合并，并且應該进一步划一劳动者的報酬。当私营企业衰落的时候，愈来愈多的工人必然轉而担

任公社的工作，到了最后，社会主义的理想就会在一个国家中实现了，在这样的国家中，所有的成年人都是工人，并且所有的人都可以分享整个国家的产品。但是应该注意，所有这一切都是市政当局及州会第一次組織工業的結果，并将按照整个社会及其各个組成部分所选择的速度的快或慢来进化。由公社加以处理的价值以及最初由公社雇用的人数，并不会如像现在由个人和公司所經營的許多大企業那样包括着許多复杂的細节。现在由个人雇用的具有头脑的人物，将来同样可以用来为社会主义工作。并不是由于人們去認識社会主义思想有何困难，而是由于社会主义思想是一种新思想，因而妨碍了人們对这种思想的接受。

可是，很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工業巨子必然会較之工業大軍的一般工人群众得到更高的报酬，这并不是因为他們應該得到更高的报酬才是公平的，而是因为在他們仍旧有可能从事私营企業的时候，他們就能够要求社会接受他們通常的条件；社会按照他們所提出的条件去雇用他們将会比在不雇用他們的情况下得到更大的利益。的确，不雇用他們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当教育普及的时候，他們的报酬就会下降，換言之，他們目前的价值乃是一种稀少性的价值，这种价值主要是取决于他們壟断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当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受到較为广泛的訓練的时候，愈来愈多的人就会有資格成为企業的組織者和指导者。

对工人应享的份額所采取的支持形式并不是一个首要的問題。讓各个公社銀行發行如像支票銀行(Cheque Bank)所發行的那类支票可能是适当的；并且这些公社銀行可以对工人們發放貸款，而貸款的數額将以他們所得的报酬为限。每一个工人花用他的財富所采取的方式当然是他自己的事情。

上面这种关于在向市政当局繳納了租金以及其他費用以后所

留下来的公社劳动者的剩余额的处理方法，在廢除私营企业方面，它本身将証明是一种最有力的因素。公社的企业所生产的数额必定会超过那些在个人主义者控制下的企业所生产的数额；即使实际情况不会如此，公社工人们可以分到的份额（由于这些份额应该把现在被懶汉們所消費掉的那部分产品包括在内）也一定会比私人雇主所能够支付的任何工资为高。因此，工人们将爭取为公社服务，这就产生了一种經常的压力，使得各个公社議會扩大它們的企业。

我應該补充說一下，由于年齡或疾病而沒有工作能力的兒童和工人應該和公社雇員一样地得到一个同等的份额。由于所有的人都曾經做过兒童，都在不同的時間內生过病，并且都希望活到老年，因此，所有的人必然会輪流地分享这种利益；而且只有这样做才是公平的，那就是：那些在健康的时候以及在整個成熟时期曾經誠实地劳动的人們，在他們生病的时候以及在他們的整个晚年都应该享受到劳动的报酬。

个人应享的份额以及市政当局应享的份额就是如此分配。至于中央国会 (Central National Council) ——用尊称的方式來說就是所謂的“国家”——我只要提一下就行了。中央国会應該向各个公社議會課征捐款，以便取得为履行它的职能所必需的收入。显然地，那些处于非常良好位置的公社所享有的任何一种天然資源（譬如矿山、港口等等）的“国有化”，都可以用調整这类捐款办法来付諸实现。这类課征的捐款在实际上是会具有所得稅的性質的。

上述这种分配計劃——特别是其中关于划一人們在产品方面应享的份额那一部份——很可能引起这种問題：“在上面所提議的这种制度下，刺激人們去劳动的是什么？懶汉們是否会逃避他們應該承担的公平的劳动义务，并靠他們的邻居的勤劳而过豪华的

生活？”

过去和現在一样，促使人們去劳动的一般的刺激首先是那种不劳动就会随之而来的飢餓。在我們会發現这样的国家以前，（在这个国家中，果酱面包卷会长在树枝上，而且烤好的小猪会来回跑着喊道：“来吃我吧”！）我們仍旧有一种迫切的需要去进行生产。我們必須工作，因为就我們全体來說，我們宁願工作而不願挨餓。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当公社議會开始組織劳动者的时候，人們唯一的就業的条件就是担任工作；而且当沒有職業就意味着飢餓的时候——因为对于一个健康的成年人來說，当公社議會給他工作而他却拒絕担任工作的时候，就沒有必要給他以任何的救济——这种最强烈而又可能的刺激将迫使人們去工作。实际上，“工作或飢餓”将摆在每一个公社雇員的面前，任憑他去選擇；而且只要現在人們宁願担任工作時間較长并且待遇較坏的工作而不宁願挨餓的話，那么，将来他們一定願意（除非人性会完全改变）担任工作時間較短并且待遇較好的工作而不願意挨餓。个别規避工作的懶汉将和今天一样要受到同样的处理；他将受到警告，而且，假若他被証明是屢教不改地懶惰的話，那么，就可以取消他的公社职务。現在絕大多数人都力求憑借合理地履行他們的义务来保持他們的職業，而在就業的条件較寬的时候，为什么他們不應該同样地去做呢？最初，雇員之被开除会意味着他們被抛回到竞争的漩渦之中，而这种命运是任何人都不願輕易地去招致的。往后，在私营企業向来自公社的競爭屈服的时候，雇員之被开除会意味着几乎毫無希望生活下去。在社会的改組完成的时候，雇員之被开除会意味着絕对的挨餓。在有人願意故意招致飢餓并自願忍受飢餓的时候，雇員之被开除就会得不到什么同情和救济。

促使人們去劳动的第二种刺激，就是工人希望得到公社劳动

果实的那种欲望，以及他的同伴們关于使他在他所生产的劳动果实中可以获得他的公平份額的那种决定。人們在目前这个时期可以发现：从集体劳动产生的那种利潤中提出一个十分微小的数目来加以分配，会对每一个个别生产者起着巨大的刺激作用。各种企業，当它們把利潤的一部分拿来分給它們的雇員的时候，它們就会发现，这种分給雇員以利潤的計劃对它們是有利的。为了增加公共产品而热心地工作的人們懂得：只要公共产品愈多，他們每一个人就会得到更多的紅利。因此，他們会警惕在生产方面的浪费，关心机器，节省煤气，等等。一言以蔽之，他們会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因为每一种节省都意味着他們可以得到利益。我們从列克莱(Le-claire)和歌丁(Godin)的實驗可以看出：人們的發明力同样地要受到人們在公共产品中所享有的那种份額的刺激。在上述这些企業中工作的工人們，将永远不断地力圖發現各种較好的方法，力圖改良他們所使用的机器。一言以蔽之，他們将力圖进步，因为每前进一步，都会使他們的命运得到改善。各种發明都起源于人們避免麻煩的欲望，起源于具有發明力的天才人物的發明冲动，起源于在完成一种智慧上的偉業方面所得到的快乐，以及起源于为人类服务所感到的喜悅。伶俐的工人們，为了便利他們的操作，正在繼續不断地作出了各种微小的發明，甚至在他們各个人自身并不是这些發明的获利人的时候，他們也要繼續不断地去發明的。当这种追加的劳动生产能力減輕了劳动者的工作或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的时候，害怕这种自發的發明活动将会停止是没有什么理由的。难道說，当人們仅仅得到一部分他們集体劳动的果实的时候，他們必然是勤勉的、謹慎的和具有發明力的，而当人們得到全部集体劳动果实的时候，他們却会墜入懶惰的、不顧前后的和停滯的状态之中？难道說，一小点利益会使人們感到刺激，而任何一种几乎要达

到使欲望完全滿足的利益却會使人們陷于癱瘓？假若在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会有某种罪恶較之另外一种罪恶更加肯定地將为人們所唾弃的話，那么，这种罪恶就是懶惰。一个規避工作的人，甚至在他遭到被开除的处分以前，是会感到他的同伴們使他置于难于忍受的处境的。

但是，当上述这些具有推动力的动机对于像今天这样的人們起着强大作用的时候，另外一些动机也是存在的，而这些动机已經对某些人起着作用，它們总会有一天要对所有的人都起作用。人类并不是如像出現在个人主义者膚淺的觀察下的那些簡單而偏頗的有机体；在个人主义者看来，人类只是由一个单一的动机即追求金錢利益的願望所推动，并且只是由一种渴望，即对財富的渴望所驅使。在我們現今的社会制度下，追求富有的斗争采取了一种反常的、人为的發展形式，就是說，富有几乎意味着一切使人們感到值得活下去的事情，那就是：沒有挨餓的危險，嗜好的得到滿足，愉快而有教养的上流社会的享乐，滿足許多欲望的优先权，自尊、受別人的推重、舒适、知識以及自由等等这类在現在条件下可以得到的东西。我們乃是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貧穷意味着在社会上是不名誉的，不幸的遭遇被看做是一种罪恶，救貧院的牢獄乃是对失敗者的一种賞賜，每天的所得不足以滿足每天的需要这样一种痛苦而令人煩悶的困扰永远駕凌于每一个工人的头上，在这样一些情況下，金錢仿佛是人們所需要的唯一东西，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而且，其他每一种思想都在人們为了逃避可以概括为“貧穷”二字的一切禍害的狂烈奔跑中消失了，这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但是，当每一个人都确有把握地得到生活資料的时候，这种渴望黄金的反常發展就会消失。應該讓每一个个人感到生活絕對有

保障——應該讓每一個人關於他未來的物質需要的每一種憂慮一掃而空。這樣一來，人們對財富的那種渴望才會失去它的杠桿作用。當人們每天的面包有了保證的時候，金錢利益的專橫統治就被打破了，因而人們的生命將開始用來生活而不是用來為得到生活的機會而鬥爭。於是，一切形形色色的動機必然會湧現出來，這些動機甚至在現在已經在複雜的人類有機體中起着作用；而且當生理上的生活基礎有了保證的時候，這些動機一定會取得它們適當的重要地位的。人們想勝過別人的願望，在創造性的工作中所得到的快樂，渴望改善，急切希望博得社會的贊許，以及仁慈的本能，所有這些必然會開始充分活躍起來，並且必然會立即成為促使人們勞動的刺激和優秀品德的報酬。注意這樣一點是有教育意義的，那就是：人們也許已經看到，上述這些力量在生活資料得到保證的每一種情況下正在起着作用，而且這些力量可以單獨地提供人們以行動的刺激。一個士兵的生活資料是有保證的，他的生活來源並不依靠他的勤勉勞動。因此，他立刻會敏感到他的愛國心，會敏感到他的集體精神，並且會敏感到他的軍旗的榮譽。為了光榮，他將敢於冒任何的危險，並且他將重視一小塊作為是“英勇的報酬”的銅制獎章，而這種獎章他認為要比黃金貴重百倍。可是，有許多士兵卻是來自人口當中的最壞部分，軍事上的光榮和在屠殺方面的成功不過是他們企圖達到的可憐目的而已。假若在这种沒有希望的環境下我們可做的事是很多的話，那麼，有什麼東西我們不可以從更為高尙的抱負中得到呢？或者讓我們學習青年們用在體育方面的那種熱情、克己和奮鬥的精神吧！人們想做牛津隊長的願望，想做劍橋賽船主要划手的願望，想在競走比賽或跳遠比賽中做優勝者的願望——一言以蔽之，想勝過別人的那種願望——是會強烈到足以推動人們去作往往有害於身體健康的種種

努力的。当生活一旦有了保证的时候，我们就会到处看到各种各样的人道的愿望显露出来了。当人们的社会本能的发展教导人们把自己的利益和社会的利益等同起来的时候，社会主义最终必定要依靠人们把这些人的愿望用来为社会服务才能得到发展。但是，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只是说社会主义要依靠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性来得到发展，而不是说要依靠人性中被称为牟利的愿望这一小部分来得到发展。假若人性会丧失的话，那么，社会主义也就会瓦解了；但是，假若用弓来打比的话，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的弓来说，我们至少有一百条弦，而个人主义的弓却只有一条弦。

可是“人道”将不会破产。建立在“人道”基础上的信仰乃是建立在磐石般坚固基础上的信仰。在更健康和更令人愉快的条件下，“人道”将上升到人们今天所不能梦想的高度。对于我们的子孙来说，那些为诗人和理想主义者所歌颂的最精美的乌托邦，要是拿来和我们的子孙的那种光天化日的白昼相比较，似乎不过是些朦胧而破碎的光线而已。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勇气、谨慎和信仰。尤其是信仰，它使人们敢于相信：公正与友爱并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比任何一个人所能够梦想到的最好的事情更加美好的事情，将总有一天会被人们实现的。



第三部分

向社会主义过渡

向社会主义过渡^①

肖伯纳

当英国学术协会给我这种荣誉，要我参加它的会议时，我建议以宣读一篇名为“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文章来参加会议。经过考虑以后，“完成”这两个字被删去了。因为在现代的用法上这两个字已带有某些突然和凶恶的意义，而这种意义是我在我即将加以叙述的过程中希望谨慎地加以避免的。我首先建议用这两个字的目的就在于以最直截的方式来表达：我们不是要从社会主义的起点退缩，而是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当中；我建议去讨论摆在我们前面的一段路程而不要去讨论我们已经走过的那段路程。因此，虽然我将要从社会主义的起源讲起，但为了要尽快地讲到我所要讲的要点，我将不为冒着牺牲历史的尊严而一下子跳过若干世纪的这种讲法感到抱歉。

那末，让我们由简短地回顾一下中世纪谈起。从理论上讲，读

^① 这是1888年9月7日在巴斯英国学术协会经济组所作的一篇讲演。

者們所看到的当时的英国要比今天的英国有秩序得多。农业是在封建庄园或公社里以一种明白而有条理的制度組織起来的，手工业是由城市里的行会来安排的。每一个人有他自己的阶级，每一个阶级有它自己的义务。待遇和权利是由法律和习惯所决定，为社会的道德意识所認可的，并且当供給和需求的作用扰乱了待遇和权利的調整时人們就根据社会的道德意识把它们重新加以修改。那时人們沒有听說过自由和平等，也沒有听說过自由竞争。法律沒有使劳动者的妻子去受穿銀圍腰的苦，同时它也不迫使她为了現代这一辨士的代价而每天工作十六小时。沒有人認為个人有任何权利可以按照他自己的高兴从事买卖而不顧及旁人。例如，当城里的人們組成一个市場的时候，他們完全了解他們之所以費力去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要帮助投机者賺錢。假若他們抓到这样的一个人，他买东西純然是为了要在几小时以后把这些东西以高价出售，那末人們会把这个人当作一个流氓；而且，在我所能確信的范围內，他再也不敢告饒說从最賤的市場上把东西买来而在最貴的市場上把它卖出去，是一种对社会有利的事或者是一种虔誠的义务。假若他当真这样說的話，人們必定会把他活活燒死，而且他們这样做也是完全可以原諒的。因为为了保护自己，他們自然会采取这一着。

这种社会制度（它的遗迹我們在各方面都还能找到）并不是由于它的不公平或荒謬而瓦解的。它是由于社会有机体的成长而崩潰的。这种社会制度的机构太原始，而且它的管理办法太朴实、太个人化、太好干涉，因而不足以应付任何比純粹为了政治的目的而非非常松懈地集中起来的（假若有任何这种集中現象的話）一群各自独立的工业公社更为复杂的東西。这种社会制度要使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發生工业关系是不能想像的。这种社会制度对于各教区

之間的道德义务的理解是令人捉摸不住的，而对于国际道德則毫無概念。一个法国人或一个苏格兰人被認為是英格兰人的天然的敌人，一个莫斯科人被認為是一个外国鬼子，而一个黑人与人类的关系則被認為是比現在所承認的大猩猩与人类的关系更为疏远。因此，当新世界的發現开始了經濟革命（这种革命使每一个工業制造业城市看起来就像世界博覽会中的一个摊子，而且完全改变了制造商們当前的目的和看法）的时候，英国的冒險家們是带着一种特別有利于商業成就的心情去航海的。他們是非常之虔誠的，他們具有一种性格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只可能在具有信念的人們身上才能找到。同时，他們把海盜行为看作是勇敢和爱国的事業，把奴隶买卖当作是一种完全正当的商業，这种买卖的惊險性使它足以和一个紳士的荣誉相称，而这种买卖所带来的利益又值得使人去冒这种危險。当他們搶得外国船上的一船貨物或在—群奴隶的身上賺到一笔厚利的时候，他們把他們的成功当作是上帝保佑的直接証明。积累了大量財富的人們，急于把他們的資本向这些黑人身上去“冒險”。所有較为富裕的人士（从伊利薩伯女王起以及她下面的人），都在这些商業冒險家的航海事業中入了股。他們所获得的利益証实了他們的勇敢是值得的，而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工業的偉大和工業的耻辱的根基也就被打下了。現代資本主义就是在这些买卖中成长起来的，而从事这些买卖的人們今天是被文明国家当作人类的害虫而吊死或槍毙的。看到在我們現代的商業冒險家身上存在着虔誠与公正和那种最魯莽的令人發生反感的卑鄙二者之間的不相称的結合，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我們大家都知道：这些豪商們，以他們的企業，以他們的一貫的堅忍，以他們的高尚的个人荣誉、無可指摘的家庭关系、大量的慈善捐款和慷慨的对公共事業的捐助等，把他們显示为社会的栋梁。可是，这些

人为了要用謀杀般的貪欲从妇女和兒童的劳动中磨出他們的財富，他們不得不把他們的牺牲者中最可怜的那些人交給苛刻的血汗榨取者，而这些血汗榨取者的唯一特殊的职务就是規避工厂条例。在事实上，这些豪商們对于工資劳动者并不比德勒克^①对西班牙人或黑奴具有更多的社会整体观念。

随着国际貿易和資本主义的發展，工業不仅超出了个人的控制范围，而且超出了乡村的、行会的、市的甚至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看起来似乎所有对工業加以节制的企圖都得放弃。任何一个为了要把商業搞得更有条理而制定的法律，不是行不通就是形成一种壟断。这种壟断只有以官方的令人發怒的干涉才行得通，它直接損害了公众的利益，而且对于它企圖加以保护的那种特別利益起着灾害性的反作用。同样地，法律甚至在它的目的方面都不再是公正的了，因为資產階級已經夺取了政权。資產階級由于当时尚未被人們了解的各种經濟規律的作用而大大地發了財^②，立法和限制已达到这样有害和腐敗的地步，以致無政府状态变成了所有进步的思想家及講求实际的人們的理想。以宗教改革而正式揭幕的理智方面的反叛，在十八世紀又被以蒸汽的利用及紡机的發明而开始的偉大的工業革命所加强了^③。于是混乱产生了。具有不平等条件的封建制度的共产主义基础改变为具有自由契約和竞争性租金的私有财产制度的时候，封建制度就变成了一种可笑的制度。行会制度未曾具有处理劳动分工、工厂制度或国际貿易的机构，因为行会制度在互相竞争的个人主义制度中只認識到某些丑恶的东西

① 德勒克 (Francis Drake, 1545-1595年)，英国最初世界周航者，海軍將官。1587年与西班牙人在西印度發生冲突。在加的斯 (Cadiz) 港內焚毀敵艦一万余噸。

——譯者

② 关于这点，本書第一編論文已解釋过。

③ 參閱本書第 121 至 125 頁。

是要加以压服的。但是互相竞争的个人主义簡直就統治了行会，把行会轉变为市参議員的休息室，而且显著地增加了后代子孙們的牢騷和笑料。

为了解决这个工業無政府状态的糾紛，人类智慧不顧死活的努力导致了政治經濟学的产生。政治經濟学在法国形成了，因为法国的混乱情况十分狼狽；而且政治經濟学本身証明了它比学究們的形而上学，比摩尔的烏托邦社会主义，比霍布士的社会学是更为切实可行的一个哲学部門。人們可以把政治經濟学的渊源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可是剛剛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时候，人类智慧又对亚里士多德十分感到厭倦，而且，亚里士多德的經濟学是一个拥有奴隶的共和国的經濟学。于是政治經濟学立即宣称它拥护工業無政府状态，拥护私有财产，拥护除了个人积累财富以外的各种个人的冒险，拥护政府除了具有把凶暴的行为和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加以镇压的职能而外把其他所有的职能都廢除。政治經濟学也許可以与賈克·揆德^①的“只有当我们处于最混乱的时候我們才有秩序”的叫喊相应和。

虽然这是政治經濟学所下的判決，但并不能由此推論說更偉大的經濟学家們会比克魯鮑特金亲王、赫伯特·斯宾塞先生或波士頓人本詹明·塔克先生 (Mr. Benjamin Tucker of Boston) 或其他現代的無政府主义者更主張管制。那些更偉大的經濟学家們并不承認除了政府管制而外另外一个办法就是無政府状态，因为他们們認為大自然在竞争之中已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自动調整器；而且只要竞争不受到干涉，个人利益的活动就会由混乱中引出一个秩序来。他們爱这样相信：一个正确而公平的社会制度，不是一

^① 賈克·揆德 (Jake Cade)，十五世紀的爱尔兰冒險家，曾率領二万人战胜过亨利六世，并企圖掠夺倫敦未遂。——譯者

个人为的、痛苦地来加以維持的法律建築物，而是一个大自然的各種力量自由活动的自發結果。他們是封建統治、中世紀干涉及宗教上不相容忍等的反对者；而且他們能够指明这三者是如何以丢人的失敗、腐化和自相矛盾而宣告終結的。他們被农民反对封建地主剝夺了农民的私有財產所有权（这种权利是被地主們成功地潛取了）的斗争的壮举所激动，因而坚决地肯定所有的人都應該具有私有財產权。虽然他們被在互相竞争的私营企業之下所产生的工業革命所給予生产的巨大推动弄得眼花缭乱，可是，由于統計数字的缺乏，使他們乐观到对于大众的生活状况是熟視無睹。因此我們發現大衛·休謨在1776年写給杜尔閣說：“沒有一個人是勤勞到不能在他每周的劳动之外再加上几个鐘头的劳动，很少有人勞到不能从他的开支之中节省下一点东西。”从来沒有一个学者可以从个人主义的經濟学家的研究中得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英国無产階級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有产者的財富却在一日千里地增长。

可是，經濟学家們对历史的無知并不会把他們从事科学的政治經濟学的抽象工作的資格取消。所有他們最珍爱的各种制度和学說都一个跟着一个由于他們对于生产和交換規律的分析而失敗了。除了一个規律——地租規律——而外，他們破坏了整系列私有財產所依据的假定。先驗主义者的这种概念，即認為在自由的竞争者当中，財富一定归于勤勉的人而貧劣一定是对懶怠和浪費的人的一种公平而自然的懲罰的概念，正如那种認為地球显然是平坦的概念一样，被証明了是虛妄的。这里存在着一大堆被称为租金的財富，它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而且，假若全国的每一亩土地，和那一亩仅能耕种了来維持生存的最坏的土地比較起来，具有同样的肥沃性或同样有利的位置，那么这种被称为經濟地租的

财富乃是由全国实际上的勤劳与可能有的勤劳二者间的差异所组成的。所有这些财富都不能被分配给这一个人或那一个人或阶级作为对这一个人或这一个阶级的单独的勤劳报酬。对于一切纯然是社会的或公共的财富的私人占有，是作不出任何永远有效的和聪明诚实的借口的。在这一个问题上，李嘉图所采的态度不但是和亨利·乔治所采的态度是同样鲜明的，而且是更为彻底的。李嘉图指出——我引他的话——，“土地的整个剩余产物，在减去了足以鼓励积累的适当的利润以后，其余的东西最后仍归于地主。”^①

正是由于采用了这样一个反常的价值论，李嘉图才能争辩说，为了工资而把自己出售给有产者的劳动者往往支配着他的生产成本，也就是支配着他每天的生活资料。甚至于这一点微弱的安慰，后来在哲丰斯重新对价值进行考察之前也消失了^②。哲丰斯证明：一件商品的价值是这种商品现存数量的一个函数，而且当供给超过了需求，以致最后增加的一件产品达到了毫无用途的时候，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降低到零^③。这一事情是失业者无需借助于微积分，而且在哲丰斯出世以前早就觉察的事情。事实上，私有财产没有给新来者留下余地。马尔萨斯指出了这一点，而且坚持不应当再有新来者——也就是说人口应保持稳定。可是人口对于这种最温和的停止人口增长的要求所给予的注意，就正好像那滚滚而来的海潮不听卡纽特国王^④的命令一样，仍旧一直冲到他的足踝上来。这种要求的确是不很合理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生产力过去

①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二十四章，第202页。

② 斯坦莱·哲丰斯(W. Stanley Javons)：“政治经济学理论”（伦敦麦克米伦公司出版）。也可参阅“经济学初步”中威克士蒂德(Philip H. Wickstead)所写的部分。（同一出版公司）

③ 参阅本书第58至65页。

比人口增加得更快(現在仍旧如此)。貧穷的增加不过是由于对租金的私人占有的增加而产生的。在李嘉圖完成了对生产与交换的个人主义的綜合以后,一个辯証的論战爆發了。只要蒲魯东随便翻閱一下李嘉圖派的論文并对它加以了解,就足够使他能够指出政治經濟学是私有财产的荒謬性的証明(reductio ad absurdum)而不是为私有财产的合理性辯护。斐迪南·拉薩尔一只手抓着李嘉圖,另一只手抓着黑格尔,調动所有經濟学家和哲学家的重武器向私有财产痛加攻击,因此沒有人敢于对他所特有的夸口提出挑战。他夸口說在文化方面社会民主主义已經成为不可抗拒的装备。卡尔·馬克思甚至沒有放弃李嘉圖的价值論,而抓着了包含着英国的飞躍的繁荣的真正历史的官方报告書,并把私有财产判决为大规模的掠夺、謀杀和强迫性的娼妓制度;判决为灾害、瘟疫和飢荒;判决为战争、謀杀和暴亡。从一个为人們所称赞的制度里,很难想像会滋生出这样的一些东西来。很多批評家都說这种对私有财产的攻击是不公平的,可是沒有一个人敢假装說这些控訴不是真实的。这些事实不仅被承認了,而且根据这些事实还制訂过立法。社会民主主义从实践和学說两方面把它自己發展起来。在我叙述到各个过渡阶段之前,作为一个形式,我願意解釋一下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东西,尽管毫無疑問几乎所有我的讀者們对于这个问题已是很熟悉的了。

社会主义的成就在經濟方面所涉及到的,就是把地租从現在窃据着它的那个阶级手里轉移到全民手里。地租既然是个人不劳而获的那一部分产品,那末这样处理它是唯一公平的方法。只要

④ 卡紐特国王(King Canute)是十一世紀时丹麦和挪威的国王。被他的奉承者称为是“万能的国王”。他有一次坐在海边的一把椅子上命令海潮后退,可是海潮并不听他的話。——譯者

这一亩土地与另一亩土地的肥沃程度不同，而且每小时经过这一条街商店橱窗的人数与经过另一条街商店橱窗的人数不同，那么，在聪明和勤勉方面完全相同的两个农夫或两个店主，从他们一年的工作中，就会得到不同的报酬。因此，从较为富裕的农夫或商主那里，把超过他的同伴所得的那个超过额或地租（这地租是大自然的博爱或地点的便利所赐给他的）拿来两人平分乃是公平的。假若这两块耕地或这两间铺子是掌握在一个私人地主手中，那末他就会把这个超过额拿来，不是把它分给两个佃户，而是牺牲他们两人，自己靠这笔地租来过懒惰的生活。当然，社会主义的经济目的不是把农夫和商主一对对的等同起来，而是要在全社会内实行这样的原则，那就是要把所有的地租集中起来存到国库里去。由于私人有产者除了具有取得地租并把地租花在自己身上的法律权力——实际上就是这种法律权力使他真正成为一个有产者——而外，他没有其他理由来死死地抓住他的财产不放。因此，这种权力的取消就意味着对有产者的财产的剥夺。地租的社会化意味着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其方法是没收现存私人有产者的财产并把它转移给整个国家。因此，这种转移就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问题。假若社会进化的任何阶段可以说已经开始了的话，那末这种过渡大约在四十五年以前便已经开始了。

我们立刻就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的有效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关于它的实践上的困难。根据抽象的公平的理由，社会主义不但是无可反对的，而且是神圣不可避免的。我恐怕按照一般中产阶级的意见，社会主义是被看作一种非常不诚实的主义，而且仅仅是在假定没有警察而人民又是不大安分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才能借助于断头台的帮助而在明天一下子就被建立起来。实际上，社会主义是诚实的，正如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一样。但是全世界的暴

动和断头台都不能够把社会主义建立起来，正如警察的迫害不能够避免社会主义一样。社会主义的第一个实际困难是由全体人民集体拥有土地、资本及任何其他东西这一个观念所提出来的。这里是人民的勤勉所创造出来的地租，这里是私人有产者的口袋。问题是把这个地租不投放到私人口袋里而投放到人民的口袋里。这是对的。但是哪里是人民的口袋呢？谁是人民呢？什么是人民呢？我们认识汤姆、迪克和哈利这些人，但是我们纯然是把他们作为各别的个人而认识的，作为三位一体的他们并不存在。谁是他们的受托人，他们的监护人，他们的管家，他们的经理，他们的秘书？甚至谁是代他们下赌注的人呢？社会主义者在他刚开始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就被这种困难堵死了，直到他想起了可以把国家当作人民的代表和受托人。现在，假若你们设想一下在李嘉图时代把自己称为国家的那些政府的大致情况，它们是由富裕的有产者组成的。它们或者依靠神授的权利或者依靠较贫的有产者的独占选举权而制订法律。在国家的行政部门里，充满了有产者所提拔和宠爱的人物。假若你把他们的演说式的国会讨论（那是在浪费时间、虚假的斗争的词藻和礼节之下进行的）仔细看一看；假若你考虑到他们的阶级利益，他们的无耻的腐败，以及他们在任何实际事业的所有粗劣的尝试中令人感到羞愧的那种浪费和管理不当，那么，你就会了解为什么李嘉图对于地租被据为私有的经济后果虽然看得那样清楚，却从未梦想过国家对地租的占有是另外一个可能的办法。那一个时代的社会主义者对这些事并不十分在意，他仅仅是一个设计模范社会的慈善的乌托邦主义者。虽然有时他把这些计划付诸实行，可是却得到了带有消极教育意义和积极灾祸性的后果。当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后继者们向李嘉图学到他的经济学的时候，他们也像李嘉图理论的通俗化者那样把困难看得

很清楚。輝格党的理論家們，把無能和腐敗当作是国家永远固有的性質而加以承認，就像承認檸檬的酸性一样。社会主义者并非不是理論家，不过輝格党人是边沁和奥斯汀的学生而社会主义者是黑格尔的学生。边沁的学校是这样的一种学校，在这种学校里，人們学不到解决問題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是只有历史才能提供的；人們也不能作出屬於进化制度的概念。反过来说，黑格尔生动地以“完善的国家”(Perfect State)的概念来教导人們；他的学生們看不出在事物的本質中有任何东西使他們不能（或者只有以特別的困难才能）把一个現存的国家弄成一个即使不是絕對完善的国家至少也是一个实际上值得信賴的国家。他們曾看見他們那一个时代的傲慢而無能的政府官員，而沒有倉促地得出結論說：国家的制服具有这样一种奇特的性質，它可以把穿这种制服的人的企業能力、廉潔和普通的礼貌都消灭了。当政府官員是依靠寵愛和提拔来得到他們的职位的时候，他們办事有效率只不过是一个偶然事件，而他們的礼貌也不过是献殷勤罢了。当他們無需对公众承担任何有效的責任就能够把职位繼續保留下来的时候，他們自然会憑借把自己的职位弄成是只領于薪而不工作的职位来欺騙公众。他們用那种使人討厭的对个人进行审問的办法来侮辱公众。但是我們国内任何一个經營得很成功的私營企業都是一个例子，那就是只要人們有决心去寻找解决办法，各种公營企業也是可以像私營企業那样容易加以改革的。把通过一个全面的考試作为进入行政部門服务所必不可缺的第一步；使行政部門对政府負責而政府对人民負責；各个政府部門必須提供廉潔和有效的各种保證，而这种保證正是私營的營利企業所假装要提供的。因此“低能的國家”这个老妖怪並沒有吓坏了社会主义者，它只使他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但是简单地这样称呼社会主义者，会产生把他与一般富有破坏

性的政客混为一谈的后果。这些政客名为民主主义者而并不具有最终要实现正式民主的目的——这些人认为激进主义是要把贵族制度连根拔出来——简单地說，这些人是一种“普遍取消主义者”(Universal Abolitionist)。因此，我们就有了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一个可以加以区别的名词。这个名词被用来表示这样的一些男人和女人：他们企图通过民主而把所有人民包括在政府内。对于这个政府我们可以把国家的地租交给它，最后并把土地、资本、国家工业组织——所有生产资料，简言之，把我们现在所委之于私人贪欲的一切东西都交给它。

这样一种变革的好处对所有的人都是很清楚的，只有现存的私人有产者及他们的寄生者才很有必要坚持说要突然实现这种变革是不可能的。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在他的见解中是喜欢突然的变革的，他们把革命的节目布置得就像一幕二十四小时的活生生的事件：星期一的上午个人主义充分高涨，星期一的下午来了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巨浪，而到星期二社会主义已具有圆满的工作秩序了。相信这样一种快乐的收场是可能的人，自然会认为只有流血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这种看法是可笑的甚至是不人道的。年青的社会主义者能够证明：因现存制度继续一年而产生的痛苦，比把这些痛苦集中在任何一个星期一下午（不管怎样残酷）要多得多。这就是这些年青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演讲中所表达的信念，而这些演讲就成了报纸所谓的“好材料”，而且至今仍旧是报纸所报道的唯一好材料。这类演讲受到了来自没有主见的人们的草率的反对意见的鼓励。这些没有主见的人们开始默認这样的一种突然变革是容易的，随后又抗議說这种变革是罪恶的。有經驗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們，用这样的方法来改变他們的过份热心的追随者的信念，那就是：有經驗的社会主义者們首先承認，假若这种变革能够

突然实现，那是值得搞的；他们随后又指出，这种变革会引起生产性工业的重新调整以便适应由于购买力的崭新分配而产生的需求，同时在劳力和工业机器的使用方面也会引起在一个下午所不能实现的各种变动。虽然你不能说服任何一个人，使他相信要在一天之内把一个政府推翻是不可能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早已相信你不能只靠唱“马赛曲”就把头等车和三等车改为二等车；不能把贫民窟和皇宫改为舒适的住宅；不能把珠宝匠和裁缝改变为面包师和建筑师。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无论他怎样深深地被人说服说皇家女裁缝的工作是没有真正社会效用的，可是他绝不会同意把这个皇家女裁缝在那些准备为她在她们当中找到一个职位的、真正从事于生产的工人当中闲置起来。因为，虽然这个皇家女裁缝在目前实际上是与普通的工人住在一起，然而她至少逃避了败坏道德的懒惰。在她的新的职位被安排好之前：让她的雇客们去订衣服以便她的两手有事可做，比之让魔鬼作祟总要好一些。破毁一个关着七个犯人的巴士的监狱是一回事，破毁一个关着一千四百万人的监狱却是另外一回事。我无需在这一点上多加说明，谨慎的和逐渐的变革的必要性，对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说来必然是清楚的。而且，只要我们在讨论中勇敢而且有理智地对付主张突然变革的那些人，那么我们也是可以使其他地方的每一个人明白这个道理的。

那么向社会主义的逐渐过渡特别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参政权的逐渐扩大，以及把地租和利息转交到政府手里，不是以一笔总数转交而是依分期摊付的方式转交。从这个方式看去，立刻就可以发现我们早已走在这条路上了，而且很多政客还在催促着我们走得更远。这些政客们并未梦想到他们已沾染上社会主义——不，他们必定会剧烈地把这种沾染当作一个污点而加以否认。让

我們看看我們已走了多远。1832年政权轉移到中产階級手里；1838年約翰·羅素勳爵^①宣告了它的成功；1834年中产階級已把劳动者們最后的經濟避難所——恤貧律扫开了，并把他們赤裸裸地交給竞争的狂热^②。繼之而来的是十年的騷动和積極的移民；然后这个社会主义楔子的鋒利的那一端終于插进社会去了。所得稅建立起来了；工厂条例被执行了。1842年訂立的所得稅(从个人主义的原則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变相掠夺)純然是無償地把地租、利息甚至能力租金从私人所有者手中强迫地轉移到政府手中。輝格党人支持所得稅的理由是：那些具有大量財富需要国家加以保护的人應該为了这种保护而按价納稅(ad valorem)。工厂条例在实际政治中把私人企業对雇員不負責任的各种無政府主义理論扫清了；工厂条例使得雇主們要为雇員們的福利而向国家負責，并且用增加工資的方法进一步地把利潤中的一部分轉交給劳动者。繼之而来的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1847年)及澳洲(1851年)的金矿發現，以及借助于英国矿产丰富地区的經濟地租而迅速發展的时期。这种情况在格拉斯頓先生退化的本能上引起了一个徒劳無益的廢除所得稅的願望。这些事件解除了新的恤貧律所引起的压力。劳动者迅速地把他們自己組織在工会里。这些工会当时曾被人們認為是具有破坏原先可以作为英国劳动者特征的丈夫气的独立精神的傾向而加以譴責。今天，劳动者却把工会看作是为了要使这种丈夫气的独立精神趋于完善的一种自助組織^③。虽然，自

① 羅素勳爵(Lord John Russell, 1792—1878年)当时英国的內政部长，后为首相。主張改善选举法。——譯者

② 認為旧的恤貧律已变为一个無可辯护的厭物的普遍印象是一个正确的印象。任何用慈善来緩和個人主义而不用社会主义来代替它的企圖是事先就注定了要陷入混亂的。

③ 參閱 1869年皇家职工会調查委員會最后报告第一卷，第17頁，第46节。

助組織兴旺起来了，特别是在曼徹斯特和夏斐尔得；政府补助被仁慈地投票通过了；工資上升了；可是工会，像附在車輪上的蒼蠅一样，認為是它們使得輪子轉動的。工会是錯了，但是工会主义在喚醒技术工人的社会意識方面，其价值是很巨大的；虽然在这方面在工会主义的傾向里也有一个严重的消極作用，那就是由于工会主义使得工人們意識到用他們能力所及的各种办法来阻撓迅速而有效的手艺乃是工人彼此之間的义务，因而破坏了工人們的技术意識。参政权的扩大在 1867 年被获得了，这种参政权实际上是民主主义制度的一个組成部分，而不是像 1832 年的改革法案那样，仅仅是向着民主主义前进。紧接着又以把从私人手中进一步轉移到政府手中的地租用于教育人民的方式，而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另一組成部分。在同一个时期，邮政局（根据曼徹斯特学派的教条，它應該是一个無能与循私舞弊的巢穴）的卓越的成功，不仅証明了，当人們使得官員們要对对这桩事情的成功發生兴趣的那个階級負責的时候，政府企業是有充分效能的，而且也証明了社会主义的或集体主义的取費，比之私人企業的取費要方便而且低廉得多。例如，邮政总长規定由肯星吞(Kensington)送一封一盎司重的信到貝士瓦特(Bayswater)取費一便士。私营企業可能在同样的距离內送半磅重的东西而只取費四分之一便士，并且从其中获得可观的利潤。可是邮政总长对于送一封一盎司重的信到英国全国各地(from Land's End to John o' Groat's House)也只取一便士的費，而私营企業对于这同样的一桩服务即使不取費五先令至少也要取費一先令；而且还有许多地方，在那里私营企業無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維持一个邮局。因此，有十封信要寄的一个公民，由于有了社会主义的划一的邮費而节省了不少錢，并很快地認識到要坚决保护邮政壟断的必要性。

1875年^①以后的極端繁荣，在所得税下降到两便士的最后冲刺以后，已喘不过气来，至今尚未复元。在其他竞争者当中，俄国和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提高边际耕地产量。教育开始使人们更加意识到他们在遭受痛苦，同时它又在黑暗的地方揭露了痛苦的原因何在。为了使英国工业跟得上增长着的人口所需要的那种资本，开始迅速地以外国贷款和投资的方式而被募集起来^②。在支付利息的条件下，这种资本使英国得到进口货物而无需以出口货物抵偿——这是使科布登俱乐部(Cobden Club)难以形容地感到惊惶失措的一个现象。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要求民主的老压力又恢复了。现在看来，好像宪章主义和斐格斯·奥康诺^③又从死里复生了似的，亨德曼先生^④的民主主义同盟(Democratic Federation)又在社会上出现了，这是具有高度意义的时代标志。这个民主主义同盟即使没有被当作事件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直接因素，在私有财产的罪恶的眼里看来，它至少是一个被扩大了的眼罩而可怕的东西。很多青年人，如像穆勒，斯宾塞，孔德和达尔文的弟子们，被亨利·乔治先生的“进步与贫困”所唤醒，抛开了进化论和自由思想而去研究主张起义的经济学，也就是去研究卡尔·马克思。这些青年人深信，只消把社会主义清楚地摆在工人阶级面前并把工人们的人数众多的力量集中在一个无敌的组织内，那末革

① 参阅罗伯特·杰芬先生(Robert Giffin)所作的演讲“最近英国物质进步的速度”，载于1887年曼彻斯特英国学术协会会议录，第806页。

② 参阅罗伯特·杰芬先生关于输入与输出的统计，载于“财政论文”第二集，第194页。(伦敦巴尔公司1886年版)

③ 奥康诺(Fergus O'Connor, 1794-1855年)，宪章运动的领袖之一。主张实行暴力改革。——译者

④ 亨德曼(H. M. Hyndman, 1842-1921年)，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译者

命至迟在1889年——法国大革命的百周年——即可实现。我记得当时曾经有人讽刺地而且公开地问我，假若我有办法的话，在我看来需要好多时间才能把社会主义付诸实现。我以极端的谦虚回答说：两个星期的时间足够实现这个目的了。只要我再补充一句，我往往被人们恭维为社会主义者中比较有理智的人，读者就可以估量到我们的信念的狂热以及我们在实际观念方面的过度的轻率了。我们所得到的反对意见是没有益处的，因为这种反对意见主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它认为我们的计划在理论上是不健全的，然而可能立即实行的。我们的弱点则刚好与这种意见相反。可是，随后过去的几年使得我们清醒了。被人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这些人组成了社会民主党，这个党的政策并不比其他任何政党更为激烈。但是，我们并不把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下一部分工作，认为是十分觉悟了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作。我宁愿把他们完全忽视过去——假若你愿意的话，我宁愿假设政府很快就要采取“星期六评论报”的建议，并且为了和平和安静而把他们绞死。

现在，让我首先谈一谈关于民主的成就方面。自从1885年以来，每一个每周支付四先令租金的人，只有在例外的登记条件下才能参加选举。这种例外的登记条件似乎很快就要被取消了。这种选举法不过是一种成年男子选举法，而它本身很快就将以成年选举法的形式而趋于完善。可是，我们也许可以不讨论成年选举法这个问题，因为妇女之被剥夺公民权利虽然是一桩畸形的事情，却不是——一个阶级特权的问题而是一个性别特权的问题。因此，为了完成民主主义的国家基础，我们需要成年男子选举法，废除所有穷人没有选举资格的规定，废除上议院，竞选人的费用应由公众负担，代表人应由公众给予报酬，每年一度的选举费用应由公众负

担。所有这些变革,在我们中间的保守党人看来,無論它是怎样無法接受的,現在都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些都是急进主义半世紀以来的老生常談。其次,我們还要考虑到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它是一个执行某些工作的机器;假若这些工作增加了而且性質改变了,那末这个机器也必需扩大和改变。現在,参政权确实已經相当扩大了,而且改变了政府的工作。但参政权的扩大对于这个国家机器还没有發生直接的影响。目前,在不断扩大的民主主义的压力之下,这种国家机器实际上已經瓦解了。因为工作主要是地方性的,而机器却主要是中央性的。沒有一个有效能的地方机器,就談不上用国营企業来代替私营企業;而我們很快就看得出来,这样的一种代替,是民主主义許多不可避免的后果之一。除非在每一个人口的中心地区,設立一个其結構与中央国会同样徹底民主的地方治理机构,否則一个民主国家就不能变为一个社会民主国家。这种民主的地方机构也同样准备得很好了。在1888年,一个公开反动的政府通过了一个“地方政府法案”(Local Government Bill),它意味着明显地向民主的地方自治前进一步^①。还有,这个地方政府法案是这样的一个法案:沒有人能看出它最后将止于何处。地方自治这种制度,很明显地是属于实际的政治范围以内。当这种地方自治制度得到实现的时候,民主国家就具有实现社会主义的机器了。

現在要討論的是,怎样才能把社会主义的原料——無产者除外——带到民主的国家机器里来。在这个問題上,解决的办法同样是很容易找到的。沒有社会主义者嫌疑的那些政客們,正以一

^① 这同一个政府,已开始認識到它無意中为社会民主主义所做的事情,現在(1889年),这个政府已經正在尽其可能地,用热心地提醒州会注意限制州会活动的那些办法,使得新成立的州会在社会主义方面失去作用。

种莽撞的方式主张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以致所引起的間接后果就是污辱了自觉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经济地租这一现象，在我們的各大城市里已达到了这样一个龐大的比例。经济地租私人占有的不公平是刺目的、罪恶昭彰的而且几乎是可笑的。在倫敦近郊的大路上，一排排类似的房子向乡間延展出去不知有多少里长，每隔几千碼，这些房子所收的租金就不同；租金的差額，刚好就是每年从这所房子到办公地点来回所能节省下来的或需要支付的那个数目。在布罗目士堡(Bloomsburg)和托騰罕(Tottenham)之間找房子住的人，發觉每一种位置上的便利，都被地主以科学般的精确把它窃取了。当租地的契約一个跟着一个滿期的时候，房子、鋪子以及作为劳动者平生劳动果实的商誉，就紛紛地落到拥有城市土地的地主的嘴里去了。最無知和易于受騙的資金持有者对社会主义者的各种攻击(例如說社会主义者沒收資本，掠夺家族，消灭进取心等)，公开地流行于倫敦。人們开始怀疑到，这些攻击的存在及作用，是否仅仅是为了要維持一个典型的公爵和他的有名的騎手和出名的賽馬。霍布豪斯勋爵和他的無可指責的、可尊敬的城市地价征稅委员会，已經在为使倫敦集体地拥有倫敦地产的价值而开始活动；每一个租約的滿期，都使他們的运动得到追加的动力。他們的立場是無可攻击的；他們所攻击的那个弊端不仅压在卑微的受苦者身上，也压在地方稅支付者及租賃者各个階級上。这种经济压力是用工人协会的政治輿論而大大地加强了。在工会里，比較温和的会员們都滿足于要求一种累进所得稅，这种所得稅实际上就是霍布豪斯勋爵的提案；而那些極端主义者又完全贊成土地国有，这同样又是霍布豪斯的原则。对于要求征收这种租稅的呼声，是不能够永久地加以拒絕的。而且很值得提到的是：在这种呼声中有一点新的見解。过去，租稅的征收是为了某一个特殊

的目的——譬如为了支付战争所需，为了教育或其他而提出的。现在，向地主征税的建议是为了要从他们那里把我们的钱拿回一点来——先从他们那里把钱拿来再想办法用它。自从亨利·乔治的书传到英国的急进主义者手中以来，就有一个不断增长的意向，去对显然是不劳而获的收入每镑抽二十先令的税；那就是，每年把四亿五千万镑倒在财政部的柜台上^①，然后为了土地已归还人民欢呼三声而告退。

这样一种处置的结果，假若它真正实现的话，可能要使它的拥护者相当吃惊。街上会充满了挨饿的各級工人、家庭帮工、馬車制造者、室內裝飾匠、珠宝商、做花边者、时髦行業的从业人員以及無數其他的人，这些人目前都是依靠从事这些工作和为有产阶级的需要服务而生活的。他们会叫道：“这就是你们的理論帶給我们的东西！讓我們回到旧时的好日子去吧！那时我們还能得到工資，它至少比一無所有要好一点。”显然地，财政部长会有三条路可供他选择。（1）他可以把钱还给地主和资本家并且向他们道歉；（2）他可以用这笔钱来試办国营工業以便使人民就業；（3）他可以干脆把这笔钱分給失業者。最后一条路是不可想像的，因为任何事都比食物与游兴（Panem et circens）好一些。第二条路（开办国营工業）对于应付目前这一个紧急的困难來說，将是一个过分龐大而不能很快就見效的企圖。第一条路（还钱并道歉）無异是对整台事情的荒謬性的証明——無异是承認私人有产者，尽管具有他所有的懶惰和貪欲，果然是在起着一种不可缺少的經濟作用——一种把超过了他个人有限的的能力所能用于个人直接消費之外的財富加以資本化的作用，尽管这种資本化是浪費的和道德

^① 关于这一个数字的溯源，可以在費邊短論第5册“社会主义者須知”中找到。

的。在这里，我們碰到了單純的亨利·乔治主义，或国家占有地租而不实行社会主义的失敗。要指出国家有权获得韦·士明斯特公爵 (the Duke of Westminster) 的全部收入，并进而爭論說應該对他的每鎊收入抽二十先令的稅是容易的。可是实际上老实說，除非国家已准备好把这筆錢投資到生产性企業中去，国家是沒有权利从这位公爵或其他任何人的資本中去拿五个銅子的。把資本从私人手中抽回而仅仅把它不事生产地鎖在國庫里所产生的迅速而有破坏性的各种后果，是任何一个政治家（不管他是怎样地以抽象經濟学的有害資料坚定了自己）所不能坚持下去的。如像过去那样，人們将来会發現：政府只有为了需要用錢来从事某些特殊目的的时候它才能够筹集金錢，而不能以演繹的論証来証明政府有权利筹集金錢。但是也得补充一句，当政府真的为了某些特殊目的而需錢的时候，那末，在将来跟在过去一样，它可以筹集金錢而絲毫無需顧慮到它将以演繹的論証来証明它沒有权利去筹集金錢。

于是，我們就处于一个进退維谷的地位。尽管有民主主义者和主張土地国有者的支持，但除非有来自另外一方面的压力强迫国家举办生产性企業的話，否則，地租就只好原封不动地放着。这样的一种压力是已經到来了。失業者的迅速地被餓死，具有比較丰富的特殊技能的就業者的緩慢地被餓死，那些今天就業而明天失業的人們的不可忍耐的焦虑或帶有危險性的不顧一切的情况，城市地租的上漲，由于貧苦移民的进入和本国人口增殖所引起的工資的非法降低，教育与不滿情緒的携手并进，所有这些都已达到了快要爆發的地步。用統計数字来証明大多数人民的情况比过去好是沒有用的，即使这种情况可能是真的，那也是由于社会民主主义的發展。然而即使这种情况也是有問題的，因为要把从来沒有被登記过的事情的統計数字拿来作为根据是沒有用的。混乱情况沒

有統計數字，事實上只有統計學家；他們之中的最能干的那一個人，對於食米消費的增加的評論是以這樣的一種承認開始的，他說：“任何人當他想像到群眾目前的處境時都會希望有某種類似革命的事情發生，以便得到一個較好的未來。”^① 群眾本身迅速地對上述情況轉而採取這種看法。因此，我們看到被基督精神的復生弄胡塗了的泛英國國教會議 (Pan-Anglican Synods) 禱告說：雖然社會主義顯然是具有基督教精神的，但“教會必須採取審慎和崇高的行動。”^② 而在上一個冬天 (1887—1888年) 失業者所發動的運動當中，倫敦的警察廳長被他自己的影子所吓壞了，把約翰·本斯 (John Burns)^③ 誤認為“法國革命”，這是使得這位廳長的爽快而勇敢的本階級的戰士非常高興的事情^④。這種失業群眾壓力的存在，還表現在為了解除這種壓力而提出來的為數眾多的各種安全措施——白銀的貨幣化，進口稅，“租戶選舉權” (leaseholds enfranchisement)，把“股份資本主義” (joint stock capitalism) 偽裝為合作運動而加以推廣^⑤ 以及其他不相干的東西。我自己從一個街頭宣傳者突然被提升到來這個台子上作演講，便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標志。可是，當我們根據我們各種不同的意見而強調道德并

① 杰芬先生所著“財政論文集”第二集，第393頁。

② 參閱1888年在蘭貝斯 (Lambeth) 舉行的泛英國國教會議的議事錄中社會主義調查委員會的報告。

③ 約翰·本斯 (John Burns, 1858—1943年)，英國工人運動領導者之一，1889年領導英國船塢工人同盟罷工大獲成功。曾任議員和閣員。——譯者

④ 結果警察廳長被撤換了；本斯先生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為倫敦第一屆州會議員。

⑤ 在這裡輪到合作運動的領袖們來說：他們不贊成用小資本家對紅利的追求，來代替合作運動創始人社會主義者羅伯特·歐文的理想；他們會說他們充分了解假若要對勞工問題得到一個最終的解決辦法，那末合作運動不僅是一個商業運動，而且更是一個政治運動。

美化傳說的時候，在要求工作的失業者与被指定負責處理窮人的地方當局之間的真正鬥爭正在開始。上一個冬天，失業者搜集了圓形的紅旗，並且由於沒有其他任何工作可做而去聽演講。他們歡迎社會主義，歡迎暴動，歡迎通貨紊亂——歡迎任何足以消磨時間，並足以表示他們是在餓着肚子的這一實際情況的任何事情。對各種著名經濟觀點同樣茫然無知的地方當局，否認貧困存在；它把窮人代表的領袖們送到地方政府委員會（Local Government Board），而這個委員會又很快地把他們送給貧民局的監護人（Guardians）。這些人威吓他們，罰他們去敲石頭，用大棒打他們，可是到了最後，這些監護人只有毫無辦法地坐下來，盼望着假若再是夏天，或者失業者都沉在海底就好。同時，遠不如工資基金那樣富于伸縮性的慈善基金，却充斥於倫敦市長官邸（Mansion House）中，並且听憑它在這些固定的慈善組織中用光了。這樣一種不穩定的情況是不能長久繼續下去的。威脅的行為以及來自反人民的報紙的吓人的、主張流血的叫囂，必然會在中產階級富于人道的人們當中造成激變。由於階級成見而盲目於任何社會責任感的人們，以一種迷信的恐怖畏懼着來自工人階級的暴動以致他們輕視了文明或控制^①。最後，市區就業必然要被提出來。這種辦法在單獨一個地方是行不通的，因為從全國各地像浪潮一般湧來的求職者將把一個孤立的實驗淹沒了。任何一個地方有了失業的壓力，必須要就地解決。為了公眾的體面，以及為了高級官員們着想，將不允許州會擬定一種每小時工資為一便士或少於一便士的十六小時工作日。這樣一來，很快地，州會所要處理的不僅有失業者，而且還有來自在血汗榨取者下面工作的白奴。這些白奴一旦認識到市

^① 在1886年2月及1887年11月的倫敦報紙中，可以找到關於倫敦西端（West End，倫敦富人居住區域——譯者）暴動恐慌的許多材料。

區就業比為私人僱主工作好，他們將要從陋室中逃跑出來并向市政當局要求工作。而且，作為一個純然是領取“計件”工資的奴隸驅使者的血汗榨取者本人，在許多情況下也會像他的奴隸們一樣地急于從逃避他的這種可怕的職業。但是，要市政當局把這些人組織起來從事勞動就需要資本。市政當局到什麼地方去取得資本呢？提高地方捐稅是不可能的，因為普通的商人和戶主們在捐稅方面已被抽到最大限度。再重的負擔似乎就會驅使他們打着紅旗跑到街上去了。可怕的進退兩難！處於前面是魔鬼後面是大海的州會，將要聽見霍布豪斯勳爵正在唱着一個解脫之歌，講着一個通過徵稅而把城市地價市有化的美好故事。主張土地國有者將要擴大這個合唱；主張累進所得稅的人會要一同歌唱，而支付租金的租戶們將要因快樂而歡呼。關於資本的困難於是便這樣解決了——因為我們無需認真地預期地主真正會要戰鬥，如像我們的主席^①所曾威脅過的那樣——但獲得土地的問題就要產生了。土地國有者主張由市政府把土地無償地歸并；但這種辦法被人們認為是只有革命的社會主義者才值得去干的辦法而加以反對。無償的土地國有化這種呼聲確乎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帶有災害性的暴動；因為假若所有的有產者要同時被剝奪，而且有產制度要立即被充分脹大了的社會主義所代替的話，那末賠償確乎是不必要的和荒謬的。但是假若土地國有是需要逐步前進的話，那末不予賠償的效果就是把某些有產者挑出來加以剝奪而另外一些有產者都安然無事，而且這是遠在市政當局舉辦適當的就業機會以前就把這些有產者的私有生產資料剝奪了。因此，土地應該像情況所需要的那樣，老老實實地加以購買；購買土地所需的錢以及為這筆錢所付的利息，

① 指布萊姆威爾勳爵(Lord Bramwell)，1888年英國學術協會經濟組的主席。

将要像資本一样是以向地租征税的办法取得的。当然，这种办法归根到底是一种剥夺的行为，就像今天征收所得税一样是一种剥夺的行为。这种办法将被地主們当做純然是以一种最古老的方式来犯一种最新式的罪恶而加以詛咒。实际上，在国家每購買一次土地的时候，地主是被迫把他的身体贖买而把他的土地交給市政当局，因而就把这种損失相当平均地分布在整個地主階級身上，而不是把这种損失单独地放在任何一个与这損失特別有关的地主身上。但是地主們必然被迫以一种能滿足普通公民的道德意識的方式来这样做，而且会做得就像一个有修养的經濟学家那样地有效。

現在我們預見到我們的市政当局已具有作为工業之用的土地和資本。首先，市政当局自然要扩大它們現在已在經營的各种工業并繼續筑公路，盖煤气厂，修电車道，盖房子等等。大多数市政当局很可能把它們的行为看作是一种純然是应付暫時緊急情况的措施。曼徹斯特学派将要極力主張它的保护政策的理論，其目的在于消除私营企業和公营企業之間的竞争。这是这个学派最后一次企圖利用群众对于經濟科学的無知所作的最大努力，而这种科学是这个学派經常努力把它加以貶低和愚弄的。短时期內，有产階級将在阻碍和限制市营企業方面获得成功^①；他們将在把乞食的污名加在市营企業所提供的劳务方面获得成功；他們将在把市营企業大量劳动者的艰苦工作和低微工資尽可能地保持在接近于私人竞争的水平方面获得成功。但是由于那种普遍要求降低地方捐稅的必要性（这种情况現在使得地方当局对于人道的呼吁無能为力）的消失，有产階級的权力即将随之破灭。慷他人之慨的这种愉快是無法抵抗的。拥有土地的地主将要成为市政当局的財源；

① 參閱第 258 頁注。

而一般的納稅者也將感覺到高枕無憂的好處。一般的納稅者立刻就解除了日漸增加的憂慮的重負，他們無需再憂慮有挨餓的暴民（這些人被認為就是社會主義和城市惡劣行為的核心）來打碎他們的窗子和掠奪他們的房屋。他們對於使地主支付這筆款項所感到的憐憫也正如地主對使他們支付地租所感到的憐憫一樣——一點不多，一點不少。當市政當局愈來愈民主化的時候，它將要發覺，地主主義不僅與民主主義相比是相對地喪失了力量，而且是絕對地喪失了力量。

可是，一般的納稅者也不可能長期地不受到影響。在新的市營工業開始擴大的時候，工資的問題就要產生。最低工資必須加以確定；雖然，在開始的時候，為了避免求職者的大量湧現，工資應該少到不足以引誘待遇良好的就業工人放棄他現有的工作而跑到市政當局那裏來找工作，可是，工資也不應該成為公開令人憎惡的競爭工資。如像中世紀的工錢一樣，工資至少要參考群眾意見，認為怎樣才適合一個合式的舒適的生活標準而加以規定。此外，市政當局還要對市營企業的組織者、經理以及其他必須的技術工人，付以他們的能力的全部市場價格，僅只減去足以引誘他們來就業的那種從事公務所具有的較高的聲望和長久性。雖然，這樣的一些高薪金並不會比開設一個新的股票公司對勞動市場引起更多的干擾，可是，勞動者最低工資的訂立對於勞動市場的影響是可以覺察得到的。最壞的那類血汗榨取者也必然會發現：假若他們要保持他們的“勞動人手”，他們至少必須像市政當局那樣來對待這些勞動人手。隨之而來的工資的上漲，將要把血汗榨取者的細小的邊際利潤吞食。因此，血汗榨取者必然向那些他幫助着去進行榨取的零售商店和批發商店要求增加單件價格。這又將減少批發商人及零售商人的利潤。這些商人勢必不能對群眾以提高他們的

商品的价格的办法来弥补这种损失，因为假若这种办法行得通的话，他们老早就采取了。可是对这些商人们说来是很幸运的，那就是作为商人，他们的能力的市场价格是依据决定商品价格的同一一些规律而决定的。正如血汗榨取者值得他的利润一样，这些商人们也同样地值得他们的利润；正如尽管工资上涨血汗榨取者仍能从商人那里勒索到他原有的报酬一样，尽管血汗榨取者的条件提高了，商人们同样地仍能取得他们原有的报酬。有人会要问，假若利润不是以提高商品价格的办法取偿于群众，那末它是取偿于什么人呢？很显然地，利润是取偿于上述这些商人在他的土地上组织生产的地主。换言之，商人们必然要求减少地租并且把地租减少了。因此，工业的组织者，纯粹的雇主，今天在经济学论文中往往称之为企业家的人，是不会遭受损失的。在产品的分配当中，企业家的份额保持不变，勤劳的工资劳动者的份额将要增加，而懒惰的有产者的份额将要减少。这样的一种调整过程本身并非没有阻碍和骚动；不过在现存制度之下，这样的一种阻碍经常是向着相反的方向进行，那就是以牺牲工人的办法而增加有产者的收入。

地主的收入的减少，必然会使从这一种收入征税而来的岁入随之减少。让我们假设市政当局为了保持岁入而在每镑的收入中多征一便士额外的税，其效果就是从两方面来消耗地主——这样的一种过程显然是不能无限度地继续下去的。但是，不久，税收就不足以作为市有资本的来源，市政当局不得不开始从它自己的工业产品中来节约出资本。使这些市营企业在市场上与私营企业相竞争是一桩无法抗拒的事情。市营企业既然无须受任何一个懒人的累，而且除了扩大资本而外，在支付雇员以后就无须再为任何事情有所开消。因而市营企业可以提供这样一种工资，这种工资是任何一个在懒惰的地主及股东的非生产性消费的重压下的商业组织

所不能提供的，除非这种商業組織由于它所处的地位的特别有利而获得了巨大的租金。可是，甚至地租，当它是城市地租时，从长远說来仍是受着市政当局的支配。街道及交通的管理人可以偏重这一地区而忽視另一地区。一家商店的租金决定于每小时内从它的櫺窗經過的人数。一系列時間安排得很好的实验，例如鋪路，建一个新的桥，鋪一条电車路，設一个兵营，办一个天花医院等等，只是决定城市地租的各种条件中的一些条件而已。市政当局控制这些条件的权力是如此显然，与它相竞争的个人是无能为力的。此外，互相竞争的私人，是被迫用与在边际耕地的全部生产成本相等的价格出售他們的产品的^①。市政当局可以用把产品价格降低到全市区耕地的平均生产成本的办法，来与这些私人相竞争。位置較好的私营企業，只能用停止支付租金的办法才能与市政当局相竞争，而位置較坏的私营企業只得毫無办法地屈服了。私营企業将陷于停頓或失敗。私有财产或者变为無利可圖，或者只能給它的具有一般能力的实际經營者带来这样的一种并不比他有把握地可以从市区就業中得到的更多的收入。而对于一个純粹的有产者，則私有财产不会为他生出任何东西。最后，全市的土地和工業将会由于各种經濟力量的自發行动而轉移到市政当局手中；这样一来，工業的社会主义化的問題就将被解决了。

私有财产使劳力廉价到最低限度以便从劳动者那里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因而减少了人們受教育的机会并提高了“能力租金”。这种能力租金的最重要的形式就是工業管理的利潤。一个偉大的肖像画画家或一个时髦的医生的收入是不大重要的，因为他們的收入完全取决于一个具有深刻的虛荣和憂郁症的非常富有的阶级

^① 关于这些术语的意义，对于讀过本書第一篇論文的讀者們将是熟悉的。

的主雇們的存在。可是工業組織者是不依賴于主雇的，他不是把工業產品的一大部分歸于他自己所有，而是用他的管理增加了產品。這種能力的市場價格決定于供求關係：這種能力愈多就愈賤，愈少就愈貴。任何原因所引起的供給的增加都減低了這種能力的價格。現在，很顯然的，由於一個經理必須是一個受過教育和風度很好的人，因此，一般地向勞動階層中去尋找經理技能的供給是無用的。在一百萬個勞動者中沒有一個人是依靠特別的天賦、特別的幸運或這二者而在他的同伴中獲得顯達的。經理們自然只能從享有教育和社会文化的這些階層中得來；而他們的价格，雖然由於教育普及和因而產生的“具有知識的無產階級”的成長而下降，也仍然是高昂的。誠然，一位非常能干而又受過高級訓練的經理，假若他的職位不強迫他把三分之二的收入花費在所謂的“維持體面”而用於滿足他的生活需要的話，那麼，我們現在可以用八百鎊的薪金去聘請這樣的一位經理^①。而且，當我們考慮到勞動者每年的收入少於五十鎊，而對勞動者的需求必然是十分大於對能干的經理的要求的時候——並且這二者之間有一個反比關係，因為經理的天才的價值是與他所能加以組織的勞動的數量成正比的——我們將承認八百鎊一年代表著一個巨大的能力租金。但是假若教育和文化（這是經理這種職位的競爭者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條件）不只是幾千個人能享受到而是幾百萬人能享受到的話，那麼這種能力租金將會大大地降低。私有財產目前的趨勢是使群眾只成為負重的牲口，而社會民主主義的趨勢是要教育他們——使他們成為人。社會民主主義不會長久地負著這個能力租金的重担，這種能力租金在過去這一世紀中曾經把我們的天生的工業巨子變為我們的主

① 見第70頁注。

人和暴君，而不为我們的公僕和領袖。甚至可以想像，这种能力租金到某个时候是可能变为負数的^①。这种說法，对于許多由于处在現存反常的事物中而难免被弄昏了头脑的人來說，可能是会使他們驚訝的。你們之中“地位最高的那一个人應該为所有的人服务”的这种建議，在这些人听起来是一个空想的似是而非的論調，而不是一个最明显的与不可避免的社会安排。虽然能力租金的降低不仅对于全市來說是有利的，对于其余的私人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可是，当市政当局的声望日益增长，并且人們愈来愈看清楚未来是朝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能干的組織者宁願接受較低的薪水为市政当局服务而不願接受私人的雇用。那些在組織的才干上能够胜过市政当局的人們，或者另外一些人們（由于他們是職業界中的人，可以直接与群众交往而無需受工業組織的干涉），将为他們在商業上的地位而直接向市政当局付出租金或者向私人地主付出租金；而私人地主的租金收入則将被市政当局用征税的方法加以吸收。最后，当能力租金已降低到不可再降的天然水平的时候，这种租金就可以用累进所得税的办法来处理了。这种处理办法是会能引起社会的重大不便的。

我們無需深入討論在消灭私有财产的过程中有关經濟方面的細节。我在此处所提出来的这种过程，大部分已可能被相繼立約投降的各派有产階級的人們所預期到了。他們認為这种过程就是在他們的权力完全丧失之前，在他們所能忍耐的条件下来結束他們的特殊利益的一个罗网^②。

現在，我們还可以安然地把下議院發展为中央政府的这个問

^① 那就是說，經理从他工作中所得到的收入比技术工人所得的少。雇主所得的利潤少于職員的工資的例子，在某些工業中絕不是不常見的。在这些工業中，小商人有机会雇用技术工人。

題暂时擱下不談。这个中央政府将成为联合各个市政当局的一个机构，它可以憑借調整各市对大英帝国的賦稅的負担而实现各市之間租金的国有化；簡言之，即它履行有別于地方事务的国家事务的責任。我們可以看出來：未来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将会是一个巨大的事業；其他的国家将要深深地被英国进步的反应所影响；在外交政策中一直是真正的統治因素的国际貿易，将要被从一个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考虑，它将不是从个人的金錢利益方面来衡量而是从純社会福利方面来衡量；我們当前的帝国主义侵略制度（这种制度，在一种探險和殖民的借口下，国旗跟随着擅自侵犯外国土地的人，貿易跟着国旗，最后以傳教士来压尾）在我們对武装力量的控制由資产階級轉移到人民手中去的时候必然要瓦解；各个階級以及我們現在可笑地称之为“公众輿論”的輿論将要憑借着把整个社会融合为一个具有不可想像的力量的公众輿論的单一階級而消失；这种輿論将要破天荒第一次有可能来有效地控制全体人民；妇女在經濟上的独立以及用个人来代替家长作为国家的单位，将要实际上改变子女的地位及家庭制度的效用；而那个不可避免的国教(State Church)的改革，例如，在一种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可以

② 这种投降在财政部长利用当前利息率的下降而乘机把統一公債贬值时已發生过了。他只簡單地威胁說要用以当前利息率借来的貨幣把公債券持有人償清。这些公債券持有者認識到除了接受财政部长所提出的贬值公債而外他們不可能在更好的条件下再把貨幣重新投資，因而他們只得屈服了。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說明，为什么市政当局不應該为它的市民去获得同样的利益。例如，現在倫敦的居民每年向煤氣公司的股東支付一百五十万鎊，即煤氣工厂的一千三百六十五万鎊成本的11%。倫敦州会每年可募集总数約为四十万鎊的款項。只要倫敦州会威胁說要这样做并且开始建設煤氣工厂，就可以迫使煤氣工厂的股東們接受每年四十万鎊的代价而把煤氣工厂交出來，因而就牺牲了这些股東們現在所享受的額外的8%。这样一來就可以为倫敦的公民們每年节省一百一十万鎊了，这笔錢已足够支付倫敦市学務委员会的雜費用。都市的讀者們可以在晋边短論第8册“倫敦人須知”中找到一些同类的情况。

打开一种把公开的自由思想者如像約翰·摩里或布拉德罗选为韦士明斯特主教的可能性。

所有这些，都被提出来作为思想和行动的肥沃的园地的一种鳥瞰。当我们解决了面包和牛油的问题而能自由地去使用和發展我們的較高的才能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园地正在等待着我們去开发。

这就是今日講求实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单調無味的綱領。在这个綱領里面沒有一件新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是那些已經被人們承認了的各种原則的运用，以及把已經在充分起作用的各种实务加以推广而已。在所有这些綱領上都打上了适合于英国的心灵的礼拜堂的烙印。沒有一条綱領强迫人使用社会主义或革命这种字眼；因为沒有在哪一点上这些綱領涉及到斫头、宣傳人权、在国家的神壇上賭咒或其他任何在本質上被認為是非英国的东西。所有这些綱領都必然实现——我們的道路的里程碑甚至已經被害怕这些綱領的政党中具有远見的政客們所看見了。

作为結論，讓我来否認一切对于这个不可避免的，然而却是吝嗇的、迟緩的、勉强地、胆怯的走向正义之路的贊美。我冒昧地要求讀者去尊敬这些社会主义的热心家們，他們坚决不相信当国会和教会在勉强地向着瑣碎的改善摸索前进的时候，千百万同胞必須被留在無助的苦役和墮落中受苦受罪。正义是这样的清楚，錯誤是这样的不能容忍，社会主义的福音是这样的令人信服，因此，在他們看来必定是可能把整个工人、士兵、警察及所有的人在博爱和平等的旗帜下集合起来；一举就可以把正义的女神放在她合法的宝座上。不幸得很，这样一个光輝的队伍不可能从十九世紀人类文化的产物中得来，正如葡萄不能从薊草中得来一样。但是假若我們因为这种不可能而感到高兴；假若我們因为这种改变緩慢

到足以避免我們个人的危險而感到放心；假若當我們發現在我們与天国之間還存在着一塊荒野的地方，在那里許多人必須要由于貧窮和絕望而悲慘地死亡而不感到深刻的失望和痛苦的耻辱，那么，我就可以向你們說，我們的制度已把我們腐化到自私的最卑怯的程度了。社会主义者無需為他們首先建議（如他們做過的那樣）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和普遍起義而感到羞慚。這個建議被證明了是行不通的；而且它已經被英國社会主义者們所放棄了——雖然是以公開表示遺憾的方式而放棄了的——可是對於我今天所提出的社会民主主义綱領來說，工人階級的武裝組織和普遍起義，仍不失為一個唯一的、最后可能採取的另一個辦法。

社会主义的远景

赫伯特·布朗德

韦白先生对历史的回顾，把我们从一个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从一个建立在对天命 (divine order) 的普遍信仰的这样一个“旧组织的崩溃” (用他自己的术语) 带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觉察到个人主义的原则不足以维持工业机构顺利运转的困惑的政治家们，口头上喊着“契约自由”，连夜通过了工厂条例，并运用他们在财政上的天才，把来自地租和利息的收入，一部分一部分地加以削减。韦白先生的论文，是用归纳的方法，证明了无政府状态不能满足真实而具体的男人和女人的需要——从历史上来证明人类世界离开了制度，通过混乱，再折回到制度。

克拉凯先生也用历史的方法指示给我们：假若经济的发展沿着目前的方向再继续几年，那末通过联合垄断组织和托拉斯，我们就要达到“界限分明的贫富对立”的这样一个时期，这个时期曾被德国思想界确定为正好处于一个根本的变革之前的短暂的社会进化阶段。

对于这些条顿族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所作的假定中所含的真理，任何一个曾对这个假定给予片刻慎重思考的人都是不会提出非难的。同时，任何一个同意本书这些论文中所提出来的论点的人，也不会相信在资本主义完成了它自己最终的逻辑表现以前，从减弱了的个人主义到充分的集体主义的过渡能够实现。在那时以

前，無論怎樣猛烈的政治或社会动乱，甚至“主張使用武力的革命者們”把張惶失措的侍衛追击到議會大街，并使費边社执行委员会在皇宮的會議厅內举行會議，用貝桑特夫人 (Mrs. Besant) 的話來說，都不过是一种“暂时性的暴动”，这种暴动“只能推翻王位并把国王斬首”^① 而已。我以为所有的社会学家都会同意，并且相信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会同意这样一种說法，那就是：在那个經濟的時刻到来以前，縱然飢餓或無知的人可能在倫敦市議會厅 (White chapel) 掀起一陣騷动并使特拉法尔加广场血流成潭，可是社会革命是不可能的。但是，对我來說，我甚至不相信皇家近衛队会遭到暫时的潰敗，也确乎不相信有任何不容易被首都警察所鎮压下去的群众暴动；而且我将不浪費時間来討論那种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少不更事的时代——在它的“前費边时代” (Pre-Fabian era)——比現在还时常听得見的解决社会問題的方法，那就是：勇猛的少数人采取武力革命的方法。正如像享有特权的托利党人一样，这些主張使用武力的人們沒有注意到事物的变化，沒有認識到由于选举权所引起的变化。在租戶选举法 (lodger franchise) 制度之下，武装革命乃是为数稀少的、自覺無望的少数群众最后才会采取的手段，这种做法是一个感到絕望的坦白承認，是把整个社会主义問題降低到荒唐的地步。革命的冒險行为，在元气橫溢的少年时代是一种自然而無足責备的行为，在身强力壮的青年时代是一种幼稚的狂妄行为，而在壯年时代将是一种犯罪的愚蠢行为。

那末，讓我們假定当前的經濟發展将要沿着它当前的方向繼續前进。机器将要代替手工；股份公司将要吸收私营商店，而轉过来，股份公司又将被联合壟断組織和托拉斯所吞并。因此，資本較

^① 由于对于这一論点的半自覺的承認，才引起了英國工人階級中的好战的共和主义 (Republicanism) 的消失。

小的生产者将要逐渐地，但却是以不断增长的速度，被排挤出来并論为大工业公司和商业公司的雇員。这些公司都是由具有高度技能的工业巨子为了那些不事劳动的股東们的利益而去经营的。

在像我国这样一个议会制的国家里，那种把有产者和無产者分开的经济上的割裂愈来愈扩大而且愈来愈明显；这种经济上的割裂在政治领域中也必然有和它类似的情况。以大工业 (Grand Industry) 之建立而结束的上一世纪的工业革命乃是最后一个巨大的未被意識到的世界性的变革。这个工业革命当然是受到了立法的帮助，不过这种帮助仅仅是属于否定旧制度和破坏旧制度的那一类帮助。革命者对议会的要求是“打开我们的镣铐并且不要来管我们”。并不完全了解他们自己是在做什么的議員們，响应了这种呼声并且快活地举了債，而且投票通过了为进行商业战争的款項。这样的一种情景今后不会再看得見了。选举权的一再扩大不仅使劳动群众可以發表意見，它还把自觉給予他們；将来，那些遭受经济变革的痛苦的人們的呼声的反响，将变为在英国议会 (St. Stephen's)^① 及城市行会会所四壁以内可以听得見的要求救济的靠声。

于是，未来的“有产者” (haves) 与“無产者” (have nots) 之間的斗争，将要变为政党之間的冲突。每一个政党都完全意識到它是在为什么而斗争，并且充分領悟到所爭論的問題的生死般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說“将要”，是因为任何人只需讀几篇政府领导人的演說或参加一个工人俱乐部的討論，就可以深信：在目前，仅仅是双方具有較敏銳的眼光和較警醒的头脑的人，才部分地意識到这

^① 因英国议会以前在聖·斯梯芬教堂召开，故以聖·斯梯芬称呼英国议会。——譯者

种竞选的真正性质。这种竞选的第一炮，现在甚至是在每一个补缺选举中都可以听得见的。

但是，正像没有任何一桩事情会像一阵尖锐的痛苦的治疗那样更能使人如此充分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因此，只有加在享有参政权和受过教育的无产者身上的、由于不断增加的经济压力所形成的那种痛苦（例如饥饿、对于家无隔宿之粮所感到的绝望、对于买不起另外一条新袜子所感到的焦虑），才能唤醒无产者的自由的自觉。这种自觉将使经济的变革获得一种政治的表现，并使工人们能够去实际使用他们的政治武器。

因此，从这篇论文的观点来说，社会主义的远景是这样的一个政治远景：在这样一个远景中，我们期待看到政治领域逐渐变为经济领域的反映（reflex）。那个政治领域之所以至今尚迟迟未与经济情况相一致的这样一回事，乃是与我们从我国过去的历史中所得到的全部教训相符合的。几十年以来，乡绅政治在下议院中保持着一个完全与它的经济力量的效能不相称的势力；甚至在今天，“拥有土地者的利益”（landed interest），仍然在立法中占着大过它真正的重要性所应享受的那种地位。所以，假若我们把英国各政党的情况冷静地考察一下，而所得到的真相是政治发展的速度与我们在思想和工业方面向着社会主义前进的速度不相称的话，那么，我们是既不必感到惊讶也不必感到丧气的。

上述这种实际情况，对于社会主义者及政治学者是比对普通人或者比对乘坐头等火车的人可能是——而且几乎确然是——非常明白的。急进主义者的报纸对于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人（Home Ruler）在补缺选举中当选所作的喧闐的欢呼，一个自由党领袖在一个两小时的演说内简略而含糊地提到“人民的家庭”（homes of the people），或者在新的每年的节目内插入一个“社会主义”的政

綱条文，都是适当而且聰明地計劃好了来欺騙熱心的民主主义者并把冷酷的恐怖打到胆小的托利党人心中去的。但是，对于各个政党目前情况的一个絕對公平的分析，将会使得一个最熱心的人相信：克拉凱先生的論文（本書第三篇文章——譯者）所討論到的巨大的經濟變革的微風，仅仅偶尔吹皺了下議院的外表。

当这一套演講的摘要被草拟出来的时候，負責草拟这个摘要的人們曾建議把那陈旧的成語“輝格党的消失”作为本文的第一个副标题。这是一个令人高兴的詞句。而且一个具有乐观但缺乏分析能力的气質的人，可以从这个詞句的沉思中得到很多的安慰。在这一点上，印出来的字比不上講出来的字，它們不能表达語气和強調所加在字眼上的更好的意义的細微差別；因此，当我们看到“消失”这两个字的时候，它們一点也不带諷刺的意味。然而，“輝格党的消失”这句成語，假若不是“意味着諷刺”的也是不得要点的；因为至今輝格党不但沒有“消失”，而且它还是今天的偉大的政治事实。这种說法，对于被急进主义者的报纸每天对民主的呼喊震聳了耳朵的人們來說，是需要一些証实和支持的。那么，讓我們来看看事实吧。有关当前議会的第一件使我們想起来的事就是：它已不再包括着两个显然不同的党派，那就是說，它已不再包括着两个各自持有根本不同原則的人們的集团。地方自治的問題被拋开了^①，除了关于“廢除国立名目”（Disestablishment）的極小問題而外，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釋，为什么甚至类似政党的組織还要被保留下来；或者为什么不把下議院的會場建筑結構安排得像市政厅

^① 在地方自治這個問題上，原則上的區別是表面的而不是真實的。格拉斯頓派拒絕任何分治的要求，并肯定他們要維持英国議會絕對否決的意圖；而自由統一黨員（Liberal Unionist）則公开宣稱他們最後的目的是要給爱尔兰以英格蘭和蘇格蘭現在享受的或將要享受到的同樣的自治權。

里的那样，在那里，所有的坐位都面对着主席台。

但是，五十年以前下议院的演讲台，曾经是一个具有真正意义的前线；而“辉格”和“托利”这两个称号，是具有真正内容和精神实质的字眼。托利党主要是由有意识地反对普选制（popular representation）的人们所组成的，他们不愿这种反对会使他们成功或失败。作为一种有生气的政治纲领，他们认为对人民的管理是有钱人特别是那些因地租而致富的人们永远的承继物。反过来说，辉格党人相信，或者据说他们相信“天听自民听”这个格言；总而言之，他们一贯主张采取那种能够发出明显而且响亮的呼声的措施。因此，这就是那些根本的区别之一，没有这种区别，政党的命名不过是一件假事。但是另外一个区别还是存在的。在本世纪（指十九世纪——译者）的上半期，在历史传统方面说来是偏窄的、而且听不到新的蒸汽机的活塞杆已在砰砰地敲着旧制度的丧钟的托利党人，仍然可怜地抱住关于国家机能及领土权利的陈旧观念。辉格党人赞成自由放任及因之而产生的商人霸权。当我说到所有从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狄士拉里（Disraeli）^①把选举权给予具有十个英镑财产的租户的一段时间内所发生的各种政治争辩^②，都能在上述两个根本区别之间的一个中找到他们的共同原因的时候，我是在作一个可以加以证明的论点。这个斗争的胜负早已决定了。辉格党人一直是获得胜利的。托利党人不仅被击败而且被吞并了。如像马考洛所叙述的这样一种过程正在进行着：在诺曼人侵入以后，人们逐渐不再称自己为撒克逊人和诺曼人，而骄傲地夸耀

^① 狄士拉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年），即培根菲尔德伯爵（Earl Beaconsfield），英国保守党的政治理论家。他死后保守党人为他组织了“樱草会”。

——译者

^② 争取天主教的解放及革除宗教上的无能的斗争，是在宗派的基础上而不是在政治的基础上进行的。

自己是一个英国人。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情况，不同之点就是：虽然托利党人已接受了辉格党的全部原则，他们仍然拒绝辉格党的名字。

今天，没有一个所谓的保守党人，敢于在公开的原则基础上来反对扩大参政权。最多他不过是对它加以因循并要求把它慢慢付诸实行而已。当里奇先生提出他的“赤裸裸的，民主主义的”地方政府法案的时候，他也不必为这种有意识的前后矛盾而在他的脸上流露出羞惭。而且他有理由不必感到羞惭；因为他所做的并没有违犯政党的原则。

在国家机能这个问题上，托利党的关心并不太显明，因为只要在社会存在的时候，从来还不曾有过，而且也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在逻辑上是自由放任的诚实的政党。甚至就在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时期中，这两大党之间的区别主要是一个脾性上的区别，一个心理状态上的区别。托利党对国家有一定的情感——一种天然的自爱，而辉格党则对国家有怀疑，这种怀疑现在是我们全体普通人的情绪。辉格党人看到（其中有些人可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些），有许多事必须要国家来做，但他们所有的人都唯愿国家所管的事应该尽量少些。甚至当他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他们能感到而不能了解的力量（这种力量只有社会主义者了解而且能够了解）所驱使而提出加强中央控制地方的权力的措施时，他们的论据也往往是充满了病态的道歉的意味；他们的姿态往往是一种胆小的反对和急躁的疑惑。他们往往是紧张地急于要解释他们的建议并没有违犯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对于他们来说，政治经济学不是指西狄威克教授的政治经济学而是指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

何以所有著名的政治家们在巨大的基本原理方面都是众口一词的？其理由在一般普通人的眼里看来是很清楚的，那就是：虽然

目前已没有什么值得激烈地甚至温和地加以辩论的问题，但政治热潮还是像过去一般高。不是在竞技场的尘土里而是在会议厅的静穆里，我们才能领悟到人们对于一个干骨头也会像对一个活的原理那样互相残酷地斗争而且互相阴险地攻击。我们需要站开一会儿才能看出政治家们就如像西里教授(Professor Seeley)在某个地方所谈过的那些宗教上的争论者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从来不会感到这样大的愤怒，如像当他们发现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已到了几乎不可识别的地步时那样，也许只有在他们的意见确定是存在着分歧的时候，才会使他们感到同样程度的愤怒。

这种众口一词现象的有效和最终的原因，乃是对于这样一种事实的不自觉的或半自觉的承认，那就是：“国家”这个字本身带有种种不同的新的涵义(connotation)——即国家这一个概念已经改变了它的内容。无论国家管制(State control)在五十年前意味着什么东西，但它从来不意味着对私有财产本身的敌视。现在，对于我们来说，以及就我们所能看到的来说，国家管制就只意味着对私有财产的敌视而几乎不意味着别的东西。只要国家干涉这一群有产者的私有财产和权力以便增加另一些人的财产和权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这种干涉和反对这种干涉的政党的存在乃是必要的。对外来谷物的征收关税意味着提高来自地租的收入^①，而这种关税的废除则意味着制造商利润的增加。“自由贸易”使新的资产阶级的钱包涨大了，而工厂条例则把他们的利润减低，并为地租减少了的乡绅们作了一个很好的报复。但是对于这种为了有产者的目的而操纵立法机构的事已将结束了，或者

^① 从历史上讲，这种说法不是十分正确的；不过地主们都相信他们的兴旺是依赖于排斥外来谷物的，因此，这种情况对于支持我的论证的这个目的来说，是足够的了。

眼看着就要結束了。国家由于各种单位的巨大集中而变得更大了，这些单位在过去都是力圖与它相分离的；現在，国家的行动一般地不是指向把私有财产和各种特权在各階級之間重新調整，而是指向着私有财产和各种特权的完全消灭。因此，使得有产的政客們联合在一起的，自然是一种保存自己的本能。

但是，也許头脑弄混乱了的急进主义者、胆小的保守党人或乐观的社会主义者会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假若政治領袖們真正是反对国家的扩大（State augmentation）的，那末为什么每一个被提到下議院的新的改革措施都或多或少地带着一点社会主义色彩？为什么没有一个著名的演說家在公开演講中談到社会問題的时候敢于不引証一些社会主义的东西？例如，为什么那个最圓滑持重的政治風信雞威廉·哈尔柯特爵士指着黎明叫道：“現在我們都是社会主义者了”呢？

对于这些問題（它們并不是我所捏造的），我的回答是：第一，因为政治領袖們的反对国家扩大是本能的，而且，甚至对最虛伪的那个人來說，仅仅是半自覺的；第二，因为許多社会主义的立法只是見諸文字而不見諸实行的；第三，因为威廉·哈尔柯特爵士的有名的华丽辞藻乃是一个悅耳的謊言；第四，因为，很幸运地，对于人类的进步來說，保存自己的本能并不是有产階級所特有的。

工人階級对于国家的态度的改变，大部分是出自本能而且全部是出于保存自己。他們从把它当作一个实际的敌人而畏惧轉变到把它看作一个可能的救助者。我知道这种說法将遭到社会主义的弟兄們的猛烈的否認。当人們告訴沾在車輪上的蒼蠅說，归根到底，它不是使車輪轉动的那个动力时，它自然会感觉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对于我來說，社会主义政党的善辯的演說家們，尽可以从幻想中去得到他們所能得到的一切安慰，他們尽可以去想像：不

是任何偉大的、盲目的进化力量，而是他們自己才是社会革命的动力。此外，关于蒼蝇的这个比喻确实不是脚踏实地的（在目前，我忘記了蒼蝇有几支脚）；因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不是使車輪轉动的动力，他至少知道車子是向着哪个方向开的。可是在我看来，社会主义者所起的那一部分作用無論如何是足够显著的；因为正是社会主义者把本能轉为自觉的理智；他把一个默然無声的要求喊了出来；他把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思想潮流导向正确的方向。

确实是有一个真正的裂口在慢慢地穿过整个的国家（the body politic）；不过造成裂口的那个楔子現在还看不見。这个楔子在發生作用的标志，可以在許多有名政客們所主張的假改革的反动措施中找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可以在某些無名的人所提出的提案中找到；可以在政治俱乐部里的人对于純粹的政治讀物日愈嫌恶的这种情況中找到；并且可以在一部分有教养的中产階級对于費边社言論的容忍态度中找到。

这种对于現代趋势的意义的有意識的承認，即对于这个裂口的新界綫的規定，虽然它是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希望的源泉，同时它也是某些栩栩欲生的恐惧的来源。在目前，仅只有产階級的那些較敏銳和較有远見的人，能够充分意識到这样一种攻击的真正本質。人們只消去听一听任何一个普通的自由党候选人的空談，就可以注意到这个人是多么的愚昧無知。他認為生产資料私人占有这一事实的存在，完全不是形成社会問題的一个因素。自由党一般成員的情況既是如此，那么他們的領袖人物的情況也必定是如此，只不过不如此愚昧罢了。对于經济学茫然無知而又不能在目前摆脱十八世紀的政治哲学^①对于他們的思想的影响，就妨碍了

^① 參閱約翰·莫泰先生关于八小时工作日提案及城市土地地租征稅案的演說，还可參閱布拉得勞先生最近所發表的著作中有关各章节。

这一个“进步的政党”的領袖們对于新的思想的前进采取一种明确的贊成或反对的立場。像俾斯麦亲王（他看得出社会主义的日益高漲的、汹涌而来的浪潮必須憑借及时采取立法的防波堤才能把它打破）那样的英国政治家的数目，是只能用負数来表示的。但是人們对于这种政治的近視，并非是要加以忍受的。在市区或其他的选举中，投給公开的社会主义候选人的每一張額外的选票，都有助于向自由党人証明：把选票只当作是用来攻击資本主义的武器的新的民主主义的党派，是一个日益壮大的党派。最后，我們的自由党人将要面临着一个合乎邏輯但却令人生气的选择。他或者放弃拥护私人資本，或者坦白承認只不过是一个本質上沒有差异的区别，才把他和他多年以来猛烈地加以攻击的保守党人分离开来。

最初看来，好像自由党历史中的这一个政治时机对于社会主义事業是一个显然的吉兆。可是，虽然我对于邏輯在长期中要获得胜利的这一桩事具有很大的信心，但我也同样清楚地認識到要获得胜利的这一个过程必定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特别是对于政客們耍手段的能力以及他們玩弄观望游戏的才能是非常欽佩的。要建議一位政治家从两条合乎邏輯的道路中选择一条是一件事，要防止他去發現第三条不合邏輯的路并且向着这条路走又是另一回事。在目前情况下要防止政治家們这样做是困难到不可能的地步；因为在自由党人手中还掌握着一付很强的牌——一付政治的牌。

我們的政党的社会綱領，必定远在自由党的各种純粹的政治提案之前得到皇室的批准；而自由党的政客們将要以喧嚷地、濤濤不絕地提出他們的提案的手段，来阻碍我們的綱領的被采用。对于我們說来这是很不幸的，因为要玩这样的一种游戏是很容易的。非

社会主义的政客們对于在政治上提出一些离奇的問題使人們的注意力离开本題 (political red herring) 的嗅覺是敏銳的，而他們对于“死海的政治果实” (Political Dead Sea fruit)^① 的胃口是巨大的。这些政客們的連篇的“福音”，使他們自己听起来都会得到灵魂上的安慰。在一个自私自利的时代里，这种政客的令人感动的克己，假若不是如此可笑的話，是会令人感到高兴的。每星期賺二十五先令的一个年青的技工(他和他的妻子兒女住在兩間像“模型般的”小房子內，他不能成为一个租戶也正如他不能成为一个喇嘛一样)，将要为了租戶选举权而叫哑了他的嗓子，并且要对倫敦西端的有錢的地主掠夺了倫敦西端的有錢的商人这桩事表示極大的憤慨。最后的一件衬衫已送到当鋪里的“失業者”，他将要冒着把自己的头顱在特拉法尔加广场被打破的危險，来为奥布利安先生 (Mr. O'Brien) 要求在監獄里穿得像个紳士一样的那个要求辯护。

上述所有这些情况当然是令人感动的。認真地說，它确实表示着我們解救社会的希望所借以存在的高貴的人类品質和广闊的人类同情心。但是必須不要讓这种人类同情心的無限可能性使我們看不到这样的一种事实，那就是：在这种同情的现实性方面，那个善于推托的自由党，将会看出他有机会去把政治的社会化無限地加以拖延。成年男子选举权、妇女选举权、已故的妻子們的姐妹們的悲哀、非国教派牧师 (dissenting ministers) 的社会野心、对于“自由”地获得土地财产的法律上的障碍、“亲爱的老苏格兰”和“被遗忘了的小威尔斯”的地方自治、額外的什一稅 (Tithes) 以及上議院的改革等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無數的障碍，很可能有效地

① 傳說死海附近有一种苹果，外觀美丽，一摘就冒烟成灰。——譯者

被投在社会主义者大軍前进的道路上。而所有这些情况中最坏的一种情况就是：自由党人在他們大部分富于破坏性的策略中将会制伏我們。因为我們充分地保証徹底的民主化，所以，無論对于世襲特权或阶级特权的攻击是来自哪一方面，我們必須支持这种攻击。

但是，再折回到我們的牌桌的比喻（这一个比喻对于政治人物所玩的游戏是更加适用的），自由党人手里的政治上的牌还未用完，他还有着一張可以摊下来的牌——一張真正的王牌。“假社会主义”（Sham Socialism）就是这張王牌的名字，而把这張王牌摊出来的人就是約翰·摩里先生。

我在上面已談到过，趋向于社会主义的各种事情，在人們对于国家干涉和国家管制的态度方面的轉变表現得最清楚；而这种說法是真实的。但是，仍旧必須不要忘記：虽然社会主义包括国家管制，但国家管制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至少不意味着这个术语的任何現代意义。在我們要决定一个国家是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前，我們所要观察的主要并不在于这个国家是在做什么，而在于这个国家这样做是为了什么目的。社会主义是生产資料及交換資料的公有，以及为了所有人的同等利益而在这些方面的公有。有鑒于我們之中某些人現在所持的論調^①，我無法过分强烈地坚持这一区别的重要性；因为朋友們对于这一点的忽視以及敌人的有意的曖昧化，都会造成巨大的直接的危險。在一群中产阶级的听众面前作辯論的时候，把六便士拍一个电报这回事拿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的例子，也許是用来击败一个主張个人主义的爭辯者的很好的方法；但是从無产阶级的观点看

^① 社会党中最不屈不挠而多产的党员中的一位党员，在一本流傳很广的短論內，曾实际地举出摊販执照的存在，作为“社会主义进步”的一个例子！

来，国家所采取的、只用来減輕资产階級和有關階級的負擔的一桩措施，并不比中世紀的領主稅 (droits de Seigneur) 更足以被当作社会主义。然而正是这一类假社会主义，将会像人一定会死亡一样地被著名的政党施舍給人們。他們希望人們把一种單純的国家行动，誤認為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立法。假若真正知道自己意向何在的那些社会主义者犹豫着（由于怕失去声望或者由于更多的厚道的軟弱）而不大声疾呼地反对采納任何足以延长私人資本生命一个小时的提案，那么这些害人的礼物 (Greek gifts) 的贈予者的目的，無疑一定能够达到。

但是，把假社会主义完全丢开不談，在自由主义的“和急进主义的”綱領中，仍旧存在着其他政綱，这些政綱在私人資本的摧毀者的道路上形成了頑強的障碍。例如，設若我們遇見廢除国教的事情而下議院的班底仍旧是像目前这样地一成不变的时候，那么，很少有其他事情会比下面的这几桩事情更可能發生，那就是：大部分現在在本質上是集体財產的东西将要落到私人手中去；对持有所有权發生兴趣的人数将要增加；唯一得到滿足的情感，就是这一些人的貪得無厭的情感以及反国教派教会 (Little Bethel) 的妒嫉心。

此外，急进主义者在土地問題上的普遍心理状态是难以使社会主义者感到愉快的。誠然，所謂的“进步分子”会拥护亨利·乔治并对土地国有化(这一个本身就是“福音”的字眼)表示同情；但是他完全拿不穩土地国有化、土地自由买卖和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并非同一建議的三个名字。而且，就自由党的正式黨員而言，毫無疑問地，在这三条“解决办法”之中，第二条及第三条办法会得到更多的拥护。处理土地問題的方式乃是社会主义的最初步的教育，主張“土地自由买卖”或农民所有制的急进主义者，和托利党人本

身比較起来，乃是一支不很强大的革命力量；因为托利党人只企圖在土地方面保持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是联合壟断組織和托拉斯的創造者在資本方面所企圖实现的^①——而这些創造者在經濟进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我們一致同意的。

民主主义进步的本身，是無力把我們从上述这些危險中拯救出来的；因为民主主义虽然随时随地都孕育着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的誕生可能一方面由于愚蠢、另一方面由于聰明而無限地被延迟下去。

对于社会主义可能产生的人为的阻碍，我已經进行了相当詳細的分析。由于在过去一年当中急进主义者左翼對我們所表示的温和与礼貌，由于急进主义者的选票使我們之中的某些候选人在学务委员会及其他的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并且由于某些“进步的”报纸所賜給我們的友誼的贊助，因而我們之中的某些即使不是最聰明的也是最有远見的有力人物，开始對他們所謂的自由党的“渗透政策”寄以很高的希望。我們的这些同胞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來告訴我們，他們說：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种逐漸的过渡，以致我們不能覺察得到这种过渡；而且我們能够叫“我們現在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的这样一天，将永远不会到来。这些人喜欢把我們当中比較單純的、不同意他們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是一个極端拖延的过程的那些人比喻为这样的一些兒童；这些兒童被教导說，下雨的时候云層就会下降，这些兒童在一个雨天失望地从窗內看出去，却未意識到云層正在他們眼前以雨珠的形式降下来。对于这些小心的人我回答說：虽然他們的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將是一个逐漸的过程的論点，包含着許多真理，但是当下述的这样一

^① 值得注意的是：特别是为土地利益的获得者服务的那些报社，同时也就是首先暗示用立法的方法来对付巨大的工業壟断組織可能有好处的那些报社。

天到来的时候，我們一定能够說我們已有了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那就是当沒有一个人或人的集团握有生产资料，握有使生产者的劳动会受到剝削的财产所有权。而且，虽然他們的生动的比喻是一个快乐而又有詩意的牵强的比喻，这仍有待于这一代以及下一代的社会主义者的聪明，去决定究竟这一个“云層”是要以一种令人清醒的社会主义的陣雨降下来呢，或者是要以陰郁的急进主义的毛毛雨降下来。这种毛毛雨带来的污点比水分还多，它把每一件东西都弄脏了而沒有把任何一个地方弄干净。

急进主义者左翼的这种渗透政策，虽然無疑是今天政治活动中的一件事实，可是仍值得我們稍微进一步加以注意；因为对于这种渗透政策的后果，存在着两种可能的与有条理的看法。一种看法認為：这种渗透政策的后果就是慢慢地把社会主义者吸收到自由党中，而且由于这样一个海綿般的有机体的活动，整个租金与利息将要轉移到公共控制之下而永远無需有一个肯定而且公开主張达到这样一个目的的政党产生。根据这一种理論，这样的一天将会到来，那就是：不久以后，公开的社会主义者与非常社会主义化了的急进主义者，在許多选区内会强到势均力敌的地步，而且会强到足以驅使进步的候选人采取比他自己願意采取的更进步的立場。那末，或者用弄权的办法，或者用在选举中实际支持反动的竞选人的办法，社会主义者与急进主义者将能够以某些人的落选来威胁自由党人。自由党人，由于在傳統上是能屈能伸的人物（如像所有具有吸水性的物体一样），将要被迫讓步或者提出妥协；而且将要或者采取某个最少数量的社会主义化的提案，或者允許社会主义者在代表之中占一个份兒。在相繼而来的各次选举中，自由党的这种讓步及妥协的数目及重要性将要逐渐增加，直到最后，社会主义者和急进主义者获得胜利为止。

現在，在我看來，這些對前途抱着希望的人們，是聽任他們的願望歪曲了他們的理智。在這一個預言中，個人在觀察上常有的錯誤 (personal equation) 起着太大的作用。一般而言，無論是尚未完全社會主義化的急進主義者，或是最近才與純粹政治上的急進主義分開而仍舊是大大地受到黨派關係和傳統影響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感覺到很難相信；他們曾經為之工作得這樣長久地、這樣誠實地、這樣令他們感覺到滿意的那個自由黨竟是一個沒有前途的政黨。這些急進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在很多場合下是與信奉急進主義的某些不很重要的領導人具有很親密的私人友誼，而且有時也是受到這類人中地位較高的領導者的提拔的恩惠的。這類社會主義者和急進主義者，是有機會在“進步的”報紙中的某些地方去發表他們的政治見解的。當然，在所有這些友誼和恩惠中，絕沒有一種是有損於他們的臉面或是對他們的動機或誠意有絲毫懷疑的；可是，這些友誼和恩惠確是使他們的判斷着上了顏色并使他們判斷錯誤。他們易于忘記了有許多民主主義的綱領（如像我所談到過的）尚待實行。成年男子選舉權、上議院的廢除、國教的廢除、議員的領取報酬，所有這些自然都可能是，而且十分合乎邏輯地是這樣的一些人所願望的。這些人就像櫻草會的勇猛的武士那樣，頑強地抓住私有財產不放。這些人認為社會主義綱領的主要條文完全是存在於實際世界——“實際的政治範圍”以外。可是，社會主義者的選舉權和發言權，是完全在這個實際的政治範圍以內的，並且這樣一點是日愈明顯的，那就是：沒有這些社會主義者的選舉權和發言權，上述的那些抱負就很少有實現的機會。現在，從顯然講求實際的自由黨人的觀點看來，只要不是爭奪到下議院議席的時候，在選舉當中不對社會主義者作些讓步是沒有任何理由的。甚至當社會主義者要求下議院議席的時候，用某個棘手的政治問題

来扮演目前地方自治問題所扮演的角色不是要容易得多嗎？于是，在講求实际的政客們的發紅的眼前，就展开了無止境的飞黄騰达的远景——他們这些近視的眼光看不到鼻子之外的东西，而且，仅仅在这一个近視的距离內，这种近視的眼光才帮助了它的主人达到目的。

如像往常那样，急进主义者在某种限度內对社会主义者信賴是合理的。对于我們来說，各种制度的完全民主化在政治上是必要的。但是远在这种完全的民主化实现以前，我們將难以忍耐并且急进主义者也会發起怒来。

有如亨得曼先生以該死的（但是是最老实的）重复一再对全世界宣称的那样，我們是“一个正在成长的政党”。我們虽然是在緩慢地吸收党员，可是我們确实是在吸收党员；而所有那些来参加我們的人，如像那些新办的美国报纸一样，都是要“坚持下去”的。我們的信仰，我們的理智，我們的知識都告訴我們說，偉大的进化力量是和我們在一起的；而且我們中間每增加一个人，都使我們按几何級数比例地愈来愈不能容忍政治上的推諉。我們直接地感觉到，只要我們强到有最少的一点机会在球賽之中获得胜利，我們就要被原則和意向二者所驅使把我們的一个球队送到球場上去。他們將要面临着二个正統派政党联合起来的或者是不联合起来的反对，就如像被击败了的社会主义者候选人在1888年11月学务委员会竞选中所遇見的那种情况一样。不論我們的成功是大、是小或者甚至是不存在，我們都会受到急进主义者幕后操縱人及目前是这样亲切而又礼貌的急进主义者的报纸的非难。我們与急进主义者的联盟到此将要結束。

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贏得我們的暫时的同盟者（目前的好朋友）的敌意。我在前面曾經談到过；在一个可能提出的急进

主义者的綱領中的某些反动的条文，它們虽然看起来与社会主义有一种奇怪的类似之点，但它們实际上与社会主义是相距天远。对于这些提議我們不但不能支持，而且必需積極地猛烈地加以反对。只要一看到这种反对的征兆，不論当时自由党的牧羊人是誰，整个自由党的羊群将会對我們所采取的路綫齐声叫喊。瘋羊的凶猛是人人聞名的；而我們將要得到現在所大量給予自由統一黨員 (Liberal Unionist) 同样多的怨恨、生气和憤怒。

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分裂的直接后果，将是一个明确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成立。这个政党主張生产資料与交換資料的公有，并使其他所有的考虑都服从于这样的一个目标。于是下議院将要隱約地反映出議會以外的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而在下議院內，我們將要看見(如像在一个昏暗的弄脏了的鏡子中所看見的那樣)某一种“界限分明的貧富对立”。关于这种对立，所有听过社会主义者演講的人都听到了許多，而且，据推測，这个世界是一天比一天地更趋向这种对立。于是，我認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同样地将要开始，这个过程比社会主义者的被吸收或急进主义者的迟緩的渗透更为可能。换言之，即把急进主义者中的一部人吸收到明确地贊成私人資本的政党的这一边而把另一部分人吸收到明确地反对私人資本的政党的那一边。

一旦一个真正一致的社会主义政党形成以后，經濟領域中的情况将要在政治領域中得到反映。如像我們所了解的奇迹一样，急进主义者将不再有活动的余地。每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者的胜利，每一个前哨的进入，每一个堡垒的攻占，都将繼之以一大群一大群受惊的和富裕的急进主义者，在下議院中跑到另一边去，并又在那里形成一个真正的前綫。最后，政治斗争的陣式将变为一个人数稀少的反对党面对着一个巨大而有力的多数党，这个多数党

是由一些他們的真正的或幻想的利益会在財產的剝奪中受到損失的人們組成的。

講到这里，社会主义的远景已足够清楚和明显了，并且無需超人的啓發就可看清它的細節。所需要的只是一个正常的眼光以及一个沒有井蛙式謬見的头腦。在这方面前途是黯淡而且渺茫的；而且要穿入到那个包裹着辽远的未来的霧里去是沒有什么益处的。

許多事情都有賴于負有高尙的使命在社会主义政党早期的議會生活中去决定政策和指导策略的那些人的勇敢、寬宏、坚定、机智、远見以及(最重要的)不可腐蝕性。社会主义政党迫切地需要一个比过去議會中的偉大人物同样能干而且更为忠实的領袖。人們的期待的眼光，現在在新的民主主义的年青的党人中找不到这样的一位領袖。这样的一位領袖，現在也許还在搖籃里或者在育嬰室里与他的同伴們分享玩具和糖果。事情必然是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一位領袖，必須是一个能够摆脱狂風怒濤时代^①的回忆、卑無足道的嫉妒、經常的錯誤和动摇的信仰的人。他必須要使他的事業成为一个沒有失敗并且不会使人怀疑到有污点的記錄。

但是，無論我們这些提出社会主义的人們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凡是来听过这一系列演講的人都可以确信：無論这个斗争是如何地漫长和使人感到疲乏，每一天都給我們带来了胜利。凡是在經濟領域中抵抗社会主义的那些人，必然也是反对国家的主权和权力的人。每一个新的工業發展，将要使我們的論証更为有力，并把更多的战士带到我們的队伍里来。組織劳工工作的不断完善化，将要使工人們一点鐘比一点鐘更快地意識到他們的生活是一

^① 指十八世紀后半期的文艺复兴运动。——譯者

个集体的生活而不是个人的生活。無产階級即使在今天已經是一个唯一真正的階級，这个階級是由这样的一些人所組成的：他們除了把他們所形成的那个聚合体的地位提高而外，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期望的。生存竞争的强化一方面使得資产階級与資产階級互相合并，一方面也迫使工人团结和統一起来。資产階級自認他們是在衰落了。竞争的尖銳性将要一年比一年地使生来就沒有資本的人更难参加竞争，将要使資产階級丧失它現在从有教养而無錢的青年人方面所得到的支持（这些人的物質利益最后必定会战胜他們的階級同情），并将丧失来自那些唯一的願望就是謀求出路的工人們的支持。正在成长的这一代工資劳动者，他們将不再像現在一样地被党派斗争的灰塵与烟霧所迷糊所惑乱。他們将要一眼就能識別出一个朋友和一个敌人的制服。在为社会主义事業所进行的斗争中，“絕望”将要变为“希望”。

对于那些具有願意听聞的耳朵和具有理解力的头脑的讀者們來說，这些演講已把这样的一桩事弄得足够明白了，那就是：單純的物質利益已足够提供一种强到足以粉粹壟断組織的动机；因而繼壟断組織而来的将是社会主义——否則就会是混乱状态。但是，小我的利益将不是目前帮助我們并在将来指导我們的唯一力量。天使們是站在我們这一边的。大量的人类貧困的經常存在，在受过教育的階層中不断地引起了深刻的不滿。这种不滿是一种精神上的不安定，它使得卑下的人們陷入悲觀，并使得高尚的人們探討問題。悲觀情緒麻痺了那些可能反对我們的人們的手臂，并使他們的心脏丧失力量。关于社会主义的探討，証明了它是建立在历史、道德和經濟这三个磐石之上的。这种探討給以从事这种探討的人一个偉大的希望——这个希望一旦能进到人們的心里，它就能够使人們生得愉快死得甜蜜。借助于社会主义理想的光

輝，人們就會發現罪惡——而且發現這種罪惡正在消失。人們隨時可以開始未來的更純潔、更勇敢、更高尚的生活；人們將堅定而煥發地，以堅決的步伐、不移的眼光和勻稱的脈搏向前邁進。

· 正當暴風雨在怒號並且天空布滿了最黑暗的陰雲的時候，社會主義的理想發射出了最神聖的光輝，它囑咐人們去相信詩人的靈感而不要去注意那些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好的政客們的半駱，它囑咐人們去相信：

“儘管如此，儘管如此，
那事還是要來，
就是全世界
人和人要成為兄弟。”^①

① 此詩為英國詩人羅伯特·本斯(Robert Burns, 1759--1796年)所寫。

